

李忠尚 著

第三条道路？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
理论研究

学苑出版社

D089
1

95958

DI08A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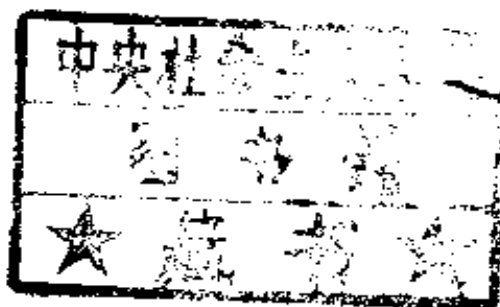
第三条道路?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
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李忠尚 著



200123464



学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第三条道路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著 者:李忠尚

责任编辑:刘小灿

封面设计:张 弢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6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 号

印 刷:河北省大厂县胶印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3.375

印 数:0001~1800 册

版 次:199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80060-451-9/B·8

定 价:8.45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哈贝马斯与李忠尚对谈录

——代序

1987年10月，哈贝马斯与李忠尚在德国吉森和法兰克福讨论了“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有关问题，并商定继续进行合作研究。1989年至1991年，李忠尚应哈贝马斯邀请两度到法兰克福大学从事合作研究，主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在此期间，两人多次讨论了现代西方哲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等问题，对不少哲学难题、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难题有所突破。之后，两人商定，将讨论的主要问题书面整理出来，以对谈的形式公开发表。由于所讨论的问题多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而且是哈贝马斯九十年代的新观点，所以特在这里发表，以飨读者，以作代序。

哈贝马斯，1929年6月生于法国杜塞尔多夫，世界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1954年获得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起任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1971年任位于施戴昂堡的、马克斯·布朗克协会所属的、科学技术世界的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1982年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至今。其主要著作有：《公共性的结构转变》（1962年），《理论和实践》（1963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认识 and 兴趣》（1968年），《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年），《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等。

李忠尚，1953年9月生于陕西西安，1980年至1984年10

月进修深造于德国波恩大学哲学院，1984年获得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1989年至1991年，应邀赴法兰克福大学与哈贝马斯从事项目合作研究，客座教研；1977年至1979年曾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1984年至198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主任、副教授，1986年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早期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研究》（1984年德文版）、《异化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1985年德文版）、《“新马克思主义”析要》（1987年）、《软科学大辞典》（1989年）、《新智囊论》（1990年）、《现代软科学》（1991年）等。

李忠尚：哈贝马斯先生，我们的合作研究项目《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进展顺利，尤其是关于马尔库塞等人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研究已基本完成。因此，我提议今天专门讨论哈贝马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研究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问题。我认为，您的理论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将系统理论和交往理论引入了社会分析领域，另一方面用语言哲学的陈述形式取代了黑格尔等人的传统。毫无疑问，您的理论和语言都已自成体系，您在继续着自己的理论启蒙工作，您已被公认为当代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如卡尔·奥托·阿佩尔所说是个“新马克思主义”者？

哈贝马斯：“世界著名”这一定语我理解是中国朋友的礼貌用语。您我熟知，毋需客套，直接回答您的问题。的确，在联邦德国我曾长期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尤其是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

论连系在一起。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一方面提出了一种带有深刻的黑格尔烙印的马克思解释学，另一方面将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同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结合了起来。这里已经集中了由豪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阐发的后期资本主义理论中的所有动机。当然，所谓的批判理论已经远远背离了自己的马克思的起点。我以此不仅指它的纯粹学术特点，而且也指明明显的内容上的修正。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证明了一种巨大的稳定性和学习能力；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努力并不在于延续危机分析，而更多的是在于对补偿危机的和起稳定作用的现象和机制（首先是在文化和社会化领域内）的分析。我本人在完全变化了的形势下再次（即50年代末）研究和结合具有浓厚悲观主义色彩的《启蒙的辩证法》，在60年代试图更好地解释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找到与当代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有机联系。

李忠尚：如此说来，您不是新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以自己的独特哲学贡献而同属“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您是否能接着谈谈，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正式称谓的社会批判理论由于豪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工作而自成体系并由您为代表的第二代加以发展，即概念和发展问题。

哈贝马斯：豪克海默在美国的政治避难时期更多地出于伪装的原因而发明了“批判理论”这一名词。后来这一名词就在字面上铸成了一个学派，用来概括豪克海默和他本人小圈子——除了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之外，有波洛克、罗文塔尔以及尚有一定距离的艾利希·弗洛姆、弗兰茨·诺伊曼

和奥托·克尔希海姆——的理论工作。阿道尔诺和豪克海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重建之后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自从七十年代以来，第二代所走的道路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我的“交往行为理论”即是这些方向中的一个。它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法兰克福社会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当然，任何一种传统之生命力，都在于人们毫不犹豫地借鉴新的经验进行必要的修正。

李忠尚：对，任何一种理论都要不断发展。关于您的理论，我以为，在70年代之前的重点之一是进行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譬如率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这一点上大概可以说，您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尔库塞命题的研究和发展，即“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了解放的桎梏，变成了人的工具化”。您亦曾指出：“马尔库塞关于技术和科学在今天也具有了统治合法化的功能之基本命题，对于分析变化了的境况……具有关键的意义。”因此，我大概可以断定，这也是您所从事的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结论，即技术和科学是意识形态。您是否能简要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主要思想，并阐述您的意识形态观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意识形态观的区别。

哈贝马斯：我著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问世于1968年，当时还旨在反对某种技术观。命题的核心在于，无选择的物的规律性的召遣和独立的经济、工业和科学复合体的不受影响性之命题，只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历史上变化的结构框架条件上转移开；这样的命题不必要地限制着进行实际政治干预的空间。我当时分析了由哈那·阿伦特更

新了的、亚里士多德的“技术”和“实践”范畴，因为我想提醒人们注意，国家公民的政治交往在一个民主的共同体中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生产力，与此相反技术和科学的生产力不可能独立化。

当然，人们不可以从古典的意义上将从这样的技术观中得出政治讨论的“物的规律性”之技术和科学描绘成“意识形态”。马克思研究的是完全不同的现象，首先是现代理性法则和政治经济学的从规范上包罗万象的流传，即自由主义本身。他将此视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必然虚假的意识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他用《德法年鉴》中的文章将此付诸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对自身的批判潜能被发动了起来。这些思想已不再适用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不仅阶级结构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而彻底得以改变，而且意识形式也改变了。因此，我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更多地谈到的是“残碎的”意识，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列宁的反映论导致一种非专门的、即过分泛化的失去了其批判内容的意识形态概念。

另一个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论判断问题。剩余价值理论无疑有许多我在过去的著作中研究过的问题。请您允许我在这里强调指出，我从未说过，应用研究和技術革新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面对简单劳动力和复杂劳动力的技术和科学无论如何构成一个附加的源泉。

还有一个问题是早年卢卡奇曾经讨论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形式和结构之间的联系。卢卡奇将马克思

提到的商品拜物教视为物化意识的所有形式的楷模；阿道尔诺在文化工业的理论中继续发展了这一命题。然而，两者在今天从经验上都不再可能保留了。

李忠尚：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交往行为理论对您“更新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在于何处？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书中对此“至少暗示”的是什么？以后又做了哪些扩展？

哈贝马斯：这个问题难以用简短的话语来说清楚。一般来说，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至少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劳动领域以及同科学上客体化了的自然的技术交往领域片面地依赖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理性潜能也在交往行为领域获得展开。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发展也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并且在新的社会形式的生成中甚至做出了先行者的贡献。由此观点出发，人们可以认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史和宗教史分析对于解释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是有益的。马克斯·韦伯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现象来理解的东西，不可能以一个简单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图式来表述。

《交往行为理论》特别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蕴含于生活世界和日常沟通实践的理性潜能。这样的理性潜能不仅存在于劳动中，而且也存在于社会的相互交往中。在这方面我要讲的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说的就应该是真实的或正确的；以此也就意味着，观念性的一部分闯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这样的作用要求最终只能用论据来说明。以沟通为意向的日常实践与不可避免的观念化交织在一起。观念化则属于日常语言的媒介，我

们生命的繁衍也恰恰是通过这一媒介来实现的。如果父母要教育孩子,如果健在的人要学习前辈遗传下来的知识,如果个人和群体要合作,即不动用暴力而和睦相处,那么他们就必须进行交往行为。实际上也存在着只有通过交往行为才能完成的社会职能。在我们超主体划分的、重叠的生活世界中,包含着一个宽泛的(当然对于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可抵抗的),没有它日常实践根本不可能进行的背景允可。

因此,符号结构化的生活世界也服从于执著的理性化。无论如何现代社会中人们可以观察到,文化流传变得具有反思性,意识为规范的陈述需要而增长,社会化过程促进着类似抽象的自我同一性的东西,而自我同一性正摧毁着传统的角色同一性的桎梏。生活世界的这一理性化与专门从事物质的社会再生产的、经济的和行政的分配制度产生某种矛盾。我在这里意在说明制度和生活世界的“调整”。

马克思从本质上正确地描述了社会现代化。它一方面从政治统治秩序中看到了一个通过市场来调节的经济制度的矛盾,另一方面考察了一个经济生命力不强的国家机器的稳定性,而这一国家机器却作为税收国家依赖于非政治管理的社会产品并且同时对这一经济制度起作用。然而,我认为,人们不应仅仅以阶级结构变化的观点来理解这一确定整个现代的进化论步骤。系统理论清楚地告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合法统治一起而来的也有整个社会职能的专门化,而这一专门化则意味着整个制度的差别矛盾的更高水平。简单来说,以此达到了效益能力的提高,当然

又是以日益增长的危机系数为代价的。于是，阶级结构确定下来，就像经济和国家管理赖以区分的媒介，即交换价值和行政权力在生活世界中从法律上被结构化一样。阶级结构决定了形式上平等的权利之内容上的不平等，赋予具体的生活形式以社会阶层各别的图像。

另一方面，以交往的日常实践为其中心的生活世界不构成被动的或者无抵抗的媒介。它们通过劳动的和消费者的角色，通过国家公民的和当事人的角色与经济和国家机器处于交换之中。它们肯定会被后两者“殖民化”，被“异化”，但是它们并不仅仅听任经济干预和行政干预的摆布。在非常情况下会发生受压制的生活世界的抵抗战争，即社会运动。如果人们从制度和生活世界的双重前景来观察社会动力，那么人们就得面对一元论的简短结论。物化效果同样可以从官僚化以及从公众的和私人的生活领域的金钱化中得出。人们也得面对整体论的简短结论：譬如说一种现代经济就在所有的生产关系中保留着一种制度上的固执。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就说明了这一点。人们不可以期望，客观的资本现象将简单地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废除同时消失并且能够同时自动地返还遭受价值规律压迫的生活世界以其自发性。

李志尚：哈贝马斯先生，我相信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和看到的、您关于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所作的最精彩、最简短而又深入浅出的表述。我们虽然在观点上不可能完全取得一致，但是都在从事着哲学研究，而且合作得卓有成效。我们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本应是知识分子及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作用，但出于时间原因，是否最后请

您对中国哲学界以及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讲几句话。

哈贝马斯：对中国的发展我所知甚少，难以表态和提出意见。我衷心希望拥有自己伟大的文化遗产的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经济发达，生活幸福，政治民主。特此向您和您的中国同事以及中国哲学界致衷心的问候。

（忠哲译）

目 录

哈贝马斯与李忠尚对话录——代序.....	(1)
第一章 导 论.....	(1)
一、马尔库塞与“新马克思主义”.....	(5)
1. “新马克思主义”概念.....	(6)
2. “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和 “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异同.....	(11)
3. “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17)
二、马尔库塞的思想概貌及其发展.....	(29)
1. 第一阶段(1928—1933年).....	(30)
2. 第二阶段(1933—1941年).....	(34)
3. 第三阶段(1942—1964年).....	(35)
三、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观.....	(39)
1. 马尔库塞马克思观的基本倾向.....	(41)
2. 马尔库塞马克思观的“新发现”.....	(44)
3. 马尔库塞马克思观的思想渊源.....	(46)
4. 马尔库塞的个人主义的乌托邦.....	(50)
第二章 “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53)
一、马克斯·豪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论述.....	(57)
1. “批判理论”的前奏.....	(57)
2. “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	(59)
(1) 时间上的差异.....	(60)
(2) 认识论上的差异.....	(60)

(3) 认识论基础上的差异	(61)
(4) 非经验科学的哲学立场	(61)
3. “批判理论”的独立性	(62)
4. 豪克海默的悲观主义	(66)
二、马尔库塞对“批判理论”的哲学描述	
——马克思主义批判论	(70)
1. 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的和机械的唯物主义	(73)
2. 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过时的 19 世纪的理论	(75)
3. 将“批判理论”解释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哲学”	(81)
三、马克思的批判与“批判的批判”	(88)
1. 马克思的批判	(88)
(1) “武器的批判”	(88)
(2) “对旧世界的批判”	(89)
(3) “政治经济学批判”	(90)
(4) “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95)
2. “批判的批判”	(96)
(1) 纯粹的“理论批判”与 “自我意识的哲学”	(98)
(2) “精神”与“群众”——“批判的批判”与 “非批判的群众”	(101)
第三章 马尔库塞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观以及他的 历史观	(105)
一、马尔库塞最初的马克思观	(107)

二、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历史性的理论”	(110)
1. “历史性”概念	(110)
2.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状况”的确定	(115)
3. 马尔库塞的“激进行动”论	(117)
(1) 神秘的“革命状况”是实现 “激进行动”的条件	(118)
(2) 对“激进行动”的确定	(119)
(3) “激进行动”的基本特征	(122)
(4) “激进行动”的参与者	(124)
4. “思维行动”和“不断革命”	(129)
三、马尔库塞将辩证法与现象学结合之败局	(134)
1. 辩证法作为历史性中对过去的“否认”	(135)
2. 马尔库塞的现象学概念	(139)
3. 马尔库塞的“辩证现象学”构想	(142)
四、马尔库塞的历史概念和马克思的历史概念	(145)
1. 马尔库塞早期的历史观	(145)
(1) “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146)
(2) “定在的历史性”	(147)
2. 马克思的历史概念	(149)
(1) “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 前提”	(149)
(2) 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150)
(3)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151)
(4) 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151)
第四章 马尔库塞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观	(153)

一、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理论“本来基础”的 “新发现”	(155)
1. 感性在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向革命理论” 时的决定性意义	(156)
2. 作为“本体论”范畴的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162)
(1)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最暂时的和最普遍的 特征”	(162)
(2) “劳动”作为哲学概念	(164)
(3) 马尔库塞的劳动本体论	(166)
3. 人的本质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基础	(170)
二、马尔库塞将黑格尔哲学解释为马克思理论的 “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173)
1.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基本范畴”	(173)
2. 关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真理	(176)
三、认识在扬弃物化中的作用	(182)
1. 从人的本质来解释外化劳动的可能性	(182)
2. 识别物化的认识是扬弃一切异化的杠杆	(187)
四、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与“人的解放”	(189)
1. 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	(190)
2. “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概念	(192)
第五章 马尔库塞的旨在扬弃异化的个人主义的 共产主义	(193)
一、马尔库塞的“异化”概念	(197)
1. 共产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198)
2. 扬弃异化的顶点——废除劳动	(203)
(1) 废除劳动论	(203)

(2) 废除劳动论的具体化	(205)
(3) 马克思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	(208)
二、埃里希·费洛姆的异化观	(211)
1. 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213)
2. 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213)
3. 人的本质的解放是马克思理论的目的	(214)
4. 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转化是马克思的主题	(216)
三、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相结合的尝试	(218)
1. 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	(219)
2. 马尔库塞与弗洛姆之间的分歧	(220)
四、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223)
第六章 马尔库塞的乌托邦社会发展观	
——现代工业社会理论 (一)	(226)
一、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社会”的批判	(226)
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性”和“一体化”概念	(236)
三、马尔库塞对“单向度思想”的批判	(243)
四、马尔库塞关于社会发展的“选择的可能性” 与批判之批判	(251)
第七章 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观	
——现代工业社会理论 (二)	(254)
一、从传统意识形态批判到技术意识形态批判	(254)
二、关于意识形态的几个传统概念的演变	(261)
三、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实质	(267)
四、马尔库塞的文明观及其评析	(268)
1. 关于实现“现代文明世界”的“彻底人道化” 问题	(271)

2. 关于“文化革命”问题	(275)
3. 马尔库塞的文明观评析	(283)
第八章 第三条道路?	(286)
一、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思想	(286)
二、马尔库塞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之总体批判	(298)
1. 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物质资料的丰富是否会消灭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问题	(300)
2. 关于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作用问题 ...	(302)
3.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的 问题	(303)
4.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	(304)
第九章 哈贝马斯的技术意识形态论	
——对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发展	(306)
一、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及其理论框架	(309)
1. 《公共性的结构转变》	(311)
2. 《大学生与政治》和《抗议运动与高校改革》	(312)
3. 《认识 and 兴趣》和《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	(313)
4.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到《交往行为理论》	(317)
二、哈贝马斯的现代工业社会之意识形态批判	(323)
1. 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 ——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	(324)
2. 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意识形态批判之阐释和发展 ——“合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政治内容” ...	(330)
3. 哈贝马斯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及其	

有关范畴	(334)
4. 哈贝马斯论现代工业社会的两大发展趋势与 技术和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339)
5. 哈贝马斯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 过时论	(344)
6. 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取代论”与 “唯一的抗议源”观点	(346)
三、哈贝马斯的技术意识形态论评析	(349)
第十章 九十年代的哈贝马斯与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理论 及“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	(354)
一、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的新认识	(354)
二、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理论及“新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意义	(361)
附 录 参考书目	(366)

第一章 导 论

20 世纪，是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首先，20 世纪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生产力和财富。按照未来学派的观点，农业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工业革命，则是第二次伟大的突破。而当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年达到顶峰之时，第三次浪潮便开始蜂拥而来。在这一阶段，能源结构的巨大突破，使原料大部分可以再生；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海洋工业和遗传工程等四大工业骨干群的兴起，使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信息环境的出现使第三次浪潮达到高潮。在此形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谓势头迅猛，例如（根据世界银行 1985 年世界发展报告）1983 年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为 11060 美元，其中英国 9200 美元，日本 10120 美元，法国 10500 美元，西德 11430 美元，美国 14110 美元，瑞士 16290 美元；1965 年至 1983 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2.5%。衡量经济发展的另两个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 1965 年至 1973 年 4.7%，1973 年至 1983 年 2.4%；而工业生产增长速度 1965 年至 1973 年 5.1%，1973 年至 1983 年 1.9%，其中增长快的行业大部分转移到第三产业。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也成正比例提高，据世界银行 1989 年世界发展报告，1987 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GNP）达到 14430 美元，1965

年至1987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3%，年平均通货膨胀率1965年至1980年为7.9%，1980年至1987年为5.2%，1987年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6岁。在医疗卫生与营养方面，高收入国家1984年每470人拥有一名医生，每130人拥有一名护理人员，人均每日卡路里供应量1986年为3375卡。在教育方面，高收入国家1986年入学人数占各入学年龄组的百分比为小学男生103%，女生102%；中学男生91%，女生93%；高等教育男女生合计39%。其中高等教育男女生合计占20至24岁人口数的百分比，英国为22%，法国为30%，西德为30%，日本为29%，瑞士为23%，美国为59%。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未列入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但我们曾一穷二白的中国也经历了很大的发展。例如根据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P)达到290美元，1965年至198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2%，年通货膨胀率1965年至1980年为0，1980年至1987年为4.2%，1987年出生预期寿命为69岁。在医疗卫生和营养方面，中国1984年每1000人拥有1名医生，每1700人拥有1名护理人员，人均卡路里供应量1986年为2630卡。在教育方面，中国入学人数占各入学年龄组的百分比1986年为：小学男生137%，女生120%；中学男生48%，女生35%；高等教育男女生合计2%。尤其是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1979年算起每年经济发展平均增长速度为9%，1992年甚至达到13%，不仅经济上了一个台阶，而且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被世人公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

其次，社会主义在20世纪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曲折的过程。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那么20世纪则是社会主义的新

世纪，苏联和新中国的建立使社会主义成为伟大的现实，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而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即使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也有宏观调控的计划成分，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中也有发展商品生产、培育市场的市场经济成分。因此，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而存在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 19 世纪及以往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以后半个世纪的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发展和完善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则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践创造性相结合的产物，是首次将社会主义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蒸汽化加巴黎公社式政权等于共产主义，列宁则于 1921 年提出全国电气化加苏维埃政权等于共产主义。事实上，列宁在实行苏俄新经济政策等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新观念，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等论著中作出了一些新的论述，他们的工作及苏联的实践最终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在这里既不否认苏联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和它将社会主义扩广到东欧及中亚等国的实践业绩，也不掩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僵化等错误，只是想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了理论创立和现实实践的两大阶段（当然并不是截然分开），并且在总结自身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就是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发展，这证明社会主义经过艰难曲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总结 20 世纪国内外发展

经济的经验的基础上的创造。这一决定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所谓市场经济，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国际化的客观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的形式和方法。从一般特征来说，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根本差别；中国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创造。因此可以说，这一新的飞跃有其新的内涵和发展。

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难以胜数。但归根结底，它更集中地体现在经济、政治两大领域。上述两大变化正是对20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变化的粗略描述。人们面对两大政治制度对抗存在的事实，面对社会现存的弊病和缺陷，开始思考社会发展的出路、战略及其如何向更高升华。于是，就出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理论”，出现了以其“非正统”、“非党派”、“非政治意识形态”的面目和众多的著述而异军突起、席卷全球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新马克思主义”原本是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内少数人对马列主义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异议而发起，但却是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并由一些西方学者按照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加以理论展开，而逐步形成一股世界性思潮的。它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和工潮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将其推向顶峰的当数海伯特·马尔库塞。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及其理论被大学生奉为反权威运动的圣经，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引起了中青年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主义的兴趣。批判和研究导向新的探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趋同论”应运而生，即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日趋接近。

认为有可能集合两者的共同点而建立一个在社会本质上同一的“新社会”。在经济领域，“趋同论”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同点体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过程干预的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它宣称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都处于一种瓦解状态，意识形态将由“社会知识”取而代之。它宣扬思想文化领域的和平共处。在国家制度上，它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同一趋向，主张由国家管理人员充当中间人。显然，它旨在建构一种新的理论和学说，走“第三条道路”。那么，马尔库塞和“新马克思主义”如何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他们的思想实质和政治思想到底是什么？其理论基础何在？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在扎实而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回答。

一、马尔库塞与“新马克思主义”

海伯特·马尔库塞，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继豪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之后社会批判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与前两人相比，马尔库塞在理论上和语言上简洁明了，直言不讳地表明他对政治实践的偏爱。因而他曾被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学生运动奉为“精神领袖”。他对马克思的研究在西方以“非正统的思维方式”而著称，以其内涵的“弗洛伊德和现象学因素”而别树一帜。联邦德国哲学家波斯特在《海伯特·马尔库塞之死》的祭文中，赞誉马尔库塞虽只进行了一场“反对单向度的生命世界的游戏”，但他的思想为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独具特色的“改良马克思主义”；“象布洛赫和卢卡奇一样，马尔库塞堪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客观上，也正是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和他的

“现代工业社会理论”把“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推向高峰，并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名声大噪。在纪念马尔库塞 70 寿辰的文集中，哈贝马斯、施密特等人称马尔库塞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大师和名星”。

1. “新马克思主义”概念

“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内涵和外延上尚不固定的、十分宽泛的概念。根据德国的经典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对那些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重新思考和解释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学术尝试的总称。面对新的历史情况，“新马克思主义”寻找新的机遇，试图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潜能的承担者和活动者等转纳入一个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被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者们所发展和运用，受到弗洛姆、马尔库塞、萨特、布洛赫和议会外的在野派以及新左派的发展和拥戴。^①因此，在德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被视为左派或左派理论家。在美国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人物传记辞典》中，主编罗伯特·戈尔曼以“非正统”标准划线，主要考察非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②他指出，“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成分复杂的运动，它的不同成分之间的裂缝也象非马克

^① 见《马耶尔大辞典》，曼海姆、维也纳和苏黎世，1983年版，第15卷第200页

^② 美国格林伍德出版公司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人物传记词典》，相反以“正统”标准划线，主要介绍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学派之间的裂缝一样宽”^①。他认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都采用一种哲学，到马克思著作中去探寻它的踪迹，并查清它的理论和实践后果。所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以解释学方式纠正马克思的不一致之处，而不抹煞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或他的革命政治。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不仅有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非唯物主义理论”^②。因此，他收“新马克思主义”又划分为“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和新左派”，其中第一种的第一个形式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指它带有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哲学的印记。戈尔曼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在理性的过程中，历史的目标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也就是人类对精神的反思认识。当精神物化为具体的价值和制度时，这一历史阶段将同民族国家的兴起重合。而在这一历史阶段上，文化将把主观的自由和客观的必然统一起来。良好的公民将使真理和必然具体化，反思的决心通过服从理性规律来获得自由。马克思则想改造黑格尔，以便在精神和具体世界之间重新建立联系。把黑格尔主义具体化这一做法既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根据马克思所表述的思想，人类解放是受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制约的，只有当后者是合乎理性的时候人类的解放才有可能成功在实践中，在这即将到来的主体性和客体性

① 《新马克思主义人物传记辞典》，格林伍德出版公司 1985 年版，导言。

② 《新马克思主义人物传记辞典》，格林伍德出版公司 1985 年版，导言。

的统一中，我们的真正的或本质的本性、我们的“类本质”才将会得到实现。因此，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所谓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后者最终将丧失它的反思的革命火花，沦落为考茨基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他们同时相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会反思地领悟主体和客体、特殊和一般的特殊渗透，并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化的非人性。“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由卢森堡、拉布里奥拉等人酝酿发起，但最终在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中得以理论展开。

“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形式是“非黑格尔式的或古典的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古典的唯心主义，共同点在于都把真理规定为一种在思想中主观认识到的、受物质而不是其它现象所制约的先验的抽象。非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则能使关于人类本性的资产阶级观点激进化，其巧妙的办法是首先说明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关于类本质的思想相似，然后指出资本主义对实现类本质的消极影响。戈尔曼在此基础上认为，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广泛的可能性。“非黑格尔式的或古典的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激进的人道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神学等。

“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戈尔曼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它试图把经验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从而来证明马克思本人是一个注重经验事实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的辩证学说也是严格地建立在具体的事实根源之上的。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规律也只是表现在实际的经验事实的条件中，批判的理论也只是建立在经验事实、说明经验世界并受现代经验方法检验的基础上，社会研究也只有

在普通承认的经验科学检验的原则指导下才能进行。于是，在“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利润率和阶级两极分化的规律，只有当被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事实证实时，才是可信的。因此，他们预言，马克思从未提出一种绝对而先验的原则来证明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灭亡厄运，相反马克思无法看到、也无法预见到的新的变化，如帝国主义、通货膨胀、广告化、工会化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可以用来衡量马克思理论的有用性。作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系统理论，“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聚集了一些思想家，主要有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马克斯·阿德勒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意大利的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和卢乔·科莱蒂等。不管他们之间的观点有多大的差别，但都千方百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一切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领域，即在他们看来正是迄今为止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忽略的领域。这也构成了“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

“体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按照戈尔曼的看法，源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体验主义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以非唯我论、非唯心主义标榜的体验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异化理论解释为创立和维护自由主体完整性的激进社会理论的理论工具，认为马克思确信人的不容贬低的自由和独立。这些马克思的体验主义解释者还进一步指出，历史是首先在人类行为者的反思的头脑中，然后在自我决定的实践中被创造的。他们认为，这才是被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误解了的、马克思的真正革命的思想。如果说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对“体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较大影响，那么存在主义也对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大多数“体

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存在主义现象学，认为“此在”把人类抛入历史以及社会认可的全部价值、行为和制定的框架中，宣称他们不提供教条的蓝图，而是只提供一种用于说明反思的社会体验但不作任何许诺的历史观。早期马尔库塞、萨特、梅洛——庞蒂等人构成了“体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并相信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剥削者的富有思想的信念和行动中，辩证的分析 and 革命的政治才能得以实现。

根据戈尔曼的划分，“新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种形式是“批判理论和新左派”。“批判理论”或曰“社会批判理论”，已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专用代名词。这些“批判理论家们在欧洲徘徊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所深切感受到的问题是，哲学体系常常僵化为把现实说成绝对理论和教条专政。按照批判理论家们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能看出隐蔽的社会相互联系，而这些社会相互联系一旦被掌握，就能消除压迫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资产阶级的、官僚社会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而不是纯粹的教义，它的目的在于用戳穿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词藻来实现人类解放”。可见，批判理论及其非教条精神变成了对法西斯主义、现实社会主义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新左派”是一种反理论、反权威的运动。它认为，理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思想是历史上各阶级争夺权力的另一种武器，因此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老左派”运用理论和思想来维护和扩大他们执政者的既得利益，那么“新左派”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有解放作用，即能动员群众采取革命行动，鼓励革命的言论和思想；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反思，等等。这些都曾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学生运动中得到体现。

可见，“新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范围极其广泛的各种理论，“从机会主义到唯心主义、经验主义、体验主义和纯粹的批判，每一种理论都能证明自己的政治策略是唯一正确的”^①。把这种种理论统一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正是戈尔曼说的三原则：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使人异化的、剥削人的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组织的所有形式中，唯有社会主义可以保证工人在工作场所受到公正的对待并从现代工业文明中得到好处。这三原则被戈尔曼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而批判研究和激进行动所要求的种种理论原则则构成“新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新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用马克思说过和写过的东西来使他们的社会理论合法化，即新的环境判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够用来回答新的问题时，就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戈尔曼的解释。

2. “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我国内学者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概括和解释，一是体现在《“新马克思主义”析要》^①一书中，二是涉及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理解和区分。众所周知，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旗号下，对马克思学说进行别出心裁的研究，形成了各种流派，如“存在主义的马

^① 见李忠尚著《“新马克思主义”析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对这些流派有的冠以“马克思学”，有的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的则谓之“新马克思主义”。这些称谓之间有何异同，有何区别与联系，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先对它们从概念上加以规定和区分。

“马克思学”一词从构词上来考察，源出希腊语，即由 Marx（马克思）加上 logos（学科）而构成 Marxologie（马克思学）。法国学者吕贝尔于 50 年代在《马克思学研究》杂志上首先使用了这一名词，继而在 60 年末、70 年初的欧美“马克思热”中流传开来。“马克思学”通常是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从纯学术观点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研究，所以有人又称之为“西方马克思学”。它具有浓厚的思辨性和非实践性。“马克思学”者们以“客观地”对待马克思来标榜自己，即把他作为一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对待，声称要对马克思的生平著述和思想作出“非阶级性”的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析。在他们撰写的著作中颇具影响，有联邦德国伊林·费彻尔写的《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967 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1976 年）、《社会主义——从阶级斗争到福利国家》（1968 年）、《共产主义——从马克思到毛泽东》（1969 年）、《从马克思到苏维埃意识形态》（1956 年）和美国的阿·古尔德纳、法国的吕贝尔等人的著作。

“马克思学”者在人员构成上，既包括象费彻尔等稳健派，也包括一些较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里讲的“较激进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亦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右翼人士。他们虽然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但基本立场是资产阶级的。至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总评价，我认为，总的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们还是激烈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揭示了在表面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背后对人的压抑和奴役。因此，他们实际上超出了学术的圈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已超出了“马克思学”的范围。）激进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满，对知识分子地位下降感到忧虑不安，有较强烈的改变资本主义某些弊端的愿望但又力不从心，故而想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足以支持自己主张的变革的武器和精神力量。此外，“马克思学”者中也有一批人是怀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的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人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御用学者。

“马克思学”学派在人员构成上的复杂性也导致它在学术思想上的多种多样，很难看出一个完整的体系或总的画面。但我们透过这些庞杂的现象仍可辨别出“马克思学”的本质。它实际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马克思学”是西方学者在书斋里从事的“纯学术性”的马克思研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在客观上毕竟使更多的人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学”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把它统统说成是纯粹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未免简单化了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的明显区别，在于它是由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而兴起，继而

由西方学者加以理论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最早由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一书中使用，后来安德森专门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一书，于是逐渐在英、美等国流传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高潮的标志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以戈德曼为首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从政治经济学和国家学说（实际上指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转向哲学、文化和艺术。也就是说，把旨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书斋里和大学课堂上的哲学。这一点，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相同之处。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构筑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并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抗衡，在政治上则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与列宁主义相异的政治组织原则。它不赞同列宁关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政党理论，主张走议会道路和选择自治形式。它特别注重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艺术是唯一能超越一切的力量，未来的希望正存在于文化艺术之中。它看重意识的力量，注重阶级意识和主观性范畴，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责马克思只顾全力分析“主观结构”——商品拜物教、异化和意识形态，而忽视分析“客观结构”——帝国主义和积累。从科尔施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命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是批判；而从卢卡奇起，则在解释哲学的作用时借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的论述，宣称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内涵有一种乌

托邦的解放精神。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断言关于人的解放才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从而主张“回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那里去。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根本点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解释马克思的理论，公开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渊源性。众所周知，卢卡奇首创和坚持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明显地继承了黑格尔乃至整个德国唯心主义的思辨传统。从黑格尔哲学出发解释马克思学说的这一特点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如和以阿德勒为代表的、具有新康德主义倾向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因其上述各种特征既不包括西欧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诸如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以及后起的被西方称作系统论者的波兰的科拉科维斯基。“西方马克思主义”虽是这种意识形态概念，但它还是有一定的地域性和一定的政治内容上的限制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员构成上，既包括那些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曾按照列宁主义从事研究工作、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的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员及其拥护者，也包括那些表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社会出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自己特定内涵的专门术语。我认为，它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曾风行一时，但已开始走向衰落。

“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较“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的概念。“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就在于它

要“重新发现”马克思和“重新设计”马克思主义。它不仅包括“马克思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包括一切非正统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想标新立异的人。在这些人中间，“信仰”马克思主义与否不是重要的标准。除西方学者广泛使用这一概念外，苏联学术界也采用了这个概念。如苏联哲学博士别索诺夫 1978 年出版的《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一书，就认为用“新马克思主义”来表示一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合适的”。

这里，主要想谈谈“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同。无疑，两者在主要内容、特征和基本理论观点上大体是共通的。它们都是旨在发现和设计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以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抗衡；都是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 19 世纪的理论，而以 20 世纪的“发达工业社会”理论自居。在革命观上，都是崇尚文化和意识革命，而不重视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在其理论宣言中，都是标榜自己为超阶级的、信奉人道主义的解放使者。在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上，又都具有富于幻想的浪漫色彩，都希望建设一个无压迫、无奴役、人本身能全面发展的理性社会。正因为如此，一些文章、著作在介绍和评述“新马克思主义”时，也包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以非正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分野的唯一标准，而不局限于具体的观点和立场。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而“新马克思主义”除此以外，还以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为基点来研究、注释马克思主义。这样，“新马克思主义”就包容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无

法收揽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其他形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文章在评介“新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只谈不能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包容的那些马克思主义流派，而不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内部派别。但这绝不是说“新马克思主义”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区别，在于它无地域性的限制。它不仅包括西方学者（如“社会批判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包括东方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研究，如卢卡奇、科尔施、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等。这样，它就超越了“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政治概念和地域性的限制，使它在事实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

总之，“新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概括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可以囊括东方“非正统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它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的情况说明，它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有概括性，更符合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际。

3. “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人们一般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于本世纪20年代初。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战争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严重后果，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而引起了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欧洲

掀起了革命高潮，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在革命高潮中，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也在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倡导和支持下应运而生。欧洲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18—1920年，在芬兰、德国巴伐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曾相继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或人民政权，接着又有1923年保加利亚、德国和波兰的革命起义。这些革命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们沉重地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同时也给世界无产阶级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

20年代初期，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苏联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也着手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内部开始了一场自发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探讨马克思学说的同时，开始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一些疑问和批评。譬如有的人就提出，西欧与俄国情况不同，工业发达，产业工人多，因而西欧的共产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其特殊性。最早以所谓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正名而实质上以“非正统派”的意见问世的著作，当属1923年出版的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它们问世后，在西方迅速流传开来，掀起了所谓“反正统”的“新潮”，后来被西方学者奉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而在共产国际内部，则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到了30年代初期，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首次正式公诸于世，随之在西方又掀起研究马克思的热潮，一时毁誉不一，众说纷纭。

当时，“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德曼、迈尔等人发表演说和文章，称这是“马克思研究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①，宣布要据此重新发现和估价马克思。由于不久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攫取了政权，接着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的研究也就束之高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斗争而威信大增；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已不止在苏联一国而在欧亚许多国家中建立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的斗争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它冲破了资产阶级的禁区，进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界和大学课堂，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热潮。尽管这种研究出于不同的立场、观点，褒贬不一，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远的不说，与萨特所说的那个年代^②，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西方的“马克思热”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高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民主德国组织一批学者作了专门的考察，描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脍炙人口，千百万劳动人民学习他们的著作，用他的思想来教育青年，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科学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家关于改

^①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载《社会批判理论思想》，法兰克福1968年版，第7页。

^② 萨特曾回忆说：“1925年，当我20岁的时候，大学里不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大学生不敢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敢提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害怕被禁止参加考试。……〔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没有教材。……我们这一代人同前几代和后一代一样，根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巴黎1960年版，第22页）

造世界的思想正在这里付诸实现，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下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建立起来”。“看来令人奇怪的倒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精神生活中，尤其是近年来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和著作的研究占据了不小的地盘”。“在报纸文章、学术刊物以及广播和电视中，确实可以说无日不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学说。同时，年轻的工人、大中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团体内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探讨他们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问题。大学生们要求，在大学也要开课讲授马克思。那些公开反共的教授们，现在自我标榜为‘马克思通’，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住房里的电视荧光屏上成套播映‘马克思述评’。大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总汇报》也想通过一系列的文章使它的读者知道马克思的‘思想大厦’”^①。

在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课程表上几乎都有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历史和工会等课程，而这些课程在某些地方是长期被忽视和属于被禁止之列的”。“左派学者的著作大量涌现……美国最大的左派出版社——每月评论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已超过40万册”^②。而且一些马克思研究者又都是一些高等学府中有影响的教授、学者。

“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西方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对20年代初所谓的“非正统派”观点加以继承和展开，逐步形成其理论体系，并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号召，影响着西

① 罗·鲍埃尔曼等：《〈马克思学〉的贫困。——对伪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批判》，柏林1975年版，第1—3页。

② 理查森：《美国教室中的马克思主义》，载1982年1月25日《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此处参阅了《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的译文。

方群众，一时名声大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如科尔施、马尔库塞等就曾被激进派学生称为“精神领袖”，他们的著作被誉为当时大学生运动及工潮的“圣经”。到了70年代中期直至80年代，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它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如施密特、哈贝马斯等）虽力图高举“新马克思主义”大旗，但终因时过境迁，已无所作为了。因此，可以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以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自命不凡，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观点，但它在基本理论上的苍白无力，使它不可避免地濒临解体的命运。

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上来考察，一般认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及葛兰西参与编辑的《新秩序》和撰写的《狱中札记》奠定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标志着“新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新马克思主义”在客观上代表了20世纪西方哲学新的一翼，虽被称作“革命哲学”，“未来真理”，但实际上是一种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带有混合色彩的人本主义哲学。从它所谓“新”的意义上来说，“新马克思主义”主张面向未来，声称要用“总体性的着眼点”来观察一切存在着的東西。因此，“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也讲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但它主要是一种哲学思潮；它公开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虽然“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客观上并不可能置身于政治之外，却在实际上脱离了社会革命实践。因而它首先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其次，“新马克思主义”极力主张要建立一种“新的”、“独立的”、“科学的”和“能代表一切阶级”的理论。这样，“新马克思主义”也就从根本上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由此可见，“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本世纪初出现的、想重新发

现和设计马克思并宣称要给马克思主义恢复哲学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

如上所述，“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的矛头首先是指向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些“正统派”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理解历史，但不能支配历史。“新马克思主义”猛烈抨击了考茨基和梅林等“正统派”对哲学所抱的“敌意”，但又把“正统派”看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不仅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修正主义（如伯恩斯坦等），都是非哲学的，因此都应加以批判。卢卡奇指责修正主义要科学社会主义而抛弃了哲学；科尔施则将“正统派”斥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科尔施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之间，起码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马克思主义同哲学（主要是学院派哲学）没有多少共同之点，哲学只不过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犯下的过失。于是，科尔施提出要给马克思主义重新确定方向，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

科尔施要求破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所谓禁区。他指出：假如把这个学说看死了，也就等于剥夺了这个学说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想一劳永逸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理，就会使历史进程丢掉辩证唯物主义并失去生机。“硬要把思维的规定及其联系抽象地纳入某种体系，就意味着放弃……唯物主义辩证法，意味着有利于一种只在理论中是‘唯物主义’的倒置，但在现实中仍是一成不变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辩证法的思维方式”^①。科

^①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法兰克福1966年版，第176页。

尔施据此宣称，既要反对脱离实践的理论——“正统马克思主义”，又要反对脱离理论的实践——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不配备上哲学就得停止自己的职能，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不相容的，其原因主要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活动，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政”。这里可以看出，“新马克思主义”从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起，就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新观点”。

“新马克思主义”从“哲学马克思主义”开始，经过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以及格罗斯曼、施戴昂堡等人的“新解释”，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达到高潮。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于本世纪20年代，主要成员是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的一部分哲学和社会学工作者。他们的思想首领首先是马克斯·豪克海默和特奥多·阿道尔诺。这批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试图在理论上为他们幻想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个人的自由进行呼吁。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存基础的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满。从世界观上来说，则反映了对哲学人本学的热衷，即人的问题成为他们的中心课题。豪克海默在30年代初就从此出发阐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自由、平等和道德（即康德的道德批判）的理想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关系的深刻矛盾。他认为，资产阶级道德本身会起着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①自由和正义的理想的内在主体就是理性。从理性的观点出发，由于现存社会未能使个人的一切天赋

^① 参看豪克海默：《唯物主义和道德》，法兰克福1975年版，第172页及以下几页。

和才能在有法律保障的自由中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非理性的。这个尊重人的理性社会的思想并非豪克海默的创造，而是由康德在分析道德意识时提出并被黑格尔后来接受为他的哲学的基础的。这说明了豪克海默思想上有德国古典哲学的烙印。他的社会思想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非常向往理性社会。这一思想和其思想渊源同样适用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其他成员（如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这一点已是公认无疑了。

豪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从黑格尔的社会学说入手来解释马克思的理论。在他们看来，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是这样的：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目的，因为个人的活动是以他人的需要为目的的。个人是作为自私自利者而存在的。自私的个人只有同其他人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才能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个别的人都以此方式为一般的实现，也就是为理性的实现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于是，理性通过行动的主体的活动而得到实现，社会即是主体本身的产物。所以，黑格尔提出将理性社会付诸实现的任务。黑格尔关于客观理性可通过个人的活动得以实现的思想，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说起了某种定调子的作用。他们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中得到了这个结论并以此建立了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即为实现理性社会必需的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理论中批判性的因素，即是马克思用他的范畴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的东西。于是，马克思主义就被简化为纯粹的社会学说，它作为包含自然和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特点就被否定了。这里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虽然从一开始就在口头上强调人的社会历史性，但实际上注重的还是人的生物本质，即弗洛伊德心理分析

学上讲的人的“欲望结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就在于没有很好地研究人的心理问题。于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课题就应是把自己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结合起来。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作新黑格尔主义解释和将马克思主义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结合起来的倾向，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两大特征。

在 30 年代，豪克海默、阿道尔诺、马尔库塞等人都曾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理论上认为改变现存资本主义关系是可能的。法西斯主义的恐怖政策和对成千上万犹太人的残酷杀害，使他们产生了对希特勒政权的强烈不满和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的幻想。他们对德国工人阶级未能成功地阻止希特勒政权上台始终不解，继而对工人阶级表示失望，最终断言工人阶级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了。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否定，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上的基本立场。这种倾向清楚地表现在豪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二次大战期间合写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这本书中表露出来的悲观主义和改良现实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他们的“批判理论”的作用。从这时起，他们以人道主义、正义和理性为旗帜，转向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转向批判现存的“工业化的、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们的批判却只是采用了马克思的一些术语，保留的只是批判概念的残余，只是一种纯理论的批判。马克思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被说成是荒诞无稽的空谈。在这一段时期内，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立场很近似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的错误都在于搞纯理论的批判和把理论批判同群众对立起来。阿道尔诺和豪克海默的这种悲观主义情调一直延续到二次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

马尔库塞在 60 年代初期曾承继了这种悲观主义的传统。他

于1964年发表的《单向度的人》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是研究“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所谓“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指这个社会中的“单向度性”。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经济成果是：劳动者的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准的提高，雇员和雇主在物质享受方面差别的缩小。其社会后果是由此而来的劳动者的被一体化，无产阶级变得安于享乐而丧失了革命性，发达的工业社会变成了“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并可以包含一切社会变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敌对阶级为了“维护改进现存结构”而联合起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人们满足于虚假的需要（物质需求），而忽略了真正的需要（精神的和意识的需求）的满足。人们虽然也有被统治的压抑感，但是由于“单向度的思想”窒息着人们的灵魂，使人们丧失了对现代社会进行合理批判的能力。马克思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同样也被资本主义同化了。于是，唤醒人们心理上的压抑感，使人们重新获得进行合理批判的能力，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少数杰出人物——发达工业社会的精华的肩上。他们应去唤醒多数人的觉悟，为他们疾呼，并去挽救他们。他们的革命主张不是最先影响无产阶级和依靠他们来实现，而是最先影响新生的社会力量：黑人、白人流浪者、其他阶层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等，依靠他们来实现。斗争的方式也在改变，马尔库塞将它称作“大拒绝”，拒绝一切苦斗和帮凶，拒绝对暴君式统治者的服从，直接参加抗议和拒绝运动。马尔库塞等人的“科学理论”于是就应成为“大拒绝”运动和（意识）“革命”行动的指南。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马尔库塞的态度有所改变。

他认为，“新生的无产阶级”（即上面讲的新生社会力量）在发达工业社会的精华（即一部分摆脱了“单向度性”的知识分子）的感召下，有可能去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但他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始终没有摆脱悲观主义的基调，也没有完全挣脱其学术框子的束缚。

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地理上毗邻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它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维也纳的一个学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克斯·阿德勒、奥托·鲍威尔、鲁道尔夫·希法亭和伦纳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其主要特征在于深受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理论体系上，它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社会学体系和“有关社会生活及其因果发展规则的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社会化的人类”或“社会联合”（阿德勒）。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而不是个体”，声称马克思主义所有探究的“唯一目的在于揭示事物的各种因果联系”。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就是分析近代资本主义各种因果要素的典型之作。它分析货币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分析银行业及其在托拉斯垄断经济中的举足轻重的统治地位，从而得出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性，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它虽在理论上有所错误，但无疑对列宁后来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强经济干预的情况作了考察。伦纳曾说：国家已经渗入私有经济直至它的最基本细胞，国家权力和经济趋于合并，国家权力被理解为强化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帝国主义时

代。希法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工人阶级通过夺取国家政权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统治下建立的联合国家（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都证明现代国家及其社会结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显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虽然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日益加强对经济干预的现象有所认识和作了一些有益的分析，但最终却得出了不同于列宁的错误结论。

同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还考察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结构。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人阶级变质”，使无产阶级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三种阶层：一是工人贵族阶层，包括享受优厚待遇的技术工人和职员；二是有组织的普通工人阶层；三是失业工人阶层。他们认为，这种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阶层标志了“现代社会的变化”，从而宣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他们由此而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幌子下的官僚专政”的政治主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上述解释和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及其变化所进行的分析，虽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思想资料，但它实际上正如共产国际所批评的，是“无所作为的资产阶级的开明理论”。它顶多只能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翼。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在理论上颇有影响的还有萨特和梅劳-庞蒂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对象。可见，“新马克思主义”的确早已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思潮，其参与者之众、

涉及国家之多、波及面之广，都是空前的而且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因此，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和加以发展，就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各种流派”，就应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气魄，也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马尔库塞的思想概貌及其发展

通过上述对马尔库塞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可以断言，马尔库塞不仅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是把“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推向顶峰的关键人物之一。我们的研究在这里从对马尔库塞及其思想发展的分析开始。

海伯特·马尔库塞，1898年7月19日出生于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曾参加过柏林士兵委员会的活动。1919年，他退出社会民主党并先后到柏林、弗赖堡大学学习。1923年，他在海德格尔指导下完成了题为《黑格尔的本体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比较》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他的哲学生涯。1923年至1929年，他在柏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1929年，他重返弗赖堡大学，想在胡塞尔指导下学习并作海德格尔的高级学术助手。但不久由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师生反目。马尔库塞看到在海德格尔指导下完成教授论文和取得教授资格已希望渺茫，遂离开弗赖堡。1932年，马尔库塞出版了自己几乎已完成了的教授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不久，马尔库塞的一位熟识者、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律监护人库尔特·利兹乐先生将他推荐

给马克斯·豪克海默，从此，马尔库塞的命运就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命运紧密相连了。1933年，当纳粹党在德国取得政权时，马尔库塞离开德国到社会研究所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分部工作。1934—1940年，他随社会研究所迁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战略情报研究所工作，作过东欧部负责人。10年后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从事苏联研究，同时兼任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他在这一段时期对苏联的研究成果于1957年在美国以单行本发表，题为《苏维埃马克思主义》。1954—1967年，马尔库塞任布兰代斯大学政治学和哲学教授。自1967年起任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1979年7月30日，马尔库塞死于德国，时年81岁。

马尔库塞的思想发展，虽十分错综复杂，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28—1933年；1934—1941年；1942—1964年。1964年后到他逝世前，虽亦可算作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年高体弱，实际上则是他整个思想的补充和完善。

1. 第一阶段（1928—1933年）

这段时期是马尔库塞思想上的奠基和初步展开阶段。其代表作主要有《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贡献》、《奠定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等。阿道尔诺称马尔库塞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为“从‘存在的意义’到对存在着的东西的揭示，从基础本体论到历史哲学，从历史性到历史”。这表明马尔库塞逐渐脱离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束缚，转向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在《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

的基础》一书中，马尔库塞旨在证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力量即是它的辩证性和历史性。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关于客体化过程即是构成生命存在的活动的论断是黑格尔的伟大发现，是黑格尔关于历史过程新观点的来源；黑格尔哲学的成败集中体现在把存在过程视为客体化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发展过程。马尔库塞始终强调，唯心主义为了有利于超时间的“绝对知识”观念，必须渐次破坏一切历史的、批判的范畴。既然黑格尔已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精神，那么异化就不存在了。客观世界的扬弃在时间上是任意的，“绝对知识”只是一个纯观念的结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世界历史在黑格尔体系中已经完成，但现实的历史象阶级社会中的矛盾一样却是继续存在的。马尔库塞在《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所表达的上述思想，正是他在这一时期研究、解释、“接受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也标志着他视野上的“地平线”^①。

可以看出，马尔库塞这段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线是：结合黑格尔研究，从海德格尔出发，试图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最初的解释和修正。他对马克思关于人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加以曲解，即承认人可以自由地创造历史，但不承认一定的客观条件，不承认人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把马克思关于人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同海德格尔的人类学加以融合，认为既然人能创造自己的历史、建构现实，那么也就能创造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就是还俗了的上帝。相反，谁承认客观规律，就是把自己活动的产物看作不是自己的、物化的

^① 阿·施密特：《海伯特·马尔库塞的存在本体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载《回答海伯特·马尔库塞》，法兰克福1968年版，第19页。

了。总之，在马尔库塞那里，辩证法成为一种主观的实践，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高高挂起、悬而不决了。其结果是完全抹煞了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

马尔库塞从上述他所理解的“历史是人的产物”的命题出发，认为人处于历史之中因而也就能认识自己的产物——历史。自然界则是外在的东西。人们从自然界只能通过自己的实践获取某些东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人们的实践也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只存在作为人们实践结果的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而没有自然辩证法。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的辩证性的原因在于人们的认识方式是辩证的；确切些说，“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而列宁则是以恩格斯为出发点的。^①在这里，马尔库塞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关系，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

马尔库塞的上述看法，即认为自然界由于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而无辩证法，使辩证法成了无源之水。众所周知，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对自然的改造，即生产劳动。人们只有首先在对自然的改造中才能逐步认识到自然乃至社会的辩证运动规律。因此，对自然观的考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②而对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考察，其核心在于把握辩证法的实质，其关键在于运用唯

^① 参见马尔库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贡献》，法兰克福1973年版，第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

物主义反映论去阐明自然界和社会的辩证运动规律，从根本上说明人的辩证思维的来源。^①总之，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不但未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且独创性地把唯物辩证法定义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尔库塞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必然涉及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总评价。在这个时期，他从存在主义、现象学出发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历史性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实践理论，即一种历史理论，因为历史就是“直接的实践”。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把卢卡奇《列宁》一文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直接引入他的马克思论。当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②时，马尔库塞则在此意义上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③。这表明马尔库塞在思想上已把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同；马克思主义被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被简化为一种历史理论。

归结起来，马尔库塞早期的辩证法思想基本上是前后不一致的、孤立的、片面的和以精神为主体的辩证法。在他看来，否定即是“否止”(Widerruf)，即完全消灭，不要一切桥梁和联系。革命成了对改良的拒绝、对历史的“取消”，即“灾难性的”行动。对立统一、质量互变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被否定了。革命在最终成了“神喻”，似乎已不需要任何客观条件，不需要任何危机；只要革命意识产生，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② 卢卡奇：《列宁》，载《组织和幻想》，德文版，第211页。

③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新贡献》，德文版，第41页。

2. 第二阶段（1933—1941年）

从1933年起，马尔库塞受聘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豪克海默、阿道尔诺一起着手创立社会批判理论。如果说在第一阶段马尔库塞颇受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影响，那么这一阶段则清醒地转向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公诸于世，马尔库塞欣喜若狂，宣称这是“马克思研究中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①。他研究马克思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开始从他的主观辩证法转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1941年《理性和革命》一书的出版，表明马尔库塞又重新开始研究黑格尔，不同的只是在于企图从黑格尔哲学中找到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真正出生地和秘密”。他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上只看到了某些同一性，而忽视了本质差别性，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其结果是把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学说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等同起来，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来源和马克思所讲的革命性变革的思想。于是，马克思主义就被解释为黑格尔哲学的简单延续。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尔库塞只部分地接受了流通和分配领域的理论。他在《资本论》中看到的惟有被简化为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的商品拜物教，对商品的分配和占有成了他的批判理论的中心点。他从流通领域导出革命意识，眼睛盯着阶级

^①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载《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法兰克福1968年版，第7页。

消费的可能性，从而忽视了整个体系这个出发点，结果是否定了资本主义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

对量变和质变、连续性和中断的辩证法的无知构成了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第二阶段的所谓唯物主义批判的出发点。他（口头上）借用列宁著作中讲的主观能动性因素批判考茨基等正统派为机械唯物主义者，批判他们对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的承认和盲从，实际上是暗讽第二国际以及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在实现人的个性解放的旗帜下，以主观辩证法偷换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概念。

3. 第三阶段（1942—196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力量之间的反法西斯同盟由于冷战政策的影响趋于瓦解。马尔库塞认为，与黑格尔哲学、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密切相关的争取自由的运动都失败了。从人们贪得无厌的欲望和贫乏的周围世界之间的矛盾中必然得出欲望放弃的结论。其结果就是人们的非生殖器官变成了毫无兴趣的劳动工具。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对欲望的放弃带来了现代的生产率、文化和技术，而所有后者的发展又是同欲望放弃的抑制程度成正比例的。最终，人们的思想在这种抑制下变形并被纳入现存制度之中。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革命者，而且也许正是革命失败的原因，正是压迫现象得以延续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融合的原因。因此，人的解放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求人的欲望结构的革命化。

在这里，马尔库塞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生物学上的欲

望结构式的修正，同时企图对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进行“改良”。在他看来，“否定”这个范畴就是同过去的连续性决裂。因此，否定之否定就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从而新世界和旧世界之间的遗传的和结构上的联系也就成为多余的了。这样一来，否定的力量就不存在其制度之内，而是在制度之外起作用了。工人运动因和过去有必然的联系（连续性），所以不可能再作为否定力量。最终，和工人运动、现实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的第三种力量——大学生为代表的否定力就应运而生了。

马尔库塞从否定的力量并不集中于某一个固定的阶级的手中的主张出发，继而宣称现代资本主义同化着几乎一切否定力，最终断言否定力只能存在于现存制度之外。他拒绝工人运动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工人运动同作为“灾难性行为”的革命概念不一致。他将欧洲工人运动史解释为失败的“链条”，将原则上的民主改革斥为社会民主主义。在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论述中，他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不是革命的主要问题，因为它不能解决自由和压迫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把个人的欲望结构解释为罪恶的渊源。他认为，“反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其欲望结构不平衡而引起的，而“侵略”则是欲望结构变形的结果。他没有将权力的形成归之于社会过程、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是归之于变态的欲望结构。他假定权力、组织本身是敌对力量，从而推论出：由于工人运动不能放弃这两者，所以工人运动也就是敌对力量。在他看来，既然欲望结构成为一切问题的症结，那么人们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改造人的欲望结构、改变人的本质。人们“应该为了解放而斗争。但是我们并不敢肯定，在

现实的彼岸等待我们的就一定是自由或者总体性”^①。马尔库塞的这种源于弗洛伊德的欲望结构论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状况，他把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思想情绪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强调指出，应激进地否定与过去的连续性，但却不得不悲观地面向未来。他在否定过去的同时，把尼采的“否定”概念、海德格尔的“否止”概念与马克思的“否定”概念等同起来。他奉行的辩证法就其实质来说是秉承了克尔凯戈尔的“质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思想。

在这一时期，马尔库塞还潜心研究了“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发表了不少有关的批判性论著。其重点是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象他对西方社会的研究一样，他对苏联的批判同样缺乏事实的依据，实质上是一种有明显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

马尔库塞在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把他的欲望结构论推向了高峰，其标志即是他于1964年发表的《单向度的人》一书。这本书曾在西方轰动一时，被称为西方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学生运动的“圣经”，马尔库塞本人则被称为其“精神领袖”。这本书又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发展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一方面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很少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带有悲观主义情调的社会批判理论推向顶峰。同时，这本书也表明马尔库塞的哲学社会学说经过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弗洛伊德等环节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1964年以后到他逝世前这一段时期，如果称作马尔库塞思

^① 马尔库塞：《论解放的尝试》，法兰克福1969年版，第85页。

想发展的第四阶段，也不是不可以的。在这一时期，一方面他对自己的结论作了一些纠正，另一方面为了使学生理解自己的理论而致力于通俗化的表述。他于1966年参加完一次讨论越南问题的会议之后，思想更为“右倾”。他认为，美国的工人阶级已被同化入资本主义制度了，而美国正是西欧的缩影；共产党在西欧已经社会民主主义化了；在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期内，西欧都不会发生革命的群众运动。在他看来，西欧的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从所上改良社会的能力。苏联由于和美国的对峙也不再具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大分裂、大改组，而和平共处政策却稳定着资本主义。这些他在《在野派的暴力问题》中所阐述的思想，后来在和广播电台记者的谈话中表达得更为清楚，而且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明确指出，由于生产力的主力存在于发达国家，所以社会革命的中心不在第三世界，而是在发达国家。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反驳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先在一个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胜利的观点；只有他才真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

马尔库塞的思想发展过程是曲折而又复杂的。他的以存在主义为基础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和他的“单向度理论”，都说明他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在马尔库塞的思想中虽然有一些有益的因素，对现代社会作了一些有启发性的批评，尤其是以他特有的方式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但他的思想本质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对立的，最终难免陷入悲观主义的思辨泥沼。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他的思想时应予以注意的。

三、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观

海伯特·马尔库塞的名字是与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形式总称的社会批判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团结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周围的知识分子，如马克斯·豪克海默尔、特奥多·维增格鲁恩——阿道尔诺、海伯特·马尔库塞、瓦尔特·本雅明、埃里希·弗罗姆等，“有志于消灭社会的不合理”^①。豪克海默尔后来回忆说：社会批判理论在30年代还“很具有批判性，特别是反对现存的统治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带来了可怕的法西斯主义……。”^②社会批判理论“寄希望于革命”^③，“希望法西斯主义能够被想建立一种人的和理性的社会的力量所战胜”^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和“进步的工业社会”的发展，促使社会批判理论发生了变化。豪克海默尔在1970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于是我们新的批判理论就不再是为了革命而出现的了，因为在国家社会主义被推翻之后，革命在西方国家里又会导致一种新的恐怖主义、一种新的可怕的情况。”^⑤这就清楚地显露出社会批判理论的本来面目，也说明他们所希望的革命绝不是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他们看来，批判理论已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溶为一体了。马尔库塞也认为，批判理论“在今天已比当时抽象得多了；它几

① 马克斯·豪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载于《批判理论》德文版第2卷第190—191页。

② 豪克海默《批判理论今昔》，德文牌第164页。

③ 马尔库塞《文化和社会》，德文版第7页。

④ 豪克海默《批判理论今昔》，第166页。

乎已不可能想象去掌握群众了”^①。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种从事“纯粹批判”^②的哲学；它最终目的在于进行一场意识革命。

60年代末的大学生运动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家”们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乌托邦式的革命的思想。法兰克福的大学生们当时甚至把海伯特·马尔库塞看作是他们的精神领袖。^③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马尔库塞后期集中精力从事“进步的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之研究”^④。他批判“单向度的”社会和文化，目的在于让人们认清自己的“单向度性”并唤醒人们否定的、批判的能力。马尔库塞试图走第三条道路，即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起来。他认为意识革命应使人性复归；他想用西克蒙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他主张无产阶级应该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无产阶级自己的历史地位让给新生力量，即“保守的大众阶层中”的“被歧视者和不得意者，也就是其他阶级和其他种族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低能者”^⑤。新生力量的斗争方式只能是“大拒绝”^⑥。尽管如此，马尔库塞还是放弃了大革命的希望，他在1964年悲伤地说道：“社会批判理论不拥有能够把当今和未来之间的鸿沟弥合起来的观念。”^⑦这就充分表露了社会批判理

① 马尔库塞《文化和社会》，第12页。

② 汉斯-马丁·萨斯《纯粹批判》跋，第254页。

③ 参见克拉尔《政体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辩证法之探讨》，法兰克福1971年版。

④ 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德文版第1页。

⑤ ⑥ 同上书第268页。

论的悲观主义和空想的本质。

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马尔库塞已很少使用马克思的范畴。这样，就使我们不得不对他还是不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怀疑。实际上，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对马尔库塞思想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相反在马尔库塞早期，他对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对青年马克思作了大量的研究。当然，他的马克思研究又是深受海德格尔、黑格尔、卢卡奇和豪克海默尔的影响的，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混合物。因此，我们绝不可只看到他晚期的“进步的工业社会”的理论，而忽视了他早期的思想。哈贝马斯在献给马尔库塞70岁寿辰的论文集中写道：不研究当时的马尔库塞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马尔库塞^①。在客观上，早期马尔库塞才真正算得上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而后期则主要是他自己思想的阐发，在思想上和用语上也已几乎完全离开了（包括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

1. 马尔库塞马克思观的基本倾向

在马克斯·豪克海默尔提出的“批判理论”之初，马尔库塞坚持了同样的立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了“（官方）科学”，但是却失去了它的批判特性；就象“启蒙”一样，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一种“否定的辩证法”。^②言下之意，马克思

^① 尤尔根·哈贝马斯“序”，载于《回答海伯特·马尔库塞》，法兰克福1969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豪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的辩证法》，德文版，第1—8页。

主义应把自己本身理解为批判（即批判、否定一切，包括其本身）的理论。于是，马尔库塞呼吁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另一方面，马尔库塞提出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机械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由于被过分地强调了它的经济方面而过时了，它成为仅仅是“19世纪的理论”。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并且也能够由他们的能适应20世纪形势的“批判理论”取而代之。这时的马尔库塞和他的同伴们，一方面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怀有极大的不满和某种程度上的敌意，同时他们又仇视法西斯德国，从而在理论上就想走自己的路——创造一种“新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幻想建立他们理想中的理性社会。

马尔库塞马克思论的思想渊源首先来自存在主义的鼻祖海德格尔。当时的马尔库塞想“从‘存在的意义’求出存在着的东西，从基础本体论走向历史哲学，从历史性达到历史”^①。他“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时间》的水平上”研习马克思的学说，并致力于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结合起来。他宣称，为了从历史存在的主观性出发来解释世界（历史），应该反对强调客观规律和客观性。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实证哲学”^②，看作是一种历史哲学，是一种关于历史性的理论。与此同时，马尔库塞还批判了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信徒的“机械经济主义”。他认为，海德格尔哲学使被第二国际的成员们忽视的“历史”和“个人”这两个概念获得了它们所应有的价值。但是，马尔库塞对此所作的努力，即想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融合起来并创造出

① 阿道尔诺：《评马尔库塞的〈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载《社会研究杂志》第1卷，慕尼黑1970年版，第409页。

② 施密特：《马尔库塞的历史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法兰克福1968年版，第19页。

一种“新的学说”的企图，却遭到了失败。

对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具有特殊意义的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当这个《手稿》于1932年第一次公诸于世时，马尔库塞象发现了新大陆般地欢呼雀跃。他说，《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研究史上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①。的确，这对马尔库塞本人的思想发展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将《手稿》的发表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源泉”^②，于是“人的本质的确定”就成了“马克思理论的本来基础”^③。人的问题，即人的历史存在，在他看来成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同时，马尔库塞将异化理论解释为马克思理论的另一核心。在这里，他援引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在30年代那种“不稳定的”^④形势下，他的思想发展逐渐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回到了黑格尔哲学。他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称作黑格尔哲学的延续。在异化问题上，他集中研究了“异化劳动”这个现象。他对马克思所作的解释使人得出这么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在他几乎所有重要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只是研究了异化问题。实际上马尔库塞借此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倾向绝对化了，把共产主义歪曲为“一种新形式的个人主义”^⑤。马尔库塞在他的马克思论中“创造”了一种具有存在主义特色的、以异化为观察问题

① ②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源泉》，载《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法兰克福1969年版，第7页。

③ 同上，第19—20页。

④ 马尔库塞：《文化和社会》第1册，法兰克福1970年版，第7页。

⑤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达姆施达特1962年版，第252页。

中心方式的、以人道主义为基调的“马克思主义”。

2. 马尔库塞马克思观的“新发现”

马尔库塞读马克思的著作，“并非虔诚的信仰”马克思，而是想自辟蹊径，在马克思那里发现“新大陆”。他在反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大目标下，苦心探索，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在马尔库塞早期数百万字的著述中，他的所谓“新发现”，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尔库塞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他认为，30年代的形势与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所处的环境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相比之下，“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即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太僵化，过分地为党派利益所限制，过多地强调了经济的因素。所以，就亟需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只有“批判理论”才应成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应成为一种“历史性”的理论。他反对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他宣称，马克思主义应是一种基于“激进行动论”^①的“历史性”理论。所谓“激进行动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简单化的篡改，其基调是存在主义的，其基本特征（“历史性”）则根源于海德格尔。由他命名的“激进行动论”的执行者（即“革命的主力军”，“有意识的历史的人”）正是（当时只略露头角）后来的“学术无产阶级”。他关于“激进行动论”由于缺少“革命形势”而不可能实现的观点，实际上把“激进行动

^① 马尔库塞：《历史和文化》，第252页。

论”神秘、空想化了。马克思主义最终被他简单化为社会的和历史的意识，无产阶级革命被说成是一种意识领域内的革命。

再次，马尔库塞断言，“人的本质的确定”才是“马克思理论的本来基础”。马尔库塞在他对“机械经济论”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对后者的批判当时还是以比较隐晦的方式）进行批判的同时，认真研究了人的问题。他首先分析了马克思的“感性”和“劳动”这两个概念，并以此得出结论：人的本质的确定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由于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基本范畴如劳动、异化等，黑格尔哲学才应是马克思理论的“真正出生地和秘密”。识破物化的意识是唯一具有革命性的，它是扬弃一切异化的手段。马尔库塞当时大声疾呼，声称他找到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武器，鼓吹他“重新发现”了马克思，断言要恢复“马克思理论的本来基础”——“对人的本质的确定”。

最后马尔库塞将共产主义解释成“一种新形式的个人主义”。在这里，马尔库塞首先着手解释劳动概念。他说，马克思将研究“劳动过程放在了他自己理论的焦点”^①。在马尔库塞看来，“劳动”就是使人异化的强迫劳动。为了解放人（个人），就必须扬弃劳动。“人的本质”的前景是“自由的个人”^②。“个人是目的”^③，“个人”是决定一切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个人主义的实现，是“一种新形式的个人主义”。可见，马尔库塞虽然声称他是在“重新发现”马克思，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定义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显然已被他作了别样解释。当

① 马尔库塞：《历史和文化》，第241页。

② ③ 马尔库塞：《历史和文化》，第250页。

然，这里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态度，也暴露了他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敌意。总之，我们并不否认他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一些探索和研究，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但是他的“新发现”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马记”主观解释。他的“新发现”同样摆脱不了他的阶级地位和立场的局限。这也正是他的“新发现”虽然在西方曾名噪一时，但并未被无产阶级所接受，而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的真正原因。

3. 马尔库塞马克思观的思想渊源

1929年，马尔库塞辞退了他在出版社编辑的职务，回到弗赖堡大学跟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从事学习和研究。在这一段时期，对他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海德格尔，因为胡塞尔于1928年就已退休了。马尔库塞本想在海德格尔指导下完成他的教授论文，而海德格尔也曾想让他做自己的高级助手。后来虽因故未能如愿，但是师生关系对他的思想发展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时间》成为他的马克思论的思想先导，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他的“唯物主义的生存分析学”中。《存在和时间》一书中关于历史和历史性关系的论述对马尔库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被他看作是依赖于“历史性”而存在的；历史服务于或者隐藏着历史性。因此，对“作为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应重新认识，应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理论。

同时，马尔库塞还想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结合起来。他把海德格尔的“否止”和马克思的“否定”概念等同起来，力图设计一种“辩证的现象学”。从这里可以看出，

在他的“马克思论”中始终笼罩着海德格尔的阴影，他的年轻的同事哈贝马斯称他为“第一位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者”^①。

其次，和豪克海默相识并合作是马尔库塞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暂时中断了他的黑格尔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了存在主义的框框。当批判理论于30年代末初创时，马尔库塞立即献身于这个“伟大的事业”，并很快成为其中坚分子。如果说豪克海默提出和确立了批判理论的基本原则，那么马尔库塞则使批判理论完整化并为它进行了哲学上的具体阐发。从根本上来说，马尔库塞赞同豪克海默关于批判理论的特征和批判理论同哲学（即“传统理论”）应严格区分的观点；在初创时期，他们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团结一致的。

另外，青年马克思在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前面讲过，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使马尔库塞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同年，他在柏林的演讲会上郑重宣布：《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是“马克思研究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集中研究了马克思关于异化和人的理论，这无疑对他后期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马尔库塞始终是黑格尔哲学的崇拜者。他的第一本专著题为《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这时他虽然还未脱离海德格尔的轨道，但是已在潜心研究黑格尔并试图对两者在历史性问题上进行综合。如果说他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论”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还不十分明显，那么在他

① 参见哈贝马斯《理论和实践》，1963年柏林版，第7页。

的《理性和革命》一书中，则用该书几乎一半的篇幅来探讨黑格尔哲学，并试图从中找出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根源。由此他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黑格尔哲学之中，它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延续。可以看出，从30年代起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就是以黑格尔哲学为根基的。

还应看到，马尔库塞在理论上是卢卡奇的同途殊归者。我们知道，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奠基者，卢卡奇以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而“闻名于世”。该书所论述的主要问题，马尔库塞不仅都涉及到了，而且与之有不少近似之处。这种思想上的联系，成为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的另一思想渊源。卢卡奇在60年代致费彻尔的一封信中回顾他走过的路，承认他“对马克思认识论基本原则的解释”“萌生于黑格尔的主、客体同一论”^①。这种“同一的主、客体”在卢卡奇那里实际上就是指在历史中起作用并完成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而在马尔库塞那里，则是指“有意识的历史的人”，指“激进行动的执行者”，即“学术无产阶级”。归根结底，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著作“主要”作了“黑格尔化的解释”^②。马尔库塞基本上具有同样的倾向，断言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理论的“真正出生地和秘密”。

卢卡奇的标准立异之处还在于“否定自然辩证法”^③。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持有相同的见解：客观上“存在着一种辩证的自然科学，即不是如恩格斯所错误地认为的近代物理学，而

① 卢卡奇：《致弗彻尔的信》，载弗彻尔：《马克思主义》第1卷，慕尼黑1975年版，第138页。

② 卢卡奇：《致弗彻尔的信》，第138页。

是同当时的定在结合在一起的自然史”^①。卢卡奇和马尔库塞都否定恩格斯，宣称“自然辩证法”是受时代局限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画蛇添足。

由于卢卡奇的原因，马尔库塞注意了物化问题的研究。卢卡奇承认，他不仅象黑格尔一样把物化同现象化等同起来，而且抹煞了物化现象的人剥削人的本质。马尔库塞则认为，物化是人的自我意识同物的颠倒；在物的关系后面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为了扬弃物化，必须首先扬弃劳动，必须产生能识破物化的意识。马尔库塞的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即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它是马尔库塞“革命”的前提。

1930年，马尔库塞指出：“对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应从其本质的和不可过分抬高的意义上，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上给予评价。”^②“正确的阶级意识”这个概念，是“对历史性范围的冲破，是在历史事件‘之外’的再定，由此出发才能同历史建立一种艺术——抽象的联系”^③。“卢卡奇反对恩格斯的论题（恩格斯的数学——物理学——自然科学之荒谬由于《自然辩证法》的部分发表已昭然若揭）表明，卢卡奇清楚地看到了自然存在的双重含义，即一是非历史存在的物理学对象，二是历史地存在的人的定在的生存空间；卢卡奇也没有把自然毫无保留地理解为‘社会的产物’”^④。尽管马尔库塞和卢卡奇曾在前期同路，却归宿不一，但是马尔库塞对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拥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卢卡奇的合拍、一

① 马尔库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贡献》，法兰克福 1973 年版，第 68 页。

② 《马尔库塞选集》第 1 卷，德文版，第 221 页。

③ 《马尔库塞选集》第 1 卷，德文版，第 221 页。

致，使卢卡奇在客观上成了他的思想先驱。

4. 马尔库塞的个人主义的乌托邦

早期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本主义的。它的基调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它的基本模式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它的核心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不伦不类、五光十色、各种思潮混合而成的“马克思主义”，既代表了整个“新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也暴露了它的思想根源和本质。证明他摆脱不了他的阶级局限，其结果只能是仅仅表达对现代西方社会的不满和在书斋里闹革命，只能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乌托邦。从内容上来考察，它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以意识为基础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同马克思的“批判”概念迥然不同，而与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和马克斯·施蒂纳的个人主义有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批判理论重蹈了他们的纯粹“理论批判”和“批判”（理论）同群众相对立的覆辙。马尔库塞的批判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意识的批判。他和豪克海默所“发现”、“发明”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意识这个沙滩上的大厦，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

其次是空想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向异化宣战的历史性理论。异化只能在“革命形势”下，通过“激进行动”并且由“有意识的历史的人”来扬弃。马尔库塞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和只有通过自身的解放才能解放全人类的理论，应由“激进行动论”取而代之。

马尔库塞历史观的核心是“人”。他宣称，他从人的本质这个问题上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本来的基础。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抹煞了人的社会性，即阶级性。他忽视了马克思在思想上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①的转变，将马克思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②误作马克思理论的真正基础。他的所谓“新发现”正是这种“人道主义”。

由于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人，它的“激进行动论”又没有现实的基础，所以它只能是空想的。

第三是浪漫的个人主义。马尔库塞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解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中进一步得到阐发的。按照他的说法，马克思不仅要扬弃异化劳动，而且要扬弃劳动本身。实际上，马尔库塞在这一点上是强加于人。马尔库塞在40年代以援引马克思的形式提出了扬弃劳动这个命题；在50年代，他通过提出用“道德的活动”来取代非道德的劳动的观点，对扬弃劳动这个命题作了发挥；在60年代，他把劳动具体化为劳动的科学化。他幻想未来社会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是“一种‘美学’的现实——社会成为艺术工厂”^③。共产主义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新形式的个人主义”的实现。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马尔库塞、同时也是社会批判理论以及整个“新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焦点之一。他们对异化理论所下的结论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和基本范畴。实际上马克思运用异化概念是来说明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7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③ 马尔库塞：《解放和剩余社会》，1969年汉堡版，第97页。

社会中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关系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经历了从异化到异化劳动、从个人和类的矛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重大转折，经历了从劳动异化论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飞跃。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还不能算作他成熟的学说。马尔库塞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并非马克思的学说，而是一种浪漫的个人主义。

同弗洛姆的争论使马尔库塞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即马尔库塞试图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和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嫁接”起来。1955—1956年间，在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心理分析的作用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具体的动机和双方的立场，它所产生的“爆炸性作用至今影响着社会心理学的科学范围和模式”。这个“爆炸性的东西”包含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之中，就是“弗洛伊德之刺”。这场争论，尤其是马尔库塞想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的乌托邦，标志着马尔库塞从具有存在主义哲学基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向他后期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转变，标志着他转向研究“进步的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转向完成他自己的“批判理论”体系。

第二章 “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自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批判理论”这个概念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专用名词而流传开来。阿·施密特在1968年说道，“尤其在近15年来它成为社会学和哲学的惯用语”。^①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并非某一个人所创造的统一的理论。它产生于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有密切联系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之中，诸如马克斯·豪克海默、特奥多尔·阿道尔诺、赫伯特·马尔库塞、瓦尔特·本雅明、埃里希·弗洛姆等。

豪克海默在他1937年《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纲领性论文中首次使用了“社会批判理论”这一术语。在这篇文章以及也于1937年《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另一篇与马尔库塞共同撰写的《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中，他明确地阐述了批判理论的特征^②。当时豪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把“批判理论……就像在该杂志的原则性文章中根据辩证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它所论述的那样，理解为一种社会理论”^③。

① A·施密特：《论批判理论观念》，载于《论批判理论观念》，1977年法兰克福版，第7页。

② 这在本章第2节和第3节中将作详细论述。

③ H·马尔库塞：《对享乐主义的批判》，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7期（1938年）第7卷，1980年慕尼黑版，第73页。

豪克海默于1970年在威尼斯所作的一篇报告中，非常清楚地论述了“批判理论的昨日与今天”：“当批判理论在20年代产生时，是以向往一个美好社会的思想为出发点的；它对社会持批判态度……”^①。如同豪克海默所强调指出的，早期批判理论确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尤其是针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②。针对当时希特勒统治下的那种社会更是如此。豪克海默同他的几乎都是犹太血统的法兰克福战友，对那个“统治社会”进行了根本的批判，因为它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恐怖和实行恐怖统治的共产主义的恐怖”^③。对极权主义的拒绝必然包含对“美好社会”的希望。“所以当时我们寄希望于革命，因为在德国爆发革命后肯定不会产生比国家社会主义时更糟的局面。”^④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贫困使豪克海默想进行革命，因为他“出身资产阶级”并对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充满热爱”，所以 he 不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的革命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意识革命，实际愿望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在早期批判理论”中豪克海默有两种“基本见解”：他认为，“第一，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比以前的社会还不合理，无数人无故地可怕地蒙受灾难。我们寄希望于革命，因为我们不敢设想战争。第二个基本见解为：唯有一个美好的社会能为真正的思想创造条件，因为只有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

① M·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的昨日与今天》，载于《过渡中的社会》，1981年法兰克福版，第163页。

② 同上，第16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在思想上才不再会被丑陋社会的强制因素所决定。”^① 这清楚地表明他对当时现实的不满以及寄希望于一场“革命”，寄希望于一个人们能够真实和自由思想的“美好”的“正常的社会”。在这里也表现出了批判哲学思辨和幻想的因素。对现状的批评并非是对未来的预知。“我们明白，人们不能预先确定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们可以指出当前社会之弊端，可人们无法说明将来什么会是好的。人们只能通过尽力工作，使弊端最终得以消失。”^② 豪克海默思想中的这种怀疑主义因素——马尔库塞与他相同——归根结底来源于圣经。在旧约中记载着这么一句话：“对上帝不该有明确的理解！”“我们把它理解为：你不能说什么是绝对好的，你不能表述它。”^③ 这样，“宗教的教义”“对当今批判理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④，宗教关于“可以描写恶的，但不能描写绝对正确的”^⑤这一思想与“批判理论结上了良缘”^⑥。此外，豪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把批判理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他们自诩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继承人和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声称批判理论是根据马克思的著作对“统治社会”进行分析的。他们从青年马克思那里采用了“批判”一词，确切地说是从马克思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采用了这个词的，马克思在信中谈道：“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68页。

④ 同上，第167页。

⑤ 同上，第168页。

⑥ 同上。

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①重要的是，“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②这样，马克思被视为批判哲学的先辈，而批判理论现在则更需要一种马克思的解释。

与豪克海默、马尔库塞有联系的除了马克思和叔本华这两位对批判哲学的开创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哲学家^③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人们还须分析其结构的类似性以及“青年黑格尔主义”对“批判理论”的某些制约性，虽然这部分被人们所忽视并几乎没人问津。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更广阔的思想史范围内探讨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

马尔库塞在与豪克海默的合作中拟订了“批判理论”：他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并企图制订出一个所谓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他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并在1941年又一次解释道：“马克思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社会批判理论并同一切传统理论和趋向决裂。”^④马尔库塞在这一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作了解释。

① 马克思：《致卢格的信》（1843年9月），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4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6页。

② 同上。

③ M·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的昨日与今天》，第162页。

④ H·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1979年新维德版，第233页。

一、马克斯·豪克海默对 批判理论的论述

批判理论这一“名称”援引自“豪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这篇文章于1937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所的杂志上，阐述了一些方法上和纲领上的意图。”^①由豪克海默和他那些法兰克福的同事们确定了这一术语，以便促进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从此，“批判哲学”就表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要求。^②

1. 批判理论的前奏

1931年至1932年间，豪克海默论述了“社会哲学”的目的并具体化了这一目的^③。他呼吁，哲学应与社会学相结合，并以特殊的方式与对现存社会的研究相结合。由此，应该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将哲学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以便分析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同时经验分析也须包括在社会哲学之内。他认为，这样就能为新理论敞开大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的

^① W·波斯特：《马克斯·豪克海默：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载于《大哲学家的基本问题》，《当代哲学》，第4卷，1981年格丁根版，第108页。

^② 属于这一议题的有马克斯·豪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H·马尔库塞的《哲学与批判理论》，豪克海默与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H·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单向度的人》等等。

^③ 见豪克海默在一次节日的讲话《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载于《法兰克福大学论集》第27卷，1931年法兰克福版；同时见《社会研究杂志》的《序言》第一年卷（1932年）1980年慕尼黑版。

“统一原则”致力于对历史整体进程进行认识并以透过事件的混沌的表象，发现可以用概念解释的结构为前提。这一“统一原则”表明研究“应该促进这种作为整体的现存社会的理论”。^①在此，批判理论已被预先认识到了。

“解决这个问题（社会研究，作者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于形成一门适合历史需要的社会心理学。”^②除了这个关键点外，“社会心理学必须注意其它相关方面：有些论点忽然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在今后对其修正时不容许阻碍运用不同的科学辅助工具去解决目前社会及其矛盾的问题。以便以一种与目前所获得的认识相适应的方式来把握对于社会生活起作用并使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重要过程。”^③豪克海默已经要求一个总体理论。他一方面在马克思的含义上承认：“在社会研究中历史不是作为单纯意志的现象，而是作为由规律支配的动力，因此对它的认识就是科学。”^④言下之意，历史不隶属于人的权力，而是遵循表现于运动中的规律。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始终致力于一种非党派的，非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对科学规范负责，就是在方法上把社会研究同政治区分开。必须面对一切世界观和政治利益捍卫认识要求的独立性。”^⑤只有这样，科学理论的客观性才会成为一种摆脱阶级考虑，非政治党派的，独立的学说。鉴于当时的形势，豪克海默认为，借助马克思的范畴（对市民

① M·豪克海默：《序言》，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一期（1932）第1页。

② 同上，第2页。

③ 同上，第2—3页。

④ 同上，第1页。

⑤ 同上。

社会的分析),对政治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因而他的批判理论应该成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2. 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

在发现批判理论这一概念之前,“法兰克福学派”使用“批判的唯物主义”这个术语。这一更名是采用马克思主义形式的“法兰克福学派”大约在1930年实行改变的标志。^①这一新的表达形式应当表明,社会学的唯物主义是同“传统理论”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对世界的解释不同的。它适用于贯彻“理论的自我意识。”以后阿道尔诺于1966年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豪克海默所表达的‘批判理论’并不是要使唯物主义变得可以接受,而是要使它成为理论的自我意识,这样它既高出于浅薄的对世界的解释,同样也高出于‘传统科学理论’。”^②

对豪克海默来说,新的标志表明,马克思著作的主导思想是批判^③。此外,豪克海默认为,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如同马克思那样也沉迷于科学,所以他提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对俄国批评家的赞颂和他对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协作。由此豪克海默转向了卡尔·考茨基意义上的

① 见安塞姆·斯库拉:《马克思·豪克海默》,1974年斯图加特版,第13页;《马克思主义眼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对豪克海默、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社会学的批判》,1970年法兰克福版,第132页。

② T·W·阿道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法兰克福版,第195页。

③ 本章第三节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

手段与目的的合理性。但他认为，科学的独立导致一个新的主—客体二元论：政治转到客体一方，理论成为对客体的反映。豪克海默由此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特性向科学性的转移。“批判理论”由此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必须予以重建。

批判理论在下例几点上与一般社会理论的区别：

(1) 时间上的差异

“传统理论”属于资产阶级的世界，“批判理论”思考“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亏空。因为这期间主客体关系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批判理论认为，必须适应客体的历史变化以及主体的历史变化。批判理论不再从思维概念的合题中——如同传统理论那样——期待主客体对立的消融，而是通过实践进行改变。这样，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论家，他们的任务在于加速发展促使一个没有非正义的社会的降临。”^①

(2) 认识论上的差异

根据目前社会内随着生活的再生产而产生的问题，“对经验的组织”，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即社会学。原理的系统包括了在特定情况下尽可能多方面地利用其形式的知识。问题的社会根源，使用科学的现实环境，运用科学的目的，对它自身来说都是“外表的”。^②“社会批判理论”“与此相反，把作为全部历史生活形式的生产者的人作为对象。科学赖以发端的现实的关系，对它来说不是作为仅仅只需确定和根据可能的规则加以预测的事实状况。当时存在着什么，并非纯粹取决于自然，而

^① M·豪克海默：《批判理论》，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170页。

^② 同上，第192页。

是也取决于人对自然能够做什么。感知的对象和特性，提出问题以及答复的意义，证明人的能动性和他们力量的强度。”^① 批判哲学认为，由于“传统”理论在方法上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它忽视了变化这一因素。传统理论的任务在于思维，其它一切都是“外表的”。批判理论把人作为对象，作为人类活动的对象化，以及人的能力的相应的成分。在这一意义上，批判哲学把理论作为实际产生的对“人类能动性”和“人类力量”的认识。

(3) 认识论基础上的差异

“传统”理论表现在形而上学和科学之中，而批判理论以一种实践人道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并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对经济概念的否定，比如等价交换的概念。“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具体科学的区别在于它还保持作为经济学哲学的批判：其内容是剖析它的概念转化为它的反面，如公平的交换转化为社会非正义的加深，自由经济转化为垄断统治，生产劳动转化为阻碍生产的关系的巩固，社会生活的维持转化为大众的贫困等等。”^②

(4) 与“传统”理论相反，批判理论与其说是经验科学，不如说是一种哲学论断。豪克海默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中得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差别不仅在客体的差异上，同样也在主体的差异上。“不存在作为整体的批判理论的普遍准则，因为它始终基于事件的重复性之上，并由此基于再生产自身的总体性之上。批判理论在每一步骤的一切明智性，以及它们的要素与最先进的传统理论一致时，自身没有特殊的机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193页。

构，只有与它们自身相连的对扬弃社会非正义的关注。”^① 传统理论未加思索地顺应再生产现存社会的特殊的劳动过程。由于传统理论是从不变的、现存的事实出发，并同现存社会一致的，因此它得出了顺应时势的结论。它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尽一份力。与此相反，批判理论置身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机械过程和现存劳动分工的限制之外。这样它就能更好地认识其基本矛盾。它注视着对现存的东西提出责难并揭示其非真实性。它是作为一种否定的理论，即试图通过新制度去克服现存社会的再生产过程。^②

3. 批判理论的独立性

许多理论家需要马克思主义并误解马克思主义。因而有必要像列宁和毛泽东所作的那样，特别强调其基本含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③ “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④ 的马克思学说“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⑤ 因而马克思主义是

① 同上，第190页。

② 参见上注。

③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维也纳—柏林1929年版，第18卷，第14页；《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5页。

④ 同上。

⑤ 毛泽东：《实践论》，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1968年版，第349—350页。

应与革命的实践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的理论。

与此相反，批判理论强调指出，它是“独立的”，同无产阶级的自我理解并非同一的。豪克海默认为，当批判理论提供论证时，批判理论也是政治斗争的因素。所以他也将批判理论同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历史分析中得出人类能动性作为目的的观点，首先是一个理智的，适合普遍的社会组织的思想，是人类的劳动所内在固有的，并非某个人或公共精神以正确的形式所想象的。这是一种经历和注意这一趋势的特定的兴趣。在无产阶级中所必然产生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①但是豪克海默在论述理论家，即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时写道：“理论家可能会与无产阶级占上风观点相反。如果没有这种相冲突的可能性，也就不需要理论了。”^②

这句话并非很清楚，理论家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理论对现实具有一种特殊的理解能力，理论家处在一个比无产阶级更普遍的平面上。豪克海默不同意 K·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知识分子概念：“在专门社会学那里，并非收入来源和理论的实际内容，而是教养的形式要素决定理论家的社会归属。”^③知识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或超社会阶层”^④。只有“大学教授和中层政府官员，医生，律师”^⑤等知识分子有“更概括的能力”^⑥。“假如缩小他的认识同他为之思想的被压迫人类的

① M·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第2卷，第162页。

② 同上，第17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162页。

⑥ 同上。

对立是批判理论家的任务，在每一社会学的概念里将把超越阶级作为知识分子的根本特征，并上升为使他们自豪的优先权的特性。”^① 在知识分子和“被压迫的人”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知识分子的任务是为“被压迫的人类”思考。人类处在一种精神落后的状态中，应该向着“知识分子的根本特征”方向发展。这样形成一个对阶级的“超越”，通过这一超越人类得到“批判理论”的“认识”。豪克海默与知识社会学，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相对立。^② “批判理论”在知识社会学上同“被压迫人类”的对立不仅使豪克海默感到诧异，而且他还认为，知识社会学“不从经济批判，而是以自身观察中得出阶级概念”^③ 是一个大缺陷。仅就这方面，豪克海默在当时还接近于卡尔·马克思。值得注意的是，豪克海默拒绝了批判理论属于无产阶级和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观点。他认为，批判理论必须是独立的，不受无产阶级制约的。他认为，因为无产阶级的处境，在这一社会中也并不能形成对认识的保证^④。无产阶级的存在，并非是对批判理论最终实现他的目的的保证^⑤。他对忠实于路线的“知识分子”作了下述谴责：“知识分子仅仅在景仰崇敬中宣布无产阶级的创造力并满足于与它相适应和美化它，但是他们忽略了在消极思维时回避理论上的努力，以及回避自身思想时

① 同上。

② H·马尔库塞于1929年写了一篇论述卡尔·曼海姆的文章《论社会学方法的真理问题》。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载于《社会》杂志第6年卷（1929年），第356—369页。

③ 同上，第170页；也见同页中A·施密特的注脚17。

④ M·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第2卷，第162页。

⑤ 同上，第190页。

所产生的时而同群众的对立，这些现象都会使群众比原先更盲目和削弱。”^①

事实上，像豪克海默和他的法兰克福同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苍白无力的。批判理论虽然是政治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为了它的独立和非制约而放弃了政治行动。这样批判理论最终仅具有乌托邦的性质。

这一非制约性表明了它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有其固有的阶级性并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③“这个解放（即人的解放，作者）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④由此确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关系的观点。所以豪克海默不能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只能称为批判理论家，不是作为革命者，而仅仅是作为哲学家。

① 同上，第163页。

②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论》，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8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0页。

③ 同上，第39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7页。

④ 同上。

4. 豪克海默的悲观主义

照豪克海默以及其它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批判首先应提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贫困理论。革命照马克思看来只有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工人群众的极端贫困时才爆发。工人阶级从贫困中开始进行一场革命，应该摧毁旧社会并建立一个新社会。豪克海默认为，“这一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较之于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已得到不断的改善。许多工人从单纯的手工业者提升到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良好生活水平的职员。”^①“第二，严重的危机越来越罕见，这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经济政治干预可以不断制止危机。第三，马克思最终所期待的真正的社会由此可能是虚假的，因为……自由和正义如同它们的相互对立那样同样是相互联结的；正义越多，自由越少。”^②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和过时的。

值得注意的是，豪克海默将现代工业社会看作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似是而非的实现，以此来摒弃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如同他以后所称的“社会主义”。“完全管理的、自动化的、运行出色的社会”^③给居民带来了富裕。虽然“每个人在这种社会里都能生活在无物质忧虑之中”^④，但是个人却“不再具有更多的

① 马克斯·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的昨日与今天》（1970年），载于《过渡中的社会》，1981年法兰克福版，第16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71页。

④ 同上。

意义”^①。社会差别将缩小，因为所有人都将关心“社会的运行”^②。

这一“管理”的社会“在事实上”即“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③。他认为，“社会主义”在现代工业国家已经实现，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主体的平等和自治。马克思对此“没有作多少思索就宣布，每个人在社会中如何能够自由发展”^④。因为马克思不懂得自动化和计算机，否则他也会从这点开始思索真正的社会”^⑤。这种思想促使我们产生诘问，即尽管强调集体的作用，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塑造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活。

由此得出一幅未来社会的图像，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都能保持他的“独立性”^⑥。这一“个人的独立性”“限制在相对小的团体内，对于我们来说是要为尽可能多的人维护其主体的自治性，加强能使每个人都能发挥其力量的社会状况”^⑦。批判思想的目的，“理性的状态，虽然建立在现实的贫困之中。但尚未提出消除这种贫困的图景。勾画这一图象的理论并非为已经存在的现实服务；它只是道出其秘密。”^⑧由此产生出“一个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性社会的观念。”^⑨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M·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第2卷，第165页。

⑨ 同上，第166页。

豪克海默看来,现存的社会一方面是通向自由社会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他对未来社会的观念却仍停留在抽象上。如何能够实现理想的社会?豪克海默对此问题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

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的基本调子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悲观主义的了。他承认,批判理论已经放弃了革命改进的希望,并致力于一个温和的社会改良。“当初我们希望在德国发生革命,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窃居统治。今天我们根本上关心的是,我们自身生活在其中的国家的具体事务。”^①此外,他们自称自己是“理论的悲观主义者”^②。人们在豪克海默背后议论,他的悲观主义,——“人们不能说,什么将会是好的”^③,——受圣经的图像禁止的思想影响^④。但是否圣经支持悲观主义仍是成问题的事。单从旧约“对上帝不该有明确理解”这句话中不能表明这一论断是正确的^⑤。但是豪克海默却认为:“生活在这种意识中的人是与批判理论有亲缘的。”^⑥

这一悲观主义在晚期豪克海默那儿非常明显,悲观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那儿即使在早期也并非全然没有。豪克海默在1968年再版他的著作的“序言”中描述了一个“更美好社会”的图像以及30年代和40年代文章中的思想发展:“随着抛弃唯心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结束人类史前史,看到目的,对

① 马克斯·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的昨日与今天》,第170页。

② 同上,第175页。

③ 同上,第164页。

④ 同上,第108页;也见本著第一章导论

⑤ 与此相反,圣经通常被神学家作为希望之书。豪克海默似乎在此(参见注释9—12)从学术意义上来解释圣经。

⑥ 马克斯·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的昨日与今天》,第168页。

我来说，是反对在惊人地实现管理化世界进程中听天由命而作的一项理论选择。内在地包含每一真正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的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对我来说，一向是不陌生的。我首次接触哲学应归功于叔本华的著作；对黑格尔学说及要理解和改变社会现实的马克思学说的关系，尽管在政治上存在矛盾，并没熄灭我对他的哲学体验。一个美好、真正的社会是一个与罪恶观念交织在一起的目标。自从战争结束以后这一目标就被更换了。社会处在一个新的阶段。不再以竞争的企业为上层结构的特征，而是经理、协会、委员会；非独立的物质环境，导致了与当时无产阶级不同的政治和心理趋势。个体诸如阶级被一体化。用其自身的概念来衡量所谓的自由世界，对它持批判态度，并仍然遵守其思想。在希特勒的、斯大林的或者其它变种的法西斯主义前捍卫它，这一切是每一思想家的权利和义务。虽然潜在着灾难，虽然存在着一切内部与外部的冤屈，它在眼下还形成一个孤岛，从时间和空间上看，它在暴力统治的海洋中的终结也标明批判理论所从属的文化终结^①。这一思想属于豪克海默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作为“早期批判理论”^②与其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1930—1941年间）相符合。“在美国逗留时的研究”（1940—1947年）就这一研究在哲学上进行强调而言，在豪克海默的晚期形成^③。马克斯·豪克海默自战争结束后的最后期间，在他的晚年著作中，从历史发展中为批判哲学所作的结论，引起矛盾的反响。它在朋友们和批判理论的追随者

① 马克斯·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第1卷，第12—13页。

② 见W·波斯特：《豪克海默：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载于《大哲学家的基本问题》，《当代哲学》第4卷，1981年格丁根版，第109页。

③ 同上。

之间引起诧异，失望和时而遭到严厉的拒绝。晚期著作表现了宿命论的态度，蕴含着精萃和高尚壮烈的悲观主义，违背了早期批判目的，并超出正常范围地放弃了实践的中介。高卢的雄鸡变成了密纳发的猫头鹰。”^① 为了理解他的批判理论，有必要注意考察豪克海默这一较大的思想变化。但由于早期豪克海默对我们的题目更引人注意，在此就不再继续对此深入探讨了。

二、马尔库塞对批判理论的 哲学描述——马克思主义批判论

赫·马尔库塞扩展和进一步地发展了豪克海默表述的“批判理论”概念。“在分析马尔库塞 30 年代的著作时，从《哲学与批判》理论开始是最合适的，因为在此同‘海德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的断裂是最明显的。”^② 马尔库塞在 1937 年同豪克海默共同撰写的《哲学与批判理论》^③ 这篇文章中对“批判哲学”下了定义，并阐述了它的基本特征。从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以及他与哲学（或者传统理论）的区别来看，马尔库塞是与豪克海默相一致的。他对批判理论的发展的功绩是不可争议的。

马尔库塞比任何其他作者都更加明确地认为批判理论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但是在这里他也掺进去了他个人的色彩。他把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为对当代哲学的批判：“社会批

① W·波斯特：《批判理论与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关于马克斯·豪克海默的后期著作》，1971 年慕尼黑版，第 9 页。

② J·P·阿耐森：《从马尔库塞到马克思》1971 年新维德与柏林版，第 48 页。

③ 最初刊登在《社会研究杂志》第 6 卷（1937 年）上，从 625—631 页为 M·豪克海默；从 631—647 页为 H·马尔库塞。

判理论从它一开始起就始终是对哲学的争论。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的形成时期，哲学就是意识的最先进的形态。当初德国的现状落后于这一理性形态。对现存状态的批判在这里就是以对当时意识的批判开始的^①。”照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即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对黑格尔的批判开始的。与此相类似现实的（1937 年）社会批判理论起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早期批判理论时期，马尔库塞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僵死的、受党派利益操纵，并打上经济观点烙印的。随着他个人主义和人类学观点的形成^②，他越来越反对经济“自动控制”和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力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由于过高地评价经济因素，因此只能被看作是过时的，或最多只能被看作为“19 世纪的理论”。所以他期待着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经历一次精神的革新，但并不由此形成学术的社会哲学；应该由批判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应该显示出能够胜任解决 20 世纪的问题。

从社会哲学转变为意识形态批判是批判理论的关键。这种转变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思想的核心。马尔库塞接受了豪克海默的哲学思想并致力于它的系统化。他在 1937 年解释道：“现代辩证哲学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受社会的理性机构所制约的。因此，对现状的分析通过批判哲学，要归结到经济批判。1941 年他在《理性和革命》中强调指出，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通

① H·马尔库塞：《哲学与批判理论》，载于《H·马尔库塞文集》，第 3 卷，1979 年法兰克福版，第 227 页。

② 第 2 章将就此作更详细论述。

过马克思的批判，不仅被扬弃为一种新的理论，而且还涉及到了社会革命的实践。因此，照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实践、革命的重大意义。理论的批判表述出了实践的意图。

讨论超越现存制度的现实社会研究，应该注意社会进行理性改造的可能性。这个意图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早期马尔库塞观点同豪克海默观点相接近。

传统理论在豪克海默那里所占的位置，就是（古典）哲学在马尔库塞那里所占的位置。他以对比分析的方式，将哲学与“批判理论”作了对照，并把哲学解释为资产阶级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从主体意识出发对客体进行考察，把现实看作是超验的。因此马尔库塞对“理性”以及与它相连的整体进行了分析。以诸如“理性和自由”“自由与必然”等成双的概念来表述的唯心主义理性哲学，作为主导思想确定了整个文章的分析。在这里不能忽略他的提示，即哲学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最先进的意识^①。“正象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②1937年本该以另外某种方式重复马克思在19世纪看到的形势。在这里明显地流露出来了马尔库塞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

在马尔库塞那里，批判理论象在豪克海默那里一样，很少得到明确地规定。首先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同义词。第二，在尝试中，仍然保持以系统的方式阐述批判理论。同样地在其它的法兰克福同事那里也普遍存在着模糊不清的情况，

① 这一表述与马克思的表述相同。

②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26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05页。

这似乎是一个证明，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没有问题，他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并非可信。因此，对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进行详细的研究是应该的。

1. 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的和机械的唯物主义

马尔库塞在 1937 年写道：“社会批判理论按照其创始人的信念来看，本质上是与唯物主义相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哲学体系是反对另一种哲学体系的。社会理论是一种经济的、非哲学的体系。”^① 因此，马尔库塞把马克思主义明显地推到经济唯物主义附近，即唯物主义哲学被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的附近。这实际上是马尔库塞早期还受海德格尔存在本体论决定的反唯物主义立场的继续。虽然承认和涉及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却拒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产品”，是歪曲。当时马尔库塞对哲学和经济间关系的评价完全是与马克思的评价不同的。

马尔库塞同时批判了机械经济主义，因为他认为，机械经济主义太缺乏哲学性，他批判哲学，因为他认为，哲学太缺乏对经济的反映。他不再为经济学寻求哲学根据，而是认为，经济自身是理论的实践基础，哲学问题和答案只能从经济中产生。新的经济理论（照马尔库塞理解的），对马尔库塞来说，就是社会批判理论。它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界限，并表现为两种观点：它提出一种整体性要求，并得出一种乌托邦的结论。“讨论重新回到了什么是理论比国民经济学更重要的问题上。政治经济学

^① 《H·马尔库塞文集》，第 3 卷，第 227 页。

批判了社会存在的整体，在这里从一开始起就表明了这种重要性”。^① 批判理论想用经济学范畴的分析以及物质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同时来解释现存社会关系的总体联系，并揭示出对它们进行彻底改造的现实可能性。照马尔库塞的观点，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经济决定的。因此“不仅哲学变成……多余的了，而且其它一些涉及人与理性的能力的问题似乎都应从经济中去解决了。”^② 但是批判理论的每一个概念都比纯粹的经济概念具有更多的内容，每一哲学的事态都应该从与经济的联系中去阐明。“他更多地是借助理论的总体性要求，从社会存在中去解释人和他的世界的总体。”^③ 不可驾驭的经济驾驭着所有人的关系，一切非经济的东西都包含在经济之内。他认为，比新调整的经济形式^④ 更重要的社会理性机制，既不是经济学的单纯补充，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的扩展，而是经济从属于个人需要。它是真正的经济学本身^⑤。马尔库塞所认为的经济机械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一体系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作为经济决定论。社会的变化最终只能以“理性社会”的方向为目标。经济活动在“理性社会”里将与政治目的，即理性所确定的目的，即与人的真正需要相适应。人的需要和利益应该最终决定经济过程的调节。换句话说，即人的利益调节经济。由于社会的发展应该为人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因此最佳利益的选择，即“群众的自由和幸福能否在这一利益下得到

① 同上，第 236 页。

② 同上，第 227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 236 页。

⑤ 同上，第 238 页。

维护”，^①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自由、需要、幸福是主观的、历史的、变动着的范畴。虽然它们受社会制约，但却不能简单地由社会来调节。因此必须求救于心理分析。马尔库塞在晚期更加强了心理分析。“如果在人的社会关系中没有自由和幸福的话，那么，生产的巨大增长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就仍然受非正义的桎梏。”^② 马尔库塞在这里表明，单纯经济学不会遵循自由和幸福的要求。显然这是针对“苏维埃经济主义”的，这种经济主义反对马尔库塞意义下的“自由和幸福”。在这里已经看出马尔库塞著作中对“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1955年）的批判倾向。

2. 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过时的 19 世纪的理论

照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只有联系 19 世纪才能理解的理论，产生于“19 世纪的 30 年代和 40 年代”。这种理论认为在资产阶级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必须扬弃的遗产。在这里马尔库塞第一次提到了遗产问题。他把什么作为必须保留的遗产呢？“由于批判理论关注人的解放，所以它与它必须保留的特定的旧真理相联系。人肯定会比阶级社会生产过程中作为可使用的主体更重要，批判理论依靠这一信念深深地与哲学相联系。”^③

马尔库塞由此揭示了批判理论同以往哲学的共同点：批判

① 同上，第 236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244 页。

理论对人的解放的关注，驱使它对传统旧真理进行研究，并剥去它们的抽象形式。虽然它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必须采取意识形态的特征，但是它们的内容却并非简单地不真实或过时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终结处提出了三个问题，人类理性的一切兴趣都被总结到这三个问题之内，即：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①在他的逻辑学讲座导论中他添加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②要回答这四个哲学基本问题，必须提供人类能力的证据。但是照马尔库塞看来，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的能力“仅仅是纯粹认识和纯粹意愿的能力”^③，因为在现存的事物之内唯有观念的解体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而哲学的中心任务在于，对关于人的所有问题必须从他的总体范围内进行研究。

正是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哲学之间的联系显得尤其重要。马尔库塞回答了对人的问题，人比作为阶级社会生产过程中可使用的主体要更重要^④。马尔库塞在这里以欧洲人道主义的传统为根据；人类学与历史哲学的动机，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对解放的理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并非隐藏的标准因素是否已包含在内，这些因素需要自身的根据，而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却没有特意成为专题。马克思通过对当时自然科学的经验以及阶级斗争的经验总结，最终发展了他作为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的唯物主义哲学。因而人们可以断定，人

① I·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本805页，B本833页。

② I·康德：《逻辑学讲座导论》，载于《康德著作》AA本，第9卷，第25页。

③ 《H·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第238页。

④ 同上，第244页。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目的。但是在这里指的是什么类型的人呢？是现实的人还是抽象的人呢？马尔库塞关于人的思想，存在着把阶级社会内具体历史条件下具体的人抽象化的危险。或许，马尔库塞构造了一种在其抽象性上，在现实社会中绝不存在的。这会倒退到以人的抽象本质为目的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①。

马尔库塞由此同传统哲学的批判相连。他认为，哲学注意到，经济关系是如何统治人并参与对人的压迫的。它的信念最终假定，世界在原则上是有秩序的，精神能够满足它对世界的要求，并局限于精神世界之内。主体所缺乏的能动性，它的内向性，表现为对现实矛盾的逃避。由于马尔库塞把传统哲学的抽象性解释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所以他仍然坚持“遗产”思想；这样，在唯心主义哲学的抽象性上表述了真理的要素：它表述为一种尚未实现的理想。但它却预先断定了一个可能更加美好的未来，或者至少认为这种未来是可能的：“抽象性在这里并不是基于撇开现存状况，而是瞻望人的未来状况。它不再被另一种对现存事物的正确理论（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理想的抽象）所扬弃，照它看来不再存在新的理论，而仅存在理性的现实自身。概念的思维是不够弥合理性现实与以往事物间的鸿沟的。”^② 人们在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重新发现了这一相同的思想：“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够弥合当今与未来之间的鸿沟的概念。”^③ 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尔库塞的基本思想：批判

① 对早期马尔库塞的人类学思想，将在第3章中作详细论述。

② 《H·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第244页。

③ H·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268页。

理论可以批判现存的事物，但不能预言未来。因为现存的事物不能转变为未来。如上所述，这一思想同豪克海默是相一致的。马尔库塞在这里也谈论到科学问题。“社会批判理论首先认为，哲学只是对科学最普遍成果的加工。它的出发点是，科学已充分显示出它为生产力的发挥服务，以及开辟更丰富的存在的可能性的能力。但是，在唯心主义哲学和科学联盟时，从一开始就负有罪孽，即带来了特定的统治关系对科学的制约性，而在社会批判理论那里却为科学解脱这一约束创造了前提。”^① 马尔库塞按照批判理论的观点，指出了科学的任务，并表明了批判理论的出发点。“科学受到现存统治关系的制约”对他来说是实际的问题。这样的科学本身因此就已不能保证真理性。统治阶级历来是通过它们的工具理性来规定科学的。《单向度的人》中的以后命题，即我们的理性原则上依照统治而组织起来的，在其现实形态上对解放斗争是无用的，这一点在这里已经暴露出苗头。技术进步与人的解放不是一致的。科学的组织可以采取虚假的普遍性的形式。科学需要一位“主人”，科学不是为阶级服务就是为富裕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是专业性的，并作为科学不具有阶级性。它一方面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会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关键的问题，在于使用科学的利益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写道，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一领域内神秘化，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并掩盖剥削。“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

^① 《H·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第246—247页。

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① 科学对社会的意义全部来自社会历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为历史进步而斗争的一部分。它为获得新知识，以及获得对自然和社会规律更好的认识的努力，在于改善人的生活。由此可以清楚表明，科学和统治是如何相互联系的。照马尔库塞看来，显然还存在着以下问题，即在“科学受到现存统治关系制约”的情形下应该做什么？批判理论的最重要任务，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把科学从这一“约束”下解放出来。他的建议的目的不仅在于摧毁现存的统治关系，以便消除科学的制约性，而且在于解放科学以便满足人的需要。

以下一段引文可以概括马尔库塞的思想：“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就其起源来说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它在‘遗产’概念下表述它对理性哲学的关系时，它是按照十九世纪所存在的状态来设想其遗产的。这一状态的某些事物在这其间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理论应该更多地以个人的发展和幸福为目的：“理论的全部推动力来自对个人的关注……在迄今的理性的现实性和它的的实现之间……在当今存在着……专制的野蛮。”传统文化消失了，“从事传统文化也不再是自豪的事，而是一种不幸。……目前，通过改变形态又重复了十九世纪社会理论所揭示的形势。现实的状况重新处于历史的普遍水平之下。”批判理论仍然同哲学真理相连。“历史的形势是渐渐成熟地趋向可能性的”，“哲学真理作为可能性的觉悟者，表现并保留在批判理论

①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1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

的经济和哲学概念内。”^①

马尔库塞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十九世纪的一种理论。“这一状态的某些事物在这其间已经发生了变化。”^②“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政治状况引起了这一状态的改变。马尔库塞和绝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非常激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并非单纯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于犹太族。文化的习俗传统使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文化和民族主义者，“专制的野蛮”得以某种继续。由此应该消灭古典文化。^③

因而马尔库塞批判地评价资产阶级文化，并认为它的继续是不可能的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他认为，他认识到了青年马克思所遇到的意识形态形势和现实状况之间有某种类似的情况。“批判理论以前没有认识到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正是为了未来。”^④在这里又重新表现出了海德格尔关于定在的时间性的思想。由于理论想严肃地对待理性的实现，所以它扬弃传统的哲学，并非象“法西斯主义”那样为了摧毁它，而是为了未来的实践。总之可以肯定，照马尔库塞看来，对批判理论目的的思考，应该为文化传统的现实化和它的实现服务。同时，马尔库塞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十九世纪的理论，因为它受十九世纪约束；他认为，理论也必须随着现实的历史条件而变化。批

① 《H·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1979年法兰克福版，第248—249页。

② 同上，第248页。

③ 1968年大学生们想把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改名为卡尔·马克思大学时，使用的论据是：“歌德已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这一由马尔库塞参与引起的口号，（关非事物本身）缺乏辩证性在此是十分明显的。

④ 《H·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第248页。

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作相应加工的二十世纪的理论。因而应该由批判理论来代替马克思的著作（主要是早期著作）。因为批判理论是以“对个人的关注”出发并想“为个人的发展和幸福”而奋斗。这一阶段马尔库塞的批判倾向，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形势也是革命的。对自身时代的批判，——这在马克思甚至黑格尔那里对理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马尔库塞转向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将“批判理论”解释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如上所述，“批判理论”这一术语在马尔库塞那里具有双重意义。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外，还指他自己的学说。批判理论将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纳入自身。

首先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进行分析。马尔库塞依据黑格尔：谁认识到事变是必然的，从而就克服了盲目的必然性，并把它上升到理性的范围，谁就获得了自由^①。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解答；但是黑格尔的思想却不缺乏批判的内容。马尔库塞断言，“自由决不会超越必然”^②，而只是对它进行美化。“当必然已经是自为真实的时候，自由才只能是必然的真理。”^③这种对黑格尔的解释导致一个二律背反：A. 自由决不超越必然。B. 自由作为必然性的真理时超越必然，因为真理不受历史必然性的制约而存在着，即作为对世界、社会以及必然的正确认识。

① 同上，第23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照黑格尔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①“因而作为这种必然性的必然尚不是自由；但是自由以必然作为它的前提，并作为扬弃了的必然包含于自身。”“由此可以推断，正如相反地，也可把自由与必然看作是相互排斥的。”^②恩格斯对此作了肯定：“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③黑格尔认为逻辑的必然性和精神的运动是第一性的，在这里不是重要的了。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表述如下：

(1) 自由是对物质必然性的认识和掌握。“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④“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及对客观世界的改造。”^⑤

(2) 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当自由作为对必然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以及认识和实践是历史的时候，自由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文化的每一进步，人类也向自由迈进一步。真正人的自由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会产生，“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

①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全集》，纪念黑格尔诞辰周年版本，第8卷，第332页。

② 同上，第349和3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0卷，第10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25页。

④ 同上。

⑤ 《毛泽东》，载于《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① 为了能够自觉地行动，必须肯定客观现实的生活，必须承认客观规律的现实存在，以及认识这些规律，没有对这些规律的认识也就不存在自由。

马尔库塞回避对这一客观性的承认，他把它作为“物化”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他也把主观的解释为必然的；他认为，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使“理性哲学”与现存制度相连。“主体只有在完全以自身为依据时才是理性的。所有‘其它的’对于它来说，都是陌生的，外在的、并且本身首先是可疑的。”^② 主体的理性成了万物的尺度。“一切不受其他事物制约的，一切自身所特有的，都是自由的。”^③ “从一开始起，哲学就确定最高的存在方式是自在。”^④

从这一唯心主义的设想中得出了“世界是为我而构造”^⑤ 的思想，言下之意，现存的制度是作为合理的为资产阶级的我而创造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对此持反对态度。“当理性指的是按照认识中的人的自由决断塑造生活时，理性的要求现在指向创建一个社会机制，在这个社会机制里个人将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共同调节他们的生活。”^⑥ 马尔库塞认为，这一社会的机制是解放了的理性的社会。在此存在着他社会学说的思想根源。他把解放了的社会解释为“在这一社会里个人可以按照他们的需要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0卷，第107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26页。

② 《H·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第23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231页。

⑤ 见《社会研究杂志》第6年卷（1937年），第6卷，第634页；也载于《文集》，第3卷，第231页。

⑥ 《H·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第233—234页。

同调节他们的生活。”“在理性的现实性中，不应该再是劳动过程决定人的普遍的定在，而应是普遍的需要决定劳动过程。”^①“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随着理性的实现也将扬弃哲学。”^②作为“自由决定”的理性以抽象形式保留到这一状态的实现，并受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约束。但是，维护现存制度的“哲学”在未来自由社会中将消亡。批判理论替代传统哲学，以便推动历史过程。它阐述了“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③。批判理论具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职能：“它可以在理论上推动那些应该改变它们历史地位的阶层进行斗争。”^④

哲学对人的关注在批判理论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形式。通过建立理性社会来实现哲学传统。哲学的观念作为理论成为人类实践的目标，并获得具体的人性的内容。所以用批判理论来取代哲学是合乎逻辑的。“除这理论之外不存在另一种哲学。”^⑤

马尔库塞认为，批判理论通过它向现实化的趋势而与哲学相区别。但是当现实化尚未进行时，对理论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几乎并没由此驳倒理论的真理，真理闪耀着新的光芒，并照亮了它的对象的新的方面和部分。”^⑥现实化的失败与理论的真理无关，而只是改变了它的对象的关系。只有在理论付诸实现的转化受阻既不意味着虚构也不意味着修正时，这种后备才是罕

① 同上，第 236 页。

② 同上，第 234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 234 页。

⑥ 同上。

见的；理论是不可辩驳的！^① 理论本来是随着社会实践才产生，并通过实践转化才有改进能力的，马尔库塞对此没有清楚的认识。“新形势下理论的转变的作用，明显地赋予它‘批判理论’的特征。”^② 它并非批判理论本身，而是批判实践。“它也批判人们在援引批判时对它们全部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某些回避。”^③ 对于理论来说仅仅是具体社会形势的可能性：它们只是作为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才有重大意义，并作为诸种可能性涉及生产过程中人的关系，社会劳动产品的使用，人参与整个经济和政治的管理。”^④ 具体涉及的是作为现实可能性的自由，作为社会关系的自由，它的实现制约着人类的命运。“在目前的发展阶段，重新显现出批判理论的结构特征。”^⑤ 理论与经验事实彼此陌生。理论首先否定经验事实状况，以便今后改善它。理论显然成了主体，而经验事实却受理论任意处置。由于理论能够否定经验事实，所以理论有能力把“粗暴的事实”置于最佳状态。马尔库塞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观点。

马尔库塞的设想表明，实现理论的失败并不在于缺乏理论，而在于错误的实践。由此他第一次间接地批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虽然他自诩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却严厉地拒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无

① 照马尔库塞看来，理论还能揭示对象未知的方面。但马尔库塞却没指出如何具体地理解这点。因而就产生这一问题，即究竟什么是非正确的或是虚假的。照他看来，它的实现最终将是实践。实践只是理论的一个要素，并为理论服务。

② 《H·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第23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235页。

产阶级，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因为它并不真正想使个人发展富裕^①。这样，苏联就反而阻碍了其它国家的革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早期马尔库塞那里已见端倪。在他的晚期著作《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里，这一批判更是暴露无遗。

马尔库塞始终承认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如同列宁所述，在新阶段的始初，还存在着作为早期阶段胎记的不平等和非正义。马尔库塞清楚地认识到，批判理论的理想社会在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对与此相关的困难这样谈道：“批判理论决不在神学彼岸的位置，用最终目标来虚构一个社会理想，这一理想由于它对始初以及未来的排斥对立而重新仅仅表现为彼岸。”^②他那关于理想不能实现的思想，或许是受豪克海默的影响。批判理论既可批判现实与过去，但不能预示未来。^③

批判理论应该取代哲学的传统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此可以作为结论确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理论，应该拯救人类。^④

马尔库塞同豪克海默合作制订并继续与他取得一致的早期

①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在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这一见解确实是片面的，关于农、轻、重的关系，中国现在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② 《H·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第236—237页。

③ 在第1章的1.2节中已论述了这一思想进程的动机。

④ 这一思想已在M·豪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的昨日与今天》和《过渡中的社会》1981年法兰克福版中清楚表明；也见于H·马尔库塞的《1971年1月5日巴伐利亚电台报道的完善与扩充的文章》，1977年慕尼黑版。

马克思解释的三种趋势构成了马尔库塞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即早期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是用以批判当时社会制度的理论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性的要求却被抛弃了。当时马尔库塞已在寻求解决世界矛盾，以便建立一个存在和意识不再彼此分裂的新社会。他把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解释成“物化”的表现，由于“物化”使存在和意识构成一种非真实的统一；在此他受到黑格尔和卢卡奇的影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通过把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化为辩证的经济学，而对黑格尔社会学说的继续阐述。批判理论作为哲学的批判，不再概括地针对现实性，而是针对它的经济基础；因而它是社会批判。马尔库塞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来自于他的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以异化概念为核心回溯到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前奏。

马尔库塞在当时把注意力放在对斯大林烙印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上。一直到1945年，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基本上把革命理解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一见解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是非常普遍的。马尔库塞对经济唯物主义的批判，首先是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机械学的批判。（五十年代期间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对人性因素的研究也属于此）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属于他的《单向度人》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为批判理论，是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解释的基础。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解释是在这一政治条件的情形下产生的。

三、马克思的批判和“批判的批判”

众所周知，豪克海默、马尔库塞以及法兰克福的其他代表，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理论的继承人，尤其是它的“批判特征”的继承人。以此出发，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以便揭示其丧失存在的理由。这样他们就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特征与资产阶级的科学理解相对立。因而也可把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称作批判主义。批判理论的早先形式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具有，甚至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也已经具有了。

1. 马克思的批判

豪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断言，批判是马克思著作的主导思想，尤其是马克思的重要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包括“批判”一词，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神圣家族》带副标题《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以及《资本论》带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但这仅是表面的一致。事实上马克思的批判同批判理论完全不一样。

(1) “武器的批判”

在十九世纪的社会，尽管进行了启蒙，宗教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马克思解释道：“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对此他断定：“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

上已经结束。”^①也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不仅批判了宗教，而且消灭了宗教，至少从先进英才的意识里消灭了宗教。但是批判不应停留在宗教上。对马克思来说，对宗教的批判仅只是一个样板，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②。马克思致力于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从对宗教的批判过渡到“对现存一切东西无情的批判”^③是马克思作为革命者出现的标志。^④他表述了下述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⑤也就是说，反动的政治制度必须通过力量来推翻。理论在此也会转化成群众的精神武器；转化成物质暴力。由此马克思已经远远胜过青年黑格尔派的纯粹理论的批判（对意识的批判）^⑥。

（2）“对旧世界的批判”

《共产党宣言》是对旧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锐利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79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3页。

② 同上；《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2页。

③ 同上，第38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0页。

④ 列宁：《卡尔·马克思》，载于《列宁全集》德文版，第18卷，第11页；《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8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0页。

⑥ 马克思由这一批判转向实践批判，转向行动。他宣布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对武器的批判”，他呼吁群众与无产阶级。见列宁的《卡尔·马克思》，载于《列宁全集》德文版，第18卷，第11页；《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页。

批判^①。“《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②如同革命理论给予无产阶级精神武器那样，无产阶级也给予革命的理论物质武器。^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④

与此相连的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或者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思想。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已经说道：“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⑤“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⑥

（3）“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批判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马克思的一项巨大工程，从1844年起耗费了他毕生的精力。在此

① 《共产党宣言》阐述了经济是基础，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学说。见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序言》（1883年德文版），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3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9卷，第29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9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4卷，第493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4页。

⑤ 马克思：《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4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6页。

⑥ 同上。

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

a)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形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批判

《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进行分析的第一次尝试。在此勾画出了共产主义的轮廓。马克思虽然把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看作变化的经济关系的反映，但由于他们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与辩证方法相对立）并在事实上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所以也对他们进行了批判。由此人们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由马克思在1844年第一次作了表述的，虽然在这部《手稿》里这一批判尚未作最终的论述。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效的批判，是马克思依据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所发挥的人道主义批判的系统化和深化。马克思当时致力于人对自身的复归。从马克思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当时对批判的理解：“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① 由此应该产生出这一批判的对象、主体以及方法。整个批判都与方式和方法连在一起，如同这三个术语在此是相互连结的那样。在对对象的批判时涉及到“一种经验，它的主体是人类”^②。“这一经验使人类去理解自身。”^③ 批判

① 同上，第34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8页。

② 雅各奎·伦西亚：《批判的概念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第28届国际马克思主义讨论会》，梅伏出版社，1972年柏林版，第7页。

③ 同上。

的主体，即“我们”，代表了批判的意识。“它是作为第一个意识到经验已经结束，即认识到它们自身的时代已经到来。”^①“全部方法都包括”在对经验的说明之中；“它是人类经验的表现”^②。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把他的重点放到经济分析和批判上来。照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的形成与本质只有通过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说明。这决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课题，而毋宁说是一个经济学课题。马克思从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这一事实出发，指出产品的异化只是自身从劳动过程或者从生产行为中产生的结果。生产行为，能动的劳动活动由此必然被异化。从对政治经济学的事实进行哲学分析中获得并以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的概念，还不是历史科学或者经济科学的概念。当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如果人们想清楚地说明私有制的本质和起源，必须对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异化劳动的起源作出具体的解释。“这一问题的新的提法已经内在地包括了它的解决，”但它还不是真正的解决。为了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事实出发，并对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以及所有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马克思在“第三部手稿，《需要，生产和分工》”中已经开始对此作了努

① 同上，第8页。

② 同上；通过对三个涉及对象、主体与方法的问题的答复，雅各奎·伦西亚把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解释为一种“经验”的学说：经验的知识——对经验的陈述。这种学说照马克思看来是片面的。

③ 在《巴黎手稿》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详细分析，在我所著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发展》中可以读到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论述，同时在本著第四章中也有一部分关于马克思的论述。

力^③。

他关于劳动产品和物质生产过程的著作，即关于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的著作已经表明，他的研究重点已经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马克思四十年代的一个特点在于，他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以及他的扬弃异化的论断是以经济分析为根据的。马克思把私有制看作共产主义理论，阶级利益对立以及阶级社会结构的起点；他从劳动与资本的对抗中看到了私有制必然灭亡的内在因素。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述的批判，是经济学批判的前奏，是向展开了的马克思主义方向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尽管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胎痣”，这一批判仍可列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阶段。

b) 政治经济学的革命——《资本论》中的批判

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如同《资本论》副标题所揭示的那样，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庸俗经济学辩护论”^①的批判以及对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②的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当时是迫切的。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③它在当时已经包含了劳动价值论学说的萌芽。“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的规律。这样，资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2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8页。

② 同上，《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页。

③ 同上。

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①

政治形势在 1830 年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获得了政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采取了更尖锐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②“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论”代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代表人物分为两大营垒。“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③他们只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外部联系，而不分析其内在联系。由此掩饰资本主义的剥削。“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④事实上，资产阶级对约·斯·穆勒评价很高。对此马克思说道：“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象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⑤

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论”以及簇拥在约·斯·穆勒旗帜下“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的学者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与此相反，马克思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包括分配关系和交往关系，以便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

① 同上，第 20 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16 页。

② 同上，第 21 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17 页。

③ 同上；《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18 页。

④ 同上，第 21 页；《马恩全集》中文版，同上。

⑤ 同上，第 541 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566 页。

规律。^①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有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②马克思由此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变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应当科学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服务。

这样，马克思就创建一门以批判为基础的新科学。《资本论》的副标题包括了批判的概念。“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③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为他在《资本论》中的思想要求“科学”的表达。在一封致库格曼的著名的信中，把《资本论》列入“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④批判和科学在马克思那里具有辩证的关系。^⑤

(4) “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阐述了他的辩证法的基本特征。《资本论》依以为据的方法是辩证的。他的辩证法不仅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直接与它相反。在马克思那里“观

^① 同上，第12、15及1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11页。

^② 同上，第22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9卷，第55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30卷，第64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637页。

^⑤ 雅各奎·伦西亚对这点作了恰当的论述；见他的著作《批判概念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8届国际马克思主义讨论会》，梅伏出版社，1972年柏林版，第73—124页。

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就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唯物主义的。归根结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它“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当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和“它的顶峰……普遍的危机”以及最终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时，^①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发挥的理论，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证实了马克思辩证法批判和革命的特征。马克思的辩证法通过对“旧世界”的批判是“革命的”；它又是“批判的”，因为它要对“旧世界”进行彻底变革。他的辩证法因而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2. “批判的批判”

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大相径庭。马克思理论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包含了把这一理论付诸实现的目的。马克思的理论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对旧世界的批判已经意味着，推翻旧世界和建立一个新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理论和“批判的批判”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批判的批判”的两个原则上的缺陷重复地在批判

^① 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27—2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4页。

理论中出现。

马克思在 1844 年写道：“这个《文学报》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这些柏林人认为自己不是从事批判的人，而是由于偶尔的不幸才成为人的批判家。因此他们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进行理论批判的需要。因此像蒲鲁东这样的一些人遭到非难，被指责是从某种‘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但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唯一的人的本质。例如，爱情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情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对象’。打倒对象！因此这种批判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对立物才有意义。因此，对批判家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感情或情欲——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嘲和凛若冰霜的哲人。”^①

青年黑格尔派^②固执于忽视无产阶级和他的特殊物质利益的“理论批判的需要”。斗争应该全部移到理论领域中来，以便促使一种精神的更新。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把人类作为群众同他们的批判，即精神对置起来。“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

^①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信，1844年8月11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7卷，第427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51—452页。

^② 此处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主要指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斯·斯蒂纳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此意义上不属于此。

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①所以群众作为非精神的停留在历史进程之下。

这两个观点重新归回在批判理论中。

(1) 纯粹的“理论批判”和“自我意识的哲学”

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批判的主体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由此成为普遍的，作为社会本质不受人制约的独立的主体。人类关系的总和作为非理性的东西必须由普遍意识来扬弃。这样，对青年黑格尔派来说，历史成了某种有别于黑格尔的精神发展，它只在意识的范围内运动并借助于纯粹的思想得到实现^②。

代替对永恒真理的预知，哲学必须批判现实并促使社会变革，批判理论在这一观点下把理论批判宣布为一种变革社会的力量。“理论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③，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形式”^④。理论、科学对于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也同样）来说，是生产力。它作为这样的生产力发挥其社会作用，一当它指出生产关系的桎梏时，它就同传统的社会制度发生冲突。科学理论的合理性与增长着的社会制度的非理性处于矛盾之中。由此豪克海默在早期制定批判理论时就认为，理论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批判的变更的能力。概念、思想的构思应该可以对改变社会存在作出贡献。因此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的，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卷，第8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02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6章第3节《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与自我意识的哲学》，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卷，第144—15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27—173页。

③ M·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第2卷，第165页。

④ 同上。

是随着这一变化的过程同时变化的。这构成了批判理论的特殊
的有条理的意识的一个部分。

豪克海默由此确定：“概念的世界构成普遍的意识，它拥有一个它的代表能够以此作为依据的基础。批判思维的兴趣也是普遍的，但是却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在批判思维影响下所形成的概念，对现实进行批判。”^①人们在马尔库塞那里也发现了这一论点。他认为，理论可以在群众和社会中，认识到那形成一个新的理想社会的基础的因素。批判理论必须拟定一个纲领，并提供能够实现所希望的目的的条件。“社会理论必须揭示这种可能性（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作者注）并说明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②这一任务决定了，批判理论使用的概念选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表达的意义：“马克思的范畴（诸如）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崩溃是一个概念整体的要素，它的意义不能从现实社会的再生产中探求，而必须从它的变化中正确地探求。”^③

三十年后阿道尔诺在历史的劫难之后又一次重新研究这些论题。他几乎完全把批判的实践简化为批判的思维。他尖锐地评价道，没有意义的实践在当今比放弃实践更不明智。阿道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哲学不能保证从某处出发可能会具体地传送作为时代错误的理论，理论始终是可疑的。或许是解释没能预告实践的过渡。理论批判所依赖的时刻是不能在理论上延期的。推移到遥远无期的实践，不再是反对自我满足

① 同上，第167页。

② 《H·马尔库塞文集》，1979年法兰克福版，第3卷，第234页。

③ M·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第2卷，第167页。

的思辨的责难申诉，绝大多数仅只是托词，行政权力在这一托词下把变化着的实践所需要的批判思想扼杀为无用的东西。在哲学违背了它是与现实性相同一，或者直接产生其现实性这一诺言后，有必要对它自身进行无情的批判。”^① 在反思中，哲学表明它在当今具有批判特征。哲学批判成为社会批判的前提，成为“变化着的实践所需要的批判思想”。按照阿道尔诺的理解，“变化着的实践”是意识范围内的“实践”，是哲学的行动或活动。理论自身成为实践，实践重新还原为批判的自我反思。

由此可以证明，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历史是在纯粹思维之内以及借助于纯粹思维所实现的精神发展的观点，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理论批判自身是变革社会力量的观点有显著的共同特征。十分明显，批判理论与其说同马克思相一致不如说同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相一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主义进行了批判：“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②“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之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要把一切外部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③

与试图用理论批判来取代革命相反，马克思得出下述“结

① Th·W·阿道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法兰克福版，第13页。

② 卡尔·马克思：《神圣家族》，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卷，第12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2页。

③ 同上，第87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05页。

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此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有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①

2. “精神”与“群众”——“批判的批判”与“非批判性的群众”

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代表能动精神的个人批判活动是历史进程的动力,而群众尚未到达自我意识的水平,停留在“非批判性”,并且是感性直观意识(在经验物质思维中)的偏见的表现。解放运动在他们那里仅限制在直接具体的物质利益与需要之中。^②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群众得出了相似的判断,这一群众在马克思那里称之为无产阶级。豪克海默同意马克思,承认无产阶级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对于无产阶级这一作为具有单独意识形态的个别阶级,要让他们从自身中获得对社会所有关系的认识,以此作为其解放的主要条件,这是过份的。因此无产阶级不能作为普遍思想的代表。只有那些较少受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制约,并较少受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3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3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六章第1节a“精神”与“群众”与“批判的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卷,第82—91页及157—163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99—110页及183—206页。

主义社会不同阶级影响的人，即具有批判思维的脑力劳动者才有能力把社会引向解放。

晚期的马尔库塞，在作了修正之后，也明显地坚持这一观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带来大量的物质财富。居民的富裕由此得到增长。技术创造了过剩的财富。反对派由此被一体化入工业社会。技术思想成为意识形态。因为它能将孤立的事实理解为现实，但却不是历史和社会政治的实践。当需要被满足时，反抗的动机和原因也消失了。工业社会的人成为统治制度的驯服工具。如果人们撇开某些少数派不谈，人的天性被塑造得一般趋向于使人的真正愿望和需要必须舒服地同各种关系适应。因而照马尔库塞看来，有必要区分“真正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①。

“一些特殊的社会强权为了对个人进行制约而强加于个人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即一些把艰苦劳动，侵略性，贫困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②从现象入手他写道：“与广告相一致的轻松、娱乐、行为与消费、爱和恨等等绝大多数占统治地位的对其它东西恨或爱的需要，都属于虚假需要这一范畴。”^③真正的需要是那些把人从他的“单向度性”中解放出来的需要。人的本性不应该被扭曲，而是应该保持人性，并能够得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在此包括与虚假需要所对立的一切需要。“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需要，以及什么是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必须让个人自己回答，就是说，只有个人能够自由地作出自己

① H·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80年达姆施塔特与新维德版，第2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的答复。”^①

当人们生活在单向度的工业社会里，人是不自由的。“在单向度的工业社会中生活的个人‘归根结底’是不能对他自己的真正需要作出自身的决定的。由于工业社会中人的天性是预先形成的，他的愿望、需要和向往都已经舒服地相适应了，因而绝大多数的人不再知道和说得出口他们的真正需要。所以只有不受单向度性制约并保持批判能力的少数人物，才能够为多数人说出他们的真正需要。这些积极的少数人物应该拯救消极的大多数人，晚期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也属于这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已经由此丧失了他的批判和革命的特征。工人阶级在“稳定时期起了巩固和保守的作用”^②。“由此工人阶级的成份发生变化使这一趋势增强”^③。“工具化的知识分子”^④也属于工人阶级。“这一‘新工人阶级’本该可以根据它的地位突破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对它进行改革和管理。但是它对它既无兴趣又无需要：它被完全一体化并得到优厚的报酬。”^⑤

舒适的群众，包括工人阶级，对自己富裕表示知足，不希望进行根本的变革。非单向度的精英，这些少数派，应该对群众进行启蒙并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受压迫。精英必须“客观地”为人民，同时也针对他的主观愿望引导一场可能的革命。多数人物应该由这些少数人物来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精英思想作了批判。

① 同上，第26页。

② H·马尔库塞：《解放的尝试》，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8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85页。

⑤ 同上。

“首先，把（布鲁诺·鲍威尔；作者注）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 he 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们体现出来的。”^① 最终也即是说：“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②

我个人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渊源不能追溯于马克思，而应该完全归之于青年黑格尔派。毫无疑问，批判理论继承的是“批判的批判”的衣钵。批判理论从与马克思不同的明显变化的条件中所作的具体历史分析中得出无产阶级不再保持解放因素的作用这一观点。由于资本积累的增加以及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对资本利益的从属，反对派的作用从无产阶级转到了少数派运动（马尔库塞）和批判（豪克海默、阿道尔诺）上来。^③

① 卡尔·马克思：《神圣家族》，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卷，第9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09页。

② 同上，第9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同上。

③ 批判理论积极转向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口头上没有作过清楚表示，但通过它们的理论结构以及在本著第一章第3节的第2小段中所论述的两点问题表述出彼此双方的一致。见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223—232页和237—241页；阿道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7—9页和13页及以下几页；参见汉斯-马丁·萨斯：跋《纯粹批判的战场》，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224—267页。萨斯在此认为，布鲁诺·鲍威尔的纯粹批判是批判理论的原始形式，它远比二十世纪的批判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新奇的多。

第三章 马尔库塞的海德格尔式 马克思观以及他的历史观

如果说马尔库塞是由于豪克海默而转向批判理论（即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在以前他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就更多。人们可以看到，在晚期著作中海德格尔的影响又是很明显的。他在海德格尔指导下，于1932年出版了作为他的第一部教授资格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在这部著作中他感激地宣称：“倘若这一著作对问题的探讨与澄清有所贡献，那应归功于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研究。”^①

当时马尔库塞倾向于“从‘存在的意义’求出存在着的東西；从基础本体论走向历史哲学；从历史性达到历史。”^②他当时（1928—1933年）“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③的水平上”研习马克思的学说，并致力于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结合起来。为了从作为人的本质的历史存在的主观性出发，来解释世界（历史），他从海德格尔出发，对强调客观性与客观规律进行了批判。

① 赫伯特·马尔库塞：《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1932年法兰克福版，第8页。

② Th·W·阿道尔诺：《对马尔库塞的〈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一书的评论》，载于《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年卷，第1卷，1970年慕尼黑版，第409—410页。

③ A·施密特：《生存本体论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载于《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答复》，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19页。

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实证哲学”，^①“它回答了海德格尔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生存以及真正的生存是如何可能的？”^②同卢卡奇一样，他也坚持黑格尔同一的主体—客体，就是说，他把中介的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由此他又像卢卡奇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事务。^③因此，马尔库塞不仅是一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尔库塞试图从海德格尔出发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拒绝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信徒的“机械经济主义”。“历史”和“个人”对第二国际的这些成员们是陌生的。通过海德格尔的哲学，使这两个因素充满了活力。但是在马尔库塞早期所致力于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结合起来的文章中，这种努力却遭到了失败。^④马尔库塞在这一时期（流亡之前）的著作“代表了对现象学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独特的尝试；尤其是当时所发现的巴黎手稿提供了一个出乎预料的连接点，以便把存在与时间翻转到唯物主义的定在分析上来。”^⑤在胡塞尔和海德

① A·施密特：《生存本体论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载于《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答复》，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19页。

② 同上。

③ 见拉迪司劳斯·鲁达斯尔：《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吗？》，载于《工人文学》1924年第1至12期及特刊，完整的2卷（本）再版本，1977年柏林版，第1卷，第493页。

④ R·毛勒：《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运用的海德格尔和学术无产阶级》，载于《哲学年鉴》（海尔曼·克里格斯等编），1970年第77年卷，第2分册，弗赖堡—慕尼黑版，第241页。

⑤ 约尔根·哈贝马斯：《前言》，载于《对H·马尔库塞的答复》，第11页。

格尔的影响下，他试图把“现象学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合起来”^①这一情况对马尔库塞的马克思的评价非常重要，使得倘若人们“不了解存在和时间的繁杂范畴，便不能对明显的误解有所确定”^②。哈贝马斯称马尔库塞为“第一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③

一、马尔库塞最初的马克思观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资产阶级范围以及无产阶级范围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卢卡奇属于马克思解释者的新一代，这些解释者对第二国际时期的经济机械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哲学上的修正。^④我们在葛兰西和科尔施那里都看到了类似的倾向。这些作者们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并间接批判了列宁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重新表述，首先使用的是黑格尔的论证。在1930年重新发现的马克思早期作品影响下，产生了添补的人类学—历史哲学解释重点。马尔库塞可以在这一背景下制定他的马克思观。“实践—革命的思想”处于重要突出地位。“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理论，真理的系统……而是社会行动、历史行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

① A·施密特：《生存本体论》，载于《对H·马尔库塞的答复》，第18页。

② J·哈贝马斯：《前言》。

③ J·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1963年诺伊维德—柏林版，第330页。

④ 人们可以从卢卡奇的《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载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8页及下页）这篇文章中，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是认识的真理，而是事变的真理。”^②从这些定义中得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历史诊断，而是实践的实证理论，即历史的理论，因为历史就是直接的实践。这样，如同在“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是普遍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被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的影响。马尔库塞几乎文丝未动地，把卢卡奇在《列宁》^③一文中所表述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纳入他的构思之中。在卢卡奇写道“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方，马尔库塞都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④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中被清除了出去。“自然领域”（天体世界）虽然可以存在辩证现象的对象^⑤（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同义语），但是事实上，马尔库塞仅承认自然的历史是辩证的。“存在着辩证的自然科学，但不是恩格斯所错误认为的新物理学，而是与各自定在相关的自然历史。”^⑥马尔库塞不是在自然和历史间作二分法的分割，而是在一方为非历史的自然物，另一方与自然历史相关的历史领域作了二分

①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载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解释》，1973年法兰克福版，第41页。

②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载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解释》，1973年法兰克福版，第41页。

③ G·卢卡奇：《列宁，列宁思想联系研究》（1924年）。

④ 见上注，《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载于《组织与幻想》（政治论文第三集），1977年达姆施塔特版，第211页；同时也见H·马尔库塞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第41页。

⑤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8页。

⑥ 同上。

法分割。“由于自然的历史在严格意义上只是外在的，所创立的自然科学由此可以撇开它的客体的历史与社会的中介。”^① 马尔库塞的这一新态度被他的解释者阿·施密特看作是一大“贡献”^② 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了对“历史性结构的基本认识”^③。自然辩证法被摒弃了。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表现的历史理论具有双重的历史性：“首先，由于它的对象是一个历史的对象并作为历史对象对待，第二，由于它自身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状况中参与历史活动。”^④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拥有—个“马克思称之为辩证方法”^⑤ 的方法。这一方法按马尔库塞看来，一开始就将“它的对象看作是历史的对象”^⑥ “这一方法揭示了概念作为‘定在形式的生存规定’……并由此重新回到生动具体的土壤之中，由此它就消融了被抽象概括成凝固单一的历史范畴。”^⑦ 马尔库塞声称，这就是由他所发现的马克思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它始终同那种笨拙地把辩证法作为‘格吱作响的脚手架’和宇宙总图来使用的辩证法相对立”^⑧ 在此，马尔库塞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于把马克思辩证法作机械解释的厌恶。马尔库塞在此赋予辩证

① A·施密特：《生存本体论》，载于《对H·马尔库塞的答复》，第43页。

② 同上。

③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9页。

④ 同上，第63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第64页。

⑧ 同上。

①

法一个特殊的意义^①。他的问题在于：辩证法是否对它的历史对象是“适当”的^②。马尔库塞就这样有意识地，把马克思的辩证法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内。^③

二、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 “历史性”的理论

1. “历史性”的概念

马尔库塞的“历史”概念是生存本体论的马克思解释的基石。属于马尔库塞思想背景的有狄尔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尤其是《存在与时间》中历史与历史性关系的规定，对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此应该简单地研讨一下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存在与时间》一开始，海德格尔就在分析本体论历史的任务联系中写道：“一切研究……都是定在的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定在的存在在时间性中具有其意义。”^④这是“历史性的可能性的条

① 事实上，马尔库塞否认马克思的辩证法同时具有自然、历史和思维的普遍规律及客观性。他认为，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种方法，这一观点是与恩格斯的观点截然不同的。

② 同上，第63页。

③ 关于“马尔库塞的第一个马克思总观”这一论题，也可以包括卡尔·福兰德的评论：《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载于《社会》，第6年卷（1929年），第186—189页。

④ 照我看来，史泰方·布鲁尔是在近似的意义上使用“历史性的理论”这一术语的。见史泰方·布鲁尔：《革命理论的危机》，1977年法兰克福版，第二集第2章……《马尔库塞，海德格尔与历史性的理论》，第96—118页。

⑤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41年哈雷版，第19页。

伴”，^① 并再度形成历史可能性的条件（海德格尔把作为事变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编纂学的“历史”作了区分）。“历史性这个规定”“作为定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发生在人们称为历史的那个东西之前。至于定在是否是以及如何是一个‘在时间中’的存在问题，在此是撇开不谈的。”^②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历史性是历史的前提，然后才是历史。海德格尔“领悟到，历史是以定在的历史性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这一关系在所谓的基础关系中处于第二位：历史学家首先并尤其是只有通过他的生存的历史性，才有能力从事他的科学活动，这一生存的历史性引导对对象产生兴趣，而自身却不成为对象。”^③

哲学的基本问题，照海德格尔看来，是“存在意义”的问题：“寻求存在的问题……自身通过历史性来表明其特征。”^④“历史性……归根结底是一个生存的东西，它直接涉及到定在的时间结构，但也在两种形态内带有‘世俗性’，在物的形态内以及与它者休戚相关。”^⑤因此，历史以历史性为基础。“没有自在的历史，历史是从定在中产生的，同时通过定在复归自身，并形成意蕴和意义；历史的奥秘在于‘重复’^⑥，它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作为‘明确的传统’，‘曾在的生存的可能性’”（当生存在

① 同上。

②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41年哈雷版，第19—20页。

③ 盖哈特·施密特：《历史性的哲学与哲学的历史性》，载于《文化科学》，1980年波恩版，第374—375页。

④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0页。

⑤ G·施密特：《历史性的哲学与哲学的历史性》，第375页。

⑥ 同上。

断然的重复中对它命运攸关地一霎那敞开时，这一可能性才复归)。① 最终“作为‘曾在’挤进定在自身的时机中。”②

海德格尔断定，历史性以及历史都可以是本真的和非本真的。照他看来，首要的是“区分本真的历史性与非本真的历史性”③。其结果是：“历史受历史学家生存的历史性制约……”④。“本真的历史首先并不涉及单纯的事实，而是涉及历史的一始终关注本真与非本真的定在的差别。”⑤ 海德格尔由此获得了评价历史编纂学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不仅仅它，而且历史自身也以定在的历史性为基础⑥。历史不是自在的事变。

马尔库塞无法摆脱这一具有说服力的思想。他被海德格尔的发现深深吸引：“一条揭示历史性是定在基本规定性的道路畅开了，这照我们看来是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关键。”⑦ 海德格尔为马尔库塞建立了哲学历史意识一贯发展的拱石。马尔库塞认为，“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性问题又被“重新确认为哲学的主要问题”。⑧ 重要的有黑格尔和狄尔泰。但只是在海德格尔那儿才达到高潮。海德格尔“从严格的现象学出发，提出了极端困难的问题并作了回答”⑨ 《存在与时间》照马尔库塞看来，似乎可以“称之为哲学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里，资产阶级哲学从内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385—386 页及 391—392 页。

② G·施密特：《历史性的哲学与哲学的历史性》，第 375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见：M·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20 页。

⑦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 57 页。

⑧ 同上，第 54 页。

⑨ 同上。

部开始自身消融,并为一种新的‘具体’科学开辟道路。^① 历史性不仅仅是一个生存的现象,而是生存的,即我们把握历史的前提。唯有一个历史的存在物能够经历历史并了解历史的联系。当历史学家由于期待过高而埋怨历史时,他们或许是想摆脱自身的历史性,或者想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它。历史性在于,人具有命运。决定命运的定在本质上与它人共在而存在”,这样,它的“表现是一个共同表现并决定为命运”^② “历史性使定在与它人的定在具有必然的牢固关系,定在的本真表现是‘在同代中以及与同代共处’的定在。”^③ 马尔库塞断然说道,海德格尔已经认识到“定在的历史被抛状态,它的历史规定性以及根源于人的‘命运’^④,即根源于‘共同体’。”^⑤ 海德格尔由此把他的根本研究向前推进到资产阶级哲学迄今所达到和能达到的最深处。^⑥

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作用评价不同于卢卡奇,也不同于他的法兰克福战友。他的思想还受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影响。^⑦

①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57页。

② 同上,第58页;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84页。

③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58页;M·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85页。

④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0页。

⑤ M·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84页。

⑥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0页。

⑦ 梅劳·庞蒂为了把苏维埃“官僚”的历史观作为宿命论的历史观来加以批判,对历史作了存在主义的解释。梅劳·庞蒂在他的著作《人道主义与恐怖》中写道,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个体,由于其生活方式,它是自由的人道主义的继承者(见《人道主义与恐怖》1969年波士顿版,第125页)。萨特的历史观也明显带有存在主义的色彩。以后萨特曾试图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这方面,马尔库塞更早地认识和发现了许多东西。

与卢卡奇不同，黑格尔的影响却由此受局限。卢卡奇从黑格尔推导出他的历史观点。“精神现象学对卢卡奇来说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一切，是全体，是不仅自身组织的全体，而且是在无产阶级完成的阶级意识之内自我理解（和自身完成）的全体。历史是实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主体，双方思辨地同一。此外，卢卡奇还成功地解决了历史主义的问题：包括黑格尔绝对在内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相对的，唯有历史本身以及与它相应的革命意识不是历史的、相对的！”^①但是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同黑格尔毫无关系。相反地，这一概念是反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黑格尔来说，历史只不过是人以某种方式加入其中的“精神过程”。而照海德格尔看来，之所以存在历史，只是因为人存在着。人们不能认为人在理论上才是历史的，即通过历史意识才是历史的，历史意识引导人去认识历史联系。对历史联系的阐释从生存状态的历史性中偏离开来。

这一研究最终必将“碰到历史性物质结构的问题”^②，海德格尔把它简述为物质的历史，狄尔泰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③“历史生存问题的疑难由自身引向历史性的物质内容。”^④马尔库塞关于“历史性的物质结构”或者“历史性的物质内容”的

① G·施密特：《论精神现象学在卢卡奇的历史哲学中的再现》，载于：斯图加特黑格尔纪念日（1970年）（汉斯—格奥格·伽达默编），《黑格尔研究专刊》第11期，1977年波恩版，第639—640页。

②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2页

③ 同上页注；也见W·狄尔泰：《历史世界在精神科学中的建立》，载于：《W·狄尔泰全集》，第7卷，第3版，1958年斯图加特—格丁根版，第252—291页；参见A·施密特《生存本体论》，载于《对H·马尔库塞的答复》第22—24页。

④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2页。

思想，必须从“基本情况”^①这一概念来确定。马尔库塞试图用这一概念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2.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状况”的确定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状况”问题的探询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必须同他的早期文章的主导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认识。

《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对马尔库塞来说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否适合由海德格尔所发现的历史性现象；海德格尔的历史性现象应该辩证地加以发展和细致化。以便它能胜任“历史唯物主义”，即历史性的历史概念。从历史现象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综合中，得出一个作为结果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即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同存在主义基本思想的混和。这一新的现象学应该研究“历史性的结构”。必须联系历史性的现象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原理。^① 马尔库塞试图从海德格尔出发解释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财富同存在主义的思想财富结合起来。

起初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状况”的讨论，如同马尔库塞所认为的那样，它以“人的基本状况”^②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只有符合它的历史位置及其中的意义时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③ 因此，人们必须把“人的定在的存在方式作

①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42页；也见第71页。

② 同上，第42页。

③ 同上，第43页。

为历史的^①加以研究，因为人的定在只是生活在‘历史状况’中并从中显露出来”^②。马尔库塞的出发点是一个人。因为每个人对环境都有“他各自”的态度并认识和确定从中产生的任务^③。

马尔库塞把这两个要素同“人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④这一思想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历史认识的唯一确定性”^⑤即在于此，对此马克思经常指出这点。这一观点的思想来源是黑格尔的同一哲学。马尔库塞在此走的是一条同卢卡奇相同的路，卢卡奇在后来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说明（1962年）中所论述的观点同样也适合马尔库塞：“《历史与阶级意识》形成于1921—1922年，正当作者从黑格尔转向马克思的时候。因而这部著作在哲学的关键问题上都带有过渡时期的一切特征。这首先表现在：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总是不断出现，但总的来说充满了黑格尔的同一的主客体理论。”^⑥

马尔库塞从“人的基本状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对此他采用了“激进行动”这一新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是有关激进行动的历史可能性，它应该为一个为实现全人类的新的必然现实性鸣锣开道。它的执行者是具有意识的历史的人，它唯一的行动领域是作为人的定在基本范畴被揭示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42—43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I·费彻尔：《马克思主义。它的文献史》，第1卷：《哲学，意识形态》，第137—138页。

的历史。由此表明作为‘阶级’的历史行动，激进行动是历史整体的行动。”^①

马克思主义因而是一个把人作为“激进行动”执行者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已经为“激进行动”的可能提供了历史基本。在“激进行动”中人应该获得自身彻底的实现，以便建设一个新社会。“激进行动”的“执行者”并非无产阶级，而是“有意识的历史的人”。有意识的历史的人会根据对历史状况的认识而作出自发的行动。马尔库塞虽然把“激进行动”确定为“‘阶级’的革命历史行动”，但他的出发点却是个人。他的主观主义表现为寄希望单独的行动作用，它把一次实现“新的现实性”作为一次决定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一设想同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同一的主客体观点相雷同，同一的主客体通过单纯的认识行动把自身建立在“行动”中^②。

马尔库塞把“基本状况”这一概念运用于马克思主义（他不是写马克思的基本状况，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这应该归之于海德格尔的影响。这一构思是含糊的。它的个人主义观点同马克思不一致。

3. 马尔库塞的“激进行动”论

对马尔库塞来说，“激进行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状况”的核心问题。由此可以把历史理解为直接的实践。然后从

①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44页。

② 参见：乔治·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70—355页，（尤其是255页及以下几页）。

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一个直接实践的历史理论。

(1) 神秘化的“革命状况”是实现“激进行动”的条件

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激进行动”只有“在革命状况”下才有“意义”；在这一状况下它是“人的本质实现的关键”，但这一实现同时又是“事实上的不可能”。^①“这种革命状况”被神秘化了。

马尔库塞称这一“基本状况”是非常历史性的，不同于一般的“具体历史状况”。这只是一个“活动的无穷总额，一个挨着一个，所有的都难分难解地结在一起并相互规定，——一切都必须由行动者来解开，行动者并不生活于其中，只是从事活动，……必须进行活动，才能真正生活。”^② 马尔库塞把这一强制性称之为马克思的“个人权力向客观权力的转化。”^③ 他抱怨道，“人自身的行动却成了与他陌生、对立的权力。”^④（由此他暗指马克思的异化）“这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一番了望，它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意识形态之背后遇到了‘一个非人生存的现实性’……与此相对立的是激进行动所要求的符合人性生存的现实性。”^⑤ 如同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所发现的那样，马尔库塞在此不是使用海德格尔的生存概念，而是日常的生存概念：“不能从本体论上去理解马尔库塞特别强调的这一生存概念。它来源于费尔巴哈的感觉论和实在论，并构成旧原子唯物主义与

①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45页。

② 同上，第4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环节。”^①

马尔库塞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追溯到“激进行动”。这是个人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属于本真的向度。马尔库塞遵循海德格尔的生存本体论。

甲) 在一个“把行动理解为人的本质的根本实现，同时又认为这种实现在事实上不可能”^②的“革命状况”下，激进行动的可能性显得英勇悲壮，同时也已经明显流露出晚期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苗头。什么时候出现“革命状况”它究竟存在在哪里？马尔库塞在当时并未提出这些具体问题。无论如何，在他看来，倘若没有“革命状况”，“激进行动”就是毫无意义的。甚至连单纯的“事实上的不可能性”都不会出现。

乙) 他把“基本状况”看作是历史性的观点，迫使我们对“具体历史状况”的存在进行认识（在此他甚至企图用马克思的“存在”概念来改进海德格尔的“生存”概念）

丙) 在任何时候他都声称，“激进行动”的任务，在于克服具体历史状况的异化存在，并创造“一个人类生存的现实性”^③。

(2) 对“激进行动”的确定

马尔库塞认为，克服“非人性生存的现实性”的“激进行动”，^④它的根源在于生存。“行动被理解为‘生存的’的，即作为人的定在的行为方式，并以人的定在为根本的出发点。”^⑤为

① A·施密特：《生存本体论》，第30页。

②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45页。

③ 同上。

④ 马克思：《神圣家族》，第132页；见《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45页。

⑤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46页。

了证实由他提出的论点，这一论点并没运用海德格的语言，他紧接着立即援引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切社会生活从本质上是实践的。所有将理论导向神秘化的神化都在人类实践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它的合理解答。”^①人们在此看到，马尔库塞用“行动”概念代替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马尔库塞还将“行动”分为“激进行动”和“非激进行动”：人的每一行动改变着事态，但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能改变人的生存；^②那种能改变事态却不能从生存上改变在事态中生活的定在的行动，称之为非激进行动；与此相反，只有“激进行动”……随着事态也改变着从中活动的人的生存。^③在此表明，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实践”以及“革命实践”解释为“行动”理论与“激进行动”理论。马克思关于人随着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人自身的主观世界这一思想，被马尔库塞分割为两个互不相关的观点，即分为“事态”和“人的定在”。他认为，只有把行动划分为“激进的”和“非激进的”才具有意义。马克思统一的实践思想由此被分割和曲解。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多次援引《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中的“存在”概念并进行了特别的强调。如同前面已经澄清的那样，尽管马克思的这一概念与海德格格的生存概念毫无关系，但根本的是：马尔库塞想把马克思的存在概念同海德格格的生存概念结合起来，以便对此概念作番改进。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存在”概念是海德格格的生存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

概念的先行。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海德格尔对定在分析的正确。事实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道，人的现实性是包括在社会与历史的生存条件中的，这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个人主义观点而提的。因此，简单地把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转换为基础本体论，也是不成功的。在此显然并非关于命运攸关的人之生存。“当马尔库塞把经济学范畴……一个特定社会的定在形式、生存条件同海德格尔的定在分析相比较，以便得出，它是否能‘对历史性基本现象’……获得完全认识时，他沉湎于这种活动中。”^① 马克思的理论在历史领域比马尔库塞的论述更具体、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如同阿·施密特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人们从马尔库塞那里获知的生存只是海德格尔的一个“贫乏的答复”^②；生存是“人的实体”，是“存在自身，定在可以对它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并始终采取某种行为。”^③

马尔库塞认为，“历史的生存”是马克思随着对“作为人类定在基本范畴的历史发现”^④所提出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它同“人的定在”的概念具有同等地位，由马克思所使用的“存在”概念被染上存在主义的色彩，当然马尔库塞也另图由此改进海德格尔的这一开端。以海德格尔为依据，马尔库塞谈道，也存在着非历史的生存：“孤立的个人诸如无意识的群众，会错误地认识他们的历史状况或者对此进行反对，而不去把握它，——这样，他们的生存就缺乏激进行动可以扎根于其中的必然

① A·施密特：《生存本体论》，第30—31页。

② 同上，第31页。

③ 同上；M·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17及12页。

④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47页。

性。”^① 由此清楚地表明，马尔库塞把“生存”作为“历史生存”的等价物，把“历史生存”又作为“人的定在”的等价物。“生存”划分为“历史的”与“非历史的”，这同“行动”分为“激进的”与“非激进的”相适应。马尔库塞把他对“历史性基本现象”的“详细”研究称为他最重要的任务。

现在可以对马尔库塞的构思进行一番简短的总结：“激进行动”由“生存”来决定，因为“行动指的是生存论上的行动。”^② “行动”分为“激进的”与“非激进的”，“生存”分为“历史的”与“非历史的”，这毋宁说是对马克思“实践”概念与“生存”概念所作的十分可疑的修正。归根结底，马尔库塞企图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成以“生存”为基础的“激进行动”理论。

(3) “激进行动”的基本特征

照马尔库塞看来，“激进行动”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只能扎根于必然性中。“激进行动”对于行动者以及它在其中实现的环境来说本质上都是必然的^③；“激进行动的必然性是内在固有的。”^④ 言下之意，“本质的必然”指的是“激进行动”的特征，“内在固有的”指的是“必然性的最终决定性意义”^⑤。但是这一必然性是如何地被“具体地决定的呢？”^⑥ “行动指的是生存论上的行动：是来自于作为基本状况的人的定在并针对人的定在的

① 同上，第48页。

② 同上，第47页。

③ 同上，第46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第47页。

行动。”^① 行动者的“激进行动”必然产生于具体人的定在；“激进行动”对于环境来说自然作为具体人之定在的必然性。“行动的场所”，或者说“事变的具体必然性领域是历史，一激进行动的所有规定都汇入作为历史性的基本规定性中。”^②

历史性在马尔库塞那里构成了“激进行动理论”的最重要因素。马尔库塞把“激进行动”同历史与存在的关系表述如下：“当激进行动是历史的，以及它的必然性是历史的必然性时，激进行动才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因为人的定在本质上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实现，并且由历史来规定。就是说，激进行动的执行者必须具有历史的存在，它的行动场所必须是历史，它的方向和目标必须来自于历史本身并面向历史的存在，为了能够确定激进行动的具体可能性，必须认识激进行动得以实现的历史状况。由此有必要弄清历史的结构以及历史生存的基本条件。”^③ “激进行动”在它的必然性及人的定在上，被归溯为历史并最终归溯为“历史性”。为了产生“激进行动”，首先必须认识当时具体的历史状况。这个清楚的一贯的思想以变化了的形式重复出现：为了扬弃异化，首先必须获得冲破物化的认识^④。为了促进“革命”，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必须首先认识这一社会和文化的“单向度性”以及他自身的“单向度性”。^⑤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48页。

④ 见《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论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等。

⑤ 见《单向度的人》，第21、139、11—20以及21—38页；参见阿拉斯泰尔·马克图列：《海伯特·马尔库塞》，1971年慕尼黑版，第80—95页及96页以下几页。

他的马克思观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马克思的方法解释为“纯粹现象学的方法”^①：“应该在彻底的具体性中揭示‘历史人’的事实情况，唯有那些在这一事实情况中显示自身的才有效。”^②具体性在马克思那里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就“纯粹现象学”的意义，而是就“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内在的本质和活的灵魂”这个意义来说的^③。

(4) “激进行动”的执行人

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的主要力量不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起客观作用的无产阶级，而首先是“有意识的历史的人”^④。这就是“激进行动”的执行人。马尔库塞在此论述的人不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而是半截子马克思意义上的人。马尔库塞的“有意识的历史的人”代替了马克思的“历史的人”。这是一些具有历史性意识的人；唯有这样的人才能自身解放自己。人的生存是历史性的；人的定在的历史性生存因此成了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有意识的历史的人”最终是海德格尔关于为它在的它在的“定在”。

马尔库塞的人不仅是个体，同时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众”。例如，他把“无意识的群众”看作“孤立的个体”^⑤。就是说：“个体（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群体，一组确定的群众；

①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48页。

② 同上。

③ 毛泽东：《矛盾论》，载于《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79页。1968年北京版；同时也见列宁的《共产主义》一文（《列宁著作》，第31卷）。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对匈牙利共产党人贝·库作了批评，列宁写道：“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④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44页。

⑤ 同上，第48页。

“孤立的个体”不是“激进行动”的执行者，因为它只是“无意识的群众”。因而作为“激进行动”执行者的“有意识的历史的人”同样也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组有意识的群体，是马尔库塞和他的朋友这样一些站在前列的精英。但是马克思那里，历史的人（马尔库塞称为“有意识的历史的人”），指的是无产阶级，它作为“现实的人”意识到它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历史使命。而照马尔库塞的说法，马克思的革命执行者归根结底是有意识的历史的人。

对此有必要提及一下他的三个观点，这三个观点几乎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重新出现。首先，作为“激进行动”执行者的“有意识的历史的人”同时是历史的主体和客体。虽然马尔库塞总是使用诸如“历史的基本现象”等基础本体论术语，但在论述中他已经认识到，人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此外他还强调了历史的“总体性特征”：人的定在按其存在是历史的定在，它的出现不需要超验的推动与目的。”^①在此，马克思虽然把历史看作人的活动的历史，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看作人追随他的目的的活动^②。马克思对此的不同点在于，人在行动之前已经有了计划，并总是目的明确，行动追逐一定的目的。在与自然的生存斗争中现代人（homo sapiens）逐渐地成为历史的人。有目的的意识以及追求一定的目的成了区分人与动物的一项重要准则。

马尔库塞认为，从历史来看，人的定在的出现是一代继一

^① 同上，第50页。

^② 同上；卡尔·马克思：《神圣家族》，第19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46页。

代的。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上一代的遗产，但却是在一个完全改变的状况内，因为“作为人出现的活动的历史”，“在每一时刻都经历着变化。”^①因而新的一代都必须发展，改善或者毁灭它所继承的东西。在世代的演变中人们继承了合乎目的的东西，抛弃了不符合目的的东西。人，一代人，“唯有在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客体，并把握到它时，唯有从对当时历史状况的认识中进行行动时，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②。另一方面，人也会“忽略他的行动……把自己从历史的主体降到历史的客体”^③。在马尔库塞那里，“有意识的历史的人”就这样既是历史的主体同时又是历史的客体。人们又重新看到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的思想。人创造他的历史，并且历史也创造人，卢卡奇先说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论点。

有趣的是，在萨特那里也能找到这一观点。“萨特从形式上论述了人的存在的历史性：人创造历史，但历史也创造人，最终也塑造人。”^④象是贯穿着一条红线，从卢卡奇到马尔库塞再到萨特，都保留了黑格尔假设的主体与客体同一。由此可以看到，马尔库塞虽然回溯到马克思，事实上早已变调了。

第二，当马尔库塞说：“普遍的阶级”作为“历史运动的最终执行者”^⑤时，他致力于个体的自我解放与变革相结合。主观上他并不想用个人的宣传鼓动来代替阶级斗争，而是致力于构思一个个体斗争与阶级激进主义间可能最佳的关系。虽然他不

①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5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53页。

④ G·施密特：《历史性的哲学与哲学的历史性》，第371页。

⑤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51页。

否认无产阶级（照马克思观点）是革命的“执行者”，但对列宁党的优先权学说，即“先锋队—社会主义”学说却持批判态度。他更愿意将罗莎·卢森堡意义上的民主机构形式，引入他的社会学说内，并坚持个人斗争是充满意义的阶级激进主义的出发点。^①他在1969年发表的《解放的尝试》一文中，试图在无政府主义自发性与先锋队模式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他并不想借助“先锋队主义”来实现革命的团结，因为照他看来，“先锋队主义”会损害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民主性质。“有意识的历史的人”始终成了他的“激进行动的执行者”，就是说，一个没有“先锋队”的阶级或者一个并非孤立的个人作为个体加入斗争。在此，他对卢卡奇也持反对态度。与卢卡奇关于革命的“集体主体”概念相对，他杜撰了革命的“个体主体”概念。由此他重复了法兰克福学派客体“统治”的论点，并且坚信，革命的个体主体会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作出贡献。

不仅马尔库塞这样，梅隆·庞蒂^②和萨特也是以蒙难与惊慌的个体作为出发点的。鉴于不同的心理基础与哲学基础，他们断言，尽管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异化，个体可以根据他自身的实践经验，从事各种不同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解放实践。当马克思主义者对异化不是作现象学的理解时，仅立足于实践经验，则很可能会忽视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这样，工人的责任和使命就会转让给一个主管普遍解放运动的特定政治组织。照马尔库塞看来，并非“孤立”的个体，具有认识与扬

① 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1978年法兰克福版，第139—154页。

② 梅隆·庞蒂是一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此处提及他，是为了说明他的早期马克思研究也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

弃自身异化的能力；只有通过个体的解放，才能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这并不意味着消灭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将依靠个体所民主表述的自由意志。

马尔库塞的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想把个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重新加以构建^①。他的观点与卢卡奇的“集体主体”和阿道尔诺以后所谓的“被统治的主体”^②不同。马尔库塞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修正。他把个体重新置于反抗的中心，由此他的学说也成了历史哲学—人类学的激进主义。马尔库塞^③清楚地表明，他把个体看作阶级斗争的出发点。这一“普遍阶级作为历史运动的最后承担者”与马克思的阶级意义不同。马克思认为，它最初产生于单个自由的个人并且也不需要一列宁党的理论意义上一的先锋队。只有当每一个体以他的意识加入这一运动时，历史的运动才能继续得到发展。

这样，照马尔库塞看来，革命意识的产生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历史性的生存只有在理解到生存，认识其历史状况，它的可能性及其使命时，才能得以现实。只有当它‘与历史直接相连’时，它才可以激进地做它须做的一切。”^④这种认识是“‘阶级意识’的成就”^⑤。负有使命的阶级在阶级意识中成熟地成为历史行动的承担者。当已经具备革命状况时，唯有意识到

① 见本著第二章第1节。

② 见豪克海默与阿道尔诺：《启蒙的辩证法序言》，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6页。

③ 见《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1928年版。

④ 同上，第52页。

⑤ 同上。

它的历史地位的阶级才能理解它。”^① 因而照马尔库塞看来，历史性的生存是以它对历史状况的认识为前提的。即使没有马克思所宣称的客观条件与危机事先必然发生与实现，革命也是可能的。只要产生革命意识或进步的“阶级意识”就足够了。

个体意识可以过渡到阶级意识（或者集体意识），个体的“激进行动”可以过渡到阶级的“激进行动”，这似乎同卢卡奇“阶级意识”的学说相同。但是无论是卢卡奇还是马尔库塞，都没有解决这一过渡问题。马尔库塞 1930 年间的一篇文章，表明了他与卢卡奇联系的随意性：“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应该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基本意义上来认识和估价，而不是过高估价的意义上认识与估价。”“卢卡奇辩证法的弱点‘在于’一点，”“即在于‘正确的阶级意识’的概念内。这一概念（如同阶级意识的构思）冲破了历史性的向度，是事变‘之外’的确定，这里才需与历史建立一个人工抽象的联系。”^②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意义，在于它并非想作为“哲学的基础，而是试图成为具体的辩证法”^③，这部著作始终强烈和持续地影响了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观。

4. “思维行动”和“不断革命”

马尔库塞“激进行动”的理论，按其内容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场革命。它的实现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它的规定

① 同上。

② H·马尔库塞：《论辩证法问题》，第 2 集，载于《H·马尔库塞文集》，第 1 卷，1978 年法兰克福版，第 421 页。

③ 同上，第 422 页。

具有存在主义性质；它的基本特征（历史性）打上了个人主义的烙印；它的承担者（“有意识的历史的人”）原来只是当时略露头角的“学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由此被归结为社会与历史意识。革命只发生在意识领域。

（1）“思维行动”与“行动”

马尔库塞的“激进行动”概念既非马克思所提供，也非恩格斯或列宁所提供^①。我认为他是以康德的“思维行动”的概念为蓝本的^②。思维行动是不可知的，因为它在时间上是不可捉摸的，由此改变了思维特性，并从恶过渡到善。康德以这一观念作为他改变道德生活的基础。指向无限世界的希望，在于死后仍继续努力追求完美的道德生活。——“激进行动”以促使一切面目一新的现象为根据来重新估价一切。激进行动不同于革命行动，它在时间上是不可确定的，生活似乎依然如旧，但明智者清楚，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马尔库塞此外还受到费希特的影响。对费希特来说，“哲学是否从事实出发或者从行动出发”^③这一点至关重要。行动是纯粹的活动，不以客体为前提，而是自我设置自身，由此行动（Handeln）直接转为行动（Tat）^④。倘若哲学“从事实出发，就置身于存在的世界和有限的世界，它想从中找到一条通向无限和超验的道路则是困难的；倘若哲学从行动出发，哲学就处于

① 列宁对此使用了“革命行动”这一词。见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载于《列宁全集》，第4卷，第2分册，第265页；《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41页。

② 1·康德：《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学术版第4卷，第39注。

③ 费希特：《科学学第二个导论》，《费希特著作》，第3卷，第52页。

④ 同上。

连接两个世界的点上，从这一点上可以俯视哲学。”^① 费希特就这样把实践活动、行动和思维活动置于统一整体哲学的方法论中心^②。马尔库塞的“激进行动”实际上是对费希特“行动”概念的复制。

(2) “激进行动”与“不断革命”

“激进行动”的另一个缺陷，在于马尔库塞总是谈论一种行动。他幻想，当“一种革命状况”已经来临，以及行动自身已经“激进”时，这一行动能一次使革命取得成果而获得成功。马尔库塞这一意义下的“激进行动”显然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大相径庭，或者除非人们仍然以康德为根据坚持无时间性的思维性；“激进行动”就成为不可捉摸、不可理解的东西。

马克思“不断革命”思想的形成，与论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相联系。1844年，马克思在他发表于《德法年鉴》的文章中，已经宣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他表示赞成“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已经存在于广大群众和无产阶级当中，通过他们能够摧毁相对立的物质暴力。只要存在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与人类解放就决非是乌托邦；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马克思在当时已经阐述了他的“不断革命”思想：“当政治生活特别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力量时，它就竭力压制它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因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真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

① 同上。

② 见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载于《历史与阶级意识》，1970年新维德—柏林版，第226—229页。

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做到这一点。”^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前夕就宣布，无产阶级必须加入资产阶级的革命；但不能把资产阶级的这一革命看作它最终的目的。“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观点同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思想联系在一起。

在德国三月革命（1848年）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必须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对1848年11月危机马克思宣称，国王已经以彻底的反革命来回答这一没有进行到底的革命。“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③“也许我们还要经历一场艰苦的锻炼，但这场锻炼将是彻底革命的准备。”^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对这一状况的认识构思出“彻底革命”和“继续革命”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不断革命”的概念：作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同义语（如同法国大革命和匈牙利的1848年革命）^⑤ 马拉特想“同我们一

① 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57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30—4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4卷，第493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3页—50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6卷，第9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4页。

④ 同上，第20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43页。

⑤ 见恩格斯：《马克思与1848年—1849年时的“新莱茵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2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24页。

样，不是宣布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革命”。马克思还指出，在匈牙利群众性的起义，全国都来制造武器，发行纸币，迅速镇压一切阻碍革命运动的人，不断革命——总而言之，在被科苏特所武装、组织和鼓舞的匈牙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荣的1793年的一切基本特征。^①“彻底革命”和“继续革命”，按马克思看来，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要求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完成它的使命，就是说，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应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像初升的太阳。因而“彻底革命”同时也是“一个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

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战略，并对“不断革命”的内容作了具体说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②他们解释道，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

^①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6卷，第16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193—1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7卷，第247—24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2页。

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① 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②。

(3) 列宁对“不断革命”的实践

列宁吸取了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思想，并由此发展出自身的理论。他在革命的1905年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③ 他把“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革命”，作者注）看作一根链条上的两个环节，由此得出一幅俄国革命的完整画面。正是在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及向十月革命胜利的过程这一点上，列宁使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成为现实。“不断革命”不能依靠个别行动来引向胜利，不管它如何激进。马尔库塞的“激进行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和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他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解释尽管在他自己看来是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是任意的见解。

三、马尔库塞将辩证法与现象学 进行结合的败局

马尔库塞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历史性的理论之后，即转向对这一理论方法论意义的确定。人们是如何解释世界的？他认

① 同上，第24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同上。

② 同上，第25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9页。

③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载于《列宁全集》德文版，第8卷，第248页；《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34页。

为：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虽然指出了“对象的历史性（历史）”，但它却不能分析“具体的历史状况，具体的‘物质存在’。”^①现象学缺乏对“历史定在的物质存在”^②的考察，缺乏具体性。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虽然以认识“具体的历史状况”为目标，并把具体性作为它的“成就”，^③但它却不能完全把握它的对象；人的定在的历史性对这一理论仍是个秘密，它缺乏总体性。由于这两种方法缺乏具体性和总体性，均不能完全正确评价“人的定在的历史性”^④有必要将两者作综合。现象学应该成为具体定在的现象学，辩证法应成为能“完全把握其对象”的具体方法^⑤。

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就其差异性来说是不能统一的。因为对“存在意义”的解释，或者实现“人的解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目标，所以不会导向方法的同一；把历史作为人的定在的历史性或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风马牛不相及的观点，是不会产生相同的结论的；“抽象的人”与具体“现实的人”^⑥没有共同的目标，它们不能完成相同的历史活动。马尔库塞把辩证法与现象学所作的综合因此必遭失败。

1. 辩证法作为历史性中对过去的“否认”

如同卢卡奇和其它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大约在

① II·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6—67页。

② 同上，第67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68页。

⑤ 同上，第67页。

⑥ 同上，第68页。

1928年也已经把注意力转向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从《资本论》中引述道，“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的。”^①为了阐明“辩证法的意义”^②他参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③中有关辩证法的观点，并附上列宁的引文^④，得出下列结论：

甲. 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认为“自然的历史”对“自身的定在”相关^⑤。但是“决不存在一个辩证的关系；是数学物理。”^⑥

乙. 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解释为历史辩证法；把辩证法限制在社会与历史领域。

马尔库塞断然反对把辩证法作为“脚手架”和“宇宙总图”^⑦使用。“辩证方法从一开始就把它的对象视作历史的对象，就是说，辩证方法把它视作既成的和逝去的，视作在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下必然产生的对象，它与处于这环境下的定在相关，并只有从它出发来理解。但辩证方法把历史范畴指明为‘定在的形式，存在的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辩证方法消融

① 同上，第63页；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27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页。

②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293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05页。

④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1921年），载于《列宁选集》，1925年维也纳—柏林版，第623页。《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449页。

⑤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8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第64页。

了被抽象为僵化单义的历史范畴，并由此重新返回到它那唯一生动具体的土壤中”。^① 马尔库塞就这样地得出由他所援引的恩格斯与列宁著作段落中的“辩证方法意义”^②。就是说，似乎恩格斯和列宁也把辩证法看作历史辩证法。（历史性）“范畴”被阐释为“定在的形式”和“生存的规定”。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③ 马尔库塞却持另一观点。

此外，马尔库塞还参照海德格尔，把按他认为是革命理论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阐释为“对本真生存的领悟命运的决心”和“对过去的‘否止’^④”。决心并非有必要去明确知道它向之筹划自己的诸可能性的渊源……，重演毋宁说是与曾在此的生存的可能性对答。但在决定中与可能性对答，作为眼下的对答同时就是对那在今天还作为‘过去’起作用的东西的反对。重演既不遗托过去之事，也不以某种进步为目标。这两者对于在眼下的本真生存都是无关紧要的”^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言”里将西方文化史，尤其是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作为对存在的遗忘进行了批判，并在此意义上进行“否定”^⑥。“否认”当然不使用那产生否认物的工具。“否认”对海德格尔来说，只是意味着对贬低“曾在”为

① 同上，第63—64页。

② 同上，第64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0卷，第131—132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54页。

④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5页。

⑤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85—386页。

⑥ 同上，第6版导言。

“过去”的表述方式进行批判和毁坏。

马尔库塞按海德格尔的“否认”意义来理解否定。他倾向于肯定那否定现存的一切东西。在对过去的“否认”中人们获得了“对本真生存的领悟命运的决心”^①。马尔库塞由此有意识地对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历史的毁坏”，沿着革命状况的方向进行具体化。

由此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对马尔库塞的影响。这清楚表明，马尔库塞必定对马克思主义作存在主义的阐释。马尔库塞将海德格尔的“否认”与马克思的否定等同起来。“从中得到对属于历史性基本特征的历史内在必然性最清楚的表述，即由存在向未来历史运动的原因完全在存在本身之中并唯有从中获得发展……只要这一发展是通过人的（历史）活动来实现的，未来总是‘对现实的否定’。如同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清楚记得，对本真生存的领悟命运的决心只有作为对过去的‘否认’才是可能的，与其对立的是作为沉沦的统治。在向着具体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突破上，它是革命的理论。”^②把未来理解为对“现存的否定”，对过去的“否认”，就是“历史内在的必然性”。马尔库塞把对过去的否定，“否认”阐释为“马克思主义向具体实践的突破”和“革命的理论”^③。

马尔库塞将这一阐释当作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论据，甚至当作马克思的理论来使用。用对过去的“否认”来阐释马克思的“对现存的否定”。照马尔库塞看来，否定是对历史观的“激

①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5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R·斯泰格瓦尔德：《H·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1969年科隆版，第58—61页。

进”摧毁和消灭^①。他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单个的、无根据的纯粹精神的主体的辩证法^②。任何通向过去的桥梁由此都断裂了；革命唯有通过“激进行动”来实现。就是说，所有现存的一切包括历史在内都被宣布无效。马尔库塞企图在马克思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的哲学之间作调和，并以其一方来批判另一方，以便从这两种理论中获得新的综合。由于前提的差异，必将产生问题——失败是早就注定的了。

2. 马尔库塞的现象学概念

为了对辩证法作补充，马尔库塞开展了对（海德格尔）现象学问题的讨论。“我们依然记得，现象学是如何揭示定在的历史性的，我们注意观察由它所要求的对现象学方法的改变。”^③

照马尔库塞看来，以海德格尔为依据的现象学意味着：“由对象自身引入问题与理解，自身了解对象。对象自身在行动中首先处于历史性之中。”^④现象学必须从定在自身的历史性中来研究历史的对象。当历史性自身没有列入现象学分析时，就根

① “历史的实证主义观点”是一个中性的表述。事实上指的是历史的单向度观点，尽管在马尔库塞那里还没有这一表述，人们仍可以证实这种观点并作为缩写语来使用。

② 见R·斯泰格瓦尔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的批判性究竟如何？》，载于《马克思主义眼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论豪克海默、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哲学和社会学批判》（J·H·V·海塞勒，R·斯泰格瓦尔德和J·斯莱夫施坦编），1970年法兰克福版，第105页。

③ 赫伯特·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6页。

④ 同上。

本不能完全“认识”对象。^①因为“现象学不容许滞留在揭示对象的历史性上，……它必须……对具体的历史状况，具体的‘物质存在’作出分析。当定在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时，定在也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状况中，在对定在的基本结构可能的揭示之前，历史状况就必先崩溃了。”^②

马尔库塞就这样将现象学归结为历史现象学。它并非是历史性的现象学，而是它的出发点。应该通过将“否认”和“重复”运用到历史的这一方法来形成一门历史现象学。这一历史现象学使关于激进行动与阶级间的内部活动的历史具有透明度。马尔库塞认为，当马克思把历史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认识时，他看到的却是历史现象学的结构。对它把握的不是单个的事实，而是铸造单个事实的整个历史演变。生存状态与活生生的东西具有优先地位。历史作为单个事实的总汇是无生命的，仅仅是“过去”。对他来说，活生生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不是马克思意义下的阶级斗争史。

马尔库塞论述道，现象学不能满足于仅仅“对它的对象的历史性揭示”，而必须“分析具体的历史状况”，在此他回避了海德格尔。马尔库塞把具体化追溯为“辩证方法的作用”^③并批评了海德格尔：“当人的定在的现象学掠过历史定在的物质存在时，它缺乏必然性与明晰性。”^④马尔库塞试图将现象学转化为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66—67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lines of text that have been completely redacted with thick black bars.]

形式。定在的过程历史性与从物质暴力中获得的规定不能相互连结，尽管马尔库塞想把它置于“辩证现象学”框架内。只要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辩证法，结合就完全是不可能的。这在以下几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对“具体的定在”以及“具体行动”的问题，马尔库塞在这里试图用马克思来纠正海德格尔，反之也用海德格尔来纠正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他们都远离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它是辩证法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黑格尔的敌人。现象学在黑格尔那里不是方法，而是主题。^①

3. 马尔库塞的“辩证现象学”构思

马尔库塞致力于统一辩证方法和现象学方法：“辩证现象学，作为最具体的方法，可以正确评价人类定在的历史性。”^②只有将“现象学化成具体定在的现象学并依靠当时历史所需的具体行动”^③才能实现海德格尔的“人的定在的现象学”；^④此外，马克思的辩证法必须“是现象学的，并且沿另一方向把握具体，作为对对象的彻底掌握”。^⑤照马尔库塞看来，为了促使“决定

① 参见盖哈特·施密特：《一种现象学方法综合的尝试》，载于《黑格尔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G·普兰特·本孰编），1981年版，第37页及以下几页。

②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6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67页。

⑤ 同上。

具体的历史行动”，^①人们必须了解，“现实是否仅限于此，一个并未超越历史，但却贯穿历史性的本身意义是否尚未包含于其中”^②。马尔库塞自己认为，当海德格尔还滞留在“人的定在的现象学”时，他已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阐释为具体定在与具体行动的现象学。只有在“两种方法”综合在一起时，才能完全了解历史现象，并进而把握人的定在的历史性。

辩证方法作为“对对象完全把握”的方法，只有从认识具体历史的状况中获得对人的生存根本范围的结果：实践时”^③，才能在此时满足最终具体化的要求并由此完全把握人的生存的存在方式。它在“行动的合乎认识的方法中”达到“顶点”^④。因而它是“具体化”的现象学。

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对定在的分析非常重要，倘若“不对历史性作现象学的分析”^⑤，这意味着丧失了现实性，“认识就不能完全把握其对象”^⑥因而马尔库塞认为，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学方法论意义，在于它彻底研究了人的定在的历史性。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对辩证方法加以补充，这一方法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状况”，具体分析了作为当时历史状况的“历史具体性”。他呼吁对这两种方法进行综合，对“能把握人

① 同上，第 68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67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 66 页。

⑥ 同上。

的定在历史性的”“辩证现象学进行综合”^①。现象学研究人的认识，而辩证法却在“合乎认识的行动方法”中达到顶峰。由于行动来自认识，必须把“认识”的现象学同“实践”的辩证法结合起来，以便分析历史。“人的定在的历史性，”即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是“辩证现象学的有效范围”。与此相联系，马尔库塞还批评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自然具有历史，但它不是历史。定在是历史。”^②辩证现象学在自然领域即无作用又无意义，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仅是“人的定在的历史性”。

马尔库塞不是把历史性作为单纯的生存状态来描述，而是作为与物质的历史相联系，由此他与狄尔泰相结合：“辩证的基础科学是关于历史性的本质，它的结构、运动规律以及历史性定在的可能生存形式的科学。狄尔泰开始从事这一基本课题，作为对“人文科学的历史世界的建设”。^③然后他又转向马克思：“每一辩证法都以这样的—个历史性题目为前提，……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的标题就标明了历史性结构的基本认识范围。”^④十分明显，他在此处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不恰当的描述。

马尔库塞的“历史性现象学”^⑤具有以下几个论点：

甲，“所有根本涉及历史性及历史性定在结构的真理都是

① 同上，第68页。

② 同上，第6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普遍有效的。”^①就是说，真理并非历史的、相对的。

乙.“所有其它的辩证认识均面向真理，它隶属于一个特定的具体历史性，并唯有依靠这一历史性的现象学才能发现证实。”^②真理在此自身取决于历史环境。

四、马尔库塞的历史概念和 马克思的历史概念

1. 马尔库塞的早期历史观

马尔库塞从对马克思二、三十年代著作的阐释中得出了受海德格尔启示，但首先是青年马克思影响的历史理论。归根结底，这一理论建立在对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失败的综合基础上。他转向马克思的直接原因，在于他当时同豪克海默一样寄希望于“革命”。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状况的分析”，不仅它的直接的历史意义，而且贯穿所有历史性的自身意义均应与此相适应的。^③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哲学，即历史性的理论。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历史”归结为海德格尔的“定在的存在状态的

^① 同上。

^② 对此，马尔库塞想把现象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已成为一种退回到自身之后并陷入主体—客体二元论的科学理论。“为了重新恢复它的‘自在’面目，一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需要一个能发掘其原始本质的现象学还原；这正是马尔库塞所希望实现的现象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斯泰方·布鲁尔：《革命理论的危机》1977年法兰克福版，第102页；也见103页及以下几页）。

^③ A·施密特：《生存本体论》，载于《对H·马尔库塞的答复》，第48页。

历史性”，并从历史性得出历史^①（根据阿道尔诺的观点），马尔库塞想使海德格尔的“定在的存在状态的历史性”从方法上更具有“抨击社会科学”^②的能力。

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历史观表述如下：“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表示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全部范围，它以认识历史性结构和历史运动规律为目的。”这些认识贯穿“马克思主义全部建设”，并且在“每一具体分析中都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能十分有意义地询问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能完全认识和恰如其分地阐释历史性现象”^③。由此出发，马尔库塞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历史现象学，在此尤其必须注意其中两点：

(1)“人与外部世界间的关系”^④，即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判性借口。马尔库塞虽然对诸如辩证的自然科学有所认识，但在马尔库塞那里这一辩证的自然科学只是“与其定在相关的自然史”^⑤。辩证的自然科学据此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启发马尔库塞得出这一原理：即“自然具有历史，但它不是历史。”^⑥历史包括自然，因为它属于人和社会。“定在”才是“历史”^⑦。

① 见本著第二章、第三章的导论。

② H·马尔库塞：《论具体哲学》，载于《H·马尔库塞文集》，第155页；参见A·施密特：《生存本体论》，载于《对H·马尔库塞的答复》，第34页。

③ H·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第71页。

④ 同上，第72页。

⑤ 同上，第58—69页。

⑥ 同上，第69页。

⑦ 同上。

(2) 照马尔库塞看来，“定在的历史”为理解社会提供了根据。“定在的首要的历史性”，在于“具体的定在作为被抛的定在从曾在中创造其生存形式，并根据其意义对它修正，而后对即将来临的定在重义成为命中注定的过去。”^①“当自然的世界不是作为僵死的物的世界滞留在纯粹的现存中，而是作为意义的世界根植于各自的定在时，”^②“自然的世界”也包含在这一过程中。马尔库塞运用了海德格尔“上手状态”优先的理论，尤其表述了实践、劳动优先于物的世界的思想。

“上手状态”优先的思想表明，对象首先是以因缘与我们相遭遇的。物在海德格尔看来，首先是用具；只有在它失去其作用时，它才成为单纯的物。这样，单纯的物，单纯的对象，来源于与人类生活和行为机构相联系的物。物具有因缘特征，它们处于“因缘关系”中^③。由此，对象在海德格尔那里被分为实践的对象和理论的对象。马尔库塞从这一对比中看到了一种与马克思的观察方式相类似的方式。商品首先是外部世界的对象，是一个依据它的特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它是人的凝聚的劳动。对马克思来说，是否使用商品（物）不象在海德格尔那里那么重要。因为商品具有两重性。马克思从经济学上解释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差别。马克思联系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来考察使用价值的商品。当马尔库塞谈及使用物的因缘特征（或者“因缘关系”）和意义（或者“意义世界”）时，由于这一类似的考察方式，使得他试图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联系起来。依

① 同上，第71—72页。

② 同上，第72页。

③ 同上。

据海德格尔“上手状态”优先的思想，实践劳动对产品优先成了劳动对商品世界的优先。马尔库塞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并反驳了唯心主义可能会起作用的指责，但他又指责海德格尔的分析缺乏具体性^①。

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分析的弱点，在于它没有考虑定在和世界在存在上相关的“本体论基础”^②。“并非定在受它的世界约束，也不是尘世作为意蕴与定在相关，而是一个具体的定在始终处于具体世界中，一个具体的世界与具体的定在相关。……定在是……特定历史状况下具体的定在……，作为这样的定在……是由具体显露的物质存在所决定的，并非一个统一的意义世界与统一的定在相连，定在与世界在存在上的联系不是随意飘浮的抽象，而是形成于具体历史过程中。”^③定在作为“被抛的在世”是由它的世界，即由“具体历史的共世和环境”所决定的，它构成“历史性的物质存在”^④。这世界不仅是“事实”，而且也是“定在结构上的最终规定”^⑤。在此汇集了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定在分析批评的中心要点。马尔库塞在此比以往更清楚地显露了，他对历史概念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时的矛盾思想。从他早期对“社会”的理解中就清楚地看到其全部开端的混乱性。他虽然认识到单个定在只有在社会及随着社会

① 同上，第 72—73 页。

② 同上，第 72 页。

③ 同上，第 72—73 页。

④ 同上，第 73 页。

⑤ 同上。

才有“历史的能动性”^①，社会构成具体的“总体性”，“这一观点接近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直接性和中介的辩证法及社会概念”^②。但事实上构成马尔库塞出发点的是个人。与此相反，在马克思那里，构成出发点的是社会。

2. 马克思的历史概念

与马尔库塞相反，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它的内容虽然还需要继续发展，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基本论述。

(1) “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③

历史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不仅是人的历史，而且是人们创造历史；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因而“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④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⑤，与“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⑥（青年黑格尔派）完全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从宗教出发，而是从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的现实的人出发。^⑦“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

① A·施密特：《生存本体论》，载于《对H·马尔库塞的答复》，第49页。

② 同上；同上第17—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2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1页。

④ 同上，第2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指的是青年黑格尔派。

⑦ 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2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1页。

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①与“德国人”的乖戾性相反，即同“它的历史思辨”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②这样，他们就规定了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2）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人具有在劳动中生产自身生命和在生育中生产新生命的能力。生命的生产作为“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③，在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间的关系这一意义上，即家庭上证明是社会性的。这一双重关系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人们彼此间物质的联系”^④，“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⑤。由此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⑥。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即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相统一的；“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2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1—32页。

② 同上；《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29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3页。

④ 同上，第3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4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①。随之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而来的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②。这表明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称之为“交往形式”。另一方面，生产力也受生产关系的制约。二者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3)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人具有意识，但他的存在是社会性的，他的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③。意识在始初并非“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④。人作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受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社会经济形式的更换和发展是社会意识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4) 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经济关系制约着社会的“上层建筑”，即政权、宗教、哲学、法律和伦理等等。“它们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⑤。所有国家都至少潜伏着不同阶级为夺取统治的斗争，因为每一阶级都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先要消灭整个”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3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1页。

③ 同上，第3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4页。

④ 同上，第3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同上。

⑤ 同上，第3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1页。

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①。这一思想在此第一次出现并随即作为革命理论的核心。

^① 同上，第3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8页。

第四章 马尔库塞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观

马尔库塞的第一部黑格尔著作《黑格尔本体论及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以及他在柏林的谈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1932年）表明，他已逐渐脱离海德格尔，受到了青年马克思尤其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他在那段时期的文章中已试图超越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

由于黑格尔哲学具有辩证与历史的向度，这部论述黑格尔的著作对马尔库塞显得非常重要。他认识到，黑格尔的伟大发现，在于客观精神的思想，以及历史过程的普遍意义。照他看来，黑格尔的成就和缺陷都在于他把存在作为中介的过程，对象化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马尔库塞认为，尽管黑格尔站在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却把具体社会实践理解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样，理性在黑格尔那里不仅作为精神的生产是可理解的，而且还作为劳动。它作为单纯的思想自由还缺乏具体的实践。它只是自由的概念，还不是活生生的自由本身。自由必须通过劳动和斗争来获得。黑格尔把劳动、即工作的结果作为意识所达到的客观性。尽管辩证形式是唯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已顾及社会过程。

马尔库塞在《黑格尔本体论》一书中突出强调，有利于超

时间，“绝对知识”的黑格尔辩证法，渐渐地毁坏了历史和社会批判范畴。在黑格尔那里，在把一切都理解为存在、即精神化之后，也就扬弃了异化。所谓的“纯粹知识”只是一个纯粹思想的结构。世界历史虽然在黑格尔体系中完成了，但现实的历史，阶级社会的矛盾却依然继续存在。

“本体论”和“历史性”（在《黑格尔本体论》一书中）体现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阐释的基本趋势。马尔库塞认为，尽管本体论在马克思那里是人类学上的表述，由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制订的本体论，从某些方面也决定着马克思。照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理论的真正基础”。他认为，他从黑格尔那里所发现，在海德格尔那里所检测的历史哲学重又返回到了马克思。人类学与历史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其趋势是相互融合。在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观中深为关切的事，是把人类学与历史哲学同为重要地保留在意识之内。马尔库塞的教授资格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指的是马尔库塞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视野内研习马克思理论，著者注），虽然本书不是专门论述马克思的，但是作为揭示‘历史性基本特征’的尝试，上述著作接近于马克思^①。必须注意马尔库塞的这一出发点，以便能理解他的马克思阐释和“新马克思主义”观。我们在此不打算继续探讨他的黑格尔一书，因为更需研究的是他所紧接着的对马克思的阐释。

恰在这一时期出版了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

^①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生存本体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载于《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答复》，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19页。

手稿》。1932年出版该书时马尔库塞在柏林谈道：“出版卡尔·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必将成为马克思研究史上重大的事件”^①。事实上，《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马尔库塞本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成了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在他先前的文章中也曾联系过马克思，但像被《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源泉》^②如此所激动却从不曾有过。《新源泉》首先指的是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是“马克思理论的真正基础”。人的定在的历史生存才是马克思理论的主题。马尔库塞就这样建立了一个带存在主义哲学色彩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对于他的马克思观和自身的学说均具有代表性。

一、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理论 “本来基础”的“新发现”

马尔库塞努力钻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首先是《经济学—哲学手稿》。他认为，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确定了人的本质，勾画了人的存在的总体性轮廓；这已“足够清楚地揭示了马克思批判的本来基础。”^③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解为“人的本质的确定实现是共产主义的基础。”^④这一人类学的马克思画面在当时是马克思研究中的一项“发现”。

① 赫伯特·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载于《社会批判理论思想》，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7页；以后作为《源泉》摘引。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9页。

④ 同上。

1. 感性在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向革命理论”^①时的“决定性”意义^②

马尔库塞在他的研究中描绘了作为类本质的人通向作为普遍和自由本质的人的道路。人必须与自然达成统一。为了理解这一过程，“必须对对象化的决定性规定进行阐明”^③，作为一个“对象化的本质”的“人的本质的确定”^④只有从此出发才有可能。“作为自然的本质，人是一个‘对象化’的本质，就是说，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对象化的，即具有物质力量与天赋的本质（第159页），一个与现实的对象打交道，起‘对象性作用’的本质，只有在现实感性的对象中才能表现他的生命（第160页及下页）”^⑤。自我实现首先意味着，人设立了一个现实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强大的对象化世界。对象化世界（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对象化）属于人的本质，但不是表面的对象化。人的本质的分裂成为“事实”的基础，“对象化转变为物化，生命表现则成为外化。”^⑥人们认识到，人的本质的异化产生了异化了的物。马尔库塞唯心主义的基本特点在此得到了清楚地表露：客体是由主体来确定的。

① 令人惊奇的是，马尔库塞继承了恩格斯的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术语，而以往他对恩格斯都是加以拒绝的。

② 《源泉》，第26页。

③ 同上，第22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22—23页。

⑥ 同上，第23页。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把对象化的本质和感性的本质看成是相等同的，以便“使对象化和包含在自身中的分裂更深地扎根于人的规定中。”^① 马克思“就这样把‘感性’挪到阐释的中心”：“感性（请见费尔巴哈）必须成为所有科学的基础。”^② 如同马尔库塞所认为的那样，他发现了一切物的基础^③。马尔库塞把感性的概念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非常重要和必须特别研究的概念。

马尔库塞援引了巴黎手稿^④ 中两处论及感性概念的地方。马克思宣称，把人的感性而不是思维看作认识的中介，才是正确和重要的；唯有感性赋予我们对象。因为感性使人和客观对象化的世界打交道。“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⑤ 但这仅是马克思认识论的第一步，而且是以费尔巴哈为基础的。

马尔库塞表明，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所吸取的感性概念，经过黑格尔可追溯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⑥ 康德认为人的

① 同上，第23页。

② 同上，第24页。

③ 见上，第26页。

④ 见上，第25页。

⑤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第1卷，1962年斯图加特版，第65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68页。

⑥ 《源泉》，第24页。

感性是接受能力，即主体的刺激性；它是方式和方法，只有通过它才能赋予我们对象。“这一感性的先天性产生先天性和先验性的开端。”“我们所具有的感性经验是由表象所刺激作为外部经验的。”^① 黑格尔认为在康德那里认识能力具有三种形式：

甲) 感性作为接受能力，给悟性提供材料；

乙) 悟性作为思维的自发性，推想感性直观的对象。它从感性获得材料并对此进行推想。当悟性把思想和感性提供的材料结合在一起时，认识得到了实现。

丙) 理性是第三种能力，“从原则中认识，通过概念认识普遍中的特殊。”^②

理性照康德看来是最高的认识能力。他把感性看作较低的认识能力；当对象“以某种方式刺激情感”，产生知觉时；另一方面人们也需要形式，以便通过对象来理解刺激。通过对象的刺激和刺激性的自我形式这两种能力康德称之为主体的认识能力——感性：“就是通过对象以一定方式刺激作用于我们，我们由此而产生接受对象的能力。借助于感性提供我们对象，它提供我们直观”^③。对康德来说，直观意味着对象和感性能力处于一种直接关系中。康德对感性认识的陈述至此还倾向于经验主义。列宁甚至认为接近唯物主义。“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载于《黑格尔全集》，B·米彻莱特版（1959年），第339页。

② 同上。

③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第33页。

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①

马尔库塞也强调了人的感性的刺激性与被动性。他认为，人从根本上是由感性规定的，由对象确定的。“他作为感性的存在物是受刺激、被动和受难的存在物。”^② 他天真地把康德的思想一直延续到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概念，象在康德那里一样，原本具有同样的意义。”费尔巴哈把用人的感性所表示的接受性的、依靠现存的受动的存在体置于他的哲学的高峰，发展出被动原则。”^③ 马尔库塞在马克思那里也发现了这一被动原则。“如同在费尔巴哈那里的意义一样，在马克思那里，人‘作为自然、感性对象化的存在物是受动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④ 在坚持感性作为被动性的背后隐藏着对“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矛头针对着由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特别强调，并在以后被哲学家和理论家，视作列宁对唯物主义认识论一大贡献的反映论理论。马尔库塞试图通过修正这一源泉，来“重新发现马克思”并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提供根据。

由此得出什么结果呢？

甲) 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激情、热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192-193页。《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00页。

② 《源泉》，第2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①。虽然这一观点还是朦胧的，但作为主体的思想萌芽保留了这一科学。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②

乙) 马克思在他的其它一些著作中（在巴黎手稿之后所写的），也某种程度地勾画了能动的革命反映论（这个术语来自列宁）的基本原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③ 因而马克思早就批判了“假设的形式”，并肯定了“能动的方面”。尤其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把实践引入了认识论。由此对认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被视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与动物符合客观目的的活动相反，人的实践活动是追求目的、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尤其是创造性的活动。对此马克思说道：“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第1卷，第65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69页。

② 同上，《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页。

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恩格斯在相同意义上论述道：“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②

冒昧地对马尔库塞的感性阐释作一批判性地评价。为了重新强调马克思的理论，马尔库塞从他的立场出发，把感性概念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中心”作了详细地论述。他还热情地写道，马克思是“从感性的概念完成从德国古典哲学向革命理论的关键转变的”^③。这与其说是马克思的立场，更毋宁说是费尔巴哈的立场。诚然，唯物辩证法的感性概念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但它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许多转折点之一。由此可以表明，马尔库塞在此并没有发现什么新大陆，更谈不上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感性概念作的新论述，与马尔库塞所认为的发现截然不同。马克思论述道：“人不仅通

① 马克思《资本论》，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123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2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0卷，第452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528页。

③ 马尔库塞：《源泉》第26页。

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①“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②成为“一切科学基础”的东西，照马克思看来不是费尔巴哈那受动直观的感性，而是能动的感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感性概念重新作了表述：感性是有机地包含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的活动。马尔库塞却没有从马克思那里“重新发现”这一思想；他仍然更多地停留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的概念”对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向革命理论”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

2. 作为“本体论”范畴的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1) 马克思劳动概念最暂时和最普遍的特征。

马尔库塞从“外化劳动”出发，以此作为对立概念来探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马克思几乎全把对劳动的积极肯定作为对外化劳动规定的对立概念。”^③劳动本身间接地是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和实现。马尔库塞以此确定：

甲. 劳动本身是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和实现；

乙. 哲学的任务是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的概念进行研究和检验；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马克思恩格斯简明经济著作》，1955年柏林版，第133页。

② 同上。

③ 《源泉》，第17页。

丙. 劳动由此“作为哲学范畴”来^①使用。

马尔库塞认为，一当马克思的哲学关心人的本质，劳动就成为本体论范畴；劳动也因此成为基础。马尔库塞吸取了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劳动概念并随即作了重新阐释：“……因为规定和制定理解人的存在与本质的概念是哲学家的任务，而不是具体科学的任务。我们应该在探寻人的存在与本质问题范围内，以及‘本体论问题’范围内进行探讨。‘劳动’以及与此相关而形成的规定是本体论的范畴。”^②人们看到，马尔库塞重新架设了一座从马克思（“本质”）通向海德格尔（“人的存在”）的桥梁，劳动在这里被宣布为哲学的课题。奇怪的是，这些话在1969年再版时却被删去了。^③马尔库塞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看到了劳动概念的渊源。“事实上形成马克思批判的基本概念是：在对黑格尔对象化范畴的批判中形成的外化劳动概念。”^④马尔库塞认为，《精神现象学》中第一次在劳动概念内阐发了对象化。马克思深受启发，高度评介了《精神现象学》，称之为“黑格尔哲学真正诞生地和秘密”。人们必须考虑到，如同马克思在此是非常清楚的：“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⑤但是“黑格尔所

① 同上。

②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首次刊登于《社会》，1932年。迪茨出版社版，第二卷，第144页。

③ 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思想》，参见《社会》，首次刊登……（见上注）。

④ 《源泉》第17—18页。

⑤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第645页；《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63页。

认识和承认的劳动只是抽象精神的劳动”。^① 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黑格尔那里到处都察觉出唯心主义，不管其正确与否。虽然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启发，但他并没把黑格尔的劳动概念作为外化劳动的概念。但是，马尔库塞却立足于黑格尔，他的黑格尔一书作为他今后的基础。^② 因而当他论述道：“经济学哲学手稿直接证明了，马克思理论根植于黑格尔哲学疑难的焦点”时，这是毫不奇怪的。^③

马尔库塞根据他的思考和阐释，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哲学性的。当马克思把人的本质作为研究的课题时，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特性就已经“超出了经济范围”^④。这一论点在马尔库塞那里始终如一，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又屡屡出现。

(2) “劳动”作为哲学概念

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生命活动，生产生活”^⑤，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照马尔库塞看来，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意义已“超出经济学的意义”^⑥，所以它已成为本体论的范畴。由此人们可以领会，人是如何地由作为“自然的”和“感性的”本质发展成为“普遍的”和“自由的”类本质的人的。对于如何实现人类特殊的“需求和需要”，以及“人的普遍性和自由”等问题也只有一个答案：依靠劳动。在此人们必须分析

① 同上，第 646 页；《马恩全集》中文版，同上。

② 马尔库塞对此说明道，他在其第一部关于黑格尔的著作中已经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作了阐释。见《源泉》第 18 页，注释 6……。

③ 《源泉》，第 18 页。

④ 同上，第 19 页。

⑤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104 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42 卷，第 96 页。

⑥ 《源泉》，第 27 页。

“拥有和行为的方式”，即分析“一个人能够‘普遍和自由’地与所给予和对象化的世界相处的拥有”^①。

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实践的对象化是拥有和行为的第一种方式。当我们对世界的对象采取实践的行为时，世界在我们面前展示自身。对象化在马克思那里以劳动为基础。作为自然产物的人虽然与世界相对立，但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人从自然界获取生产资料，以便生产满足他的肉体需要的生活资料。劳动的产品即是对象的形成。对象化的世界也即成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②“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③对象化因此是实践的。人们以社会的观点来认识劳动。马尔库塞在此赞同马克思，社会的对象化意味着“特殊的人类普遍性”是在劳动中实现的^④，因为人是在集体中进行劳动的。人具有共同的劳动对象和生命活动的共同范围。对象化本质上是“社会的”活动，对象化了的人本质上是“社会的”人^⑤。马尔库塞在完全赞同马克思的意义上论述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的说来的生存过程。”^⑥

① 同上。

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9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97页。

③ 同上；《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同上。

④ 《源泉》，第28页。

⑤ 同上。

⑥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9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31页。

“人的本质的总体性”是“人与自然的统一”。^① 由此得出“人作为普遍自由的类本质”这一定义^②。但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并非与自然的融合；人保持这一区别：“只要人在生产、加工和占有对象化的世界中表现为他自身的现实性，只要他对对象的行为恰是对人的现实性的证明……劳动就是人的自由的现实表述。”^③

马尔库塞的人类学是由劳动概念来确定的。在此他把自身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紧密联系在一起。顺便提一下，马克思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经过费尔巴哈而实现同黑格尔的决裂的^④。马克思的精神发展是通过在黑格尔哲学的长时期的批判和改造来实现的，马尔库塞过高估价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⑤

(3) 马尔库塞的劳动本体论

马尔库塞从对马克思的阐释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劳动本体论。这尤其表现在他的文章《关于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中。

马尔库塞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的劳动概念不能从根本上规定“人的定在总体上的劳动地点、意义与作用”；^⑥ 这里所指

① 《源泉》，第2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30—31页。

④ 同上，第28页。

⑤ 在马克思那里，在对革命理论的起源上，马克思按改变了的基础获得黑格尔的积极成果。

⑥ H·马尔库塞：《论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载于《文化与社会》，1965年法兰克福版，第7页。

的是处于“经济理论中心”^①的劳动概念。普遍的劳动概念只能从哲学中产生。它确定“人的定在总体上的劳动地点、意义与作用”^②。黑格尔在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行动……在行动中纯粹意识的自为之在……超越自身进入存在的因素，同时又‘回归自身’并使劳动的对象成为‘实体’”^③。马尔库塞援引《资本论》来补充黑格尔这一意义深刻的话：“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④当马克思论述道，只要人们存在，具体劳动也就一直存在时，这一劳动的观点就绝不再简单地是哲学意义上的劳动。对马克思来说，首要的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差别。“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

① 同上。

② 马尔库塞沿着抽象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的、思辨的方向来构画他的劳动概念。他从分析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巴黎手稿出发，把他对劳动的规定，看作是马克思一贯的观点。他甚至认为，这一“观念”深深地、甚至在《资本论》中仍起有效作用”。（文化与社会）第13页）。马克思继承了“包括所有基本特征的黑格尔劳动概念”，（同上，第12—13页），并深深印入他的思想的核心。劳动概念由此从经济学领域中被驱除了出去。这意味着丧失真正的劳动形式，即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被采纳的只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劳动，即人的自我创造——凡作为精神本质——。因此，马尔库塞继承的并非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而是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并出于自身目的而对此作了发挥。

③ 同上，第12页。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霍夫曼斯特编1949年版），第149页及下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大众版（考茨基编），1928年柏林版，第1卷，第10页。

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①“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非常重要，可以把它看作是人们“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②劳动价值理论建立在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基础之上，商品的价值学说起关键作用。劳动力支出的理论区别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体劳动将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抽象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差别以新旧价值的区别为基础。这一区别重新形成资本有机构成的基础。它又是资本积累过程学说向剩余价值理论过渡的重要基础。因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成为马克思理论观中重要的转折点。倘若人们认识到马克思的这一发展，就会得出，马尔库塞根本没有采纳马克思的理论，至少没有采纳晚期著作。他没有认识到劳动二重性的意义。马尔库塞遵循黑格尔而强调指出，劳动不是“一个特定的人类活动”^③，而是各种不同活动的一般基础和前提，即作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的行动”。^④这一行动构成“历史性的基本结构”，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对马尔库塞来说，劳动作为“中介”，“对象化”，从不稳定的形式过渡到“存在的形式”^⑤。只是“人在世界中的定在的特殊实践”。^⑥“人与对象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6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0页。

② 同上，第5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5页。

③ 《文化与社会》，第2集，第13页。

④ 同上，第13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第14页。

基本统一”^① 存在于劳动中：

甲)“人把自身‘对象化’，”即人按自己所规定的方向通过劳动改变对象，由此使他自身与对象相联结，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变化着的对象的一部分。

乙)“对象成为‘存在的’，人的对象”^②，即对象成为一件人在其中认识自身和发现自身的作品。

无论如何，“人们在观察这一行动时，必须同时注意在此行动中随对象性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注意在此行动中人的定在所接受的任务。”^③

通过对人的行为在内容上的归结，马尔库塞形成了他的劳动概念。主体的其它自我外化方式或自我对象化方式被忽视了，只剩下有意识的主体的特殊的自我对象化。马尔库塞对客体问题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主体可以两种方式自我外化：沿着物的方向以及沿着他人的方向。就是说，客体有两种与同一主体相对立的形式。因而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里又重新出现了黑格尔主客体同一的思想（也是卢卡奇的思想）。马尔库塞在对劳动概念的研究中继续坚持这一思想。照马尔库塞看来，劳动过程始终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社会化。社会实践的因素被限制在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内，它作为哲学劳动概念的特殊状况，隶属于哲学的劳动概念。

马尔库塞就这样简化了这一问题，使得人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似乎所有其它劳动形式均隶属于哲学的劳动概念，似乎

-
- ① 同上。
 - ② 同上。
 - ③ 同上。

马克思简单的采纳了黑格尔的哲学劳动概念。这种撇开一切区分与差异，即撇开一切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毛泽东》的做法表明了马尔库塞学说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特征。

劳动概念的哲学归结抹去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革命内容。与海德格尔的影响相适应。马尔库塞的劳动概念是生存论性质的。集体属于个人，论述的是个人定在的实现。海德格尔并没给劳动以合法地位；照他看来，操心是人的定在的普遍结构。

3. 人的本质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基础

如同上述，马尔库塞为了他自身的目的，对马克思感性和劳动的概念作了曲解。人类学的论点（在他那里几乎总是指“本体论的”）不断出现，并在对劳动异化^①的简短分析中第一次作了论述。他声称，人的本质的确定是马克思理论的“真实基础”。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外化和异化的结果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和异化。这样，“在异化劳动中并非人的生存成为他自身实现的‘工具’，而是恰恰相反，人自身成为他生存的工具：工人纯粹的肉体上的定在是目的，他全部的生命活动为此服务。”^②人失去了他的本质，即人性变为兽性，兽性变为人性。异化，即物对人的统治，扭曲了人的本质；工人为了生存而被奴役；资本家为了越来越多地占有，生活在强迫中。马尔

^① 马尔库塞 1940 年前出版的著作很少探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只是在他的晚期作品，如《理性与革命》中才详细地加以论述。

^② 《源泉》，第 32 页。

库塞的异化理论在这点上与马克思有某种程度的一致，诚然，他的理论在我看来并没始终贯穿如一。他试图在人应该是怎样和人实际是怎样之间把握其差别。但是人的本质只能在历史中实现。“人的历史性被纳入他的本质规定中。与此有关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在具体历史过程中不变僵化的本质，而是一个在历史中，并唯有在历史中才可确定的本质。”^①“虽然马克思、或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均论述过‘人的本质’”^②，马尔库塞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差异。他认为，当马克思论述到人的本质时，它是“毋需讨论的理所当然的”，^③因为德国哲学传统在马克思那里是活生生的。“在马克思与衰落的德国哲学进行斗争中，存在着一种哲学活力，唯有完全一无所知才会把它识为是一种毁灭意志。”^④

马尔库塞以对人的本质的历史性认识为基础^⑤，把“人的本质的历史”与“人的实际历史”^⑥区分开。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传统烙印的人的行为成为仅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工具。从这一事实出发，他把扬弃“人的本质的颠倒”^⑦作为最重要的使命。作为劳动异化结果的人的本质异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正是对人的本质的全神贯注，成为激进革命根据的强大推动力；涉及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实际状况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而

① 同上，第33页。

② 同上，第3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是涉及人的本质的劫难——这一认识推断出，每一单纯的经济或政治改革从一开始起就会导致失败从而坚决要求通过总体革命来扬弃这一实际状态。只有在其稳定性决非经济或政治论断所能动摇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历史条件和革命承担者这一问题：即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每一仅仅从事理论而不涉及真实基础的批判，是不会切中其对象的。”^①

这些论断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纲领，它不仅是批判理论，而且是对马克思阐释的标准。从而提出了下述论断：

甲) 马尔库塞认为，人剥削人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恶劣的弊病，最恶劣的弊病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阶级性“在晚期资本主义”已经消失，人的贫困也已消除。而异化却是一个并非明确的事实。所有的人均异化了。包括工人和资本家。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才成为“人的本质的劫难”。这一思想在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它代表那里均是基本论点。马尔库塞在他以后对工业社会的分析中，把人的“单向度性”看作解放的最大障碍和最恶劣的社会弊病，因而对根本变革的要求（即革命，作者注）……如同先前一样迫切。”^②

乙)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是从这一“认识”中得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但这一理论的现实基础，诸如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和阶级分析却因此遭到否认。事实上，阶级的概念与抽象人的非历史性本质是没有联系的。

丙) 马尔库塞还认为，人的本质的研究为整个马克思理论奠定了“真实的基础”。马尔库塞认为自己从中获得了对马克思

① 同上，第 35 页。

② H·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7 年达姆施塔特版，第 15 页。

的新发现。为了还能做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步子迈得更远。人的解放是最重要的事。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可作为榜样。照马尔库塞看来，哲学才是马克思理论的“真正基础”。

二、马尔库塞将黑格尔哲学解释为马克思理论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照马尔库塞看来，被马克思高度评价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是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①，马尔库塞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奇异地相一致，过高评价了黑格尔这部分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他轻视了马克思的特性。

1.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基本范畴”^②

马尔库塞将“劳动”理解为哲学概念。问题在于：马尔库塞是否简化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简单地采纳了黑格尔的这一概念。虽然马克思写道：“黑格尔将……^③……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④和“本质，看作

①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第641页；《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59页。

② 《源泉》，第8页。

③ 如同在此所复述的那样，马尔库塞在摘录这段句子时，把最重要的部分删去了：“……在抽象之内……。”

④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第658页；《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75页。

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①，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他仅仅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②。马尔库塞仍然认为：“这丝毫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即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确证人的本质”^③。这当然不是把劳动看作单纯经济学的范畴，而是看作‘本体论’的范畴”^④。当然这并非怀疑劳动的经济学意义，但是劳动的起源（这对经济又是基础性的）被移至人的本质中。因而黑格尔的哲学“植根于黑格尔哲学疑难点的中心”。^⑤

与劳动概念紧密相连的是对象化概念。马尔库塞援引黑格尔的对象化概念：“黑格尔把托付给人自身的历史（人的历史）理解为一个其要素是外化及它的扬弃的‘过程’，它作为总过程处于‘对象化’名义之下。”^⑥它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黑格尔现象学及它的最终结果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为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⑦（马尔库塞毫无评论地摘引了这一段话）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外化劳动概念，是在同黑格尔对象化范畴的论战中形成的，外化劳动概念在《精神现象学》中第一次作

① 同上，第64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63页。

② 同上；《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同上。

③ 《源泉》，第53页。

④ 同上，第52页。

⑤ 同上，第18页；第三章第1节，第2小节包括了这一前后联系的详细论述。

⑥ 《源泉》，第51页。

⑦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第64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63页。

了阐述。^① 外化劳动的概念是否来源于黑格尔的对象化概念却是可疑的^②。需作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对外化和异化概念是作批判地吸收的。虽然“外化劳动”是由黑格尔在“统治与奴役”这一节中第一次作了描述，但是对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却是“自我意识”的阐发，而马克思对此却并不感兴趣。显然，马尔库塞过高估价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

“所有制”概念是马克思和黑格尔间的另一个联系环节。马尔库塞认为“私有制”不言而喻是“一个所有人类行为的实现，但不是人之外物的‘状态’，而仅是对象性的本质。”^③ 马尔库塞认为，转向注意人的行为已经表明了马克思理论的人道主义问题。私有制按马克思看来是从外化劳动中形成的；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即双重的否定，是对全部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因为私有制是人类基本行为异化了的的形式。应该具有一个与私有制相对立的另一种所有制形式：“必须存在两种现实的所有制形式：一种异化了的的形式和一种真实的形式，一种私有制和一种真正人性的所有制”^④。这在马尔库塞那里成了人的本质的所有制！青年马克思论述道：“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他全面的本质”^⑤ 为了扬弃私有制和实现真正人性的所有制，人必须向他的社会本质复归。马尔库塞称这一复归为“社会的解放”^⑥ 复归在于扬弃

① 《源泉》，第17页及下页。

② 见：第三章，第1节，第2小节。

③ 《源泉》，第36页。

④ 同上，第37页。

⑤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第131页；《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42卷，长123页。

⑥ 《源泉》，第39页。

异化了的的所有制形式。但只有通过向人的本质的“复归”才能实现扬弃：一种循环论证。

马克思确实首先在巴黎手稿中使用了“真正的人性的所有制”这一概念，但一年之后他就抛弃了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章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这一倾向，即从“人的本质”来进行一切批判以及“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悄悄塞给每个人，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各种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抽象迫使……宣布：消灭内部的和外部的之间的任何差别归于消灭”^①。所有制概念被划分为私有制和真正人性的所有制，从而从根本上掩盖了人剥削人的事实真相。把向真正人性的所有制的复归看作对私有制的扬弃，或者反过来，这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只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乌托邦。马尔库塞走向这一歧途；他忽略了马克思理论对这一概念所进行的革命改造。

由此人们可以断定：马尔库塞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基本范畴”“是在同黑格尔哲学坚决的论战中”“形成”^②的论断，是不切合实际的。

2. 关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真理

以下将探讨是否该把辩证法看作黑格尔哲学的方法，或者“基础”和“真正内容”这一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50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606页。

② 《源泉》，第8页。

马尔库塞也试图解决，关于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地位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为批判黑格尔而制订了“积极的基础”，即“人确定为一个‘对象性的’，历史性—社会性的、实践的存在物。”^①马克思是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出发，并采纳了他的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尔库塞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否定和肯定判断分隔开来处理。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的“过错”在于，（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抽象、逻辑、思辨地表述了人的本质的历史运动，但不是“他的现实的历史，而仅是他的‘形成史’”^②。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关于黑格尔不是历史地理解人的本质，而只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自我意识”的观点^③。人异化了的的存在形式在黑格尔那里仅属于意识，照马克思和马尔库塞的看法，它仅是想象而非现实。所以黑格尔的《现象学》仍停留于异化范围。马尔库塞说，照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伟大的功绩在于他理解了劳动的本质；他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历史的过程，并把对象化理解为外化和它的扬弃的相互交错的因素；黑格尔把对象化的人看作他自身劳动的结果。这一切均表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优越性（“最后成果”）^④。

马尔库塞从总的说来同意马克思，但却从中得出另一种结论：“从批判开始之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作者注）似乎

① 同上，第46页。

② 同上，第47页。

③ 事实上，马尔库塞也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自我意识。这一趋向先前已经清楚地表明了。

④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第645页；《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63页。

涉及的只是对某种人们习惯上看作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东西进行批判，由此表明，马克思作为辩证法来进行批判的东西，正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和真实“内容”——不是它（所谓的）“方法”^①。就是说，当马克思抨击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指的正是唯心主义的内容，但是马克思本人把辩证法作为方法来使用。马尔库塞以这一解释为基础。阐发了他关于“背弃他晚期马克思解释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可以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归结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转化——已完全清除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②。这是对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尖锐批评^③。事实上确实存在某种教条，其观点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仅继承了改造了形式的辩证法，至于其它的则几乎什么也没继承。照我看来，促成这一观点的原因在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成是革命的，而他的体系却是保守的。这一先入之见造成这假象，似乎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和体系彼此间并非是相互联系的事物。从整体上看，黑格尔的哲学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即革命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由此存在另一问题，即黑格尔的哲学是如何分派其辩证法一方和体系另一方的。撇开其政治价值判断不谈，马尔库塞的这一观点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黑格尔辩证法与其体系的关系

① 《源泉》，第47页。

② 同上，第54页。

③ 我以德国惯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来指修正主义者，如卡尔·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信徒，他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列宁在他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中对这些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尔库塞对恩格斯的抨击包括了一个我所不能同意的偏见。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令人生疑。

系本身就是辩证的：

(1) 黑格尔辩证法与他的哲学体系相矛盾，这一点不容否定。列宁在论述黑格尔辩证法时强调指出，马克思吸收和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这一革命的方面：即辩证法是革命的。在此他援引恩格斯的话为依据：“黑格尔的体系……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① 我们注意的正是辩证法与体系的矛盾。

黑格尔阐述道，在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中存在着一个由矛盾推动，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运动，真理作为逻辑和历史的过程是自身的运动。其中辩证法是“革命的”。但是黑格尔把他的哲学体系也看作是绝对真理的概念。他甚至认为，在历史现象中可以认识到绝对，比如在新教的形态中，在普鲁士国家以及他自身的哲学中，情况就是如此。他的辩证法表明其矛盾性。但他不能始终忠实于辩证方法。他一方面强调矛盾的不可缺少性，另一方面又断言矛盾将得到调和。他的辩证法具有双重的性质。它既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

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与（肯定的）体系不能得到相互调和。体系作为全部真理，使辩证法作为工具。使它隶属于形而上学。但是，把辩证法看作独立于体系并把二者分开的做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0卷，第23页及下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7页。

也是错误的。

(2) 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其体系相互融合；体系不能缺少辩证法。“否定的否定”就是一个事例。恩格斯从中看到黑格尔体系中这一基本规律。^①

作为“存在论”最高阶段的度是“质”与“量”对立的真理，二者的否定被否定。在“本质论”中“现实性”是“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在“概念论”中“观念”是“主观性”概念和“客观性”概念的统一。普遍的“概念”把存在于“存在”和“本质”中的“特殊”概念包含于自身。这些均是活生生的否定性的不同事例。抽象地说，就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三段论。真理的形式照黑格尔看来自身是三段式的，即判断。“判断因而是一切真理的基本根据；绝对的定义现在就是判断，或者作为句子陈述这一规定：一切都是判断。”^②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从寄宿于体系内的辩证法中获得其活力。它的原则是否定性（作为否定之否定）。三段式作为形式是非常自然的，黑格尔只有在偶尔例外时不使它，例如在其本身就是“僵死的物质”的判断形式时不使用它。

黑格尔认为，方法的真理在于，它正是在它体内运动的内容的形式，而绝对不是对内容漠不相关的。“按此方式的方法不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③黑格尔的辩证法不

^① 同上，第120—13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42—156页。

^② 为了便于上述研究，我在此使用了百科全书中所谓的《小逻辑》，哲学体系第一部分，逻辑，载于《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382—384页（弗洛曼编1929年版），第383页；同上，第181页，第382—384页。

^③ 同上，第451页。

是机械的空洞的三段式；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是具体内容的自身运动，其内容通过逻辑学和现实哲学的体系在辩证过程内不断发展。至于谈到逻辑学，它的所有部分都适合哲学。“每一迄今所观察的阶段都是绝对的一幅画面，但起初以某种局限的方式，并以此不断地推向整体，它的展开即我们称之为方法的那个东西。”^① 只有当哲学体系彻底地获得发展时，辩证法才达到它的目的。

马克思将黑格尔体系的发展作了如下总结：“扬弃了的质等于量，扬弃了的量等于度，扬弃了的度等于本质，扬弃了的本质等于现象，扬弃了的现象等于现实，扬弃了的现实等于概念，扬弃了的概念等于客观性，扬弃了的客观性等于绝对观念，扬弃了的绝对观念等于自然界，扬弃了的自然界等于主观精神，扬弃了的主观精神等于伦理的客观精神，扬弃了的伦理精神等于艺术，扬弃了的艺术等于宗教，扬弃了的宗教等于绝对知识。”^② 因而辩证法作为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体系的灵魂。

照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正适合他对马克思主义内部实证经济主义的批判。马尔库塞还认为，马克思本人坚决抨击了“粗陋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因为它在人的本质的现实中同样没有位置，因为它仅在物与事实的世界的经济基础上运动，自身停留在“异化”内。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是以普遍的私有制替代个人私有制^③；它将消灭一切作为私有制却无能力使大家着魔的东西；它将以暴力的方式放弃天赋

^① 同上，第 448 页。

^②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第 656 页；《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 42 卷，第 173 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 1 部分，第 3 卷，第 111 页。

才能等等。肉体上的直接占有是他生命和定在的唯一目的：工人的劳动并没扬弃，反而扩大到每个人身上。^①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不断盲目地谴责马克思理论的绝对经济主义，而马克思自身正是以此谴责他所斗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这一粗陋的共产主义照他看来只是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否定，这样的否定与资本主义处在同一层次上，这一层次正是马克思思想铲除的”。^②马尔库塞的这番话使人感到，似乎他只是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事实上他是打着马克思旗号（如同他所认为的）来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③在这一批判中已经包含着今后被纳入他的后期著作“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内的一些动机。或许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尔库塞按“本体论”倾向，即人类学倾向来解释马克思。

三、“认识”在扬弃物化中的作用

1. 从人的本质来解释外化劳动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劳动外化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最初也是马尔库塞的观点，但后来他又提出了对立的观点：劳动外化的基础在人的本质中。

马尔库塞认为，私有制起源的问题是阐明他的论点之关键。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中几乎没有对此问题作过探讨。手稿中对此问题最重要的段落是（马尔库塞也做了

① 同上，第111页及下页。

② 《源泉》，第13页。

③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尔库塞与“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实际上他也同列宁主义相对立。

摘录)：“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①这里使私有制的起源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马克思当时还处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因而经常出现费尔巴哈的术语，诸如“人的本质”，诚然这一术语已包含新的含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指出这点。马尔库塞却忽视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他继续把马克思解释为物化必将成为对象化的自然形式以及外化将成为劳动的外化。马尔库塞认为这是马克思对解决私有制起源问题的一大贡献。由此表明，外化劳动加速了私有制的发展过程，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以人的本质为根据。马尔库塞又重新回忆起基础本体论。私有制的扬弃即人的自由的重新建立。“人的表现倾向于……外化，他的对象化成为物化，使得它的普遍和自由的现实只有作为否定的否定：作为外化的扬弃，作为从异化的复归才有可能。”^②

马尔库塞解释，外化劳动以人的本质为根据，从而来阐释私有制的起源。他把外化的起源分为两部分：观念、哲学中的起源，即人的本质，以及经济学和历史的现实的根源。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0—11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02页。

^② 马尔库塞：《源泉》，第43页。

观念的起源却是他自己的发现：它表明，“外化劳动的可能性以人的本质为根据”^①。因而对哲学规定作了详尽阐释。剩下的只是进行“经济—历史分析了”^②。马尔库塞的论调在这里是否与马克思是一致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理解私有制的起源呢？不能仅从《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获求对这一问题的答复；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著作。更有启发意义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所完成的对美国人种学者L·H·摩尔根《古代社会或对从蒙昧经过野蛮到文明的人类进步路线的研究》一书的摘要；这一摘要包括了许多批判性的评论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以及来自其它材料的补充。恩格斯对它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并确信摩尔根的著作证实了由马克思和他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法。因而他想根据摩尔根的结论，马克思的评论，以及由摩尔根所提供的材料，继续进行亡友所从事的研究。恩格斯把它看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卡尔·马克思的遗言”^③。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是马克思和摩尔根思想的总结和继续。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起源的观点在此著作中清楚地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超出必需品的生产是私有制形成的决定因素；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币的出现加速了私有制的形成过程。现在可以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说：“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

① 同上，第43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27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9页。

多东西。”^①人们立即可想到，马尔库塞的论点是不能作为马克思的论点的：外化劳动的秘密，照马克思看来，并不在人的本质中。我们现在将研究揭示这一秘密的认识。

恩格斯把私有制的起源归结为社会的三次大分工。

(1)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野蛮时代的中期^②：游牧民族从野蛮人的其它人群中分离出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一分工第一次使不同部落与部落成员之间“有规则的交换”成为可能和必然。“起初是部落与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的时候，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有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③不仅畜群及其它交换的东西，而且生产工具也逐步地从作为公有制的部落所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私有制的数量得到不断增加。同时“社会大分工”又提高了生产率。劳动力现在能生产大于供应自身所需的产品。产品的剩余使新劳动力的开发成为必要。战争俘虏由此不再被杀掉，而是沦为奴隶。这样，奴隶制的开端随着私有制的早期形态一起出现。社会第一次分裂为“两大阶级：主人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④

(2)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随着金属工具，尤其是铁器的使用，生产活动呈现多样化。手工业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0—11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02页。

② 恩格斯把野蛮时代分为三个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16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15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83页。

④ 同上，第157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85页。

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奴隶劳动成为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源泉。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① 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生产商品是直接为了交换，“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货币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渗入农业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划分：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之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耕地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这已经意味着向私有制的过渡。原始“氏族”的集体劳动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单个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②

(3) 第三次社会分工带来了文明的开端：出现了不从事生产，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即阶级社会。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金属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日益增长。”^③ 阶级的差别及奴隶数目的不断增多导致产生“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氏族”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解体。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是“氏族”的分裂，而是地域的分裂。“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

① 同上，第159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87页。

② 同上，第16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88页。

③ 同上，第162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91页。

了。”^①

恩格斯这一受到马克思鼓励的分析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起源的观点。

2. 识别物化的认识是扬弃一切异化的杠杆

马尔库塞在早期阶段，就已经为晚期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所代表的理论作了准备。马尔库塞认为，扬弃异化必须以识别物化为基础，这种识别受双重条件的制约：“对象的关系必须成为人的关系，即社会的关系，必须认识这样的关系并有意识地维护它。”^② 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变化是同等重要的。在这两种条件中存在着一种先验的哲学联系：人，当他认识对象时，也认识了自身，人拥有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可能性。

识别物化是对“社会”的认识^③。他从马克思那里学到，没有个人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以后他则同马克思相对立，马克思把重点转向社会，他则从人出发，把社会看作“与个人对立的抽象”^④。另一方面，马尔库塞又在“对人的历史—社会状况的认识”中获得了对象化的认识^⑤。在1969年时他对柏林

① 同上，第16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93页。

② 马尔库塞：《源泉》，第39页。

③ 同上，第40页。此处的主旨在于，说明马尔库塞在以后分析了现代工业社会。

④ 见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30；《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30页；同时也参见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250页及下页。

⑤ 马尔库塞：《源泉》，第40页。

演说（1923年）的原版本进行了修正，从这一比较中可见，^①这一认识的内容不是始终如一的：“只有当我们还记得，一旦人的意识行为揭示了人的真正本质与真实的现实性，人的‘意识’行为就不是单纯的理论认识，不是毫无联系的被动直观，而是一个具有深刻和全面意义的‘实践’：扬弃先前所发现的定在，成为自由的自我实现的工具。对历史—社会状况的认识，即认识负有义务的使命：实际实现由这一状况所要求的人的真正的现实性。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一认识。”^②1969年他又作了另外的论述：“认识不仅是理论认识，不是没有联系的直观，而是‘实践’，扬弃现存的事物成为自由的自我实现的‘工具’。”^③认识作为对对象化的认识，作为对“社会”，“人的历史—社会状况”以及“实践”的认识，应该识别物化。这种“实践”现在在马库塞这里只是实践哲学。他的说明近乎一种文字游戏。哲学不能完成扬弃异化的使命，因为它“把这一使命仅仅理解为理论上的使命”，^④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相对立，马库塞说道：当哲学把这一使命理解为“实践的使命”^⑤时，哲学能够完成这一使命。马库塞认为，这一“实践的使命”是对“单纯理论哲学”的扬弃，它将是哲学的真正实现。尽管对“单纯理论哲学的因素”作了限制，哲学仍然保持它的精神特性。

① 见马库塞：《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第一次刊登于：《社会》，1932年迪茨出版社版，第2卷。

② 同上，第2卷，第163页。

③ 马库塞：《源泉》，第40页。

④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3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27页。

⑤ 马库塞：《源泉》，第45页。

马尔库塞所谓哲学的真正实现只是发生在哲学内部，即人们意识内部的一场“革命”。他所称之为“实践”的东西，至少从他哲学发展之始初就存有精神的成份。以后也只是意识革命的一个影子。

马尔库塞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声称，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实践”。以后又断言只有知识精英才能获得实践认识，而马克思则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实践^①。要扬弃异化，首先必须实现实践认识。只有对对象化的认识已经揭示了人的历史社会状况的历史条件后，“这一认识才能获得实践力量和具体性，并依靠它们成为革命的杠杆。”^②

马尔库塞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他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他的晚期观点显然只是上述观点的继续发展：马尔库塞认为，那令人诅咒的群众的“单向度性”在工业社会是无法摆脱的，群众的领袖同样遭遇“单向度性”，唯独自由漂浮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哲学认识的帮助下能够冲破这一令人迷惑的魔圈。

四、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与 “人的解放”

马尔库塞从马克思“人的本质的确定”出发，“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真实基础”，但却掩盖了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的社会性，即阶级性。他忽视了马克思由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认为马克思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理

① 这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得以清楚地表明。

② 马尔库塞：《源泉》，第41页。

论的真正“基础”。马尔库塞的新发现事实上只是卡尔·马克思“真正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1. 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

从1844年起，马克思随着对黑格尔理性的人即自我意识的人抛弃，开始唯物主义地看待人。他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人自身看作他研究的主要对象。如同费尔巴哈宣布人是宗教的基础那样，马克思在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人中看到了“作为国家基础的现实的主体”^①。马克思认为国家的“理性”在于“现实的人的理性”能够“达到现实性”^②。因而国家不再是有理性的自我意识的产物，而是现实人的产物；理性不再创造人的本质，而只是人的一个特征。人最终成为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的哲学认识到，宗教和思辨哲学的秘密是人。马克思肯定地论述道：“只有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③因而马克思转向对人自身的研究。

费尔巴哈的格言是“人类学”。“这个词就它所论及的对象来说，是对‘神学’的挑战；但由此也表明了费尔巴哈哲学的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22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72页。

② 同上，第22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78页。

③ 马克思：《神圣家族》，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卷，第147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77页。

基本情调，热情和形式。”^① 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直接影响，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② 但马克思并没停留在这一步。“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③ 这里论述的是人的社会特性。费尔巴哈的人是以“自然界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马克思的人却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现实的人。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和物质利益的分析，深化了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由此产生他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④ 马克思由此转向反对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 就这样，马克思确定了人的本质（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科学地确定）。从对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分析中逐渐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诸如生产关系等。这些基本原理又成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的理论基石。

① 盖哈特·施密特：《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批判版的序言》，1967年法兰克福版，第391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9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7页。

③ 同上，第37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2页。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3页。《政治经济学要素》摘要，载于《马恩全集》国际版，第一部分，第3卷；《神圣家族》，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卷，第127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2页。

⑤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页。

2. “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概念

马克思早期关于共产主义，“完成了的共产主义”的学说是在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影响下形成的。恩格斯把它看作“哲学共产主义”。^① 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宣布：“共产主义不是从‘寻找本质’开始的，”它是“最高的实践运动”。“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最实际的运动”^②。“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就把共产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尖锐矛盾的必然产物。他们把“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术语转变为“实践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术语。^④ 马尔库塞任意地把马克思“人的本质的确定”，“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思想重新解释为“马克思理论的真实基础”。

①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49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19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36页。

③ 同上，第3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0页。

④ 同上，第42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8页。

第五章 马尔库塞的旨在扬弃异化的个人主义的共产主义

马尔库塞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他的马克思观的核心，植根于异化问题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马尔库塞马克思观的关键部分。

30年代末及40年代初的状况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尚属未知之谜”。“法西斯主义的军事和行政管制将使它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更加现代化、高效率，而不是摧毁其社会结构，这一切在当时也还不明确。当时还无法断言不断推进的总的力量会不会修正这种管制：旧的现代化了的社会尚未完全显示出自身的威力和理智，工人运动的前途也莫不可测”。^①他“在这种迷惘中”从豪克海默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从海德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重新回到黑格尔，以便从黑格尔出发来重新研究马克思。他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以费尔巴哈为中介的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社会和思想来源——黑格尔之外的德国唯心主义、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和

^① H·马尔库塞：《文化与社会》，第1集，1970年法兰克福版，第7页。

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极少受到重视。他把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延续。由此，马克思在马尔库塞那里就丧失了其革命的能动性，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反倒成了被马克思所接近的理论了。

马尔库塞认为：“哲学向国家和社会领域的过渡，曾是黑格尔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① 要想估计黑格尔哲学对“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理论”的作用，我们须在理解马尔库塞的意义上对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作用作简短的回顾。

黑格尔哲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思想影响了整个哲学世界。恩格斯肯定地说“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地，正是在1830年到1840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的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② 但“到30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③

① H·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1971年达姆施塔特与新维德版，第223页。

② F·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27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11页。

③ 同上，第27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12页。

黑格尔学派右翼^①接受了黑格尔体系中保守的特征，并以保守的眼光看待宗教和国家哲学。左翼则将辩证法当作批判的工具来使用，以批判的、有时甚至是革命的态度来对待宗教和国家哲学。右翼降低辩证法的批判意义，并坚持唯心论的理论体系。它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上帝相提并论，把黑格尔的哲学当作是基督教神学的民族形式。它把君主立宪制看成是理想的统治形式。左派黑格尔主义者以哲学为批判的武器，批判传统的宗教和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队伍，并超越了他们，同时也回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上。但马尔库塞它的历史地位作了过于简单地估计：“例如黑格尔哲学的历史遗产就没有转到‘黑格尔派’的手里（包括右翼和左翼）；赋予他的哲学的真正内涵以生命力的不是他们这些人。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倾向更多地是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得以接受和发展……。”^②马克思之所以似乎是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人，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发展。

①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是由德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所决定的。在上世纪的30至40年代，德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资产阶级不能再忍受半封建、半官僚君主制度的约束，而在1840年继承皇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想独揽国家和教会的一切权力。他“在幻想着充满了僧侣、骑士和农奴的伟大过去”（《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41—342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3页。）“因此，……就抓住自己还能在中世纪残余中找到的——一切东西。”（同上，第45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40页。）当时的形势使得人们较高地评价黑格尔哲学中的进步因素。黑格尔学派的分裂有着理论根源：即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这种矛盾性“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270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11页。）

② 《理性与革命》，第224页。

另一方面，马尔库塞主张，“马克思的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和经济的范畴……甚至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都不是哲学的著作。”^①因此，他在1941年还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唯物主义。^②当时他把异化劳动看作马克思理论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把劳动过程作为他的理论的焦点。”“最终研究劳动过程是绝对必要的，以便揭示真正意义上的实现理性和自由的条件。因此，对劳动过程的批判分析是哲学的决定性论题。”^③

然而，马尔库塞决定“劳动过程”的方式却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语录被（马尔库塞）滥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不相一致的观念，被扯平而统一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作用这一笼统的观念。但马尔库塞仅触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某些部分，即流通和分配领域的规定。于是，他从《资本论》中只吸收了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并将其归结为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观。马尔库塞从抽象劳动出发，通过分析异化劳动得出以下结论：即应该扬弃劳动，共产主义应被理解为消除异化以及人的实现的“个人主义新形式”。^④

倘若说马尔库塞对“异化”的解释还有些模糊不清，那么弗洛姆的设想则明显而又清楚。弗洛姆把马克思看作人道主义者，因而对异化思想的评价也相当高，他把“异化”从马克思理论的其它部分中独立出来。在他看来，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区别”之中。他以为，扬弃异化，意味着将异化

① 同上，第229页。

② 见本著第一章，第二节，第1小节。

③ 《理性与革命》，第241页。

④ 同上，第252页。

了的毫无意义的劳动，转变为创造性的、自由的劳动以及“个人的解脱”。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以类似的方式，扩大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并改变了其意义。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异化”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对抗性关系的写照。马克思把这一概念严格地局限于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

尽管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在“异化”问题上的意见一直是相一致的，1955年至1956年间在心理分析的作用上彼此还是出现了分歧。在他们间存在着分歧很大的弗洛伊德思想。马尔库塞和弗洛伊德以及马克思间的联系表明他已转向晚期学说，转向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转向对“单向度人”的批判。

一、马尔库塞的“异化”概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对西方马克思研究是一项重大事件。它引出了一股研究的热潮。赫伯特·马尔库塞于1932年在他的柏林演说（《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中，向该书的出版致意：“1844年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应该成为马克思研究史上一项决定性的事件。手稿可以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及根本意义的讨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①

马尔库塞积极地参与了这场对青年马克思的重新评价。（1932年，他充满激情地宣称，他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中，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真正基础）。但是，直到40年代，在

^① H·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思想》第7页。

《理性与革命》一书中，他才对异化劳动作详细的研究。

1. 共产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马尔库塞从“对劳动概念的解释”入手，因为马克思将“劳动过程放在他理论的焦点上”。^①“马克思 1844 年至 1846 年间的文章中，认为现代社会的劳动形式对人的彻底‘异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②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③，即异化劳动是人的异化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说，劳动的异化首先在劳动者和他劳动的产品的关系中，其次在劳动者和他自己的活动的关系中反映出来。”^④异化劳动的这两种形式是基本的。第一种形式是异化为物，第二种形式是人自身异化。它们导致下列结果：“与自己的产品相异化的劳动者同时也和自身相异化。”^⑤“与对象相分离的劳动最终是人对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互相的疏远、互相对立。他们首先是在他们互相交换的物品中，然后才是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人的自我异化同时也是同别人的疏远。”^⑥

马尔库塞向马克思表示谢忱：“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明确地探讨了物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这一过程使全部人与人

① 《理性与革命》，第 241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243 页。

④ 同上，第 244 页。

⑤ 同上，第 245 页。

⑥ 同上，第 246 页。

之间的个人关系，采取了物的关系的形式。”^①物化就是人被物所颠倒；在物的关系中，人的关系失去活力。马尔库塞以卢卡奇^②的理论为依据，来扬弃物化。他从人的本质入手，并期待“自由的个人。”

马尔库塞主要注重的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倾向。他认为，马克思在推翻私有制中看到了消除异化劳动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扬弃异化劳动，并将个人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马尔库塞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倾向为出发点，热情洋溢地谈论“自由的个人”。他认为“自由的个人”代表光明的未来和一切美好的事物，而社会则代表沉重的过去、压力，简言之，一切丑恶的东西。“自由的个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人类真正的历史”，因为它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将成为自由个人的历史”。^③因此“自由的个人”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只有当自由的个人，而不是社会成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的主人，私有制的推翻才能引起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④他把社会和个人对立起来，并肯定：“个人是目的。这种‘个人

① 同上。

② 卢卡奇在《阶级意识》（1920年）一文中第一次谈到了物化。卢卡奇论述道，无产阶级是对资本主义生活全部形式的否定。这一否定在起初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孤立、部分地批判。这一脱离整体的批判自身，正是物化的结果。唯有辩证的阶级意识包含了对总体性的理解。卢卡奇并没揭示人们如何能达到这一理解。但他指出，工人委员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可克服资本主义的物化。无产阶级的自我批判在反对物化时同无产阶级的行动同等重要。（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19—169页。）

③ 《理性与革命》，第250页。

④ 同上。

主义’^①的特征对马克思理论关注的方向是很重要的。”^①但在马尔库塞看来，如果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属于社会，而非“自由的个人”，社会就会再度被物化：社会对个人重新成为一种抽象物。

①（接上页注②）在1922年所写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详细论述了物化问题。他主要立足于《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资本论》，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85页；也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74—175页。卢卡奇把它称为“物化的基本现象”。（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74页。）由此得出：“从这一基本事实中可以断定，由于物化，人与作为对象化的、不受人制约的人的活动、人自身的劳动相对立，同与人相异化的自身规律相对立。”……客体指的是从现成的物及物的关系中产生一个世界（商品世界及它在市场上的运动），它的规律虽然可以逐渐被人所认识，但在此状况下却作为自由、自身相互作用的力量与人相对立。个人虽然可以利用这些认识为自身服务，但他的行动却不能对这一现实进程起变更作用。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自身被客体化，主体成为商品，它隶属于社会的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如同某种满足需要的成为商品的物，它的运动的实现也必然不受人的制约。”（同上，第175页。）这一对物化的分析表明，卢卡奇是如何把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作为“异化”所描述的东西，同《资本论》的商品拜物教联系在一起。但是，卢卡奇的物化概念首先是针对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人的残缺性。物化被普遍使用，卢卡奇“在此依照黑格尔，却没对物化、外化和异化作充分的区别”。（见马丁·德雷斯：《工作日与物化》，第241页，注释22。）卢卡奇对人剥削人不予以注意。人的对象化和物化使人与他的内在本力量相异化。由此他说道：“照马克思看来，劳动异化产生于人的自然。他把人类的全部历史看作是一部不断增大的异化史。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同黑格尔哲学的接近在此是不容否定的。

① 同上。

在此，马尔库塞对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批判；由于生产资料已经国有化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变得徒劳无益的了。他设想一种自由的个人所有制，而非公有制或私有制。在此很难将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区别开来。至少同马克思的公有制思想是相矛盾的。用积极的眼光看问题可以这样理解，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从苏联的极权主义不仅得出了实践的结论，而且也得出有关学说的结论。如果马尔库塞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理解，这不意味着全盘背弃马克思主义吗？“个人是目的”^①，一切事物都是以此为出发点而得以决定的，“自由的个人”应该占有生产资料诚然是美好的梦想；但马尔库塞是从何处得出“自由的个人”的呢？并且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又如何转到个人的手中呢？这个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的。

马尔库塞承认个人在“一旦阶级被消灭”后有能力和普遍性。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事实与人和自然的普遍本质，从而也与真理是相矛盾的，除了它可以在其中得以独立成一个抽象的一般精神以外，它别无其它庇护所。”^②这一分离过程的根源存在于劳动分工的阶级社会，存在于精神的和物质的生产力的分离之中。这种普遍性在精神领域里，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和创造性的现实。“每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都有必要将其利益描述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从思想上来说就是赋予它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并将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 251 页。

其描绘为唯一明智和普遍有效的。”^① 于是，按照由马尔库塞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论断，现存的一切、有约束力的普遍性都是不合理的。个人怎样才能获得新的普遍性呢？通过对未来，对无阶级社会的预测，个人将成为“历史事实的主体，其方式是：他自己就是普遍性，在自身中表现出人的普遍本质。”^② 马尔库塞就是这样使个别人成为普遍的。^③

马尔库塞进一步研究了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得出以下结论：“共产主义积极地消除私有制，它整个的天性决定了它是个人主义的新形式，不仅只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新的生活制度。”^④ 私有制的扬弃，即扬弃人的本质的异化是对人的自身的复归，而共产主义正是个人的实现，这就是说“个人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至此，我们了解到马尔库塞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一切都是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为中心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新型的个人主义社会。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⑤ 也考虑到人的复归，因为他接受了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观点。它同个人主义却没有联系。马克思的思路是从异化思想到异化劳动的事实。脱离费

① 见上注，第 251—252 页。

② 同上，第 252 页。

③ 同上，第 256 页。

④ 同上，第 252—253 页。

⑤ 事实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资本主义制度中所有异化现象的“历史之谜的解答”。马克思在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中看到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随着这一天才发现，他摒弃了平均共产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一向人自身的“完全”“复归”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即符合人性的人，意味着对私有制的废除及自我异化的扬弃，以便实现共产主义。

尔巴哈后，他研究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①

相反，马尔库塞却主观地思想，他只对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感兴趣。人道主义占主导地位。马克思则反之，他从事实出发。并开始分析生产方式。马尔库塞则停留在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倾向上。

2. 扬弃异化的顶点，废除劳动

在考虑异化劳动时，马尔库塞萌生出一个怪念头：应该废除劳动，因为它本身就是异化的。他在40年代初设想出这一浪漫的思想，并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得到了具体化。

(1) 废除劳动论

“自由和理性的实现要求推翻这种状况”。^②“马克思相应地把共产主义革命称为‘占为己有’的行动，意思是，通过推翻私有制，人应该成为所有这些迄今一直与他们相异化的物的占有者。”^③他认为，这种占为己有取决于被占有的对象，即生产力。只有当人使生产力隶属于统一的个人的力量之下，他在历史上才第一次获得自由。另外，占有还取决于占有的人。但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这样的人的，因为异化劳动产生了分裂为对立阶级的社会。”^④社会生产的方式“限定了个人的生活，并将他的整个定在限制在由经济规定的关系之中，而不顾及他的

① 见我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发展》一书。

② 《理性与革命》，第25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255页。

主观能力和愿望。”^①人们不得不违心地从事无聊的劳动。“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工作。”^②这种劳动是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被迫的劳动。

另一方面，马尔库塞又认为，劳动条件是阶级条件。“劳动条件使个人形成团体或阶级；它们是阶级条件，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本分裂为根据。”^③消灭阶级首先必须铲除阶级条件的观点就是以此为依据的。因为劳动条件正是阶级条件。倘若劳动条件不复存在，劳动也会消失。由于劳动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无产阶级就成为普遍的人性。而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又是一种否定的普遍性，它表明，劳动的异化已经上升到全面摧残的地步。”^④无产阶级的劳动窒息了它的自我的实现；它的劳动否定了它整个的定在”。^⑤倘若无产阶级想要实现它的自我，获得它的定在。首先必须废除劳动！“劳动进程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生命”。他认为，扬弃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扬弃无产阶级。”^⑥“扬弃无产阶级同时又会导致这种劳动的扬弃。”^⑦马尔库塞在这里三次引用马克思的话用以证明马克思也想废除劳动。市民担忧，无产阶级忍饥遭难，这都是由劳动引起的。要消除这些苦难，首先必须扬弃劳动。

马尔库塞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要完全废除劳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256 页。

④ 同上，第 257 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第 258 页。

动。他的论断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甲. 由于劳动过程就是无产阶级的定在，因而，扬弃劳动过程和异化劳动就意味着同时扬弃无产阶级。

乙. 马尔库塞三次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①，为的是证明马克思要消灭劳动。他认为，马克思已断言：“共产主义要解除市民的‘担忧’和无产阶级的苦难，只有清除二者的根源，即劳动才能做到这点。”^②

丙.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在把同一‘劳动’术语既用于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又用于描写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过程时是犹豫不决的。他之所以使用‘劳动’这个术语，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事实上最终是怎样理解劳动这一在商品生产中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资本的活动的。”^③从这点出发，他断言，“劳动意味着劳动者的个人不可能自由全面地发展，并且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解放同时就是对劳动的否定。”^④

丁. 马尔库塞把“自由的个人的结合”说成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理性的社会，在此社会组织的准则不是劳动的普遍性，而是所有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⑤与此同时，劳动应被作为非人道的、异化的强迫劳动而被这一发展所取代。废除劳动就等于废除异化。

(2) 废除劳动论的具体化

在《理性与革命》(1941年)中，马尔库塞对废除劳动思想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的阐述仍属于对马克思阐释的范围内。在晚期著作中这一思想得到了独立的发展和具体化。

在《欲望结构和社会》(1955年)中,马尔库塞把“劳动”和“道德”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他认为劳动从来就是“反人道的”、^①异化的强制劳动,在严格的意义上它是不道德的。“当然”也“存在比较熟练的条件下能给从事劳动的身体器官创造快感的劳动。”^②甚至在“异化劳动”中也可能存在乐趣,比如当女秘书制作出一份完美的副本,理发师作出一个漂亮的发型以及裁缝裁出一套合体的服装时。^③但“这种乐趣”和“基本欲望的满足没有丝毫关系”。“倘若试图把在流水线旁,办公室内和商店工作同欲望要求联系起来,就等于把非人性的东西赞美成乐趣。”^④倘若人们断言必须做这桩“事”,原因在于它本是一桩“事”,即将真的会是“异化的登峰造极”,“本能与理性自由的彻底丧失”,以及一个“对人来说不是第二自然,而是第一自然”的压迫。^⑤于是,年轻的一辈也应该出于“神经官能的压迫”而劳动,劳动更应该“成为道德”。^⑥

在马尔库塞的文章《富裕社会的解放》(1969年)中可以发现更为有趣、清楚的探讨。在该文章中,他将劳动置于解放的问题下进行探讨,目的是为废除劳动的要求提供根据。“发达工

① H·马尔库塞:《欲望结构与社会》,1967年法兰克福版,第218页。

② 同上,第216页。

③ 同上,第217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218页。

⑥ 同上。

业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①使马尔库塞产生了“技术解放的设想”。^②他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新的工艺上。对他来说虽然“劳动和娱乐彼此接近”，（在异化劳动中也可能有乐趣）但劳动和娱乐主要还是对立的。劳动不等于娱乐和消遣。倘若劳动不再隶属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和赢利的要求”，不再隶属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产生的匮乏的要求，”社会必要劳动、物质生产则将不断科学化”。^③劳动的科学化即“技术实验，科学和工艺。”^④自动化和计算机技术将靠自动人来代替劳动者。（难道计算机也能在马尔库塞搬家时帮助搬书吗？）劳动的科学化将废除劳动自身。废除劳动的思想就这样被具体化了。

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是“所有激进理论与实践中最古老的梦幻之一”。^⑤这事实上是马尔库塞的一个美好的梦幻！他想在未来具有“一个美学的现实——作为艺术品的社会。”^⑥劳动在这一社会内是多余的，因为在社会中仅存在艺术，艺术自身并非劳动。活动（Tätigkeit）代替了劳动。如同马尔库塞论述的那样，这一理想是“解放的最激进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乌托邦”。^⑦这最终是未来的事情。他于1964年在《文化与社会》的序论中冷静地断定，“在现存的社会内”“废除劳动”是不可

① H·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见它的副标题和序言，1980年达姆施塔特和新维德版，第3页及第11—20页。

② H·马尔库塞：《富裕社会的解放》，载于《解放的辩证法》1969年汉堡赖伯克版，第97页。

③ 同上，第97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能的。^①

(3) 马克思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不仅想扬弃异化劳动，而且要废除劳动本身，这一观点主要是以《资本论》为根据的。“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②虽然马克思在此说了应该“终止”“劳动”；但事实上仅指的是异化劳动。马克思并不将他的希望寄于乌托邦，而是与此相反，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③马克思寄希望于工人运动。他以“自由王国”的实现从“缩短工作日”开始，给工人运动指明了一条道路。^④当马尔库塞说，“马克思自己在后来摒弃了……废除劳动的思想”；^⑤这一论点无任如何都是不切实际的；马克思在先前就没有表述过这一思想。

如同马尔库塞所承认的，马克思并未曾犹豫地“把劳动这

① H·马尔库塞：《文化与社会》，第1集，第9版，1970年法兰克福版，第16页。

② 《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5卷，第82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6页。

③ 同上。

④ “工作日的缩短”是工人运动基本条件的第一步。见《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5卷，第82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6页。

⑤ H·马尔库塞：《文化与社会》序言，载于《文化与社会》，第1集，第9版，1970年法兰克福版，第14页。

一同一术语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① 马克思坚持，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应该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灭，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灭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 发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相区分，即同雇佣劳动，归根结底同异化劳动相区别。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包括了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劳动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一种需要。社会必要劳动，物质生产不仅不被废除，而且必须更高效率地进行组织。马尔库塞认为，必须废除劳动的这一形式。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对劳动作了论述，他肯定了付立叶自由劳动的理论：“付立叶证明，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偏好某种劳动的习性；绝对懒惰是胡说，这种情形从来未曾有过，也不可能；人类精神本来就有活动的要求，并且有促使肉体活动的要求；因此就没有必要像现今社会制度那样强迫人们活动，只要给人们的活动天性以正确的指导就行了。接着他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指出现代社会

① H·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258页。

② 《哥达纲领批判》，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9卷，第21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2—23页。

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把欢乐变成大部分劳动者享受不到的东西，是极端不合理的。然后他又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时候，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① 恩格斯在以后更加详细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有计划地使用它，也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因而必须消灭“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分工”。然后应该形成一个崭新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都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② 这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崭新的、形成人的能力的真正人的劳动。因而十分明显，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扬弃劳动仅仅意味着废除非人性的异化劳动。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了主观和片面的阐释，并把其从内在的联系中孤立出来。^③ 从马克思出发，马尔库塞关于废除劳动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异化问题耗费了不少精力。他自己对此作了总结，那些部分照他看来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

^① 《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483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78页。

^② 同上，第20卷，第273—27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18页。

^③ 见《理性与革命》，第258页。

是应该强调的，那些部分是“马克思社会批判中在他之后的发展中被弱化”^①了。

甲.“共产主义的个人主义因素”；（事实上他把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道主义因素绝对化了。）

乙. 废除劳动的思想；

丙. 反对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学说，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的反驳。事实上它具有主观倾向，并拒绝承认客观规律。照马克思看来，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自己任意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马尔库塞认为这一句的上半句是正确的，而下半句他拒不加以承认。）

丁. 所有这些因素均隶属于个人自由实现这一思想。虽然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出现个人自由实现的思想，但这仅是他的经济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以后用无产阶级来代替个人；无产阶级也必须依靠自己来获得自身的解放。^②

二、埃里希·弗洛姆的异化观

倘若说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还不十分明确，埃里希·弗洛姆却对此有了理解与明确，弗洛姆参与社会研究所的工作并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他首先积极从事异化问题研究，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位人道主义者。^③他的马克思观从

① 《理性与革命》，第259页。

② 参见R·斯泰格瓦尔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1969年科隆版，第192—204页。

③ 见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1963年法兰克福第一版，此处摘自1982年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再版本。

这一人道主义出发，“却具有最大的选择性。异化的积极作用问题及恶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在人那里并未得到反映。像费尔巴哈那样，异化照他看来始终是恶。”^① 科拉柯夫斯基甚至把他称为“我们时代的费尔巴哈”：“他的著作明白易读，他也不掩盖自己的说教意图和道德意图，而往往是直接说出来。”^②

典型的是，他同马尔库塞一样，把马克思向存在主义哲学靠近。“马克思的哲学同存在主义的思想一样，是对人的异化的抗议，是对他自身丧失的抗议以及转变为物的抗议。”^③“它以否定或者掩盖包含于自身的矛盾，对一切试图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④ 他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植根于西方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中，“马克思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对现实单个人的生存问题。”^⑤ 弗洛姆论断的基础同马尔库塞一样，在于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表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⑥ 弗洛姆致力于对“马克思进行真正的批判”。^⑦ 这一批判讨论的只是通常偏激或傲慢的判断。^⑧“我确信，我们只有通过对于马克思思想真正内容的理解，以及对俄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作者补充）的正确区分才有能力理解我们当今世界的现实并能够理智而又有益地迎接他

① 莱斯泽克·科拉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1979年慕尼黑版，第3卷，第419页。

② 同上，第414页。

③ 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第7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第10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

们的挑战。”^① 弗洛姆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一种荒谬的把马克思看作是亚魔、把社会主义看作魔鬼杰作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由迫害狂的幻觉所造成的。^②

1. 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弗洛姆从青年马克思出发，认为唯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首先是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异化”即“世界，并本质上被动地接受地在主客体分裂中经历了自身”^③ 当他把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及的人向人自身的复归和人自身的实现看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④ 时，他过高估价了马克思著作中异化概念的意义；他认为扬弃异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人类的历史照马克思看来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从异化中的解放，意味着人向人自身的复归和他自身的实现。”^⑤

2. 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弗洛姆在这点上比马尔库塞更远离马克思。他认为，人类

① 同上；弗洛姆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的知识，他的判断毫无价值。

② 同上，第 10 页。

③ 同上，第 49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历史照马克思和黑格尔看来都是人的异化史。^① 他从黑格尔出发来阐释马克思，因为黑格尔“创造了异化概念”^②。照他看来，异化概念并不植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是植根于人的“存在与本质间的区分。”“异化概念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都建立在存在与本质的区分基础上，建立在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相异化的事实上，即建立在人实际上并不是他所可能的那样。换句话说，建立在人不是他所应该怎样这一事实上，建立在他所应该怎样这一事实上”^③ 他尤其对马克思在异化问题上运用无产者与资产者的矛盾认识不清，同时也忽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3. 人的本质的解放是马克思理论的目的

弗洛姆指出，《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对劳动外化产品的设想。”^④如同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述的，这一商品拜物教正是工人劳动产品的异化。在《资本论》中，“商品的拜物特征”即是“商品的神秘特征”，它既不是从它的使用价值中产生，也不是从形成其价值的“抽象劳动”中产生。马克思认为，商品的神秘特征的原因“虽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86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9页。）因为当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的形式，“人类劳动的同等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等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⑤不同的劳动只是同一人类劳动

① 同上，第49页和51页。

② 同上，第51页。

③ 同上。④同上，第54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8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9页。

的表现。所有的劳动产品具有它们的价值并在此程度上相同，凝聚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因而获得物质形式，并表示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①当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时，人的关系也获得了物的形式并表现为物的关系。人的关系的价值表现在物质形式中。“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②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③马克思认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是不可避免的。“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④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社会，相互交换其劳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表现为相互交换的商品间的关系。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产生是必然的。

商品的价值是人的劳动的物质外壳。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一商品的劳动量所决定。但价值与价值量由生产这一商品的劳动量所决定的。但是价值与价值量的发现并不能铲除商品的拜物性。为了扬弃它，人们必须废除商品生产的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87 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89 页。

④ 同上。

条件并最终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①

但是弗洛姆却对马克思作了如下阐释：“必须重新强调，马克思的目的并不限于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是在于依靠重建所有人非异化和自由的活动所获得的人的本质的解放，在于一个只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以物的生产为目的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不再是一个畸形的怪胎，而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本质。”^② 马克思的目的在于解放人的本质，在于建设一个以人为目的的社会。

弗洛姆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追溯到康德。“马克思的思想在此涉及的是康德的原则，即人必须始终是自身目的而决不容许成为目的的工具。但是当马克思断言，人的本质不容成为个人生存的工具时，马克思就发展了这一原则。”^③ 因而就需要把费尔巴哈作为在康德和马克思之间联系的环节。

4. 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转化是马克思的主题

弗洛姆把异化劳动的根源移置到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区分中”。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关注“人从摧残其个性、使其成为物和物的奴隶的劳动形式中解放出来。正如基尔凯郭尔一样，马克思关心的也是拯救个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针

① 弗洛姆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归结为马克思的劳动外化产品的思想，即归结为《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思想。人们在马尔库塞那里也能发现这种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一过程描述为“商品拜物教”。载于《理性与革命》，第246页。

② 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第54页。

③ 同上，第56-57页。

对其分配方式。而是针对生产方式、针对摧残个性和人的奴役——这种摧残个性和人的奴役并不是由资本家所造成的，而是人的奴役、即工人和资本家均被奴役所造成的，是由他们自身所创造的物与环境所造成的。”^①他认为，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是对“拯救个人”的最大贡献。当马尔库塞经过海德格尔而获得他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时，弗洛姆走的是另一条经过基尔凯郭尔转向个人主义的马克思阐释的羊肠小道。

“马克思的主题是异化的、毫无意义的劳动转化为创造性自由的劳动，而不是依靠私有的或者‘抽象’的国家资本主义来对异化劳动作更好的报酬。”^②我们看到，弗洛姆把马克思关于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主要形式这一观点置之一边。他否定包含扬弃私有制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人剥削人的批判也被置于一边。

马克思异化理论与黑格尔精神异化学说以及费尔巴哈人的异化观点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揭示了私有制的不合理性；马克思依靠共产主义革命来扬弃异化。马克思始终把私有制看作劳动异化的主要形式。“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8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页，第100页。）“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

① 同上，第53页。

② 同上，第48页。

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同上,第109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同上)。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废除私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革命中看到了扬弃异化的最重要措施。“私有制的……扬弃”以及“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意味着“消灭人们对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3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0页)“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同上,第37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2页。)

埃里希·弗洛姆把“异化”从马克思理论的其它部分中独立出来。弗洛姆把异化根源移置到“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区分”中;异化的扬弃照他看来只要将“异化了毫无意义的劳动转化为创造性自由的劳动”以及对“个人的拯救”即能达到。^①

三、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相结合的尝试

倘若说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在解释马克思异化理论时彼此继续一致,二者在联系社会理论来评价弗洛伊德时则分歧颇深。二

^① 埃里希·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1982年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版,第48页和第53页。

次世界大战以后变化了的状况以及在批判理论范围内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研究均促使马尔库塞转向一个新方向，即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我们从中看到马尔库塞向晚期理论的转变。

1. 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

对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作综合的尝试是“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所作回答的一部分，这一新阶段的鲜明特征是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间的界限的消失。”^①因而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哲学问题，而且包括将心理学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他使用“心理学范畴，因为这些范畴已成为政治范畴”。“以心理学为一方，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另一方的传统界线，通过当代人的状况而变得模糊：个人在国家中的作用，——个人公共的定在承接和占有了以往独立同一的过程。”^②

尚在1941年，马尔库塞就以社会和个人间的巨大差别为前提。他坚持个人高于社会，并论述“自由个人”的可能性。他认为，倘若社会重新作为抽象物与个人相对立，则必将出现新的社会物化^③。但到了1955年他又认为可以把个人与社会间的差别理解为正在消失中。这意味着，统治作为不易察觉的压迫

① J·P·安耐森：《从马尔库塞到马克思》，1971年新维德—柏林版，第143页。

② H·马尔库塞：《欲望结构与社会》，1967年法兰克福版，第7页。

③ 见H·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250页；也见本著第4章，第一节，第1小节。

得到了实现，个人同时与他的自由利益相悖自愿地被社会所征服。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的社会哲学范畴不再足于解释和批判这一过程。因而，马尔库塞在“类历史”的标题下援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素材。现在，马尔库塞把个人与社会间矛盾的根据，建立在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冲突中。而这一冲突又不能归结到自然和文化中：“而必须把它解释为人类学结构内在矛盾的一个特殊、物化的形式。”^①

2. 马尔库塞与弗洛姆之间的分歧

批判理论内对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讨论并非起始于马尔库塞。豪克海默在 20 年代就表示出对弗洛伊德的兴趣。^② 1927 年，阿道尔诺试图在心理分析和科尔内留斯的先验现象学之间建立一种联系。^③ 埃里希·弗洛姆第一次开始把弗洛伊德作为社会批判哲学的一个要素，系统地与马克思联系起来。尽管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以后为弗洛伊德而分道扬镳，但当时他们却彼此相互一致。马尔库塞早先是通过弗洛姆才注意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间联系的可能性的。在 1955 年至 1956 年间，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就心理分析的作用问题发生了纷争，这一纷争的意义超出了两位对手的论断，它象一枚炸弹，对社会心理学

^① J·P·安耐森：《从马尔库塞到马克思》，1977 年新维德·柏林版，第 145 页。

^② 参见 M·杰：《辩证法的幻想》，1976 年法兰克福版，第 114 页。

^③ 见阿道尔诺：《先验的灵魂说中的非意识概念》，未公开发行的博士论文，1927 年法兰克福大学。

的影响一直至今。^①

在《欲望结构与社会》一书中，马尔库塞试图拯救“革命的弗洛伊德”，并使他和马克思相结合。他在这部著作的“跋”中自我批判性地论述道，不同的压迫形式的消失，“使人忽视了性欲以及与之相融合的破坏欲的历史动力。”但他也不同意“性本能的解放是治愈人与社会危急的灵丹妙药”^②这一观点。与弗洛姆相一致，马尔库塞对“以父亲为中心，以工作为目的的所谓父权制社会”进行了批判。这一社会建立在片面的“工作原则”上，“这一原则在工作与竞争不断扩大的社会中成了统治原则。”马尔库塞认为，“相应于社会成员竞争的经济贡献，社会在这样的‘工作原则’统治下被划分为等级。”^③因而“个人的幸福与创造性的发展同社会处在矛盾的关系之中；倘若把个人看作唯独在社会内才能实现的价值，个人则深受压制。”^④

由于马尔库塞仍想坚持他的“恋母情结”意义，而弗洛姆从一开始就没把这一意义绝对化，造成马尔库塞与弗洛姆的疏远。他认为，“弗洛姆对恋母情结所作的新解释使他从性的领域转到人与人关系的领域”。^⑤“这一新解释使他转回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内部。”^⑥这意味着它使弗洛伊德的理论不具有批判性。^⑦

① 见B·格里希：《弗洛伊德之刺》，1980年法兰克福版，第2页。

② H·马尔库塞：《欲望结构与社会》，1967年法兰克福版，第235页。

③ 同上，第49页。

④ 同上，第241页。

⑤ 同上，第264页。

⑥ 同上。

⑦ 见B·格里希：《弗洛伊德之刺》1980年法兰克福版，第350页及以下几页。

“这一‘转向’的要点在于，‘乱伦的本质’并非是‘性的要求’，而是寻求保护与安全，寻求保持童真。”^①照弗洛伊德看来，对“匮乏的自由”企求，“对母亲=妇女的企求”是“性的企求”，它使“恋母情冲突成为个人与社会间性冲突的范例”。^②

马尔库塞从这一重新解释中，发现要对弗洛伊德的死亡欲望，死亡理论作修正性拒绝，他坚持把弗洛伊德解释为一个革命的乌托邦主义者。弗洛姆对此进行了抨击，他在《争鸣》杂志上对马尔库塞进行了批判。^③照弗洛姆看来，马尔库塞的否定的含意是对世界虚无般地拒绝。相反，马尔库塞则认为，“大拒绝”^④的虚无主义是唯一真正的人道主义。“生命欲望和破坏欲望”。^⑤，照马尔库塞看来，是可以互为因果的，而弗洛姆则倾向于二元论。美国人马丁·杰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一部著作中对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之间的纷争作了如下总结：这“两位先生”似乎“在他们所坚持的论断方面彼此相距甚远，但至少在一点上他们是相互一致的，即在死亡欲望的强烈与恒久性问题上彼此是一致的。马尔库塞以某种喜悦的确信声调完成他的乌托邦著作。（《欲望结构与社会》，作者注）豪克海默在十几年前曾论述过这一思想，即不可能使逝去的苦难重新变好。不可能扬弃早已不再存在的苦难。唯有这一思想才能抑制马尔

① H·马尔库塞：《欲望结构与社会》，第264页。

② 同上。第265页。

③ 见埃里希·弗洛姆：《人类本能激进主义的内涵》，载于《先锋》第二期，1955年4月和《一个反辩驳》，载于《先锋》第三期，1956年1月。

④ H·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268页。

⑤ E·弗洛姆：《畏惧自由》，第181页。

库塞的那种声调。”^①

上述纷争最终围绕着弗洛伊德之“刺”^②。试图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的尝试，表明了早期马尔库塞向晚期马尔库塞的转折。我们在此不打算继续研讨这一问题，因为它已超出本书所研究的题目。

四、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不仅影响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而且启发了批判理论乃至“新马克思主义”。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均普遍地把“异化”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基本范畴。诚然马克思曾用“异化”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关系。在《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影响下，发展了异化劳动的思想。为了说明历史、批判资本主义，为了能定义和描绘共产主义，“异化”成了一个基本范畴。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1845年—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嘲讽地谈论“异化”；这个术语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哲学家们仍能理解”^③。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还将一般异化具体化为劳动异化（或者异化劳动），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已转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对个体与类的矛盾已不感兴趣）。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不再使用“异化”这个概念；

① M·杰：《辩证法的幻想》，1976年法兰克福版，第142页。

② 遗憾的是，在此我们不能详细地对此进行讨论，人们可以查看第二手材料《弗洛伊德之刺》（由B·格里希等编，1980年法兰克福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3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在法国社会主义的文学后面”描写“他们诸如人的本质的外化”的“哲学胡说”。这种“胡说”只是一种“关于实现人性的无谓冥想”^①。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1850年）》（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1851—1852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雇佣劳动和资本》（1849年），《雇佣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以及他所阅读和参与撰写的《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都没再使用“异化”概念。

在《资本论》中又出现了“异化”这一概念，当然不是作为对普遍、永恒规律的表述。这一回复过程（即“从劳动观点出发的外化过程”作者注）显然只是从特定历史出发点或者特定历史基础出发的历史必然性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而绝不是生产的绝对必然性；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必然性，这一过程的结果和（内在）目的在于扬弃这一基础本身，如同扬弃这一过程的形式一样”。^②照马克思看来，“异化”概念不能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现象的本质；对此现在依靠剩余价值理论和对资本运动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仅在四处使用了“异化”概念；^③在法文版中则仅有一处保留了这一概念。^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4卷，第486页和第485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5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迪茨出版社，1974年柏林版，第716页。

③ 见马克思：《资本论》，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455、596、635和674页；《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3、626、668、708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1872—1875年巴黎版，第249页。

可见，“异化”概念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它只能描述资本主义制度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关系。此外，马克思还将它严格地限制在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①。

^① 参见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载于《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北京，第1—5页；我在《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一书（1985年，德国亚琛版）中，对异化理论作了详细的论述。

第六章 马尔库塞的乌托邦社会发展观 ——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一）

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马尔库塞与弗洛姆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心理分析作用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具体的动机和双方的立场，产生了“爆炸性的作用”，并“影响着社会心理学的科学范围和模式”。^①这场争论对马尔库塞造成的影响之大，使他转向了他后期理论的构造——“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即试图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说结合起来，研究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建立他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

一、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社会”的批判

随着本世纪50年代中期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发达的工业社会阶段，即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后期资本主义”，亦即我们称之为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马尔库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返回德国，而是留在美国（作为美国公民）继续从事他的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1954年以后历任布兰代斯大学政治学和哲学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教授等职。

^① 格尔利希：《弗洛伊德之刺》，1980年法兰克福版，第2—3页。

因此，他不仅对德国及欧洲国家，而且对美国有着长期的生活、工作感受和深刻的了解，从而将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他研究发达工业社会的典型。同时，他在理论上也受到同时代西方理论家的影响，譬如接受了美国“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加尔布雷恩提出的关于现代西方社会已进入“富裕社会”^①的观点，赞成对传统社会观念进行批判，期望建立一个能得以全面发展的、更美好的新社会。

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工业社会即是“发达的”“富裕社会”，其典型特征体现在以下四点上：一、工业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滥用，工业技术被用来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和军用品，即被用于“非生产领域”；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中下层人民大众也分享到了一部分好处；三、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资产阶级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四、科学研究的成果不仅用于为人类造福，而且成了对个人和集团的行为进行成功的控制和操纵的工具，因为科研成果被充分地运用于商业和政治。^② 马尔库塞认为，“富裕社会”的这四大特征也同时构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正常功能，它们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表现出综合的病症。这就表现出马尔库塞理论的需要性特点和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即在这里旨在说明，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所承受的压抑和负担的根子并不源于个人的精神紊乱等病症，而是在于社会的正常功能。所以，马尔库塞指出，“富裕社会”同时也是“病态社会”：“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

① 参见加尔布雷恩《富裕社会》，1958年英文版。

② 见马尔库塞《现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载《工业社会中的攻击和适应》，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7页。

(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① 马尔库塞在这里虽然较空泛地规定了“病态社会”的内涵,但却认识到了现代工业社会仍面临种种的内部矛盾,仍经历着非理性的发展,诸如生产力和破坏率在同步提高,效益原则的至高无上和被不断强化,个人的自我发展并未很好实现,人的异化和奴役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在扩大,等等。他尤其重点分析了社会主体——人,指出,人的可能状态和实际状态之间的鸿沟越宽,压抑的需要就越大,即“不是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文明,而是有利于使现存社会延续下去的合法兴趣的本能压抑就越大”^②。人被迫屈从社会的需要和不得不承受“补充施加的心理压力”的真正原因在于他的实际利益,在于他害怕失去工作或社会地位。在“富裕社会”里,“人的自由的现存形式和可达到的可能性之间”^③存在着矛盾,这使人的心理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屈服于现存制度的控制和操纵。^④总之一句话,人性在“富裕社会”中被扭曲了。

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及其两面性(“富裕社会”和“病态社会”)的描述,是别出心裁的,有他独立的见解的。他一方面旨在说明时代已经改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已经过时,尤其是由于机械化、自动化和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的采用使资本主义已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阶段。另一方面,他旨在此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其中心是著名的“单向度”理论,这也是马尔库

① 同上书,第10页。

② ③④ 见同上书,第11页

塞后期思想的结晶和他一生的得意之作。60年代末的西欧等地的大学生运动曾奉这一理论为“行动的指南”，政治信仰的“圣经”，马尔库塞本人也一反常态，积极介入大学生运动，充当了“精神领袖”的角色。当阿道尔诺被法兰克福的大学生用大字报包围起来而郁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时，当左派学生高举“反权威”的旗帜而上街示威游行时，马尔库塞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态度。甚至当一些大学生因聚会而损坏了大学的公物时，马尔库塞曾慨然解囊相助。的确，在那一段时期，马尔库塞成了左派学生的崇拜偶像和思想支柱。

在马尔库塞看来，“西方世界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今天为了捍卫资本主义制度，要求把自己内部的和外部的反革命组织起来”^①。这恰恰因为反革命在西方世界仍处于防御阶段，“这里并不存在新的必须打退的革命，而且也没有新的革命会发生”^②。“当然资本主义从未能够，而且也永远不能使其生产关系与其技术能力相一致；可以使人的劳动力日益脱离物质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最终将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但是，资本主义能在人的依赖性增强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体现在这样一个公式中：技术进步 = 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 = 奴役的加强。商品世界和服务效益的供给在不断增加，牺牲者只是日常的代价，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的‘不幸事故’，于是剥削显得合情合理。”^③

马尔库塞在这里阐述的这一公式，正是他对现代工业社会

①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法兰克福1973年德文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③ 同上书，第10页。

及其发展方式的特殊描述。的确，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成功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成果，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使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得以满足；但是，它也协调着对这种社会制度不满和进行反抗的人们，带来了一个起一体化作用的政治统治制度。在马尔库塞看来，由于物质需求的满足，人们也就似乎丧失了反抗的理由，从而成为统治制度的驯服工具。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的这种单向度性，使人们最可贵的第二个向度——否定的和批判的思想趋于消失。因而，马尔库塞写道：“阻止社会演变，也许是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最杰出的成就。”^①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认为，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大家都希望维护和改进现存结构，希望保持现代文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革命也让位于改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揭露单向度的社会和文化，唤醒人们对自己单向度性的警惕，启迪人们否定的、批判的思想（即社会生活中的创造性），导出走“第三条道路”的必然性。他公然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异想天开地要用自己的文化革命来拯救人类。然而，由谁来拯救呢？他的“革命”的主力军又是谁呢？这就要由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少数杰出人物来加速革命反抗的可能性，由他们来唤起“革命”力量——“流浪汉，没有专门知识的人，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的被剥削者，被迫害者，失业者和可能失业者这些人所构成的下层社会”，去采取激进行动。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闪烁着“圣洁”之光的奇异幻想，曾经在60年代末使许多西方大学生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奉为行动指南。然而，曾几何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7年达姆施达特版，第14页。

时，随着大学生运动的夭折，马尔库塞罗曼蒂克式的空想也就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但是，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有不小的影响。它的应运而生，反映了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苦闷、忧虑、不满、彷徨而又想寻找出路的思想状况。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有益的探讨和甚至是激烈的批评，是马尔库塞后期“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当然，它还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需要说明的。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马尔库塞认为，一个新现象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即不仅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异常迅速的提高，而且也成功地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大多数工人，尤其是熟练工人的生活要比他们以前过得好得多。他们分享着消费社会的舒适。他们有自己的汽车，高级音响设备，漂亮的住宅，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和厨房设备等。这些都构成了马尔库塞眼中的富裕社会。马尔库塞考察了这个社会的消费方式及其后果，指出：一方面它满足人们必需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潜移默化地将人们纳入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即起一体化的作用。由于有福可以共享这种表面现象，使人们受这些消费方式的制约。而“消费领域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一个向度，因此是决定人的意识的，人的意识则又是决定人对劳动和业余时间的态度和立场的一个因素”^①。马尔库塞据此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统治地位。当然革命的意识只有在革命的形势下才会显示出来；但是和以前相区别的是，今天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一

^①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法兰克福1973年德文版，第13页。

般地位与革命意识的发展是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一体化，这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植根于基础，植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中的：宗主国的工人阶级从超级利润中，从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中，从军火和政府的巨额补贴中分得好处。工人阶级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他们的锁链，这一点可能是普普通通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①。因此，马尔库塞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两个阶级的结构和作用，以致于他们似乎已不再是历史改造的承担者。一种超越一切，希望维护和改进现存结构的利益团结了在当代社会中最进步领域内的敌对者们。”^② 发达的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而是技术所产生的强大的生产率和破坏率^③，富有和贫穷，在不合理性统治之下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之间的矛盾。

然而，在马尔库塞看来，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满足，不是真实需求的满足；而是对虚假的需求的满足，因为虚假的需要是一些特殊的社会利益为了对个人进行制约而从上面强加于他的需要。发达的工业社会正是通过制造和满足这种虚假需要来左右人们的意识，支配人们的生活，使人们与现有秩序一体化。另一方面，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变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主要表现在机械化、自动化使劳动数量和强度大大减轻，使企业中蓝领和白领工作的比例发生变化，从而就使与现存劳动制度对立的意识日趋消失。这种与现存制度一体化

① 同上书，第12—13页。

②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5页。

③ 工业技术的普遍使用，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控等后果，故称技术的破坏率。

的倾向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日益增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由于这种一体化，就与现存制度获得了一致，丧失了对这个社会的鉴别和批判的能力。这样，一体化就导致了单向度。这种单向度的人也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发达的工业社会可以阻止任何一种质变（革命）；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可以摧毁这个制度的力量。但是，只要现存的还存在，就不会改变人的意识和行为，“甚至一场大危机也不会带来变化”。

马尔库塞将这种单向度的生产和分配的体系放在了他具体分析的中心。他研究现代的生产力，目的并不在于研究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在于借助对这种体系的描述，转向对意识形态过程的分析。在马尔库塞看来，欲望结构论在这里成为中心话题。他认为，从人们贪得无厌的欲望和贫乏的周围世界之间的矛盾中必然得出放弃欲望的结论。其结果就是人的（非生殖）器官变成了枯燥乏味的劳动工具；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对欲望的放弃带来了现代的劳动生产率、文化和科学技术，而后者的发展恰恰又是同欲望结构的抑制程度成正比例的。最终，人们的思想在这种抑制下变形并被同化于现存制度之中。这一切也导致革命者丧失革命性，导致革命夭折，导致压迫延续，导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溶合趋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进行革命并实现人的解放，其首要条件就是必须首先实现欲望结构的革命。

其次，马尔库塞还将个人的欲望结构解释为罪恶的渊藪。在马尔库塞看来，“反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欲望结构不平衡而引起的，而“侵略”则是欲望结构变形的结果。他不是把权力的形成归结于社会过程、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是归结于变态的欲望结构。他假定权力、组织本身是与人敌对的力量，从而

推论说：由于工人运动不能放弃这两者，所以工人运动也就是与人敌对的力量。在他看来，欲望结构已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要实现社会主义也必须首先改造人的欲望结构，恢复人的本质。这样一来，欲望结构的革命化就成为进行革命和实现人的解放的首要条件，意识革命和思想解放就成为革命和解放的首要目标。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欲望结构论源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他依据弗洛伊德关于欲望需求的自由满足并不同一个文明社会相一致的观点，试图进而研究个人自由和文明进步的关系。但是，马尔库塞同时又明确声明，人们“应该为了解放而斗争。但是我们并不敢肯定，在现实的彼岸等待我们的就一定是自由或者总体性”^①。这种源于弗洛伊德的欲望结构论反映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状况，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情绪向理论高度的升华。^②

马尔库塞还认为，欲望结构作为一种变量也可能被现代工业社会所利用。这主要表现在性的解放表面看是实现了，例如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性可以在广告、戏剧、电影、文学作品中自由表现，性商店、夜总会、酒吧间也可以合法存在，但是人们得到的并不是性欲的正常享受。以前的社会限制性的行为，而发达的工业社会却通过非升华扩展性的行为的界限，使性浸透了社会生活的表面，使人通过欲望需求——那怕是从外面强加的、扭曲的需求的满足而沉迷酒色，安于现状，不问政治，自觉或不自觉地去维护现存制度。反而言之，社会通过满足人的欲望需求加强了对人的控制。

① 马尔库塞《关于解放的尝试》，法兰克福1969年版，第85页。

② 参见马尔库塞《欲望结构和社会》，法兰克福1967年版。

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是唯一能超越一切的东西。但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艺术也已经失去了它的传统功能：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熟知精美的艺术，他不是通过拨动他的收音机、电视机的旋钮，就是从走进他所熟悉的咖啡馆就可以得到艺术享受的，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由于这种艺术的普遍传播，人们就变成了改造自己的思想内容的文化机器中的零件。这样，文化虽然得到普及，但是却变成了单向度的文化。这不但表现在艺术作品中，而且也表现在普通语言中。一切标志着文明的东西，一方面成为解放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成为新的统治和压抑的工具。

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单向度社会”的批判是他对单向度思想批判的基础。他所提出的论点，即认为消费方式的变化，劳动力结构和福利结构的变化，使劳动者乐于安享舒适的生活，变得驯服和柔顺，使他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基本分析、阶级斗争的学说也就显得过时了的结论。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率得到很大的提高，劳动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却也改变着劳动者的意识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地位，使劳动者同现存制度协调、一体化；因而，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又成为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新的统治和压抑的工具。当他谈到第三世界的发展时，由于相信第三世界也必须发展技术，就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这样，在他看来，既然无产阶级已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那么就不可能再是革命的主体；既然在社会物质生活领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由于一体化倾向而导致了单向度，就使人感到受压抑和受统治的不快；唯一可以超越一切的就是文化，只有通过把单向度的文化恢复到多向度的文化，才有可能唤醒人们

的觉悟。按照他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惟有寄希望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改良——文化革命，人类世界的前途才是光明的。这就是马尔库塞的理想和归宿。

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性”和“一体化”概念

马尔库塞在研究现代工业社会时曾指出其两面性特征，即既是“富裕社会”又是“病态社会”。所谓“病态社会”，其具体体现则首先是社会的“单向度性”。所谓“单向度性”，即指一种起操纵和同化作用的、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趋于稳定和使大多数人失去批判意识的“超然力”。它的根源则是工具理性的泛滥。马尔库塞继承了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指出现代科技与人的异化相同步，它加强了技术的统治地位，从而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技术成为理解一切的关键，一切经济现象或政治斗争都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技术成为压倒一切的反力量，具有优越于人的根本特征。这样，在发达工业社会的自动化和机械化过程中，人们心中超越现实的力量被削弱了，理性的批判被驱逐出精神的家园，人丧失了最可贵的本质即批判性和否定性，从而丧失了主体性，依附现实，顺从现状，与社会取得认同，从而形成了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以及单向度的思想。在几乎机械般的反应中，人们内心映象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已麻木不仁，制度的效率使人对世界的认识、感受和评价显得僵化迟钝。“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即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体化。”

在这里，我们隐隐约约听到了黑格尔的主客体统一论以及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的回声，看到了马克思早期从异化劳动角度对资本主义予以激烈批判的折光。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历史的发展是主体与客体相协调一致的上升过程，因此，他的哲学暗含着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在发达工业社会，由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工人阶级地位有所提高，经理、技术人员比重增大、白领工人比例上升，工人的收入不再仅仅为了完成劳动的再生产，而且还可以拥有汽车、洋房。整个社会福利的加强，又使人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益处。对于这种状况，马尔库塞认为这不但值得庆贺，而且还潜存着危机，一种主体意识的危机。因为，个人对社会的认同，社会的需要与个人的需求达到一致，以及表面上的全民选举所造成的似乎是公平、自由、民主的假象，使发达工业社会“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自由的要求，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在这里，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对于抚慰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状态的缓和方式的需要，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这些自由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圈套之间的自由选择”。^{①②}

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工业社会作为“病态社会”的具体体现还在于它具有攻击性，而“单向度性”也在其中得到了实证。在这里，马尔库塞吸取了弗洛伊德的死本能概念，认为现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代工业社会存在着慢性自杀的倾向。在这种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和机械化，人成为工具，私人空间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和削弱，复杂的生产、紧张的节奏以及大量的分配充斥于人的灵魂，使人很难有属于自己的片刻的宁静。由于大众传播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宣传，广播、新闻、广告等侵入闲暇时间，破坏了人的心理结构，加上语言的滥用和生态的破坏，使得攻击性渗透于整个社会。

首先，攻击性表现为把人变成生产消费的附属品，科技越发达，生产出的产品越多，人对科技和物品的依赖就越严重，非人道化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日益加强，人与物的关系颠倒了，消费品成为社会的轴心。“技术进步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消个人在创造财富和效益时作出个人爱好和自主需求的决定自由同步进行。”^①

发达工业社会的攻击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战争、恐怖事件等对人的攻击，表现为追求高科技的军事技术，表现为“拥挤不堪、噪噪杂杂和无可奈何地凑合在一起”的人海社会的特征，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疏紧张，个人对社会的反应又表现为攻击和拒绝。他强调富裕社会的军事化是攻击性的突出表现。他引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拉塞尔的话说：“在购买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时，购买毁灭城市、摧毁运输道路的武器时，总有什么东西诱使人们慷慨解囊，而在要为人民建设象样的住宅或保健设施时，他们却算了又算。”^②

① 马尔库塞《现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法兰克福1968年版，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爱欲的受压抑是攻击性的第三个表现。由于工业技术的普遍滥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与人之间爱的情感被扼杀了，代之而起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排挤和残杀，性活动越来越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欲望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活轨道，社会对人的压抑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生活上；不仅在理性领域，而且还渗透到本能生活领域。

现代工业社会的“单向度性”和“攻击性”导致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与现存制度“一体化”，或者也可说，现代工业社会以其“富裕社会”的现实将人们与现存制度“一体化”，使人们从物质上的“一体化”走向精神上的“一体化”，从而使人们具有了“单向度性”，产生了“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思想。可以认为，“一体化”和“单向度性”是互为因果的。所谓“一体化”，即指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因其实际利益而与现代工业社会溶为一体，对现存制度不是批判而是维护，对现存的一切司空见惯，置若罔闻，严重的“非政治化”。于是，合理化支配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同一性原则压倒否定性原则，工业化的“中立性”成为现代统治的政治手段，现代工业社会成为“没有反对派”的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这种新型的极权主义主要不是体现为恐怖的政治合作，而是主要体现为非恐怖的技术合作。它不但能与政治民主和平共处，而且打着普遍利益的旗帜来操纵人的思想和行为，用民主的面目掩盖其极权主义的性质。具体的说，新极权主义不是表现为监狱、警察、军队和恐怖的实施，不是表现为人身的粗俗占有，而是

“表现为消除以体现破坏现状、改变现状为理想的文化”，^①表现为个人的全部活动和能力都服从生产的需要，使人们在这种文化中丧失了历史主体应有的品质，取得与国家、社会以及他人的认同，从而批判的能力丧失，从根本上退出政治领域，因而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消失，发达工业社会成为没有反对派的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新型极权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体化”。总结马尔库塞的分析批判，他的一体化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社会与国家一体化。由于科技革命和国家干预，政府职能渗透一切领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不再有效，形成国家社会化和国家社会化；（二）个人与社会一体化。每个人都是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一个环节，社会的需求转化成个人的愿望，社会用科学技术向人们展示了美好的生活，社会也似乎显得公平合理，个人从社会得到好处，这样个人与社会就达到一体化；（三）个人与他人一体化。由于细密的分工和流水线的工作程序，每个人都被社会分割成具体的原子，每人都是劳动中的一个符号，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他人，都不具备特别的意义，这就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彼此认同；（四）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体化。即人的思想顺从于社会行为，不再具有否定和超越的意义，思想本身成为单向度的，从而作为社会的原子的具体个人也成为没有矛盾的实体，社会的超越和发展失去了前进的微观基础。这样，发达工业社会就是“一张巨大的人的机器网，而这些机器生产维持着一个富裕社会。”^②

^① 参见阿拉斯戴尔·马克图列《海伯特·马尔库塞》一书。

^②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第21页。

“一体化”理论标志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否定，内在地包含着他的拒绝的策略以及他的改良的总体社会主义的构想。他的思想主题是冲突消失了，暗示了思想家自身的优越感，在逻辑上必然导致把人划分成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滑向了杰出人物统治论。在此，我们看到马尔库塞又一次陷入困境。他没有走出这个困境，而且在对政治力量被同化的论述中，又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进一步从一体化理论出发，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结构。在他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劳动阶级正在经历着一个决定性的变化。一是机械化不断降低着在劳动中所耗费的体力数量和强度；二是在职业的各种层次中，出现同化的趋势，蓝领工人白领化，形成“新工人阶级”；三是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这些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劳工阶级与社会相互依存，工人关心的是如何参加资本主义的管理；四是新的工艺的劳动世界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工人失去攻击的目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不再是主仆之间的关系，他们共同依存于他们所组织和管理的机器。^①因此，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个人劳动与社会大生产取得融合，在劳动方式上，个人从属于社会，技术进步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和协调的完整体系，创造了形式合理性的多种生活形式，能够调和对抗，击溃和驳倒为实现摆脱劳役和统治的历史希望而进行的抗议。马尔库塞还特别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消费创造了人的第二天性，它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是使人满足了那些如果得不到满

^① 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24—33页。

足就会导致抗议的物质需求,使人感到发达工业社会的好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刺激虚假需要,促进工人与现存制度的统一性。“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圣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盖地勒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性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士在多大程度下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①

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虽然物质生活免于匮乏但精神生活相当空虚,这是一体化的翻版。发达工业社会从其运动原则来说就是不合理的,人们似乎是为了商品而生活,他们把小汽车、高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厨房设备当作生活的灵魂,人们的喜怒哀乐都据电视等而定,人们的休息娱乐都据广告而挥霍。甚至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民主和宽容也是一种欺骗。之所以允许某些人表达其观点,正是因为这些人不能形成结果,而多数人则被制度及大众传播所束缚和控制。选举不是真正民主意义上的对杰出人物的选择,而是在有限的相互对立的人与人之间进行选择。“特权阶层达到政治独裁的目的,而其它社会阶层则感到无依无靠,直接感受到压迫。”^②因此,“富裕社会的不道德表现在政客和演说家的微笑和言辞中,表现为大众的恳求和无知,表现为它所豢养的知识分子的假道学。”^③于是,马尔库塞才得出他的公式,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进步=财富的增长=扩大了奴役。

① 同上书,第9页。

② 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中的攻击和顺应》,法兰克福1968年版,第155页。

③ 《走向解放》,巴黎1969年版,第22—23页。

马尔库塞指出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一体化所具有的极权主义性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否定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并进一步把原因归结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是完全错误的。他把“一体化”的基础建立在技术主义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表明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而对生产关系所作的轻微调整；他从认同、精神生活的匮乏、消费的异化及政治民主的虚伪等角度去论证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体化及其极权主义性质，表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矛盾深藏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中；他把技术当成新极权主义的关键，表明他漠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从而导致科技决定论，排除了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一方面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历史力量，另一方面又同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密切的联系。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使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的病态特征都归结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从而使批判丧失了它固有的锋芒。^①

三、马尔库塞对“单向度思想”的批判

从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单向度性”统治着社会、人及其思想；现代

^① 本节的内容我曾在指导我的研究生胡邦胜同学写作硕士学位论文时一起讨论过并共同署名发表了《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一文（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这里引用了该文的有关段落，特此说明并致谢，因为该文也包含有胡邦胜同学的辛勤劳动。

工业社会的极权主义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而且也体现在文化生活和思想意识中。于是，这样的“单向度的思想”变成了统治的工具，成为纯粹压抑的管理机器的一部分。马尔库塞从对“单向度的社会”的批判过渡到了对“单向度的思想”的批判，而且十分重视对理性概念的研究。他认为理性的本质即是自由和批判，并且进一步从其艺术化的理性出发，对工具理性提出批判。

在《理论与革命》中，他提出理性的五种规定性^①，归纳起来就是作为工具的理性和作为批判力量的理性。在《爱欲与文明》中，他提出拯救灵魂的课题，进一步把理性概念席勒化。到后来的《单向度的人》中又进一步提出艺术理性，从而完成了理性艺术化的过程。他指出，技术理性的科学至上论同资产阶级的社会计划和国家干预相辅相成，科学方法为征服自然提供了有效手段的同时，也提供了促进更有效地进行统治的一套工具。因此，工具理性培养和强化了操纵意识，“极权主义的技术理性领域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结果。”^② 据此，他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提出强烈的指责。

首先，他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在他看来，文化艺术是唯一能超越现实的东西，然而，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文化艺术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功能，现在每个人几乎都可以享受到精美的艺术。通过拨动一个旋钮，信步走进一家咖啡馆，或者在大街的橱窗里，都可以得到艺术享受。这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

① 参见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253--255页。

②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11页和第53页以及55页。

谐地、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①，这样，灵魂的音乐成为了售货术，重要的是作为商品的文化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价值。

艺术作为一种否定的力量，使人认识到理念和现实、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它要求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秩序的文字、图画和音乐。因此，马尔库塞指出，艺术不应去顺应现实和维护现状，而应该去反抗。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艺术远离社会，冒犯和指控社会的特征已经消失，人们不再幻想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沉醉于现状。艺术失去了颠覆现状和批判现状的传统功能，大众文化用幸福意识取代了不幸意识，大众流行艺术拒斥发自心灵本身的体验，文化不再用灵魂去抗议物化，在人的心灵中不再升起光辉的星，不再投掷希望的剑，它完全附着于经济拜物教和商品世界，吞噬了人的灵魂的最后的神圣领地。因此，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对人的压制性操纵，人们正象消费异化一样被动地接受流行音乐，从而剥夺了听众的自主精神和批判意识。

因此，发达工业社会的艺术具有肯定性特征，对富裕社会起着美化作用，美学成为统治的艺术，这表现在“美学形式用对普遍人性的欢呼来对孤立的资产阶级个人的贫困作出反应，用对美好灵魂的褒奖来对肉体的堕落作出反应，用对内在自由的价值的强调来对外部的奴役作出反应”。^② 由于文化中心成为购物中心，文化达到与现实的一致，“因而，荡妇、民族英雄、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11页和第53页以及55页。

②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第109—110页。

垮掉的一代、神经质的家庭妇女、歹徒、明星、超凡的实业界巨头，起着与其文化前身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他们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象同一种生活方式中的不同类型或畸形，他们是对已确立制度的肯定而不是否定。”^① 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了，但却付出了不再追求自由的代价。

发达工业社会的语言受到滥用和污染，导致了语言腐败现象。“价值”、“自由”诸如此类的字眼被竞选者和政治家在电视广播中说出来以后，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声音。马尔库塞讽刺说，发达工业社会的仪式化的语论被赋予矛盾的免疫力，出现诸如“和平即是战争”之类的语言，这类奥威尔式语言成了极权主义的帮凶。甚至那些缩略语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操纵意识。比如 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缩写）以其直接性和概念性的手段，使人们忘却这些概念的具体内容，阻挠人们进行概念的思考，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缩写了的“事实”。“语言本身被贬低成为广告、头条标题，报纸文章，缩写，首先是贬低成为其具体内容不能反映和批评涉及现实的思想文体。”^②

马尔库塞认为，不仅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的，而且现代工业社会是有其哲学前提的。因此，他对现代哲学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了其“单向度性”。他论证的根据是英、美流行的语言分析哲学。在他看来，这一哲学思潮是顺从的和非批判的。它使心灵活动和社会现实中的活动得到协调”，它具有“一种内在意识形态的特征”。他对这一哲学思潮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 111 页和第 53 页以及 55 页。

② 参见阿·马克图列《马尔库塞》第 207 页。这里要说明的是，本节第 2—6 段引自李忠尚、胡邦胜《马尔库塞的现代工业社会批判》一文，见上一节最后一个角注。

强烈不满，抨击哲学没有方法可以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最终只能描述它的论调是接受现状和非批判性的，从而使现代哲学丧失批判性。马尔库塞强调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哲学就不可能使人们对社会环境作出合理的批判。

在哲学的本来意义上，“马尔库塞对现代哲学的不满集中在三个焦点上，即：（1）现代哲学使用了形式逻辑；（2）现代哲学偏重语言，特别是偏重普通语言；（3）现代哲学中的科学哲学。”^①

首先，逻辑学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头面人物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薄弱环节。豪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写道：“演绎逻辑所推出的一般概念在支配现实中有其基础。”马尔库塞发展了这个思想，认为形式逻辑对于其内容具有中立性，形式逻辑按照命题和论证的形式等同和分类现实，在这种意义上就等于歪曲了现实。马尔库塞所依据的是两个观点：在某个历史时刻，思想是附属逻辑规律并为逻辑规律所组织的。他甚至认为，人们可以划一条线，把这种附属和组织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加以对照。可惜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形式逻辑所做的表达和阐明规则，是为了形成真实的论据，避免前后矛盾的错误。这就是说，形式逻辑是保证人们的思想表达的论证保持前后一致和避免矛盾所必须遵守的规则，而不是附属或组织的关系。在这里，他抹煞了符合于逻辑规律的思想与不符合逻辑规律的思想之间的区别。由于根本没有由逻辑规律规定的思想和不由逻辑规律规定的、因而产生

^① 阿拉斯戴尔·马克图列：《H. 马尔库塞》，1970年德文版，第97页。

错误的论证而后又经过规定获得正确的思想之对立，所以所谓思想附属于形式逻辑或为它所组织的说法，即形式逻辑规定思想的说法是荒谬的。

马尔库塞还论述古代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区别，重点阐述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的哲学论争。亚里士多德代表了形式逻辑的一方。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对于它的对象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它们都得服从一定的规律。“形式逻辑的思想本身，在精神的和物理的工具向广泛的控制和预测的发展中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在这种行为中，人必须从实际的不协调中制造理论的和谐，使思想摆脱矛盾，在复杂的社会和自然界的过程中揭示可断定的和可预计的一致性。”^①同时，马尔库塞还重复了霍布斯、洛克等人对亚里士多德的责难：“亚里士多德逻辑之毫无成果已经被注意到了。哲学思想经常随着这种逻辑而发展，甚至是在这种逻辑之外发展。”^②

在柏拉图那里，马尔库塞解释说：“宁肯说，矛盾的存在作为辩证思维和既有现实之间的适应；真正的判断力判断现实并不根据现实自己的概念，而是根据那些以消灭现实为目的的概念。现实在这个消灭的过程中达到它自己的真理。”^③（在柏拉图那里）“根据自己的本质和思想来判断，人和物作为某种不同于自己存在的东西而存在，所以，思维就与现存的东西相矛盾，并且使自己的真理同既存事实相对立。”^④被思维所观察的思想或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达姆施塔特和诺伊维特 1967 年德文版，第 146 页。

② 同上，第 145 页。

③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 147 页。

④ 同上，第 147—148 页。

真理是一种潜能 (Potentialität)。但是，本质上的潜能不是普通的潜能，而是来自完全另一个制度。“其实现必然导致对现存制度的消灭；因为同真理相一致的思维具有同真理相协调而存在的义务。”^① 这样，辩证思维就创造了一个具体的实践，勾画了另一个世界，即另一个不同于现存的向度。于是，马尔库塞得出结论：柏拉图的逻辑同时提出了推翻现实的指令，因而是一个革命的逻辑。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奴隶主哲学就成了革命的哲学。

马尔库塞通过追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关于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哲学冲突，指责现代哲学使用了形式逻辑，公然自诩为辩证逻辑论者，目的则是为了反对既存的东西。马尔库塞相信，形式逻辑是一种“给定的现实”的逻辑，而辩证逻辑则是讨论给定的现实中的矛盾的。因而他厚此薄彼。应该指出的是，马尔库塞在逻辑方面表现了他的盲目和无知，他的“辩证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更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次，马尔库塞批评现代哲学被普通语言所吸引。他指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赖尔放在一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批判维特根斯坦，说他过于强调普通语言的重要性，把哲学当作了改变语言的工具。他指责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只能描述语言的论调是接受现状和丧失批判性。他批评奥斯汀抽象地讨论句子的意义，而主张对句子的理解要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当奥斯汀坚持应注意普通语言中的差异的共同根源时，他责备奥斯汀的著作与古典哲学之间有根本的对立。在他对语言分析哲学的批判中，许多地方露出牵强附会的痕迹；在他对语言分析

^① 同上，第 148 页。

哲学的愤慨中，隐藏着对现代哲学强烈的不满。

再其次，马尔库塞也表达了对现代哲学中科学哲学的不满。他认为，现代科学在经验上和思想上与现代技术有密切的关系；现代科学本质上是同现存统治形式有联系的。“现代科学的原理是这样先验地构造出来的，它们可以用作推动自己的，具有严格规律的宇宙的思想工具，理论上的操作主义将符合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①这样，马尔库塞实际上就是认为，在科学哲学中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是一回事，用对实证主义的反驳同样可以用来反驳任何科学哲学。他得出结论说，这种科学哲学只不过是异化了的、反过来奴役人的、单向度的科学的哲学表现。

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对现代哲学和大众文化——“单向度思想”的批判，撇开了意识形态的具体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内容，而是把它等同于日常生活，把意识形态消融于大众文化的堕落、语言的滥用和当代哲学的某些倾向上，从而抹杀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内容。而且，如果当代工业文化具有肯定性和顺从性，而他的批判又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章节，那么，他必然又陷入一种二难困境。在对逻辑学的批判上，马尔库塞混淆了“什么是逻辑学”与“逻辑学能告诉我们什么”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在对维氏的批判上，马尔库塞夸大了哲学的职能，把改变社会秩序当成哲学的义务，把整个知识的探讨归结于哲学，模糊了不同类型的探讨方法与使用之间的重要差异^②。他批评现代哲学被普通语言所吸引，却引起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对语言哲学的兴趣。他批判科学哲学，却无法阻止科学哲学在现代哲学中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53页。

② 见《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一文。

的发展。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思想”的批判，是机智的、高明的和具有教授水平的，但却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而是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

四、马尔库塞关于社会发展的“选择的可能性”与批判之批判

面对“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马尔库塞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不满；那么出路何在？马尔库塞又想用什么来拯救人类呢？

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经济成果是：劳动者的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准的提高，雇员和雇主在物质享受方面差别的缩小；其社会后果是由此而来的劳动者的被一体化，无产阶级变得安于享乐而丧失了革命性，发达的工业社会变成了“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并可以海涵一切社会变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敌对阶级为了“维护和改进现存结构”而联合起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人们满足于虚假的需要（物质需求），而忽略了真正的需要（精神的和意识需求）的满足。人们虽然也感到被统治的压抑感，但是由于“单向度的思想”窒息着人们的灵感，使人们丧失了对现代社会进行合理批判的能力。在这里，马尔库塞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只有排除压抑，恢复人的本能，才可能解决其他社会问题。于是，唤醒人们心理上的压抑感，使人们重新获得进行合理批判的能力，进行文化革命，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由谁来承担这个历史任务呢？发达工业社会的大多数人已变得非常驯顺，他们的需求和希望已变成了服从；他们感觉不到自己需要什么，也就不能提出要求。于是，这就只能由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少数杰出人物

——发达工业社会的精华 (Elite) 来承担此重任，来唤醒多数人的觉悟，来为他们疾呼，来挽救处于被动地位的愚昧的多数人。少数杰出人物的革命主张最先影响和依靠其实现的，已经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新的社会力量：黑人、白人流浪者、其他阶层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等。斗争的方式也已改变，马尔库塞将其称作“大拒绝”：拒绝一切苦斗和帮凶，拒绝对暴君式统治者进行服从，直接参加抗议和拒绝运动。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自己的理论意义：“随着工业社会的日益增长着的一体化倾向，这些（指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就丧失了其批判的内容并倾向于变成为描述的、虚假的、图解式的术语。”^① 马克思主义作为“19 世纪的理论”而过时了。解决的办法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批判地更新，而是用马尔库塞自己的“崭新的”理论——社会批判理论来取而代之。

马尔库塞想借以救世的良方，他的纲领——文化革命，也不过是幻想在纯粹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革命。尽管如此，他在本书的末尾也仅仅是看到一种革命反抗的可能性，一种渺茫的希望。他对未来的展望是悲观的，总的基调是可以批判过去，却难以展示未来。他写道：“批判的社会理论并不拥有能够弥合当今和未来之间的鸿沟的概念，因为它未作任何许诺，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成就，它保持着自己的否定性。因此，它愿向那些没有希望地为大拒绝而献出了或者将献出自己生命的人开诚布公。”^②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 16 页。

② 同上，第 268 页。

现代工业社会理论是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顶峰和他的哲学社会学说形成的里程碑。他企图总结自己以往思想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加以融合，从而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新学说。因而，他的思想模式是一个混合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他的技术决定论揭示了他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的阶级同化论，抹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分析，实际上是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发达的工业社会已不再适用；他的杰出人物统治论，是唯心论的英雄创造历史的翻版，是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反动；他的文化（意识）革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是唯心主义的乌托邦。理论是对现实存在的反映和总结。纵观马尔库塞在本书中的思想，使人似乎看到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满、对自己的所处的地位不满而又势单力薄，自命清高而又想变革现实的矛盾心理。由于马尔库塞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脱离社会的真正创造者和现实的斗争而闭门造车，以纯思辨的形式苦苦地探索，所以他的理论就只能是“革命”的乌托邦。当然，他的理论在现象形态上还是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他的模特儿主要是美国社会）的许多新问题，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分析 and 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幻想进行改良，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观点都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七章 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观 ——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二）

如果说马尔库塞与弗洛姆之间关于心理分析作用的争论导致马尔库塞转向他后期理论的构建——以“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那么，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选择的可能性”就寓示了他的乌托邦的社会发展观，从而也成为他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则重点阐述他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批判观，即从分析马尔库塞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到对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之转变入手，研究技术意识形态这一新现象和若干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剖析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新概念；从分析“现代文明世界”的“彻底人道化”问题入手，来研究“文化革命”问题，从而剖析马尔库塞的文明观。

一、从传统意识形态批判到技术 意识形态批判

马尔库塞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以其“单向度理论”影响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学生运动，并被誉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正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开始十分注重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研究并阐发自己的社会发展观，

十分注意在此基础上对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以便建构“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现代工业社会理论。”

马尔库塞在1962年于华盛顿召开的第十五届世界社会学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曾从分析现代工业社会入手，来指出该社会的主要倾向。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通过浪费和摧毁变得更加富有、强大和美好，它减轻了一大部分人的生活负担，它巩固了人对自然的统治，一句话：它的非合理性作为理性而出现。”^① 同样，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宣传和影响大众并不需要消灭发表意见的自由而起作用，社会的政治、经济需求变成个人的需要和追求，而这些需求的满足正促进着经济的发展并符合民族的利益”^② 人们为自己需求的满足而一叶障目，沾沾自喜，现代工业社会从而有可能“阻止或延缓社会变革”^③，而且是阻止和延缓“动摇这一社会的结构性基础的社会变革”！这里说的社会变革是指质变，是指社会变革创造人类存在的其他的基本形式，是指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分工，创造控制生产过程的新形式，新的道德等等。至于在现代工业社会虽然还存在的冲突，有时甚至会是激烈的爆发，但是这已与前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区别。由此可见，“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最重要的成就”^④也许正在于，它成功地使对抗性利益群体取得一致，如多种政党奉行一种政治，承认民族目的以及雇主组织

① 马尔库塞《论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问题》，1964年诺伊维特和柏林版，第33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35页。

④ 同上。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7年达姆士塔特版，第14页。

和雇员组织的合作都是证明。^① 于是，“反对旧社会的基础性结构的政治反对派，在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在生产机器的巨大和高效率以及在上升着的生活水准的影响下崩溃了，并且变成为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之内的反对派^②，变成为制度内的反对派，现代工业社会也就成为“没有反对派的社会”。

现代工业社会以理性的面目而进行的非合理性的统治，它使对抗性利益群体取得一致、使反对派只在制度内活动并可阻止或延缓社会变革的功能，构成了它的主要倾向，也奠定了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对这些倾向的历史作用的解释，在于合理性与非合理性的分析，揭示这些倾向的历史作用，就成为我们批判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首要任务，从而也是马尔库塞建立“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的必要理论前提。

然而，我们的揭示与批判却还存在着障碍，这就是现代工业社会成功地遏制着内部的反对派，而整个社会正是一个“没有反对派的社会”。这一现象在马尔库塞看来，其本质正在于说明了“从社会的历史选择出发来分析至今的社会制度，是抽象的和空想的”^③，因为“在社会理论实现之前，历史选择是作为某些群体或个人的价值而出现或消失的”，“在社会理论中，价值不是事实，而是作为价值与事实相对立的”^④赋予社会理论以空想性质的论据正在于现存社会同化了反对派，而“反对派的消除只有通过历史的媒介才能完成”。“这一历史的媒介在工业社会的早期在使自由成为现实的资产阶级意识和政治行动中进

① 同上书。第 335 页。

② 同上书。第 335 页。

③ ④ 同上书，第 336 页。

行；而进一步的历史媒介，则在工业社会的成熟期，即在不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获得实现。”后期的发展大大改变了阶级的结构和功能，维护现存制度的等同利益，团结了以往的敌对者们。只要资产阶级还是统治阶级，它就日益显示出它对延缓变革的依赖。在技术和经济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基础上，在总体管理下日益增长着的舒适的基础上，工业文明最发达地区的大部分工人阶级被‘绝对政府’引导得顺从、听天由命并且甚至去肯定现存制度。这一变化不仅阻止了社会变革和反对派的存在，而且使批判停留在抽象的水平上，结果是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脱节。马尔库塞由此得出结论：关于社会和社会变革的理论（它包括了历史选择的客观估价）现在成了非现实的思辨，“如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如果我们考查一下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和发达共产主义的现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是不现实的，是纯粹希望思想的反映”马尔库塞在此明确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怀疑与否定，流露了他建构自己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愿望。

如果说马尔库塞在这里以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而进行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那么他的意识形态概念也正是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起步而阐发的。在马尔库塞看来，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关系（历史相关性），从这一点来说，它取决于社会的变革。他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意识——不管它能否实现，仅就它能够反映思想来说——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就意识形态意识无力摆脱这种状况并受社会现实制约来说，它是一种：“虚假意识”。而且，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意识以理想主义的形式领先于受当今现实制约的历史可能性。然而，马克思的这一意识形

态概念在马尔库塞看来，已不能应用于现代工业社会，因为理论上意识形态与现实同步，实践上现代工业社会已将意识形态付诸于自己的政治机构、个人财产、原子能发电厂、超级市场、商店和心理治疗室等现实之中而征服了自己的意识形态^①。

马尔库塞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内容本想赋予生产率之目的在于建立真正的人的存在，即生活不再仅仅是手段，人也不再被他的劳动工具所确定。与这一对自由的追求相反，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一再迫使人们为了活命而去赚钱，还一再将生活作为手段来对待。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率一方面是循着自己的轨道前进的，另一方面又是自我摧毁的。生产和压迫的同步增长就构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②。

“那么，什么是这一解放与奴役、生产与摧毁的力量们的共同分母呢？”^③ 这就是作为社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自动化的大工业。马尔库塞认为，他这一论断的提出，不仅具有震聋发聩的理论启蒙作用，而且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作出了新的解释，是对技术具有中立性这一观点的反驳。在他看来，“技术是中立的”这一观点“在今天已经变得成问题了”^④，“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机器不是作为纯粹被孤立于社会和政治前提之外的工具整体而起作用，而是作为先验的确定——为了它的使用和普及——产品以及个人的和社会的活动之机器而起作用。这就是说，它是作为确定社会必要的需求、职

① 见同上书第 333 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 340 页。

③ ④ 同上书第 340 页。

业、能力和行为以及规定社会控制与社会前提的形式之机器而起作用。这一技术机器虽然体现了控制者与机器操纵者之间的一定区别，但却是就它变成为当今的生产基础、也就是社会得以维持和增长的基础来说的，技术机器正是非常急迫地在国家和国际的水平上提出了它的要求。社会最重要的行为自由的领域变小了。因为现实的选择现在实际上是灾难性的了：它不仅意味着现存社会机构之内的变化、目的和方法，而且要求自身的消亡。进步的这一新的方向实际上威胁着整个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发展事实上已达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历史地来看，这是质变的因素，而且工业社会发动了它所有的辅助力量来反对这一可能性。”^①于是，科学技术的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作为中性的工具而被人们所操纵与使用，而是反过来控制和操纵个人的和社会的活动。现代工业社会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技术机器在这一变革中起了关键性的、至为重要的作用，现代工业社会事实上成为作为征服自然这一历史工程的最后阶段的“技术社会”^②。

值得指出的是，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社会”中这一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技术工程”虽然是由资本主义实行的，但是它的普及却并未局限于资本主义，而是包括了发展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一世界性的技术现象说明机器的作用在发生变化，机器在社会生产的中心不仅仅是作为技术总体的一部分，而且也作为政治与文化总体的一部分而起作用。^③

① 同上书。第 340—341 页。

② 同上书。第 341 页。

③ 同上书。第 341 页。

而整个“技术机器的生产率和增长率使它本身具有了合理性，即不仅稳定社会统治制度，而且也将技术进步限制在统治的范围之内。”^① 这一变化反映在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即是说明工业社会基础的生产关系日益获得一个技术的形式，而技术形式又日益获得一个政治内容”^②。所有这些变化都说明，技术机器作为整体意识形态化了！现代工业社会具有自己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技术意识形态！技术和科学接过了为统治的合法化辩护的功能。

应该看到，马尔库塞在这里谈到的技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技术与科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它们本身的含义，更确切些说，是指技术与科学对理解现代工业社会所拥有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意义。^③ 在他看来，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意识形态同样也具有“虚假意识”的含义，因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从方法上制造着保护它自身的虚假意识，并且——这里有新意——也从方法上否定能理解和克服这一社会的真正意识”^④。社会变革不仅在于“真正意识”的获得，而且意味着“社会行动，并且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动”^⑤。这一社会行动虽然可能是从盲目革命开始，但是只要某一社会阶级或者某一社会阶级的代表能理解和有意识地把握“历史选择”，那么这一社会行动就会变得清晰可见。^⑥ 从更高的哲学层次上来说，“现时存在着的

① 同上书，第 341 页。

② 同上书，第 341 页。

③ 同上书，第 343 页。

④ 同上书，第 342 页。

⑤ 同上书，第 342 页。

⑥ 同上书，第 342 页。

意识”正是“评论和理解能更好存在的前提”^①。相反，“一个社会可以通过成功地压制这一意识并且使它与现时存在的合理性取得一致而遏制社会变革”^②。因此，批判“虚假意识”，批判技术意识形态，努力获得真正意识，就成为采取“社会行动”，进而实现“社会变革”的基本前提。然而，遗憾的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人们还被技术意识形态所左右，还不能跳出这一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单向度性^③。为此，马尔库塞呼吁人们认真思考，逐步认识这一单向度现象，并且指出：“如果人们看电视或者几天不断收听无线电广播，如果人们不关闭电台广告节目和不断转动调谐旋钮，人们就会得到最有说服力的证明”^④。

二、关于意识形态的几个传统 概念的演变

马尔库塞指出，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许多传统概念和思想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人们一向崇拜乃至迷信的政治权力，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也不得不通过技术权力而发挥作用，不得不通过机器过程和生产机器的技术体系的控制而获得实现。^⑤根据马尔库塞的思想，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追求的，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可能性之内的目的即是“技术合理性”^⑥的目的，这就是生产机器根据满足基本需

① 同上书，第 342 页。

② 同上。

③ 见《单向度的人》一书。

④ 同上书，第 343 页。

⑤ 同上书，第 345～346 页。

⑥ 同上书，第 345 页。

求的要求而进行组织、设置和集中控制，而且这种控制不仅不会阻碍个人的自治，相反会促进个人的自治。^①事实上，这一运转的机器按照自己经济和政治的要求强行规定劳动时间和业余时间，强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接受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根据现代工业社会组织自己的技术基础的方式来分析，现代工业社会倾向于“总体主义”^②，即政治的社会协调和经济技术的协调融为一体，利益群体在这一协调中操纵需求，而这一协调也阻碍着反对派的形成。进一步说，“总体主义”不仅意味着某种国家形式或者某一政党的统治，而且也意味着某种拥有多党制，多种报刊、多种反对力量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一“总体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现代工业社会国家的巩固和维持，都在于是否能够成功地发动、组织和利用科学技术生产力。现代工业社会的这一基本事实说明，机器已经成为有效的政治工具，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治统治必须通过对机器及科技的控制与“统治”来实现。

其次，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心因素的法律和自由概念，在现代工业社会退居到了背景地位，“它们失去了它们传统的存在理由和概念内涵”^③。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历来以自由和法制国家而引以为自豪。的确，作为统治阶级意志表达的法律，为反对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维护资本主义秩序无疑起过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与法律密切相连的自由，虽然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闻名于世，甚至于以“自由女神”的形

① 同上书，第345页。

② 同上书，第345页。

③ 同上书，第344页。

象矗立人间，但其实也不过是作为资产阶级意志表达的法律许可范围之内的自由。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由于生产和分配通过个人自由的自由竞争来调节，而这一自由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工作或者挨饿的自由，意味着不安全或者害怕，所以占统治地位的，实际上是“舒适的、顺利的、理性的、民主的非自由”^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自由的消失正是文明的最大成就。^②于是，批判思想试图以更合理，更具生产性的文化取代衰落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由于现代工业社会日益能更好地满足个人及其组织的需求，思想的独立性、自治和政治反对派的权力被剥夺了它们基础性的、批判的作用。事实上，这个社会要求人们接受它的原则和机构，向反对派指出在制度内选择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存在的整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也正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③，是自由向“非自由”的潜移默化式的演变。马尔库塞由此指出了批判现代工业社会自由概念的重要性并寄希望于实现真正人的存在，寄希望于脱离强制人的需求和可能性的劳动世界，自治自己的生活。

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工业文明向我们清楚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它已经达到了一个不能再从传统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等概念的意义上解释‘自由社会’的阶段”^④。这传统的三大自由概念“要求新的、能适应社会新的可能性的实现形式”^⑤。这正意味着对传统的三大自由概念的批判和赋予其

① 同上书。第 344 页。

② 同上书。第 345 页。

③ 同上书。第 344 页。

④ 同上书。第 346 页。

⑤ 同上书。第 346 页。

新的内涵，从而形成它们新的实现形式。那么，什么是自由的新的实现形式呢？马尔库塞认为，这即是对现时还占统治地位的自由实现形式的否定，即是在此否定中对新的实现形式的阐发，概括起来就是：经济自由应是个人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制约，应是摆脱每天的生存竞争——被迫去赚钱；政治自由应是意味着个人从他对之毫无影响的政治中解放出来；精神自由则意味着当今仍受大众交往和大众影响（媒介）吸引的个体思维的再建^①。马尔库塞在此清楚地表露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批判态度。他在此一反“新马克思主义”思辨的传统，对资本主义一向自诩的自由进行了无情揭露，指出即使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精神自由也不过是自觉自愿受压抑的自由，不过是“舒适的、顺利的、理性的、民主的非自由”^②。归根结底，“自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③。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无疑对人们认识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及其巨大的同化作用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也正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学生运动发出“要真正自由”的思想源泉之一。再次，传统的人与需求概念在现代工业社会变成为需求的二重性（真假需求论）与人的异化。马尔库塞认为，人的生物需求之外的需求历来是被外力塑造和影响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空前的满足，人们的生活比以前过得好得多，人们分享着现代工业社会的舒适。但是，物质需求、尤其是人的生物之外需求的满足并不是人的真实需求的

① 同上书。第346页。

② 同上书。第344页。

③ 同上书，第349页。

满足，而是虚假需求的满足，因为这些需求是一些特殊的社会利益从外面强加于个人的。^①应该看到，现代工业社会正是通过制造和满足这种虚假需求来左右人们的意识，支配人们的生活，使人们与现有秩序一体化。遗憾的是，人们对于外力强加的这种需求却是以个人自发需要的形式公开表现的，这就不仅不会给人们带来自治，而且相反证明了现代工业社会控制的有效性^②。为了达到人的解放，首先要认识这种控制，这种奴役性，要求个人回答什么是真假需求。但是，能自发接受外力强加需求的人们早已丧失了鉴别的能力，已无法弄清需求的真假，已无法弄清哪些需求应该发展和满足。人们得到的是令人失望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自由：浮动价格基础上的自由竞争，自行书报检查的新闻自由，在市场供给的商标和样式之间的自由选择。^③对人们的需求产生影响并制造这种自由的新闻媒介具有了双重性，即既是信息交流的工具，又是操纵与影响的工具。^④人的解放意识的形成因此而受到新闻媒介的影响，并受到人的必要的需求的满足这一人类第一需要的阻碍。于是，个人变成了“被管理着的个人”^⑤，变成了异化的人，而“异化也变得完全客体化了”，“异化了的主体被他异化的存在吞没了”^⑥。这样，就只存在一种向度，并且这一向度以各种形式无处不在”^⑦。人的

① 同上书，第 347 页。《单向度的人》真假需求论。

② 同上书，第 349 页。

③ 同上书，第 349 页。

④ 同上书，第 349 页。

⑤ 同上书，第 348 页。

⑥ 同上书，第 351 页。

⑦ 同上书，第 351 页。

“单向度”化，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就表现为单向度的统治，表现为单向度的社会和文化。

最后，人们欢迎、追求的科技进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统治的工具。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以它的进步赢得了人们的欢呼，“技术的合理性”被作为“理性”而受到人们的承认，现代工业社会因为科技进步带来的高福利而受到人们、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青睐与羡慕。但是，“技术并不是中立的概念”^①，“而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技术进步在必然性的领域中以有限的合理性被用作统治与剥削的工具”^②。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似乎使人和社会的本质僵化”^③，从而起着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作用。从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性阶段到自由阶段的过渡，出发点即是要求物质生产的自动化，一切生活必需的要求的满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到最低程度。只有从这一点起，技术进步才有可能逃脱必然性的领域，即听任技术参与各种力量在为满足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而进行的自由竞争。^④同时，处于现代工业社会必然性阶段的技术进步现象也告诉我们，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工业文明——就意识形态本身现时存在于生产过程来说^⑤——比它的先驱者更加意识形态化。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也是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它虽然获

① 同上书。第 355 页。

② 同上书。第 355 页。

③ 同上书。第 356 页。

④ 同上书。第 355 页。

⑤ 见阿道尔诺、《文化批判和社会》，法兰克福 1955 年，第 24 页及以下页。

得了“技术合理性”^①的表象，但是现在起统治作用的“技术合理性”本身却具有明显的政治本质。“技术合理性”通过产品影响和操纵社会与个人，要求一个无力反对虚假的虚假意识^②。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比以往都更好的，并且足以反对质变的生活方式^③。技术进步也由此做出了它对“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④之形成的“贡献”。人们一向追求的科技进步走向了反面，成为了现代工业社会“统治与剥削的工具”^⑤。

三、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实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马尔库塞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批判并概括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倾向，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阐发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概念——技术意识形态论。他描述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些传统概念的演变，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从传统意识形态到技术意识形态的发展，都说明了马尔库塞的理论目的，即揭露现代工业社会基本倾向的历史作用^⑥，阐释技术合理性这一最重要的理性因素的政治特征^⑦，从其历史选择性出发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⑧。于是，批判现代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的意识形态”^⑨，就成为马尔

-
- ① 同上书。第 358 页。
 - ② 同上书。第 352 页。
 - ③ 同上书。第 352 页。
 - ④ 同上书。第 352 页。
 - ⑤ 同上书。第 355 页。
 - ⑥ 同上书。第 334 页。
 - ⑦ 同上书。第 358 页。
 - ⑧ 同上书。第 335 页。
 - ⑨ 见《单向度的人》序言。

库塞的主要理论任务之一。

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面对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发达工业社会，这使他有可能接触和探讨了前人未能研究的问题。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分析，尤其是技术意识形态论的提出，都使人耳目一新，给我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但是，他的技术意识形态论却否认意识形态对现实的反作用，以现代工业社会通过自己的特有方式征服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断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过时^①，以反对技术中立的命题片面夸大技术的作用，进而将技术进步解释为现代工业社会“统治和剥削的工具”（但忘记了技术进步毕竟主要是造福于人类的，关键看谁去利用，而不是对技术进步持悲观主义态度），等等，从而使他的技术意识形态论最终难以自圆其说，变成了技术人化的神话，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时应该给予注意的。

四、马尔库塞的文明观及其评析

从上述对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他否认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现代工业社会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征服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断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过时。其次，他否认技术中立的观点，从而片面夸大技术的作用，得出了技术决定论的结论。第三，他想用技术意识形态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等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之形式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

^① 同上书。第 7 页。

化而变化。但是，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不管是促进的还是阻碍的作用，这也称作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在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之中，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最具阶级性，对社会经济基础起着比其他意识形态形式更为直接的作用。把意识形态放在文明这一大范畴中来研究，就会发现它属于精神财富和精神文明的部分，与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而言之。研究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就应该研究他的文明观。只有这样，方能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批判马尔库塞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

“文明”一词在中文和德、英、法、俄等国文字中都可与“文化”同解，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故也可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现代文明是人类社会几百万年来发展的产物，标志着人类社会的现时进步状态。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文明就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观。

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即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的极有典型性的一种。从理论根底上来考察，它源于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而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则是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开始的。

如前所述，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和“富裕社会”，其典型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工业技术的高度发达和滥用，工业技术被用来生产奢侈品、玩乐和用于军事目的，绝大部分被付诸于“非生产性”用途和第三产业；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大的提高，中、下层群众也分享到了一部分好处；三、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资产阶级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四、科学研究的

成果成了对个人和社会集团的行为进行控制和操纵的工具，而且往往是通过商业的或政治的方式^①。它认为，“富裕社会”同时也是“病态社会”：“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它不能运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②人的可能状态和实际状态之间的鸿沟越宽，“补充压抑”的需要就越大，即“不是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文明，而是有利于使现在的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合法兴趣的本能压抑越来越大”^③。人们由于害怕失去工作或社会地位，不得不屈从社会的需要，不得不承受“补充施加的心理压力”。在“富裕社会”里，“人的自由的现有存在形式和可达到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的矛盾，使人的心理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屈服于“制度的控制和操纵”。^④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这种两面性——“富裕社会”和“病态社会”特征说明，当机械化、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出现和运用标志着社会已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就显得过时了。于是，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在它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的批判中提出了自己的文明观。它从（它历来极其重视的）意识出发，认为新的社会文明的建设必须借重于精神文明的力量。它宣称，现代“福利社会”中，人们已毋庸大

① 参见马尔库塞《现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载《工业社会中的攻击和顺应》，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力发展物质文明，而应当看到人们的伦理道德、思想品质，秉性天赋等都被扭曲了，走向堕落了，着手拯救堕落的灵魂才是亟待完成的使命。这就是说，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性泯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主要应是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

1. 关于实现“现代文明世界”的 “彻底人道化”问题

如何完成上述这一神圣的使命？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关键应使“现代文明”“彻底人道化”，“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在他们看来，当代文明虽然给人类提供了过富裕和自由生活的机会，但是人类迄今却没有找到利用这一机会的途径。“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仍然存在着奴役和贫困。”^①虽然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但是人类不仅未能支配这些力量，却相反为这些力量所支配。这些力量使人类能够征服宇宙空间，却未被用来从地球上消灭贫困、饥饿、疾病和儿童死亡。国家、政党、军队、教会、康采恩等社会组织与人类相离异，“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后果”^②。于是，现代文明世界成了异化的世界！

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文明赋予人们的物质资料和生活享受也是一种非正常的、异化的存在，它强加给了人们一种“人为的要求”——对新商品的占有欲。这就驱使劳动者继续为资本家卖命。这就是说，生活水平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

① 马尔库塞《现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第11页。

② 同上。

是“这并未使社会关系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更人道化。在劳动能力迅速增强的条件下，高工资并没有排除剥削，相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和剥削在同步增长……从经济观点来看，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官僚，对工人来说都是剥削者”^①。因此，“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文明世界的经济、生产领域存在着“地地道道的非人道化”现象。然而可悲的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在“自由地”为自己选择商品时，实际上他的选择受着强大的宣传机器所鼓吹的选择标准的影响和制约，即当他认为自己是自由地进行选择时，却恰恰正在遭受奴役。

怎样来消除上述这种异化并使世界人道化呢？“新马克思主义”指出，首先应反对庸俗的人道主义，即不应把人道主义狭隘地理解为制定救济纲领、消除物质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以及制止残忍的政治压迫方式等等。其次，实现“彻底的人道化”就是“创造条件使人类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成为一个自由的、创造性的、社会的、合理的本质”^②，“使每个人变成历史的主体，并积极投身到创造历史中去”^③。一句话，就是要使“自由的”、“超阶级的”“人”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人，由这样的人来创造“真正人的”历史。

还值得深究的是，上述异化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现代文明世界“社会的原子化、政治的霸权化、群众性交往手段的垄断化和人性的被吞噬”^④等异化现象的根子在哪里呢？“新马克

① 同上书，第146页。

② 同上书，第153页。

③ 同上书，第156页。

④ 同上书，第154页。

思主义”指出：“所有异化的根子都在于那些垄断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社会集团的存在。这种垄断或者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攫取支配物化劳动的权力的基础上……或者基于两者之上。”^①这种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垄断的非人道性是由于两者都具有剥削性：前者利用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法攫取生产者的无偿劳动，后者剥夺其他人决定社会问题的权利，从而以粗暴的或欺骗的手段，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独霸政治。前者的剥削作用体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工资增长的速度要快，体现在剩余价值的社会分配不合理，即某些社会集团的收入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劳动产值。“这种剥削不仅存在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物质贫困的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存在于还有强大的官僚机构的后资本主义社会。”^②后者的剥削作用与前者密不可分，它以独霸政治权力而攫取剩余价值。因此，“新马克思主义”指出，“现代世界并没有多少民主”，因为“事实上，人类的绝大部分是根本不可能参与重要的决策过程的。”那些能通过选举进入政治机构的人，要么由于他们拥有巨额资产或者由于他们有强大的政党机器的支持；要么由于选举人只能进行有限的选择和受到合法的操纵。在这两种情况下，“特权阶层达到了政治独裁的目的，而其他社会阶层则感到无依无靠，直接感受到压迫”。^③

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来考察这种由某些社会集团在经济界和政坛称王称霸、蔑视和压迫其他阶层的现象，则会发现，它

① 《工业社会中的攻击和顺应》，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154页。

② 同上书，第155页。

③ 同上。

们在“新马克思主义”眼中既是现代文明非人道化现象的根子，也是实现“彻底人道化”的最大障碍。因此，要使每个人变成历史的主体并积极投身于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去，要实现“彻底的人道化”，就必须创造条件：一、“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废除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二、也是关键的一个步骤，即是“废除职业政治”，“废除社会特权阶层——官僚”。在他们看来，只有消除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集中于某个社会集团手中的现象，才算具备了人类彻底解放的基本前提。^①

显而易见，“新马克思主义”及马尔库塞提出的要使现代文明“彻底人道化”的观点，既是一种政治主张，也是它的文明观的重要支柱。这一观点至今发出“神圣而崇高的”诱人光彩，并因其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而吸引了不少中、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但是，这一观点却是从抽象的人出发，从“个人”、“自我”出发来分析现代文明的，因而就难免忽视了人的社会性，违背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的正确论断，也没有看到作为社会政治机构的“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从而未能按照个人的社会特质来考察个人^③。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及马尔库塞从“个人”、“自我”出发来分析现代文明，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的基本原理，而且未能全面理解个人的历史发展，从而最终否认了“个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作为阶级的人

^① 同上书，和 155—15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8 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70 页。

和社会的人才能存在的基本观点。如果从哲学上来考察，就会发现，“新马克思主义”及马尔库塞一切从“个人”、“自我”的存在出发并以此再去解释其他存在的意义的做法，显然带有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烙印。“新马克思主义”及马尔库塞上述的要使现代文明“彻底人道化”的观点，在阶级利益上则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愿望，这也正是“人道主义”、“人道化”口号在教育普及、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西方世界得到共鸣的原因所在。

2. 关于“文化革命”问题

如上所述，“新马克思主义”及马尔库塞的“彻底人道化”思想（这里要说明的是，马尔库塞是主张和赞成“彻底人道化”观点的，但他又有其特有的看法，即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具有一种自杀的倾向”，人们可以“在个人的欲望结构中找到彻底毁灭这场世界性游戏的牢固基础”；要克服这种倾向，要实现“彻底人道化”，就首先必须实现人的欲望结构的革命化，实现意识革命。）是确立其文明观（尤其是其思想建设）的支柱，而“彻底的人道化”的实现却要依赖于它的另一“伟大思想和发明”——“文化革命”。一提起“文化革命”，我们中国人就会想起那腥风血雨的十年浩劫，想起那文化被革命的年代。曾几何时，西方的左派学生也曾胸佩毛泽东像章、手捧“红宝书”，但他们与我们对“文化革命”的理解究竟不一样。一般来说，“西方人一看到文化革命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思想意识的发展先于社会基础的发展。但文化革命不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当艺术、文学、音乐、交流形式和风俗习惯发生了变化，而这

些变化表示了新的经验和对价值的激进的再评价时，社会结构及其政治表现形式看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至少还落在文化的变化之后。‘文化革命’同时表示，激进左派今天已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向物质需求彼岸的整个领域发展，并把目标指向传统文化的彻底改造。”^① 这就是说，文化革命即是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这是在整个精神需要领域发动并进行的革命，也即是意识革命。

毫无疑问，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具有激进主义的特征，它公开表白要对现存的东西进行控诉并追求解放。它的“文化革命论”从“日常语言”着手，认为由于现存的语言和思想对人的精神和肉体行施着一种“压制性的统治”，所以现存的语言和思想世界就已成了“控制、灌输和欺骗的工具”^②。于是，人们就应力图找到新的思想交流形式——“新语言”，而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仅仅存在于两个领域：民族传统和艺术。马尔库塞据此指出：“民族传统的语言仍是被压迫者的语言，它和抗议与拒绝有着一种天然的姻亲关系”^③，如果人正是有意识地发展了自己的语言，从而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和增强了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那么一些激进主义者系统使用“粗话”、“脏话”，即“把小资产阶级忌讳说的那些话变成口头禅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政治、社会、文化等不满的发泄，是“语言造反”^④！

另外，在马尔库塞看来，“新语言”在它存在的“艺术

①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1972年法兰克福版，第95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③ 同上。

④ 马尔库塞《有关解放的尝试》，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58页。

领域”里，“继续存在着一个固有的、独立的、抗议和否定‘现存物’的传统世界”^①。艺术的这种否定性作用“在今天反对现存社会的政治斗争中是一种武器”，它可直接影响到某些特权集团^②。这种否定性同时也是艺术的“传统的破坏性”，它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使艺术全面地非升华”，致力于“破坏美的形式”^③。所谓“美的形式”即指“质的总体”，因为“质”使一部作品具有自己的结构和秩序（即具有某种风格），“质”帮助“艺术作品改造现实中占统治地位的秩序”^④。资产阶级的艺术和文化几乎在四个世纪（16—20世纪）长的时间里统治着世界，它的美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资产阶级艺术的发展，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打破旧的“美的形式”，从资产阶级的艺术和文化中解脱出来。然而，自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尤其是20世纪（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资产阶级的艺术和文化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黑人音乐、艺术等的兴起说明资产阶级艺术已在退却，说明艺术领域进行造反是可能的。这也说明，在艺术领域创造“新语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可以看出，马尔库塞提出的“文化革命”应从“民族传统”和“艺术领域”着手并进行“语言造反”的主张，把革命引向了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语言哲学的方向，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另一方面，它认为资产阶级文化的阶级特征表现为文化的分离，即分裂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在它

①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1972年法兰克福版，第96页。

② 同上。

③ 马尔库塞《有关解放的尝试》，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66页。

④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1972年法兰克福版，第98页。

看来，“物质文化”属于使用价值的体系，它贯彻能力原则的统治，把劳动作为职业和工作；而“精神文化”则指自然和精神的科学以及艺术和宗教。更确切些说，“物质文化是典型资产阶级的：主要指金钱、买卖和商业……；指作为家长的父亲和企业的主宰经济和‘精神’的作用；指权威教育……。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全部‘生活风格’包含有一种工具主义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和自由的倾向是相背的，是贬低性行为的，是贬低妇女的，并以上帝和买卖的名义进行着压制。”而“精神文化则相反，它蔑视和否定这种物质文化；它是理想主义的：它把满足和放弃，自由和屈从，美和外形无情地相互联结在了一起，并使压制性的力量得到了升华。”^①对文化分离的这种现象，马尔库塞主张要加以消除，即在“造反派”的“文化战略”上应注明：“扬弃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分离”^②。这里所说的“扬弃”，一个隐含的意思是认为在精神文化中还在存在着一种“高级的文化”，它批判资产阶级的物质文化并和它保持距离，它“离开了商品世界，离开了残酷的资产阶级工业和资产阶级行为，离开了对人的关系的歪曲，离开了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工具主义化的理性”^③。这一“美的世界和现实”的矛盾体现在对“自主的人”的发现，体现在寄希望于作为主体的“自主的人”“在摧毁自我的斗争中，走向自我和发展为独立的自我”^④。也就是说，“高级的文化”有它作为优秀文化的一面，但却由于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才能得到（劳动阶级在这一文化世界里只能处

① 同上书，第100页。

② 同上书，第102页。

③ 同上书，第103页。

④ 同上书，第105页。

于低下的地位)，而最终逃不脱阶级文化的框架。

在实践上，马尔库塞的文化革命采取了对所有资产阶级艺术加以拒绝的方式。它认为，由于资产阶级艺术具有肯定性的特征，所以资产阶级艺术起着维护和美化现存秩序的作用。^①这主要体现在“美学形式用对普遍人性的欢呼来孤立的资产阶级个人作出反应，用对美好灵魂的褒奖来对肉体的堕落作出反应，用对内在自由的价值的坚持来对外部的奴役作出反应。”^②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认为，这一肯定性有其固有的辩证法，“没有一种艺术作品是不用‘否定的力量’来突破它那肯定立场的。”^③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艺术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两面性，而致力于恢复其否定性（在质上是反资产阶级的），则是文化革命的任务之一^④。这样，美学形式本身就成为“激进地重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尤其应看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反革命的压迫性组织之势力增长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趋势之情况下，反对派就被‘挤’进了文化和亚文化领域，并在这两个领域寻找可以打破现有格局并能够拯救未来的药方”^⑤。也就是说，出于形势所迫，反对派只好在文化领域内活动，只好以拒绝资产阶级文化艺术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这也许正是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文化革命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吧！

① 参见马尔库塞1937年写的文章《文化的肯定性质》，1965年法兰克福版。

②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1973年法兰克福版，第109--110页。

③ 同上书，第110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关于“文化革命”的前途和由谁来作其“历史承担者”的问题，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回答是悲观主义的。它认为，在现代“最先进的工业国里，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因为“资产阶级以后的文化”之发展受到阻碍。“看来文化革命在社会中没有土壤和基础，它主要是抽象的否定，而不是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历史继承。由于没有一个革命阶级来承担文化革命的任务，所以它就到两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方面去寻求支持：它一方面企图用文字、图画和声音来表达‘群众’的感情和需要，另一方面它发展反抗形式并使传统的形式变得支离破碎”^①。可见，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论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而进行抽象的文化批判的理论。

那么，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还要进行文化革命呢？其原因就在于它相信文化艺术是唯一能超越一切的力量，文化艺术可以通过增强自己的否定性力量来获得“破坏性潜力”并“将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对抗性的组成部分”^②。其次，还由于它相信，在政治上“艺术确实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武器，其途径是它促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的变化”^③。可见，对文化艺术的相信（即在文化艺术问题上的乐观主义）已构成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论的重要精神支柱。如果将此同它的文化革命论的悲观主义基调加以比较，就足以看出其文化革命论的乌托邦本质。

追根溯源，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

① 同上书，第111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同上书，第145页。

论”思想曾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名词的借用上，而且也体现在其某些思想（如造反、反权威等）被运用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学生运动和工潮中，从而引起世人的瞩目。关于这场被称作“辩证法的幻想”和“新文明的建设”的西方“文化革命”运动，马尔库塞在1971年不仅看到了它曾受中国“文化革命”的影响，而且对之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他指出，“文化革命始终是一种激进的力量”^①，但“文化革命中，不恰当的激进主义”却是一种“反唯理智论”：“造反所针对的理性，不仅是指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性，而且也是针对理性自身。反对在大学里为统治集团培养干部的斗争的确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但是却变成了反对大学的斗争，同样，摧毁美学形式的斗争也变成了摧毁艺术的斗争。”^②“这两个精神文明领域和现实的脱离以及异化”必然导致“象牙塔式的行为”——抽象的思维活动，但也会导致统治集团所不能容忍的“非单向度”行为——“独立的思想 and 感情”^③。反对唯理智论的文化革命的结果是：“强调理论和教育使精神的和肉体的能量离开了决定现存社会斗争成败的政治领域。这种强调使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变为文化条件，使人们去研究抽象的知识问题，而绝望的反抗运动正在全世界被人们用公开的暴力加以摧毁。在‘文化革命’……招牌的背后隐藏着的无非是个人的思想意识的造反，这也正是对受苦受难的群众的嘲弄。”对马尔库塞对西方“文化革命”的上述评价，我们虽然不能完全

① 同上书，第122页。

②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1973年法兰克福版，第149页。

③ 同上。

赞同，但它却从一个方面证实并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马尔库塞的“文化革命”论这一庞杂思想体系的实质，实际上是个人的思想意识借助文化条件在文化领域的造反，其“革命”的含义无非是“让我们坐在一起讨论我们的事业”^①的空洞口号而已。

尽管如此，马尔库塞并不愿放弃他们“新文明建设”的革命手段——“文化革命”。他认为，“出路主要靠年轻一代，……他们……应该去学习，应该学会在失败后重新组织起来并用新的感情去发展新的合理性，以经得住漫长教育过程的考验，而这正是向伟大的政治行动过渡的前提条件”^②。在他看来，准备阶段和过渡时期的必要条件就是“概括在‘教育的社会化’这一名称下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措施”^③。“只有通过对于新生一代的不断的工作才能有效地促进”这种过渡^④。在“文化革命”的具体措施方面，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认为，领导权问题是关键；在科学技术发达、生活富裕而人性泯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只能、而且必须首先“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领导权，最终积小胜为大胜、变量变为质变，从而达到新文明的建立。

根据这种观点，知识分子就处在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只有知识分子不是或可不作统治阶级的仆从，因为资本主义文明需要知

① 同上书，第153页。

② 同上书，第154页。

③ 卡尔·科尔施《什么是社会化？》，载《科尔施全集》第2卷，1980年法兰克福版，第124页。

④ 同上书，第126页。

识分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因为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脱离资产阶级文化；所以，文化始终是现代和未来文明世界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只有由知识分子唤醒大多数人的觉悟，世界才是有希望的，也才能创立一个理想的未来文明世界，“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和浪费的社会”！人们只有在这个社会中才找到了“一种人能够真正确定自己的存在的生存方式”，只有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彻底人道化”的社会。

3. 马尔库塞的文明观评析

综上所述，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既注重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在内的文化建设，也注重包括社会政治思想、理想信念、道德风尚等在内的思想建设，从而“文化革命”和“彻底的人道化”就成为其文明观之车的两只轮子。如果说“文化革命”旨在建设“新文化”和进而实现社会革命，那么“彻底的人道化”则代表了其理想信念、政治主张和目的；这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构成了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明观。他们之所以重精神文明建设并寄社会革命的希望于此，则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裕但人性泯灭的可悲现象，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没落。他们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思想建设主张虽对现代社会福利等问题起了某种推动作用，但最终还是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并完全脱离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可以认为，它作为思想意识的东西不可能超越现阶段的社会存在，因而只能属于资产阶级文明观的范畴。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在现阶段，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还不很发达，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张与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在资本主义现阶段亦侧重精神文明建设的说法有着本质的区别。问题是：我们有无可能和必要在物质文明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往往表现为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在某一阶段的不平衡或不一致。精神文明一般来说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其中文化建设（教育、科学、文化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思想建设（政治思想、伦理关系、社会意识等）的发展则往往同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平衡。这一原理告诉我们，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平虽较高、但其社会意识、社会风气和意识形态等却在没落；反之，我国现在虽然经济发展还较落后，物质文明还不太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和精神文明非得滞留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可以大大加以发展的。特别在思想建设方面，我们具有历史实践所证明的中国式优势。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我们已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尤其是建立起了相应的、能够日益摆脱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旧思想旧习惯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就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当然，建设精神文明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借此促进物质文明的建设，因

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和思想觉悟的提高都可大大推动作为物质文明建设的主要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我们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张与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在现阶段应优先建设精神文明的主张确有本质的不同。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虽在重视人的伦理道德教育以及提高人的文化素养等方面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它作为整体是难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接受的。总之，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第八章 第三条道路？

马尔库塞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包括他在其中阐发的乌托邦社会发展观和意识形态批判观，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激烈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存在主义、人本学和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繁荣的背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所遭受的压抑和奴役，以它特有的方式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同时（当然，如果单纯从时间顺序上来算，应在此之前），马尔库塞也激烈地批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从人本主义和自称科学、非意识形态的角度以及出于功利的目的——受命于美国战略情报研究所，对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列宁主义理论进行了剖析，声称要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于是，马尔库塞在对两大对抗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中萌发了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马尔库塞是想建立第三种政治制度还是寄希望于意识革命？对他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从总体上应该怎么看？这都是我们最后应该回答的问题。

一、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思想

马尔库塞在他早期的马克思论中曾重点分析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并通过此进一步阐发了他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

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不仅要扬弃异化，而且要扬弃劳动本身。实际上，马尔库塞在这一点上是牵强附会的。他在40年代以援引马克思的形式提出了扬弃劳动这个命题；在50年代，他通过提出用“道德的活动”来取代非道德的劳动的观点，对扬弃劳动这个命题作了发挥；在60年代，他把劳动具体化为劳动的科学化。他幻想未来社会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一种‘美学’的现实——社会成为艺术工厂”。于是，共产主义对他说来，就不过是一种旨在废除劳动、扬弃异化的、个人主义的共产主义，就仅仅是“一种新形式的个人主义”的实现。马尔库塞在这里所表现的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和否定，实际上也是他的第三条道路思想的萌芽。

如果说马尔库塞在这里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还是纯粹理论上进行的话，那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研究则还具有现实的意义。我们知道，马尔库塞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情报研究所从事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工作。战后，他曾一度返回欧洲，但不久（1951年）又回到了他长期从事意识形态研究的美国，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苏联发展问题。也正是从这时起，他着手整理他长期积累的关于苏联的研究资料与笔记，重点分析、研究50年代的苏联社会，开始写作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的第一部分。两年多以后，他转而到哈佛大学苏联研究中心供职，并于1954—1955年期间完成了该书的第二部分。全书于1957年在美国出版，1960年再版并在以后的时间里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形成的历史背景正值中国革命胜利不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冷战”和美国侵略朝

鲜的严峻时期。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进行了30多年，但斯大林的逝世使苏联面临着新的考验。马尔库塞研究的正是当时的苏联社会。他批评苏联共产党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胜利的说法是错误的，认为苏联的实践并不能说明苏联的社会现实越来越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恰恰相反，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变得不得不日益去适应苏联现实的要求。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不再是表述真理的学说，而成了人人必须接受的英国国教式的信条。马尔库塞由此出发以各种方式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解释成实用主义的和咒文式的。他指出，应看到这种实践方式是不符合理性的，原因在于：“如果从体系以外看是不合理的，那么在体系之内看则是合理的。”^①于是，马尔库塞将自己的任务规定为：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

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苏联现存制度谈起。从对革命、革命主体以及党的作用的讨论引出官僚主义和官僚阶层的论题，从对官僚主义的批判走向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试图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作出一个较系统的分析。

首先，马尔库塞批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对控制经济无能为力；而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国家学说，苏维埃国家已在指导和控制经济的发展，这就导致苏联经济发展缓慢。马尔库塞同时还指出，集权制使管理苏维埃国家的人已经形成一个官僚阶层，他们能获得特殊

^① 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1964年诺伊维特版，第86页。

利益^①；他们通过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巩固着自己的权力基础。马尔库塞从而呼吁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阶层，争取人的平等和自由。显然，马尔库塞在这里抹煞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对经济基础所具有的反作用力，把国家根据经济规律指导和调节经济发展诬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以及将管理国家的干部统统斥为官僚阶层，既表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的缺乏，也暴露了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敌意。尽管他也提出了如反官僚主义的命题，但其观点在其本质上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马尔库塞谴责“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规律看作是支配一切变化的因果联系。这里问题的焦点是，马尔库塞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本身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这一观点。他否认规律性的用意在于“揭露”苏联领导人利用经济计划干预经济发展的做法是盲目而又无益的，把过渡解释为受规律支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马尔库塞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非绝对的必然，也不取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②

与此密切联系的是马尔库塞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他认为，俄国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业国，因而十月革命在本质上是非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虽使工人阶

① 马尔库塞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第112—113页上说：“官僚阶层就其本身来说，不管它如何庞大，如果没有它的地位所赖以产生的自己的经济基础，如果不同具有此种权力基础的其他社会集团联合起来，就不能产生出自己延续的力量。”

② 参见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第87—99页。

级掌了权，但由于共产党的“少数人统治”而产生了一批官僚主义者。这就使苏维埃政权本身也具有了非社会主义的性质。于是，苏联社会就似乎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向现代社会的另一极——资本主义靠拢，苏联社会主义由于其生产力的不够发达和所谓的政治上的“极权”与官僚主义等弊病而向资本主义求教，从而人们也应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在社会主义内部进行革命。这一论调既反映了马尔库塞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态度，也表达了他想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真正的第三选择”^①的政治思想。所以，当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问世即受到两面夹击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苏联批判它是资产阶级的攻击和宣传，美国则指责它过高地估价了苏联。马尔库塞本人则为此感到自豪，他在1960年为该书第二版写的前言中说道：“我从这些矛盾中看到了，我试图把自己从冷战的宣传中解脱出来和提供一种相对客观的、在对历史发展进行有理有据的解释的基础上得出的分析，取得了一定成就。”^②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马尔库塞并不认为苏联现实中的一切坏事都是马克思主义引起的，但也不承认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发展。他的观点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洁的、以马克思为正统的理论，可以充当判断苏联现实的标准，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却对此无力。在他看来，由于苏联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受党的意识形态的支配，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它已经不是真正的马克思

① 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第167页。

② 同上，第11页。

主义了。马尔库塞自称他作为旁观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被歪曲和篡改的事实。他由此得出结论，宣称“苏联马克思主义”迫使马克思主义服从苏联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就变成了违背马克思原意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这种以维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貌似公允的姿态，意在掩盖马尔库塞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旨在将马克思主义割裂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或叫作理想的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并以前者来反对后者。我们看到，青年黑格尔派所钟爱的用理想的理论批判现实的理论的故伎又重演了！

还须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基调上讲是人本主义的。他虽然在书中简短地引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性的理论，但实际上是以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作基点的。他认为，历史决定论即是人的决定论。人是“历史的动力，选择和决定都取决于人”^①。另一方面，马尔库塞的历史理论明显带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烙印。在他看来，从一个历史阶段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过渡，只有在海德格尔对现存的东西进行“否止”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只有彻底破旧，方能立新；只有彻底废除现存的东西，才能完成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过渡。马尔库塞在历史观上对历史规律性和历史连续性的否认，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得出了下述结论：“不存在可以作为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观’的马克思理论，问题也不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不存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因为支配社会主义前史的对抗性

^① 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第26页。

辩证规律是不可用于自由人类的历史的；同样，理论也不能事先确定自由的规律。……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历史性排除了非历史的一般化。”^① 马尔库塞在这里以否认规律性为基点，以马克思没有为社会主义制度留下完整的理论为借口，将社会主义本身说成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被马尔库塞相对化、乃至虚无化了。

最后，关于马尔库塞对列宁主义形成的理论概括，也是一个应加以分析的问题。在马尔库塞看来，列宁主义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革命的主体从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转移，自发的革命者群体过渡为职业革命者的少数人；强调农民同盟军的作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性；承认发达工业国的“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态度；在一个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实行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② 马尔库塞的这一概括反映出他并未搞清马列主义关于政党、领袖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他对列宁主义的片面化、简单化解释和怀有一定的偏见。他一方面说列宁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改良态度，一方面又在书中批评列宁忽视了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所发生的巨大的同化作用；他一方面批判列宁的政党理论是党对阶级的统治，是阶级向党的转移，一方面又指责列宁在徒劳地试图拯救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些颇为费解又矛盾的论调证明他旨在贬低、乃至否定列宁主义。同时还应看到，他对列宁主义形成的概括实际上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发达的

① 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第141页。

② 参见上书，第47—49页。

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为理论依据和前提的。这就否认了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条件。同样，这也就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作用和与农民联盟的思想。显而易见，马尔库塞对自发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阶级和政党之间的关系最终作了机械主义的理解。

从上述马尔库塞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已可大略看出，在批判的背后隐藏着马尔库塞自己的政治思想——走第三条道路。在该书的许多地方，马尔库塞都试图为他后来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阐明的“单向度”理论作最初的阐发，为第三条道路思想作初步的探讨。在他看来，马列主义的缺陷恰恰在于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弊病，只想到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进行斗争，而“从来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还有真正的第三选择”^①。马尔库塞指出，走第三条道路就既要批判资本主义，也要克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弊病。首先，马尔库塞宣称要克服苏联政党统治阶级的现象。他指出，列宁关于政党的学说实际上为苏联实行党对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无产阶级由行动的主体变为行动的客体。与列宁的理论相比较，在他眼中希法亭和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的理论比列宁高明，比列宁更接近马克思。他认为，希法亭和考茨基看到了帝国主义在其广大统治范围内继续控制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看到了它保障着统治者继续获得利润，在剥削国际市场 and 别国人民的前提下保证着“他的”工人以较高的工资水平。这就使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被抑制住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

① 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第167页。

得以稳定。由此就产生了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对生产的控制。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就被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程度地同化了，就被分裂为内部的和外部的无产阶级，就似乎分化为统治范围内部和外部、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就失去了从制度内部进行改造的能力；特别是由于党是统治者，阶级就只能行动的客体，只能是服从者了。

另外，马尔库塞特别强调了走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在于新形势下阶级结构和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变化。50年代在他的笔下是多事之秋：革命在一个经济和社会不发达的国家的胜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早已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形势的变化，使社会重心发生了从工人阶级向农民、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东方农业国的转移；落后国家出于民族利益想实现本国工业化的迫切要求，使人们愿意与再次稳定下来的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由此就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引出了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主力，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使“两大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耽误了作为革命阶级而行动的时机。这……也许是苏维埃国家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①即使是发达工业国家的工人运动（包括共产党），也同样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性。这样一来，苏联的内外政策在马尔库塞眼中，已不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苏联追求的是实现工业化，苏联已在向资本主义靠近。加速或实现工业化、发展生产力这一共同目标，使“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了一致的发展目标。由此就应在社会主义

^① 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第37页。

内部发动革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内部都发生革命，都克服自我弊病，走第三条道路就成为现实的可能。

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尤其是他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性丧失、无产阶级政党官僚主义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巨大一体化（即同化）作用等论调，是他后来的“单向度”理论的萌芽，是他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企图在两者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的初步阐发。《苏联马克思主义》是马尔库塞在为美国战略情报研究所而写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经过50年代初数年的研究才成书的。它以自己抽象的哲学形式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成为“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的代表作。它虽对西方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它从事研究的是资产阶级阶级立场、非马克思主义方法，他所得出的是否定社会主义的结论。

马尔库塞第三条道路思想的萌发体现在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上则是他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所谓“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则指使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合法化并使这个社会中的“人”单向度化。在这一社会中，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成果，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使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得以满足；但是，它也协调着对这种社会制度不满和进行反抗的人们，带来了一个起一体化作用的政治统治制度。在马尔库塞看来，由于物质需求的满足，人们也就似乎丧失了反抗的理由，从而成为统治制度的驯服工具。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的这种单向度性，使人们最可贵的第二个向度——否定的和批判的思想趋于消失。因而，马尔库塞写道：“阻止社会演变，也

许是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最杰出的成就。”^①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认为，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大家都希望维护和改进现存结构，希望保持现代文明。即使社会主义国家里，革命也让位于改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揭露单向度的社会和文化，唤醒人们对自己单向度性的警惕，启迪人们否定的、批判的思想（即社会生活中的创造性），导出走“第三条道路”的必然性。他公然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异想天开地要用自己的文化革命来拯救人类。然而，由谁来拯救呢？他的“革命”的主力军又是谁呢？这就要由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少数杰出人物来加速革命反抗的可能性，由他们来唤起“革命”力量——“流浪汉，没有专门知识的人，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的被剥削者，被迫害者，失业者和可能失业者这些人所构成的下层社会”，去采取激进行动。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闪烁着“圣洁”之光的奇异幻想，曾经在60年代末使许多西方大学生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奉为行动指南。然而，曾几何时，随着大学生运动的夭折，马尔库塞罗曼蒂克式的空想也就烟消云散了。他的第三条道路思想亦如划破天空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美丽的弧光的瞬间闪烁。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思想的萌发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失望与不满。因此，马尔库塞发出了“乌托邦的终结”^②的哀叹。这一结论性的预言之寓意在于：如果说马尔库塞曾想借助马克思的理论进行社会批判并憧憬社会革命的话，那么这时则在失望中设想第三条道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7年达姆斯塔特版，第14页。

② 马尔库塞《心理分析和政治》，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67页。

路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乌托邦的终结，意即对那些曾为了吹嘘社会历史的可能性而用乌托邦概念为自己服务的思想和理论之否定，现在也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历史的终结’，即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类社会及其周围世界的新的可能性不再被视为旧的可能性的延续，不再从同一的历史一致性中来理解，而更确切些说，这些新的可能性是以同历史的一致性决裂为前提的，即指自由的社会和尚不自由的社会之间的那种质的差别——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这一差别实际上将迄今为止的历史变为了人类的史前史”^①。马尔库塞由此断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也许还没有或者不再表述它本应表述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确定的否定。这就是说，乌托邦的终结的概念导致了这样的必要性：至少应讨论社会主义的新定义”^②。马尔库塞正是在这样的。对现代社会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批判中，试图开辟出第三条道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他的第三条道路设想之内容，又会发现它是零碎的、只言片语的和忽隐忽现的；即使它是天才的思想火花，但也只是照亮了一个非常粗略的、十分模糊的轮廓。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借以实现的方式仍是他著名的“文化革命”，即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即在整个精神需求领域发动革命，即从“日常语言”着手进行“语言造反”，从文化艺术领域着手而追求这一“唯一能超越一切的力量”并促进“占统治地位的意识的变化”^③，从启蒙、教育和发动年轻一代着手并在不具有单向度性的知识分子的率领下去夺取文化和意识形

① 马尔库塞《心理分析和政治》，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③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第145页。

态领域的领导权——然后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去不断扩大夺取领导权，从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和浪费的社会”，确立“一种人能够真正确定自己的存在的生存方式”。归根结底，马尔库塞依稀可辨的粗略的第三条道路设想及其“文化革命”思想，也不过是希望进行意识革命；因而，它们具有浪漫的乌托邦特点。马尔库塞号召人们“应该为了解放而斗争。但是我们并不敢肯定，在现实的彼岸等待我们的就一定是自由或者总体性”^①。他的这一坦诚的表示旨在说明，革命反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希望是渺茫的；人们可以批判过去乃至现在，但是却难以展示和决定未来。因此，他在《单向度的人》一书的结尾写道：“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够弥合当今和未来之间的鸿沟的概念，因为它未作任何承诺，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成就，它保持着自己的否定性。因此，它愿向那些没有希望地为大拒绝献出了或者将献出自己生命的人开诚布公。”^②

二、马尔库塞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 之总体批判

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思想源出自他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为了完整地理解和研究马尔库塞的思想，这里需要对之进行总体性的批判。

马尔库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尤其从 50 年代以来开始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他的“现代

① 马尔库塞《论解放的尝试》，1969 年法兰克福版，第 85 页。

②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 268 页。

工业社会理论”。所谓发达的工业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成果，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不过，这只是“虚假的需求”的满足，因为它是“一些特殊的社会权力为了制约个人而从上面强加于个人的需要”^①，而人的“真实需求”，即对理性的追求、对人性的维持和升华以及人对物质需要的自由，却在泯灭，人堕入了“单向度性”之中，丧失了自己最可贵的、最富于创造力的否定和批判能力，无产阶级也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并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所谓“单向度”即指一种起操纵和同化作用的、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趋于稳定和使大多数人失去批判意识的“超然力”。要改变这种可悲的“单向度”的社会，就需要由少数无单向度性的知识分子去揭露单向度的社会和文化，启迪人们否定的、批判的思想，最终共同建立一个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高度自治、高度文明的自由人社会。

“现代工业社会理论”是否真正回答了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如何评价“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笔者认为，它还是激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从存在主义、人本学和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繁荣的背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所遭受的压抑和奴役，以它特有的方式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它在现象形态上部分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反映更引起了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共鸣。这首先表现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工人不再是奴隶，不再受棍棒和饥饿的威胁，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德文版，第15页。

在工人队伍中不但发生了蓝领和白领工作比例的急剧变化，而且不少工人由于购买股票而成为企业的股东。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已可通过工会参与企业的管理，参与对解雇工人、裁减员额、作息时间变更等问题的决策。“劳动阶级正在经历着一个决定性的变化。”⁽¹⁾

其次，工人在分配领域的境况也有所改善。工人的收入不再仅仅为了完成劳动力（包括繁衍第二代）的再生产，而且可拥有小汽车、小洋房和全套家用电器，每年还可休假一次。即使失业，也可领到救济金，过上一般生活水准稍下的生活。

第三，社会福利得到大大加强。譬如被西方人称作“半个生活”的住宅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政府每年建一批“社会住宅”（即低租金住房），让银行拨出专项低息贷款支持建私房。对于收入过少的居民，则可根据法律由国家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再如交通问题，联邦德国不惜巨款为城乡人家通公路，等等。

但是，“现代工业社会”理论并未从本质上正确而深入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也就不可能指出从毁灭人的“单向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把人拯救出来的正确道路。它提出的问题本身告诉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须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还须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加以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价。

1. 首先迫切需要人们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资料的丰富是否会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现代工业社会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物质

(1)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德文版，第15页。

需求的满足，意味着无产阶级因此而丧失了革命性，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显然，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基于对19世纪初“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否定，是将工人劳动的繁重艰辛和生活的贫困误作“无产者”概念的本质。这是一种从现象出发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无产者所以是无产者，是根据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决定的。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是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无产者”是同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还存在，就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抗的阶级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源泉，在于争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工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①。恩格斯晚年在对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不仅坚持了他和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而且再次明确论证了：“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②。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既不能填平阶级差别的壕沟，也不可能改变两大阶级的根本对立，因为归根结底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相对贫困化现象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在它几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比过去各代加起来还更多更大的生产力，其实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10页。

“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物质资料”^①。结论只能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②。世界无产阶级将用资产阶级锻造的武器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设社会主义。

2. 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已经成为研究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尖锐问题。“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一个支撑点就是所谓“技术决定论”。它认为，建立在科技革命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社会”，不仅使生产力大大发展，而且使对抗阶级消亡、经济危机不复存在，社会上的不平等趋于缓和。于是一种“共同的利益”“团结以往的敌对者们”致力于合理地开发自然财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建设物质福利社会。“技术决定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它片面夸大了科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作用，排除了生产关系这个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因素。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精深研究，使他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做出了全面而正确的论断。他们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一方面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③，另一方面又同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④。如果说奴隶制比原始公社更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资本主义较奴隶制、封建制则更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超过以往各个时代的高度发展的技术。^⑤可见，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的生产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256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72页。

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陈旧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①资本主义不是适合科学技术发展的良好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其主导方面，同时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科学技术本身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取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未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必将加深这种矛盾。

3. 如何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是需要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回答的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一体化”和“单向度”理论，在政治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趋同论”，即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日趋接近，并有可能集合两者的共同点而建立一个在社会本质上同一的“新社会”。在经济领域，“趋同论”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同点体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过程干预的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它宣称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都处于一种瓦解状态，意识形态将由“社会知识”取而代之。它宣扬思想文化领域的和平共处。在国家制度上，它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趋向同一，主张由国家管理人员充当中间人。显然，“趋同论”的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之间的质的差别，企图证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是不合乎规律的和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479页。

没有必要的。它最终旨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走“第三条道路”。

上述“趋同论”在经济领域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的确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已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在资本主义世界，铁路、邮政、煤矿等部门在许多国家已属国有。例如在联邦德国，约有25%的股票掌握在国家手里；在英国，资本投资总额中约有20%由国家提供；在法国，约30%的工人和职员在国有企业中工作。那么，这是否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呢？答案是否定的。国有化的性质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个阶级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他们的国有化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资本主义的国有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就分析了政府和金融寡头的混合成长，导致资产阶级国家日益增强对经济干预的现象。他们揭示这种干预所蕴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①。这不但击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要害，而且为我们在今天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现象指明了方向。

4.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根本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们特别强调国有化的作用，认为国有化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事实是，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内暂时地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

的性质，恩格斯说：“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① 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未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列宁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②。

① 同上，第3卷，第318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

第九章 哈贝马斯的技术意识形态论 ——对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发展

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和他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以及他所萌发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在他生前得到他的朋友和年轻的同事——哈贝马斯的崇敬和支持，在他死后则得到哈贝马斯的传播和发展。例如著名的长篇论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即是哈贝马斯献给马尔库塞七十诞辰的礼物。哈贝马斯坦率地承认，此文即旨在讨论和分析由马尔库塞所阐发的命题：“技术的解放力量，即物的工具化，演变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这就为我们研究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理论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杰出左翼代表，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和“现代大师”，也是继豪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之后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曾潜心研究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哲学家的思想，曾在阿道尔诺和豪克海默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德国唯心主义的思辨传统，他的哲学语言也是自成体系，深奥晦涩等等，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哈贝马斯思辨哲学”的印象，似乎他只是在一个玄妙的理性王国遨游的智者。其实，他的理论不仅有着惊人的深度和力度，而且具有面向社会、面向实践、面向未

来的向度。他一方面在社会分析领域引进了系统和交往行为理论，另一方面以语言哲学的陈述形式取代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传统。哈贝马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这一推陈出新，不仅反映了他在继承和发展社会批判理论，在沿着与先验哲学、思辨哲学相反的方向——社会哲学的道路前进，而且表明了他对哲学的基本态度，即作为人类最高思维形式的哲学应研究人类社会并影响社会的进步。

哈贝马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长起来的德国知识分子。他目睹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兴衰，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重建家园的“经济奇迹”，因此，他十分关心德国社会的发展，十分重视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他从哲学的角度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对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制理论及其辩护机器（包括“合法性危机”）进行了剖析，从而试图确定启蒙在当今的进程并构建现代工业社会的改革方案。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续性来看，哈贝马斯致力于用交往行为理论更新社会批判理论。如果将哈贝马斯的理论比喻为一栋大厦的话，那么其基础是一种扩展了的语言哲学，其骨架是一种继续发展着的社会观，其目的则是重新确定启蒙过程。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主导性的问题在于：在当今的条件下如何从理论上相应地确定启蒙的过程？如何使启蒙的过程得以卓有成效地延续？

哈贝马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其思想与理论引起了同代人的很大共鸣，具有与上代人不同的特征。他的理论创作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几乎没有第二种理论能比哈贝马斯的理论在今天……引

起人们如此的关注”^①。他没有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学生运动中的出名和他的理论成就所陶醉和止步，而是几乎年出一书，妙文不断，被称为高产的哲学家。当他于1989年6月正值60岁寿辰时，他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追随者为他出版了长达800页的纪念专集，年近90高龄的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著名马克思研究者费彻尔和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一代还健在的代表人物罗文塔尔等学者都为此专集写了文章。当时各家报刊、电台、电视台均登文庆贺，称他为“最有成就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当今最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世界著名的哲学家”等等。近些年来，他还被先后授予斯图加特市黑格尔奖（1973年）、塔姆施塔特市语言和诗歌研究院弗洛伊德奖（1976年）、法兰克福市“阿道尔诺奖”（1980年）、丹麦的索宁奖、德国国家DFG奖和美国、以色列等国的名誉博士以及被聘为美国、苏联、中国等国的客座教授。“作为哲学家，他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一名法国哲学教授如是说。哈贝马斯的技术意识形态论，即对现代工业社会之意识形态批判，是他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于60年代末与马尔库塞一起率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认识到了由此而生产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根据现代工业社会的新变化激烈地抨击了这一社会中的“人的工具化”现象，并进而提醒人们注意新的压迫与剥削的形式。因此，他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了研究哈贝马斯的这一批判观，就有

^① 荷奈特等主编的《至今的观察——在启蒙的过程之中》（为庆祝哈贝马斯60寿辰而出版的专集），苏康出版社，1989年法兰克福版，第1页。

必要首先对他的思想发展及其整个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一、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及其理论框架

毫无疑问，哈贝马斯的理论研究主题是启蒙，是在于阐发一个广泛的交往理性概念并用它作为正常标准来批判对进步的合理化和现代化过程的片面性解释和片面化作为。可以说，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理论在当今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对启蒙和启蒙的辩证法之主题“一往情深”。他指出：“理性的任务恰恰在于，将非理性的东西变为理性。这一表述在与现存的非理性的东西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失去了所有权威。”^①他将复古时髦派对理性的攻击视为过激行为，认为“在这些圈子里被作为‘理性’揭示的东西，仅仅是被伪作整体的目的合理性……有时人们眨一下眼睛，就好像被庄严地区分开的悟性和理性的差别完全是徒劳的。豪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谈到的‘工具理性’是一个有讽刺意义的表述，它告诉人们，马克斯·韦伯的目的合理性今天威胁着理性的地位……，这就犹如处于一个被错误地认为是社会的中心和首脑的官僚体制中一样。”^②哈贝马斯正鉴于此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预言交往理性远比科学和技术理性重要并将在社会运动中得到体现。总之，启蒙主题贯穿于哈贝马斯理论研究工作的始终，成为他理论创作的主旋律。

这一主题的确定与哈贝马斯本人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贝马斯 (Juergen Habermas) 于 1929 年 6 月 18 日生于德

^① ^② 见哈贝马斯《现代概念——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利克拉出版社，1990 年莱比锡版，第 257 页。

国杜塞尔多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是当地一家学院的院长，其父就是当地工商业局的局长。他于1949年高中毕业后，先后到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心理学和德国文学，1954年，哈贝马斯通过题为《绝对和历史——论谢林思想中的两面性》的博士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曾在几家杂志社工作。1956年，哈贝马斯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高级学术助理职位，与路德维希·冯·弗利德堡等人一起参加了“大学生的政治意识”课题的研究工作，并于1961年出版了课题研究成果《大学生和政治》一书。1959年至1961年，哈贝马斯享受德国研究中心的奖学金资助，倾全力写作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性的结构变化》，并在马堡大学通过答辩。在此期间他被海德堡大学任命为哲学教授，两年多之后又返回法兰克福大学并受聘为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在法兰克福，他经历和参与了惊心动魄的大学生运动，以他的雄辩和思想闪光而声名远扬，法兰克福学派也正是在当时作为大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而名声大振。但他与大学生们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也许部分地由于他的老师阿道尔诺不受大学生欢迎，哈贝马斯于1971年离开了法兰克福大学，受聘于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新组建的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1982年，哈贝马斯在1981年辞退了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职务之后，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接受了作为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的重新任命。这一从施达昂堡（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所在地）到法兰克福的回归过程，反映了哈贝马斯的政治态度和理论倾向，即不受保守的基督教社会联盟执政的巴代利亚州政府欢迎，理论上属“新马克思主义”激进派，政治态度上属抨击资本主义的左派，一贯反战，渴望自由、民主和社会进

步。前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原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曾不无讽刺意味地称他为高尔基笔下的“海燕。”

1. 《公共性的结构转变》

哈贝马斯对政治的关注和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介入也反映在他的著作中。他于1962年出版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公共性的结构转变》，即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运用历史的和经验的研究方式，考察了“资产阶级公共范围”的兴衰，探讨了它是如何被大众媒介，科技管理和社会的非政治化倾向所取代，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公共性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它成为利益竞争的战场，成为弱肉强食的范例。要改变这种公共性，要实现公共性的结构转变，即对公共讨论媒介的控制的合理化，就须有一个新的、变化了的基础，即要求相互监督下的社会政治权力行施的合理化，要求社会组织从内部建设和与国家的外部交往以及组织之间的关系中都依赖公共性。哈贝马斯在这里讨论的公共性，其要义在于探讨理解的可能性；他将理解的可能性和暴力的使用一样视为解决人类行为冲突的建设性机制。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哈贝马斯讨论这一问题处于探讨下述问题前提之下的，即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的结果与交往的人类生存条件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的结构转变》一书显然受到阿道尔诺和豪克海默（尤其是他们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的学术影响，亦意在共同建构辩证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然而，从哈贝马斯以后的思想发展来看，他在此书中还是更多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为他后期完成的理论打下了重要基础。

2. 《大学生与政治》和《抗议运动与高校改革》

哈贝马斯对政治的关注还表现在他于1961年出版的《大学生与政治》和1969年出版的《抗议运动与高校改革》以及此类论文中。他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大学生和大学以及社会的关系为着眼点，从社会学（包括部分哲学）的角度，对法兰克福大学生的政治意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大学生抗议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对高校改革及高校立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大学生和政治》是哈贝马斯和三位同事以及几位大学生合作的成果，他们先后于1957年和1959年调查了721名大学生，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综合研究，最终形成了这本包括三编的著作，即“论政治参与概念”、“对法兰克福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社会学考察”和附录（含问卷及调查方式的介绍）。作者之一的弗利德堡后来将此称为“对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行为进行经验研究的法兰克福模式”^①。这部著作既包括了对联邦德国政治关系的一种分析，而且也包括了对大学生的经验式询问和一种判断，即认为“就取决于大学生的政治积极性，即他们的力量作为国家公民的有效介入来说，反民主的倾向可能会更多地得到支持而不是遇到抵制”^②。当时整个新闻界在惊呼：“这些大部分反动的、从最好处说是随大流干的大学生将在不久占据我们社会的领导位置。”曾为民主学生鼓与呼的资产阶级新闻界显然站在国

^① 哈贝马斯等《大学生和政治》，卢赫特汉特出版社，1969年第3版第8页。

^② 见上书第360页。

家和政府的一边。大学生们却从这部著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哈贝马斯对政治参与概念的反思成为人们可以援用的大炮”！上述这一判断使参与者觉醒，使高校的反权威的政治化运动得以延续。正如著名诗人海涅所说，要理解革命，就得先理解“革命的博士”^①。这些后来都在60年代末的大学生运动中得到了体现。

《抗议运动和高校改革》(1969年)一书则是哈贝马斯有关的论文、报告和书信集，主要包括哈贝马斯曾对大学生抗议运动和高校改革产生过影响的政论文章，甚至还包括对高校立法的具体建议。这部在大学生运动高潮时期形成的著作回顾了大学生抗议运动的三个阶段，分析了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动机，讨论了抗议运动中热门的帝国主义理论、新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等问题，并对抗议运动的实际成果和“今后怎么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哈贝马斯认为，“这场抗议运动从高校开始发起，高校的改革就应是抗议运动的下一步和现实的目标”^②。他由此将抗议运动和高校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并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提出了改革高校组织，重视教研实际效果和提教育制度在社会上的地位等改革建议。这部著作无疑在当时的学生抗议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 《认识 and 兴趣》和《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

哈贝马斯在发表政治见解的同时，也为他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认识 and 兴

^① Doktor 德文中有博士和医生的双重含义。

趣》(1970年)和《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1968年)两部著作中。哈贝马斯在《认识 and 兴趣》中表达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激进的认识批判只有作为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他以此不仅涉及了以方法问题为主题的实证主义讨论,而且论及以实践为主题的讨论。他试图通过系统分析认识 and 兴趣的关系来“重建新实证主义的前史”^①,指出“谁追随……认识论的解体过程,谁就登上原已离开的反思阶梯。从追溯至出发点的展望角度来重新走这一条路;有助于重新获得人们已经遗忘的反思经验。否定反思就是实证主义”^②。哈贝马斯自称重点研究的是思想的运动和发展,目标是社会理论的建构与完善,他在研究中抛开别的论题则是想通过科学的自我反思来获得通向社会理论的钥匙。^③哈贝马斯承认心理分析(自述从弗洛伊德处学得而不具有实践经验)在此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承认研究了理解在心理分析中的方法论作用,但也已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了黑格尔、康德和马克思的认识论,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阐发了人的生活动机的三种兴趣,以及相应形成的三种科学,即人在技术兴趣的导引下从事工具性劳动,从而形成以自然为认识对象的经验分析科学;人在实践兴趣的导引下从事交往,从而形成以理解为认识对象的历史释义科学;人在解放兴趣的导引下从事反对社会控制、反对权威的活动,从而形成以社会为认识对象的社会科学。在这里,哈贝马斯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从人的存在结构和人的社会生活的角度,考察了人的认识的形成与发展,从

① 哈贝马斯《认识 and 兴趣》,苏康出版社,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9页。

② 同上。

③ 见同上。

而断言认识论必然同时也是社会理论。这就又回到了他在本书中所持的基本观点：激进的认识批判只有作为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从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来看，他在此书中所作的研究只是他走向批判的社会理论的第一步和前奏。“在自我反思中，一种认识为了认识而同独立的兴趣达成一致，因为反思的完成是作为解放运动来表现的。”^①

可以说，哈贝马斯在30多年前提出了关于批判的的社会理论的设想。无疑，这一理论从总体来看只有经验科学性、批判哲学性和以解放为主旨的政治实践性等基本特征。^②他在当时的设想中曾为实践意识的启蒙、为某种集体政治意志的构建以及为对实践进行理性指导提出把社会作为一个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来看待的思想，并于6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认识与兴趣》和《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这两部著作中为他的这一理论进行了逻辑结构和理论结构以及方法论的建构尝试。当然，这里讲的方法论，即社会研究方法论，批判理论方法论。这两部著作主要批判了新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方法统一性的观点，即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逻辑和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基本是相同的。而贯穿《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的红线，则是在社会研究中对理解或释义理解的种种思考。^③哈贝斯通过对不同的理解方式（如新康德主义的、韦伯主义的、现象学、人类学的、语言学的和释义学的等理解方式）的考察，提出了在用符号建构起

① 见同上书。

② 见麦卡锡为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所写的英文译本序，1979年波斯顿版。

③ 这一红线当然后来在哈贝马斯的其他著作中也不时出现，贯穿始终。

来的对象领域，在社会领域，需要一种与自然科学以及从自然科学发展而来的完全不同的逻辑程序，而对这一程度的设计则要求掌握对社会现实具有建设性特征的“意义”，哈贝马斯看重理解，看重行为，认为社会行为取决于行为者的“情境界定”等等，但却从未简单地苟同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释义性理解是社会研究方法的唯一基础。他与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不同，指出了社会现实的不同侧面，提出了社会现实所要求的超越单一释义性范围的研究模式。^①他将社会研究方法论概括为：释义性理解+意识形态批判（因为理解总同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以及生活的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历史为指向的社会系统分析（因为理解和意识形态批判要求一种超越主体意向和文化传统的参照系，要求把社会行为和经济条件等系统地纳入考察范围）=社会研究方法论。哈贝马斯的结论是，“如果社会系统分析确如以上建议的那样将历史释义学的向度和批判的向度合为一体，那么它将再也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直接形式的经验分析科学，而不得不转化为以历史为指向、同时又带有实践意图的社会理论。这样一种理论采取的形式将是理论一般化了的历史或一般性译解，它们反思性地把社会的规范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对当代情境的重建不仅借助于对过去的考察，而且也顾及到可期望的未来。它将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②哈贝马斯将这部主要讨论社会科学的基本范畴和研究逻辑的著作看作是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至少当时指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

^① 见《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第三章第8节释义学的动机，苏康出版社，1970年法兰克福版，第251—290页。

^② 见麦卡锡为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所写的英译本序。

材料，他强调指出：“我认为，人们不应把自我理解的过程与自我理解的结果相混淆。……我将心理分析理解为语言分析的尝试，只是走向交往行为理论道路上的一步。我相信，社会科学的语言理论的基础也有助于解释研究逻辑的有争议的基本问题。”^①

4.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到《交往行为理论》

的确，哈贝马斯在《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和《认识 and 兴趣》两书中对方法论问题的思考，只是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准备阶段。到了7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继续以各种方式阐发、建构自己的批判理论，并于1976年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书，以作为他前一段理论创作的小结，当然也是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巨著的前奏。他在这部著作中从哲学展望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同一性、进化论和合法化等问题，阐发了一种社会进化理论，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哈贝马斯在该书导言中写道：本书涉及到构建一种我将其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理论方案的种种努力。复原意味着向已经消亡了的起始状态的回归，但是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兴趣既不是教条的，也不是历史哲学的。复兴意味着对一种已被埋葬的传统的更新，这个马克思主义也不需要。重建在我们的前提下意味着，人们将一种理论分解开并以新的形式进行重新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理论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

^① 哈贝马斯《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苏康出版社，1970年法兰克福版，第7页。

但其启发源泉尚未枯竭的理论的正常的（我的意思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正常的）方式。”^① 从这里也可看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即与正统的资产阶级学者不同，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基本是积极的，但又认为“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更主张以他的方式进行“重建”。

哈贝马斯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书评价甚高，承认是他的得意之作之一。他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交往和社会进化》（由麦卡锡译成英文，1979年波士顿出版）一书则直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全文照搬了三节，从而占了《交往和社会进化》一书的五分之三篇幅，即该书的第二章道德发展与自我同一性、第三章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书的导言）和第五章现代国家中的合法化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之主要宗旨在于构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试图勾画出这样一种非历史哲学的社会进化理论的界限，解释人类史与个体发生史之间存在的结构式同源性，阐发现代国家中的合法化问题，即使规范结构紧紧追随一种发展逻辑的话，那么在现代国家中合法化问题也不会像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可以随意得到解决。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书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新作出贡献^②，其方式则是通过对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与完善来构建社会进化理论。“尽管交往理论旨在解决那些更多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即涉及到社会科学基础的那些问题，但我仍然认为它与社会进化

① 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苏康出版社，1976年法兰克福版，第9页。

② 参见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苏康出版社，1976年法兰克福版，第12页。

理论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① 哈贝马斯正是以他的方式展开他的理论“重建”工作，并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加以论证的。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当马克思理论中出现了科学主义倾向时，马克思理论就可能沦为坏哲学，因为历史哲学的遗产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有时也是非反思地发挥着作用^②。哈贝马斯考察了这种历史客观主义对第二国际的进化理论（譬如考茨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暗示以科学主义面目出现的历史哲学行为实际上导致了保守主义和僵化，明确提出他虽在今天重新拣起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基本设想，但是却是分外的小心谨慎。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今天从事社会进化理论的构建也不能赶时髦求新潮而去从物理学模型演变来的方法论中寻求令剪，因为恰恰是此类方法阻碍着通向社会科学的发展理论的道路。显然，哈贝马斯倾向于赞同弗洛伊德、米德、皮亚杰和乔姆斯基等人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理论的倡导，为社会科学的发展理论所取得的进展而鼓舞。他指出，这里所讲的小心谨慎系指对确定交往行为的客体范围的基本概念是选择；由此就可决定，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是可以令人信服的。^③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旨在构建一种哲学社会进化理论，反对以历史哲学的态度对待历史唯物主义，不主张用物理学模型等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理论。

其次，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从一开始就缺乏明晰性。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既不应

^① 同上书，第9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③ 见同上。

去更新古典自然法则的本体论要求，也不应去满足研究思维规律的科学之规范要求”，“而应是批判的社会理论”。“马克思曾认为他以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唯物主义改造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马克思不必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因为他为了他实际研究的目的可以满足于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理论的规范内涵、对现代自然法则和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内涵——这些规范内涵均体现在革命资产阶级的宪法中——发表意见并对之进行不断的批判。”^①与此同时，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变得具有讽刺意味了，它已完全从与他有密切联系的规范内涵中解脱了出来。“然而，如果资产阶级的理想……也包括在内的话，就缺少能够同意呼吁对之进行不断批判的规范和价值。”^②资产阶级意识和理想的变化，伦理社会主义毫无成就的消声匿迹，以及上述等等，就需要在今天建立一种哲学伦理学，其前提则是构建规范和价值的一般交往前提条件和方法。可见，哈贝马斯在这里论及的哲学伦理学是以交往行为（如语言媒介、交谈等）为前提的，他试图通过交往理论寻找“一种吴侬软语但却是顽强的，一种从不暗哑但却很少实现的理性要求”^③。当然，哈贝马斯认为他的以交往为基础的哲学伦理学与唯心主义对理性的追求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这是唯心主义的话，那么这种唯心主义就以最高的自然主义方式属于靠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亦即依靠含有真理成分的建议和需要完成的规范来维持

① 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苏康出版社，1976年法兰克福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同上。

生存的类的再生产条件”^①。

第三，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不仅在交往行为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当我们在单个考察进化理论的设想时，也遇到了那些必需交往理论的问题。^②哈贝马斯认真研究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这里尤其重点研究了上层建筑概念，指出：“文化始终保持为……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尽管它在向新的发展水平的过渡中似乎起着一种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迄今所认为的那样更为重要”^③。这一重要性就体现为文化作为大众媒介和传播体的主角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粉墨登场，它既是现代工业社会相应发展的产物，又对现代工业社会及其社会主体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它实际上起着沟通与交往的作用。“这一重要性”本身就说明了交往理论对一种更新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能作出的贡献”^④。这就告诉我们，哈贝马斯不仅预言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明确宣称交往理论将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的贡献，其着眼点则是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更新。于是，建构交往行为理论并以此“更新”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哈贝马斯的重要任务。至于哈贝马斯是如何作出“新贡献”的以及如何“重建”的，这些问题留待我们在下节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再加以阐述。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的重视是和他之后倾全力建构交往行为理论的工作密切相关的。1981年，哈贝马斯

-
- ① 同上。
 - ② 同上。
 - ③ 同上。
 - ④ 同上。

隆重推出了他两卷本的《交往行为理论》。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他的哈贝马斯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标志着他作为世界著名哲学家的地位的确认和稳定，也使他同时在西方哲学界更为引人注目。记得之后的几次哲学大会上，每当他作报告或出席时，总引起不小的轰动和瞩目，听众常常是座席不够站在走廊上或甚至坐在主席台的地上，结束之后又往往是听众围着他要求签名留念等。到这时为止，大致可以说，哈贝马斯于50年代末开始的构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工作，经过约20年的努力，终于告一段落，并初步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美国学者麦卡锡曾将其概括为由三个层次的理论组成的复合体：“1. 最基础的层次由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构成，哈贝马斯将其称之为普通语用学；2. 较高层次以基础层次理论为本原，致力于一般的社会理论的建构并通过发现交往性质的理论来完成；3. 最高层次以前两个层次为基础，勾画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①

哈贝马斯的理论工作及其思想发展有其明显的特征。首先，他的研究工作始终瞄向未来，着眼于现在，背靠德国的哲学传统。从他出版的著作来看，研究哲学史或古典哲学的所占篇幅很少；即使有，也是为他的理论服务的。这就使他能不断有新思想涌现，不断有新著作问世，不断引起学术界的瞩目。这大概也是他治学致胜的秘密所在。其次，哈贝马斯的著作大多以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他的哲学在起着干预社会生活的作用，他往往从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乃至政治学家的

^① 托马斯·麦卡锡为《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作的译者序，波斯顿1979年版。

角度来研究问题，这就使他的理论自成一家，大致也可称其为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第三，哈贝马斯属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以及反战的思想接受较快，较乐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尤其对战后的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和德国）研究较深较广，从而使他较他的同事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新的思维向度。这些特点不仅引起西方哲学界的注意，而且是否也可为我们所借鉴呢？当然，学术观点是可以讨论和不同意乃至争论的。

二、哈贝马斯的现代工业社会之 意识形态批判

从以上对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及其理论框架的总体分析可以看出，哈贝马斯作为哲学家是积极介入并干预社会生活的。从他篇幅宏大、内容广博的著作整体来看，哈贝马斯理论工作的重要方面之一是对现代工业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主要体现在他70年代以前的著作中。如果再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哈贝马斯对现代工业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受到阿道尔诺和豪克海默的影响，而且直接继续了马尔库塞的工作。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序中坦率承认：“‘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包含了对海伯特·马尔库塞所阐发的观点的研究，即‘技术的解放力量，即物的工具化，演变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①由此可见，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乃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大传统。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苏康出版社，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7页。

1. 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 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

所谓现代工业社会，即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具体地说，系指 50 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众所周知，根据未来学的观点，农业的兴起是第一次浪潮，而工业的兴起则标志着第二次浪潮的到来；至于 50 年代中期以后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正是第三次浪潮的来临。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成果，而且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它不仅在科技领域、生产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使劳动力结构、福利结构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使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乃至社会历史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了解、分析和研究现代工业社会，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研究问题之一。

社会批判理论家们、尤其是海伯特·马尔库塞倾注了大量精力来研究现代工业社会及其意识形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和“富裕社会”，其典型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工业技术的高度发达和滥用，工业技术被用来生产奢侈品、玩乐和用于军事目的，绝大部分被付诸于“非生产性”用途和第三产业；（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大的提高，中、下层群众也分享到了一部分好处；（三）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资产阶级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四）科学研究的成果成了对个人和社会集团的行为进行

控制和操纵的工具，而且往往是通过商业的或政治的方式。^①上述四大特征，在马尔库塞看来，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功能；它们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表现出综合的病症。这即是说，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所承受的压抑和负担的根子不是个人的精神紊乱病症，而是源于社会的上述正常功能。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富裕社会”同时也是“病态社会”：“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它不能运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②人的可能状态和实际状态之间的鸿沟越宽，“补充压抑”的需要就越大，即“不是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文明，而是有利于使现在的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合法兴趣的本能压抑就越大”^③。人们由于害怕失去工作或社会地位不得不屈从社会的需要，不得不承受“补充施加的心理压力”。在“富裕社会”里，“人的自由的现有存在形式和可达到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的矛盾，使人的心理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屈服于“制度的控制和操纵”。^④

另一方面，马尔库塞还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也成功地提高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得到了空前的满足。然而，这只是“虚假的需求”的满足，因为它是“一些特殊的社会权力

① 参见马尔库塞：《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载《工业社会中的攻击和顺应》，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7页。

② 《工业社会中的攻击和顺应》，第11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为了制约个人而从上面强加于个人的需要”^①，而人的“真实的需求”，即对理性的追求、对人性的维持和升华以及人对物质需要的自由，却在泯灭、人堕入了“单向度性”之中，丧失了自己最可贵的、最富于创造力的否定和批判能力，无产阶级也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并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所谓“单向度”，即指一种起操纵和同化作用的、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趋于稳定和使大多数人失去批判意识的“超然力”。这一“单向度”性发生及其向“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正是“技术的解放力量”演变为“解放的桎梏”、“物的工具化”演变为“人的工具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说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伦理道德、思想品质、秉性天赋等被扭曲了，人走向堕落了。要消除这种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却人性泯灭的现象，要改变这种可悲的“单向度”的社会，就需要由少数无单向度性的知识分子去揭露单向度的社会和文化，启迪人们否定的、批判的思想，最终共同建立一个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高度自治、高度文明的自由人社会。^②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本身的作用有了新的变化，这是马尔库塞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得出的结论。在马尔库塞看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本来在于建立真正的人的存在，即生活不再仅仅是手段，人也不再被他的劳动工具所确定。然而与这一对自由的追求相反，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却一再迫使人们为了活命而去赚钱，却一再将生活作为手段来对待。从这个意义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德文版，第35页。

② 对马尔库塞以及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工业社会批判的评价与分析可参见李忠尚著《“新马克思主义”析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北京版，第53—59页。

上说,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循着自己的轨道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在自我摧毁。于是,生产和压迫的同步增长就构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那么,什么是这一解放与奴役、生产与摧毁的力量的共同分母呢?”^① 这就是作为社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自动化的大工业。马尔库塞认为,他的这一论断的提出,不仅具有理论启蒙作用,而且是对科学技术的作用的新解释,是对科学技术具有中立性这一观点的反驳。在他看来,“技术是中立的”这一观点“在今天已经变得成问题了”。“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机器不是纯粹被孤立于社会和政治前提之外的工具整体而起作用,而是作为先验地确定——为了它的使用和普及——产品和个人的以及社会的活动之机器而起用。这就是说,它是作为确定社会必要的需求、职业、能力和行为以及规定社会控制与社会前提的形式之机器而起作用。这一技术机器虽然体现了控制者与机器操纵者之间的一定区别,但却是就它变成为当今的生产基础、也就是社会得以维持和增长的基础来说的,技术机器正是非常急迫地在国家和国际的水平上提出了它的要求。社会最重要的行为自由的领域变小了,因为现实的选择现在实际上是灾难性的了:它不仅意味着现存社会机构之内的变化、目的和方法,而且要求自身的消亡。进步的这一新的方向实际上威胁着整个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发展事实上已达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历史地来看,这是质变的因素,而且工业社会发动了它所有的辅助力量来反

^① 海伯特·马尔库塞《论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卢赫特汉特出版,1964年诺伊委特和柏林版,第340页。

对任何倒退的可能性。”^①于是，科学技术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作为具有中立性的工具而被人们所操纵和使用，而是反过来操纵和控制个人与社会的活动。现代工业社会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科学技术、“技术机器”在这一变化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现代工业社会事实上成为“作为征服自然这一历史工程的最后阶段的技术社会”^②。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在这里既看出了生产和压迫的同步增长这一两面性现象，看到了这一两面性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现代化大工业，而且指出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作用，即具有卓有成效的征服自然和反过来又卓有成效的征服人与社会的双重作用，明确否定科学技术中立性的观点，从而赋予了科学技术以新的内涵，为它确定了新的作用。

与此同时，马尔库塞还指出，科学技术还渗透入了人们的生活乃至社会历史领域，甚至超越了社会制度的限制。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社会”中的这一“技术工程”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但是它的普及并未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包括了发展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这一世界性的“技术现象”说明机器的作用在发生变化，机器在社会生产的中心不仅仅是作为技术总体的一部分，而且也作为政治与文化的总体的一部分而起作用。^③而整个“技术机器”的生产率和增长率使它本身具有了合理性，即不仅稳定社

① 同上书，第340—341页。

② 同上书，第341页。

③ 见同上。

会统治制度，而且也将技术进步限制在统治的范围之内。”^①这一变化反映在生产方式上，即是“表达工业社会基础的生产关系日益获得一个技术的形式，而技术形式又日益获得一个政治内容”^②。所有这些变化都说明，技术机器作为整体政治化了，意识形态化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接过了为统治的合法化辩护的功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单向度性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之一。

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总体考察入手，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四大特征及其“富裕社会”与“病态社会”的两面性；从对人的需求——“虚假的需求”与“真正的需求”——的分析中指出人已堕入了“单向度性”并进而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从对这一“单向度性”向“一体化”发展的过程的研究，指出正是“物的工具化”演变为“人的工具化”。马尔库塞在其批判中，还十分注意了科学技术本身作用的新变化，即科学技术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富裕的生活，而且变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它不仅在生产领域起作用，而且渗透入了社会历史领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乃至社会历史观念；它不再作为人的产品从而具有中立性而被人所操纵和利用，而是反过来操纵、控制乃至奴役人和他的社会，即科学技术既征服了自然又征服了人和社会；科学技术从而具有了非中立性的特征。马尔库塞从科学技术的这一新变化中得出了他的结论：科学技术因其对人类的贡献而获得了合理性，然而当它被用作统

① 同上。

② 同上。

治目的时，它就政治化了，就以其合理性稳定社会统治制度，就具有了为统治的合法化辩护的功能，从而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和存在来论证他的观点，从而主张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这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以便达到砸碎解放的桎梏，消灭人的工具化，实现人的解放之目的。

2. 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意识形态批判之阐释和发展—— “合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政治内容”

哈贝马斯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首先，哈贝马斯指出，马尔库塞用以进行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分析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我们知道，“合理性”这一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引进的，主要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特征，用以确定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资产阶级私法行为和官僚主义统治的形式。引伸而来的合理化概念则指接近合理决定的社会领域的扩展。合理化的目的在于找到有效的手段和道路来实现人的目的，尤其是达到“与正在使用的手段相比较而是成就的最佳状态”^①。马克斯·韦伯将“合理性”概念区分为形式合理性（计算使用的标准）和物质合理性（在一定的价值先决条件的观点下以经济为指向的社会行为的使用之级数）；由于价值判断的不同，物质合理性概念往往是多意的；而形式合理性概念，即具体来说马克斯·韦伯从资本主义企业主和工业雇佣工人，从抽象的法人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45页。

和现代的管理官员的目的合理行为中抽象而获得并将之与科学技术的标准相固定的合理性概念，则具有一定的内容上的规定。随着合理化的实现，即随着遵循合理决定标准的社会领域的扩展，社会劳动的工业化带来了这样的后果：工具行为的标准也渗透进了其他的生活领域，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交往和沟通的技术化，目的合理行为的实现、社会“合理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构化相互关联。当科学技术渗透入社会结构领域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其结构时，旧的合法化就被清除了。马尔库塞延续了这一分析。他尖锐地批判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指出“技术合理性以此方式更多地保护了统治的合乎法律性，而不是废除它”^①，从而预言技术理性即是意识形态，即是新的合法化基础。“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使用，而且技术就是（对自然和对人的）统治，是方法的、科学的、已计算出的和正在计算的统治。一定的统治目的和利益并不是‘追加地’和从外部强加给技术的，而是它们已经进入技术机器本身的建构之中；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投影；从技术中反映出，一个社会和支配它的利益想要同人和物做些什么。统治的这样一种目的是‘物质的’并在此意义上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②哈贝马斯不仅看到了在马尔库塞对韦伯的批判中所包含的关于“目的合理行为的社会制度之技术理性并未放弃其政治内容”^③，而且将马尔库塞的这一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7页。

②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载《文化和社会》第二卷，1965年法兰克福版。

③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49页。

段话视为马尔库塞对马克斯·韦伯批判的结论^①。

其次，哈贝马斯指出，马尔库塞进行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分析出发点是“技术理性的政治内容”。马尔库塞在1956年就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统治合法化具有了新的特征，即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在日益失去其剥削的和压迫的特点而变得“合理”，而且并未因此而丧失其政治统治的功能。这种统治的合理性之基础正是在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来的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和对自然的统治也使个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适”，即科学技术进步不仅成功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也大大提高了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从而使剥削和压迫的现象淡化或变得可以接受，从而“在日益强烈的对个人在强大的生产机器和分配机器面前所经受的压迫下，在业余时间的非私有化中，在几乎不可区分的建设性社会劳动和破坏性社会劳动的融合中“使镇压成为多余，从而使剥削、压迫、镇压——这些令人们奋起造反的词汇从人民的意识中消失。

另一方面，“同科学技术进步相连的生产力的增长炸毁了一切历史的均衡”^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具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它不再为了一种政治启蒙而作为合法化批判的基础而起作用，而是自己本身变成了合法化的基础。”^③ 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作用的这一转变是马尔库塞进行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49页。

②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51页。

③ 同上书第32页。

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重点之一，他指出：“现代科学的原则曾从纯理性出发获得如此的结构，以致于它们作为概念工具可以服务于一种自动实现的生产的控制的总体；理论上的操作主义最终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相适应。曾导致对自然的有效的统治的科学方法，也提供了纯粹的概念，即提供了借助对自然的统治来达到人对人的卓有成效的统治之工具[……]。今天，统治不仅借助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将自己永久化并扩展自身；技术向膨胀的、包揽一切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力提供巨大的合法性。在这一总体中，技术也向人的不自由提供巨大的合理化并且证明要自治、要自己确定自己的生活‘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是不合理地出现，也不是政治性地出现，更确切些说是作为受技术机器的压迫而出现的，而技术机器却成功地提高了生活的舒适性和劳动生产率。宁可说，技术合理性以此方式保护着统治的合乎法律性，当然除了前者废除后者之外，工具主义的理性地平线面向以合理的方式总体化着的社会而开放。”^①

哈贝马斯在沿着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继续研究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之批判的思想时，明确指出了马尔库塞所从事批判的分析出发点：“马尔库塞将这一思想，即近代科学的合理性是一种历史的形式，归功于胡塞尔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论文以及海德格尔关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毁灭的论著。布洛赫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发展了这一观点，即指出已经被资本主义歪曲的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合理性剥夺了纯粹生产力的无罪。然而只有马尔库塞将‘技术理性的政治内容’变成为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7年诺伊委特版，第172页。

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分析出发点。”^① 哈贝马斯通过此就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和确定了方向。

3. 哈贝马斯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及其有关范畴

还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哈贝马斯从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基本差别出发，试图从“现代化”的角度（即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的结构框架的反作用）来考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及其诸多范畴，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从来自下面的合理化向来自上面的合理化的转变，从而预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统治的合法化成为同义语近代科学具有独特的作用，即摧毁了旧的统治合法化。哈贝马斯像马尔库塞一样，在分析现代工业社会时是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起步的。同样，他在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也借用了其“现代化”概念，即“马克斯·韦伯用‘合理化’概念来尝试把握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的结构框架的反作用”^②。他认为，由于目的合理行为的基础体系的扩展而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譬如法律地位和契约、集体和社会、机械统一和有机统一、非正式团体和正式团体、主要关系和次要关系、文化和文明、传统统治和官僚统治、宗教团体和世俗团体、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等级和阶级等范畴，都是在试图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结构框架

① 同上书第 52 页。

②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 年法兰克福版，第 60 页。

的结构性变化。所谓“传统社会”，在哈贝马斯看来，指一般来说与高度文明的标准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制度，即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阶段。他同时指出，“传统社会”有三大特征：1. 拥有中央集权的统治暴力，即国家统治机器；2. 社会分裂为社会经济阶级；3. 任何一种起主导作用的世界观（包括神话和宗教），其目的都在于使统治有效的合法化，都在于为统治起辩护和卫道的作用。“传统社会”的基础则在于拥有较发达的技术和社会生产过程的分工组织，在于能生产出较充裕的产品来满足直接的和基本的需求。尤其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大约三百年前，还没有一个大型的社会制度每人每年所生产的最高产值，能超过相当于两百美元的产品”^①。“‘传统社会’这一术语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结构框架建立在对现实整体（对宇宙以及社会）的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之毋庸置疑的合法化基础之上。只要目的合理行为的基础体系能在文化遗产的合法化有效性之界限之内发展，那么‘传统的’社会就会继续存在。这就说明了结构框架的一种‘优越性’，即并未排除随着生产力充裕潜能而出现的结构之转变，但是却杜绝了传统的合法化形式之批判性解除。这一无隙可击性正是区分传统社会与超越现代化浪潮的社会之极有意义的标准。”^②所谓“超越现代化浪潮”的“现代社会”，哈贝马斯实际上指的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19世纪最后25年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他所讲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之过渡，实际上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不过使用了与列宁完全不同

① 同上书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的术语。这不仅说明了他有一套自己的术语，而且也说明他与列宁主义“自觉地”保持了距离。

哈贝马斯在考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其出发点是“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基本差别”^①。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或曰目的合理行为）即指工具行为（以基于经验知识的技术规则为行为准则）或者合理的选择（以基于分析知识的战略为行为准则）亦或是两者的结合。而“相互作用”则以符号为媒介，即指交往行为。这一相互作用以必定起作用的、解释相反的行为期望并且必须被至少两个行为主体所理解和承认的标准为行为准则。社会标准是通过认可来得以确证的。其意义在口头语言的交往中得以客体化。当技术规则和战略的效用取决于经验上真实的或者分析上正确的原理之有效性时，社会标准的效用就仅仅在对意向理解的超主体性中得以陈述并且通过对义务的普遍承认而获得保障。”^②哈贝马斯指出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基本差别的目的，则在于重新阐发韦伯的“合理化”概念，即在相互作用（交往行为）中实现解放、个体化和排除了统治的交往之扩展，在劳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中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使用权力之扩展。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准首先是工业化的完成。这既是物质基础，也是社会的结构框架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契机。“在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压力下，结构框架被迫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这就是原始民族发展历史的机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在不断更新的，这种目的合

① 同上书第 62 页。

② 同上书第 62—63 页。

理行为基础体系总是不断地得到了扩展，从而通过对宇宙的解释，向统治合法化的文明形式提出了质疑。这种神话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乃是遵从相互作用关系的逻辑的。这些世界观回答了集体生存和个体生存历史的那些至为关切的人类问题。这些世界观的主题就是公正和自由，权力和压迫，幸福和满足，以及贫困和死亡。它们的范畴就是胜利和失败，爱和恨，以及解脱和永远堕入地狱。它们的逻辑是用一种变成了畸形的相互交往的语法、分裂象征的命中注定的因果性和压抑动机的命中注定的因果性来量度的。这种同交往行为有关的游戏的合理性，在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时候，却遇到了目的-手段-关系的合理性，而后者又是同手段的和战略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① 由此就生发了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第二个标准，即统治合法化的原有形式失去效用。这样一来，统治合法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再是“君权神授”，“受命于天”，而是从社会劳动的基础上获得，即政治统治“从下”而不再是“从上”得以合法化^②。哈贝马斯所说的“从下”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产力，建立了旨在持续扩展目的合理行为的基础体系的经济机构，从而确立了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合法化。“来自下面便形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适应压力，一方面随着财产和劳动力的地区性的交换行为的结构化，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构化，新的生产方式才得以实现。在社会劳动制度中，生产力的累积性进步，自然是以经济危机为代价的，而从生产力的累积进步出发，目

① 同上书第 68—69 页。

② 同上书第 69 页。

的合理行为的基础体系从水平方向的扩展才有保障。这样一来，传统关系便愈加服从于工具合理性和战略合理性条件了：劳动的和经济交往的组织、运输、信息和通讯网，私法行为研究机构以及从财政管理来看的国家官僚。于是，就在现代化的强迫下形成了社会的基础结构。这一基础结构逐渐把握了一切生活在领域：军事、学校教育、卫生、甚至于家庭，而且还迫使生活方式城市化（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概莫能外），即基础文明使每个人随时可以从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转变为目的合理行为。”^①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合法化必然要求“来自上面”的政治合法化；“统治制度”在经济合法化下“才能适应这种进步的基础体系对新的合法性的要求。马克斯·韦伯把这一适应过程理解为‘合理化’”^②。这样，“来自上面”的“合理化”压力自然同“来自下面”的“合理化”压力相适应。“这种新的合理化一方面是从对传统的世界解释的教条进行批判而产生的，并要求具有科学的性质；另一方面则保持了合理化的作用，并且取得了确实的权力关系（既有分析又有大众的意识）。从此较狭义的意义来说，只有当意识形态代替了传统的统治合法化的时候，它才开始形成起来，并且还是带着近代科学的要求而出现的。此外，它在意识形态批判面前还为自己进行过申辩。从本源来看，意识形态同意识形态批判都是一回事。在这种意义上，资产阶级以前的“意识形态”乃是不存在的。”^③可以看出，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统治的合法化

① 同上书第 71 页。

② 同上书第 70—71 页。

③ 同上书第 71—72 页。

是同义语，具有“虚假意识”的属性；在这一过程中，近代科学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即科学与技术的结盟以及在实际上的运用对现代化的进程起着直接的作用，促进了来自下面的那种合理化的压力，并且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摧毁了旧的统治合法化。^① 哈贝马斯一方面欢迎科学技术的这一独特作用——对旧的统治合法化的摧毁，另一方面为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新作用埋下了伏笔。

4. 哈贝马斯论现代工业社会的两大发展趋势 趋势与技术和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哈贝马斯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即国家日益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因而使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趋于过时，而技术和科学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对19世纪中叶的英、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以及对其等价交换的合法化基础之批判是切中时弊的；马克思由此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成了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武器，其劳动价值论摧毁了自由的假象，而自由劳动契约的法律机构正是打着这样一块虚伪的招牌把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强权关系掩盖了起来。哈贝马斯由此同意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韦伯的批判，即指责韦伯无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只是死抱住抽象的合理化概念不放，而这一

^① 同上书第72—73页。

概念并未表述结构框架适应进步的、目的管理行为的基础体系之特殊阶级内容，相反将其再次掩盖了起来。同时，“马尔库塞明白，马克思对马克斯·韦伯已经看到过的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再也不可以到处搬用了。不过，马尔库塞只是想用马克斯·韦伯的例子说明，如果自由资本主义还未上升为概念的话，那么也就不可能理解在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现代社会的发展”^①。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这一同意和发挥，不仅否定了韦伯的合理化概念，而且也否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有效性之前提和基础，从而为他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开辟着道路。

哈贝马斯的用意显然在于想说明：时代不同了，也就需要不同的理论。他指出：“自19世纪最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势：1. 确保制度稳定的干预主义的国家活动日益增加；2. 研究和技术之间的日益增长，从而使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② 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两大发展趋势，在哈贝马斯看来，具有较前不同的本质特征，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质的变化。因为对哈贝马斯来说，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意味着对经济生活及其发展的无政府状态的控制，而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则意味着不仅仅是直接劳动创造财富与价值。这两大发展趋势“摧毁了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一向用以炫耀的结构框架和目的合理行为的基础体系之格局。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应用条件便落入了马克思根

① 同上书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74页。

据自由资本主义所赋予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① 这就是说，这两大发展趋势打乱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原有格局，超越了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从而显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已经过时，即“十九世纪的理论”^②。由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这中心命题：“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命题，即技术和科学在今天也接过了统治合法化的职能，为分析变化了的情况提供了钥匙”^③。技术和科学成为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的重新提出和强调，是哈贝马斯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宣言和高度概括。这一从科技成为第一生产方向科技成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发展主线，说明他已背离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基本范畴，说明他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着自己独特方式的批判和理论建构，从而也就使他的必然得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的结论。

哈贝马斯写道：“自 19 世纪末叶以来，晚期资本主义特有的另一种发展趋势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即技术的科学化，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构上的压力，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总是占绝对优势。但是，革新所取决于分散的、顺应经济发展的发明，还带有自发的性质。当技术的发展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受到反冲力的激发时，上述情形便明显的改变了。由于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和应用便结合为一个体系了；

① 同上。

② 参见李忠尚《早期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研究》，1984 年亚琛版，该书导言部分。

③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9 年法兰克福版，第 74 页。

而工业研究在此期间又同国家委托的、首先要求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研究密切相关。随后，科学技术情报又从军事部门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这样一来，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使用前提便不复存在。要在不合格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计算研究和发展中的资本投资总额，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源泉。与此相比较，马克思原先考察的剩余价值源泉——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①。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科学化现象以及对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构压力”的分析，使他从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同时又成为意识形态的结论过渡到对马克思理论的评价，即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使用前提便不复存在”。同时，哈贝马斯在这里提出的关于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以及马克思原先考察的剩余价值源泉——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的观点，曾引起过轰动，也曾遭到批判。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急于超越马克思，却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即技术与科学最终还必须由人来掌握和发展，由此便不能否认剩余劳动的存在和剩余劳动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当然，我们也不能像有的作者那样不认真研究哈贝马斯观点的全部而简单抓住一句话斥之为“胡说”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从而以“大批判”的方式来进行理论批评，搞简单化和自相矛盾。如果我们对哈贝马斯的观点加以认真的分析，就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79页。

会发现，首先哈贝马斯从未讲过科学技术进步是“唯一的”“剩余价值源泉，而是讲“一个”源泉，这是有区别的，我们在理论批判时要弄清概念关系和准确使用术语，不可造错，不可以讹传讹、以讹批讹。其次要看到，哈贝马斯和马克思的研究出发点和对象不同，即在马克思那里是工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在哈贝马斯那里是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间接生产者的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基于工人——无产者的劳动，哈贝马斯的观点则指出价值源泉并非仅仅来自于（工人的）简单劳动，而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科学技术本身，即剩余价值源泉有了改变，剩余价值并非一个源泉，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和其他有关的著作中借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概念，按照哈贝马斯的逻辑推理，科学技术工作自然是复杂劳动、高级劳动，而工人的工作一般当然是简单劳动；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即复杂劳动创造财富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工人即简单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工人本身的价值也就随之缩小；由于社会进步是靠生产力推动的，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主要动力，而科学技术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革命的主力军也就不再是工人——无产者，而科学技术的载体——知识分子。哈贝马斯还旨在说明，虽然马克思提出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范畴，并鉴于当时的情况他还是主张依靠无产者——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马克思的预言已不适应新的变化了。哈贝马斯和马克思研究的出发点的不同当然决定了结论的不同，即马克思呼吁揭穿剩余价值的秘密，唤起工人觉悟，依靠无产者推翻旧世界，铲除剥削和压迫；哈贝马斯则

呼吁区分今日的剩余价值源泉与当时的剩余价值源泉的不同，提出要认清科技已成为第一生产力，要依靠科技及知识分子来推进社会进步，变革命为进化，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可以认为，哈贝马斯虽然曾认真研究了马克思的理论，曾为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所倾倒，但他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走的却是一条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一点大概也应成为评价哈贝马斯理论的基调。

5. 哈贝马斯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过时论

哈贝马斯在他的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中，进一步指出，由于现代两大趋势的出现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马克思理论的两个关键范畴——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再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了”^①。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存在社会阶级斗争的。然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从公开的阶级对抗的经验教训中产生了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这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是能够通过补偿政策来确保依靠工资生活的群众的忠诚，从而卓有成效地平息阶级冲突；二是成功地将“与维护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的利益”淡化为非阶级利益。这是因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社会利益公开冲突的爆发可能性与这些冲突对制度危害的严重性成反比例。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种种差异和矛盾，譬如一方面是高度现代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84页。

化的生产设备和军事装备，另一方面却是交通、卫生、教育和民用建筑等领域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以及不太先进的设备等，然而这样的矛盾再也不能被解释为阶级对抗了^①。这就证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首先传统“统治”已让位于新型的非统治，即新的统治方式使一个阶级的主体把另一个阶级的主体当作平等的集团来对待，技术意识成为统治意识，因为第一生产力本身成为统治合法化的基础。^②其次，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一种超越一切、希望维护和改进现存结构及其生产方式的利益团结了最先进领域内的敌对者们。^③这就使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强大的生产率和破坏率，富有和贫穷，在不合理性统治下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哈贝马斯指出，由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进步本身成为统治合法化的基础，所以“新的合法化形式自然就失去了旧有的意识形态形式”^④。这是因为技术意识一方面比以前的一切意识形态都非意识形态化，另一方面它作为以科学拜物教为基础的“背景意识形态”比一切旧的意识形态都更有不可抗拒性。如果简要地对新旧意识形态加以区分的话，那么可以概括为两点：1. 体现在私有经济的资本使用形式上，即资本关系在今天不再说明一种不可改良的剥削和压迫；2. 体现在一种保证群众忠诚的、分配社会补偿的政治形式上，即群众

① 同上书第 85 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 88—89 页以及李忠尚著《“新马克思主义”析要》，1987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版，第 255—367 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 88—89 页以及李忠尚著《“新马克思主义”析要》，1987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版，第 255—367 页。

④ 见同上书第 88 页。

的忠诚在今天只能借助对私人需要的补偿才能建立。这就是说，技术意识不可能像旧的意识形态一样建立在“集体取代”^①之上，新旧意识形态的区别正在于新的意识形态“解除了建立共同生活的组织标准，即解除了对相互作用本身的规范调节，在这个意义上即是非政治化”^②。新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是意识形态并因而具有危害性，即它“损害着一种坚持我们文明存在的两大基本条件之一的兴趣，即语言更准确些说即是通过语言的交往所确定的社会化和个人化形式。这一兴趣的延伸便是理解的超主体性的维持以及一种摆脱了统治的交往的建立。技术意识使这一实际兴趣在对扩展我们的技术使用权力的兴趣后边消失。因此，新的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反思就返回到了一种历史确定的阶级兴趣之后并且解除了自我建构的类的兴趣前提”。显而易见，哈贝马斯是对意识形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而且不伦新旧一概排斥、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我们文明存在的两大基本条件的维持，尤其是语言，即通过日常语言的沟通实现超主体的理解，而其中建立非统治的交往又是关键。哈贝马斯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主张更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以及上面所提及的扬弃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范畴。

6. 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取代论”与“唯一的抗议源”观点

哈贝马斯在他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探讨了取代意识形态的

① 同上书第90页。

② 同上书第90页。

可能性，指出由于公共性结构的转变，在现代工业社会必须揭露“技术的背景意识形态”和批判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抗议源是大学生和中学生。毫无疑问，哈贝马斯对意识形态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对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即是这一态度的体现，而并非纯粹出自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辩护，而是相反。这一点从他被称为左派、不被施特劳斯等保守派所欢迎即可看出。同时，他也继承了豪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的悲观主义传统，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大部分因成为“单向度的人”而被现存制度一体化了，从而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他看来，人们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被技术机器的背景意识形态所潜移默化，人们会提出生活需要什么的问题，而不会提出我们想怎么生活的问题，人们所具有的单向度性必然导致人民大众的非政治化。要改变这种状况，要消除异化而实现人的解放以及建立理性社会的美好理想，关键在于从意识形态领域着手进行新的启蒙；要正视公共性的改变等新情况，采取新的方式，相应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以实现新的社会进化，而不是革命。哈贝马斯认为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和出路是进行新的启蒙，而承担这一历史任务的唯一抗议潜能与源泉是大学生和中学生。^① 哈贝马斯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有三条论据，即首先认为“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抗议团体是有特权的”^②，因为学生不代表某种社会利益，也不去当卫道士，没有既得利益就可能“公而无私”，况且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统计数字，这些抗议团体的学生往往出身于名门富豪，从而

① 同上书第 130 页。

② 同上。

没有追求好的工作或赚钱等急功近利的要求。其次，“统治制度的合法化宣教”^①对他们不具有说服力。这些抗议学生往往对职业上的飞黄腾达和美满的家庭比一般学生要淡漠得多，因为他们既不为生活所迫，也不必未来遭受劳动市场的竞争之苦。这些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学、语言学以及历史学等院系，通过做学术论文的直接经验总是同技术机器格格不入，从而对技术意识具有免疫力，对意识形态具有抵制力。第三，学生倾向于拒绝，他们不是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业余时间而斗争，而是恰恰矛头对准这一“社会补偿”本身，因为正是这样的“社会补偿”使人们变得鼠目寸光。从心理学上来分析，哈贝马斯认为“宁可以说，大学生积极分子的父母也参与了孩子们的批判态度。”^②，因为这些学生“根据更自由的教育原则长大”并从父母处得到更多的心理理解。^③同时，这些学生对现代工业社会对人性压抑的许多现象不理解，譬如为什么个人的生活在今天仍然屈服于“职业劳动的专政”，为什么还得服从效益竞争原则等等；而当进一步触及到可解决的制度问题时，就有可能在将来产生一种政治力量。哈贝马斯寄希望于学生，指出“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财富的规模以及生产这些财富所需要的技术的和组织条件，使得从主观上令人信服地将法律地位的分派同对个人成绩的估价机制联系起来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抗议可能会持续摧毁这一变得分崩离折的效益意识形态，并且以此将这一已成问题的、只是还

① 同上书第101页。

② 同上书第102页。

③ 见同上。

由于非政治化而掩盖起来的后期资本主义之合法化基础推向灭亡”^①。

三、哈贝马斯的技术意识形态论评析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对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以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为基点，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和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理性的政治内涵”的观点出发，试图从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基本差别入手、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及其范畴，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从来自下面的合理化向来自上面的合理化的转变，从而预言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与统治的合法化成为同义语，近代科学具有了独特的功能，即摧毁了旧的统治合法化，推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指出，现代工业社会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即国家日益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因而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趋于过时，使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变得不合时宜，使“马克思理论的两个关键范畴——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再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了”，而技术和科学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主张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批判，以便撕掉统治合法化的虚假外衣，唤醒大众对“人的工具化”的觉悟，打碎“解放的桎梏”，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完善。然而，哈贝马斯又继承了批判理论的悲观主义传统，认为现代

^① 同上书第103页。

工业社会的人大部分已成为“单向度的人”并与现存制度一体化了，从而使他寻找不到“解放的力量”。他最终找到的唯一抗议源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他将进行新的启蒙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青年人身上，至少是寄希望他们于先锋的作用。他指出，只有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抗议才可能摧毁现存的意识形态，才能将“由于非政治化而掩盖起来的后期资本主义之合法化基础推向灭亡。”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反对将统治思想解释为全社会的思想并从而将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合法化的基础之观点，主张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由于现代工业社会出现的新的两大发展趋势。科学技术具有了新的两大功能，即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从而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任务就必然转移到了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哈贝马斯进行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是要揭穿“物的工具化”演变为“人的工具化”之谜，扭转科学技术异化的现象——科学技术成为了“解放的桎梏”，扬弃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恢复和光大科学技术的最根本功能——“第一生产力”，从而使科学技术继续作为“解放力量”而发挥作用。由此也可以断定，哈贝马斯反对列宁关于“科学的意识形态”^①观点，主张对意识形态进行根本的扬弃。他要建构和实现的是这样一种理想：抛弃意识形态，铲除意识形态为统治辩护的合法化基础，变“教育”大众、“灌输”大众——愚弄大众为大众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主要通过日常语言的交往、讨论等），变“暴力革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第127页。

命”为“和平进化”；在此过程中，交往行为与生产活动相比较不仅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而建立科学的法哲学（法理论）和理论的民主法制国家则是根本基础；当然，归终还是要实现人的解放。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也是他进行新的启蒙的理论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等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在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中提出的技术意识形态论是有其独特见解的，并曾在西方引起过轰动。首先，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现代社会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超过以往各个时代的高度发展的技术，而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又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不仅成功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也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科学技术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和第一生产力。他们分别于60年代中期和末期即已提出这一论断，不能不说是一个理论贡献。其次，较客观地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关于两大发展趋势等新变化，激烈地抨击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的工具化”现象，为我们研究现代工业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提供了思想资料。第三，他们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醒人们警惕新的剥削和压迫的形式（尽管他们本人主观上也许并不愿意这么做），而且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倡导联系实际的理论研究，旨在创立“实践哲学”，客观上起了新的理论启蒙作用。

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之根本缺陷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看问题，虽然他们采用了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方法、或术语（如意识形态批判），但其根本立场和基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首先，马尔库塞和哈贝马

斯虽然都强调科学技术的批判、尤其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但实际上还是过高地估计了科学技术的作用，过分强调了生产力因素，从而忽视了生产关系这个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最终还是由人来创造掌握和发展的这一基本事实，他们的科学技术批判在实质上还是一种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技术决定论。其次，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工业社会的无特权集团群体时，一方面指出他们在潜能方面从来也没有代表人民群众。他们的无权和他们的贫困不再是伴随着剥削而发生的，因为社会制度并不依靠他们的劳动而生存。他们顶多只能代表剥削的一个过去的阶段，一方面又将此模式套用于第三世界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关系，意在指出并非工业国家依靠第三世界而生存，而是相反，因此剥削这个范畴已无多少可用于理解现状的意义了。他们在这里模糊了或曰掩盖了在现代工业社会以及现代世界上还存在着剥削关系，尽管其程度与方式已较前大不相同。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第三世界及穷人的蔑视，暴露了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穷的大国沙文主义及帝国主义思想，以及工业国家所贯有的优等民族论思想。这说明他们不可能同他们的传统截然分开，尽管他们属于开明的左派：这对东方民族来说，尤其是应注意的。第三，马尔库塞、尤其是哈贝马斯宣称在变化了的形势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这一观点忽略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即现代工业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而这样一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研究和结论也就继续有效。有现代工业社会中，只要剩余劳动仍然存在，只要科学技术仍然由人来发明、掌握和发展，对人的剥削就必然继续存在，剩余价值论也就继续发挥效用，劳动价值论也就不会过时。当然也应看到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新变化，

应看到现象后面的本质，即只不过无产者——工人以及科技人员等受剥削的程度不同罢了。至于他们妄言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范畴再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了的论调，亦属同样的道理。他们预言在现代工业社会由于新的变化以及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三高”政策，使现代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人被“单向度性”所俘虏，被现存制度所“一体化”，与此同时随着新的科学革命的到来技术意识形态应运而生，从而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范畴作为十九世纪的理论而不能应用于二十世纪的工业社会了，最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继续了法国哲学的思辩传统，在意识形态批判中用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框架或曰通过韦伯的合理性眼镜来考察现代工业社会，因而他们的批判仍然拘泥于哲学批判，不可能给现实的活生生的实践提供直接的指导作用，这一点又是与他们的意识革命论宗旨分不开的。

第十章 九十年代的哈贝马斯与研究 现代工业社会理论及“新马克思 主义”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技术意识形态论是他对马尔库塞及“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发展。作为尚健在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对自己的理论也在不断地构建和发展。这一方面增加了研究他的理论的难度，但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有可能直接面询哈贝马斯，从而对他的理论有一个较客观而准确的研究。本章将简要阐述哈贝马斯对自己理论的看法和最简洁的概括；同时，也探讨研究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及现实意义。

一、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的新认识

到了20世纪90年代，哈贝马斯在理论界、学术界已是举世闻名。那么，他对自己的理论怎么看呢？笔者在同哈贝马斯长期的合作研究中，尤其是90年代初的多次讨论，方逐步理解和认识了哈贝马斯的理论。笔者认为，哈贝马斯的理论工作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将系统理论和交往理论引入了社会分析领域，另一方面用语言哲学的陈述形式取代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传统。毫无疑问，他的理论和语言都已自成体系，都已远离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向着理论启蒙迈进。哈贝马斯的技术意识形态论虽主要完成于70年代末，但却与他后期的“交往行为理论”达成了有机的结合，这正是“现时代——一个未完成的研究课题”。

哈贝马斯的技术意识形态论不仅率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而且断言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指出：“马尔库塞关于技术和科学在今天也具有了统治合法化的功能之基本命题，对于分析变化了的情况……具有关键的意义”。这正是哈贝马斯对现代工业社会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关键性结论，即技术和科学是意识形态。为此题目，哈贝马斯曾在对谈中指出：“我著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问世于1968年，当时还旨在反对某种技术观。命题的核心在于，无选择的物的规律性的召遣和独立的经济、工业和科学复合体的不受影响性之命题，只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历史上变化的结构框架条件上转移开；这样的命题不必要地限制着进行实际政治干预的空间。我当时分析了由哈那·阿伦特更新了的，亚里士多德的“技术”和“实践”范畴，因为我想提醒人们注意，国家公民的政治交往在一个民主的共同体中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生产力，与此相反技术和科学的生产力不可能独立化。

当然，人们不可以从古典的意义上将从这样的技术观中得出政治讨论的“物的规律性”之技术和科学描绘成“意识形态”。马克思研究的是完全不同的现象，首先是现代理性法则和

政治经济学的从规范上包罗万象的流传，即自由主义本身。他将此视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必然虚假的意识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他用《德法年鉴》中的文章将此付诸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对自身的批判潜能被发动了起来。这些思想已不再适用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不仅阶级结构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而彻底得以改变，而且意识形态也改变了。因此，我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更多地谈到的是“残碎的”意识，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列宁的反映论导致一种非专门的，即过分泛化的、失去了其批判内容的意识形态概念。

另一个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论判断问题。剩余价值理论无疑有许多我在过去的著作中研究过的问题。请您允许我在这里强调指出，我从未说过，应用研究和技术革新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面对简单劳动力和复杂劳动力的技术和科学无论如何构成一个附加的源泉。

还有一个问题是早年卢卡奇曾经讨论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形式和结构之间的联系。卢卡奇将马克思提到的商品拜物教视为物化意识的所有形式的楷模；阿道尔诺在文化工业的理论中继续发展了这一命题。然而，两者在今天从经验上都不再可能保留了。”

哈贝马斯在这里的阐述，无疑有他新颖独到之处。譬如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判断问题，他就特别强调，他从未说过，应用研究和技术革新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事实上，哈贝马斯关于科技进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源泉以及关于马克思原先考察的剩余价值源泉——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的观点，曾引起过轰动，也曾遭到原苏联东欧国

家一些学者的激烈批判（中国有的学者曾借助这一批判的某些观点作过简单化的批判）。在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是正确和有效的，而“大批判”是错误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在这一观点上的问题在于，首先哈贝马斯从未讲过科技进步是唯一的剩余价值源泉，而是讲“一个”源泉，这是有区别的，理论批判必须讲求概念清楚。其次，应看到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研究的出发点和对象不同，即马克思研究的是工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亦含整体工人），哈贝马斯研究的是科技进步和科技人员（间接生产者的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基于工人——无产者的劳动，哈贝马斯则认为价值的源泉并非仅仅来自于（工人的）简单劳动，而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科技进步本身。这里也隐约可见哈贝马斯想从对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按照他的思路，如果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划分，科学技术工作理所当然的应是复杂劳动、高级劳动，而工人一般是从事简单劳动的，从而工人——简单劳动在今天创造的价值比例日益减少，工人的影响力也随之日益减弱，这是因为社会进步是靠生产力推动的，科技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并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样一来，既然简单劳动占次要地位，那么工人就不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主要动力，而是科技人员；革命主力军就不再是工人，而是掌握科技的知识分子。哈贝马斯由此预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掘墓人是无产阶级——工人的论断就是过时的和不能反映当今的变化了的。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研究的出发点和对象的不同当然决定了结论的不同，即马克思呼吁揭穿剩余价值的秘密，唤醒工人的觉悟，依靠工人阶级推翻旧世界，铲除剥削和压迫，并建设新世界；哈贝马斯则呼吁区分今日的剩余价值源泉与昔日剩余价值源泉之不同，

呼吁认清科技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呼吁依靠科技及其载体——知识分子来推进社会进步，变革命为进化，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建设新的世界。可见，我们不必死抠住“唯一源泉”不放，而应客观地、科学地对待这一问题。而且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也可清楚地看出，哈贝马斯从事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是在构建哈贝马斯理论的。

还应指出的是，哈贝马斯要构建的正是他的交往行为理论。那么，在他看来，交往行为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有哪些贡献？他是如何考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问题的？对这些问题哈贝马斯也作了答复：“这个问题难以用简短的话语来说清楚。一般来说，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至少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劳动领域以及同科学上客体化了的自然的技术交往领域片面地依赖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理性潜能也在交往行为领域获得展开。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发展也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并且在新的社会形式的生成中甚至做出了先行者的贡献。由此观点出发人们可以认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史和宗教史分析对于解释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是有益的。马克斯·韦伯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现象来理解的东西，不可能以一个简单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图式来表述。

“《交往行为理论》特别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蕴含于生活世界和日常沟通实践的理性潜能。这样的理性潜能不仅存在于劳动中，而且也存在于社会的相互交往中。在这方面我要讲的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说的就应该是真实的或正确的；以此也就意味着，观念性的一部分闯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这样的作用要求最终只能用论据来说明。以沟通为意向的日常实践与不可避免的观念化交织在一起。观念化则

属于日常语言的媒介，我们生命的繁衍也恰恰是通过这一媒介来实现的。如果父母要教育孩子，如果健在的人要学习前辈遗传下来的知识，如果个人和群体要合作，即不动用暴力而和睦相处，那么他们就必须进行交往行为。实际上也存在着只有通过交往行为才能完成的社会职能。在我们超主体划分的、重叠的生活世界中，包含着一个广泛的（当然对于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可抵抗的），没有它日常实践根本不可能进行的背景允可。

“因此，符号结构化的生活世界也服从于执着的理性化。无论如何现代社会中人们可能观察到，文化流传变得具有反思性，意识为规范的陈述需要而增长，社会化过程促进着类似抽象的自我同一性的东西，而自我同一性正摧毁着传统的角色同一性的桎梏。生活世界的这一理性化与专门从事物质的社会再生产的、经济的和行政的分配制度，产生某种矛盾。我在这里意在说明制度和生产世界的“调整”。

“马克思从本质上正确地描述了社会现代化。它一方面从政治统治秩序中看到了一个通过市场来调节的经济制度的矛盾，另一方面考察了一个经济生命力不强的国家机器的稳定性，而这一国家机器却作为税收国家依赖于非政治管理的社会产品并且同时对这一经济制度起作用。然而，我认为，人们不应仅仅以阶级结构变化的观点来理解这一确定整个现代的进化论步骤。系统理论清楚地告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合法统治一起而来的也有整个社会职能的专门化，而这一专门化则意味着整个制度的差别的更高水平。简单来说，以此达到了效益能力的提高，当然又是以日益增长的危机系数为代价的。于是，阶级结构确定下来，就像经济和国家管理赖以区分的媒介，即交换价值和行政权力在生活世界中从法律上被结构化一样。阶级

结构决定了形式上平等的权利之内容上的不平等，赋予具体的生活形式以社会阶层各别的图像。

“另一方面，以交往的日常实践为其中心的生活世界不构成被动的或者无抵抗的媒介。它们通过劳动的和消费者的角色，通过国家公民的和当事人的角色与经济和国家机器处于交换之中。它们肯定会被后两者“殖民化”，被“异化”，但是它们并不仅仅听任经济干预和行政干预的摆布。在非常情况下会发生受压制的生活世界的抵抗战争，即社会运动。如果人们从制度和生活世界的双重前景来观察社会动力，那么人们就得面对一元论的简短结论。物化效果同样可以从官僚化以及从公众的和私人的生活领域的金钱化中得出。人们也得面对整体论的简短结论：譬如说一种现代经济就在所有的生产关系中保留着一种制度上的固执。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就说明了这一点。人们不可以期望，客观的资本现象将简单地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废除同时消失并且能够同时自动地返还遭受价值规律压迫的生活世界以其自发性。”

哈贝马斯在这里对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作了迄今为止最精彩、最简短而又深入浅出的表述。他的探索无疑是有益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有助于理解他的技术意识形态论的，但从基调上看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由于本书旨在研究他和马尔库塞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所以对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留待以后再作评析。值得强调的是，哈贝马斯在90年代初发表的这些新观点、新情况，对我们研究哈贝马斯理论，思考新问题，是很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二、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理论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意义

在本书将要结束之际，就不禁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简而言之，在我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为了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结合新的实际，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结合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实际，二是结合现时代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颇具影响的世界性思潮，自应在此之列。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方法去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因为在研究中可以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可以进行鉴别，通过鉴别方能分清什么是真理，与什么是谬误，方能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其有益的、合理的因素。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可以使我们面向当代，在比较中更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规律，并对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新马克思主义”自封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

认为以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为其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面向 20 世纪中叶以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并从中得出新的结论,那么就会导致机械地重复原有的基本范畴,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僵化和脱离现时代的要求。抽象地说,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由于它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和认识的过程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成果和特征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资料的丰富,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主要的生产力已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直接源泉,从而改变了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的观点。这样一来也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的结构和职能,使他们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不再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维护和改善现存制度的共同利益把两大敌对阶级联合了起来,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显然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它把科学技术解释为剩余价值的直接源泉的观点,忽视了科学技术始终是由人发明、发展和驾驭的。即使是机器人,也是人的劳动的物化,机器人所“创造”的价值,不过是人的劳动价值的转移。它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两大敌对阶级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和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的结论,是将工人劳动的繁重艰辛和生活的贫困误作“无产者”概念的本质,是没有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源泉在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必然产生两大阶级的对立的观点的否定。又如“新马克思主义”从心理学出发,把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厌恶”感解释成觉醒(“革命”)的原因;从文化是唯一可以超越一切的观点出发,把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视为革命的先锋队并进而把“黑人、白人流浪者、失业者……”等组成的社会下层封为革

命的主力军,以及在未来社会问题上所持的“趋同论”观点,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符合的。这样的比较研究,就可以使我们一方面高度重视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学说所据以做出判断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结合这些新的实际,即在回答现实问题和分析、批判“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中,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加灵活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经过一个多世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充满新的生命力。

其次,研究“新马克思主义”,还可以使我们通过比较,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即使是在当代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也仍然需要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错误,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触及到的那些社会现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条件的变化,只能丰富和发展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可能使它过时无用。“新马克思主义”公开主张要探究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渊源性。这实际上是要马克思主义向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化靠拢。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现象只有在一个具体而完整的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而黑格尔哲学的优点正在于承认历史的重要性并将主体看作历史过程的原动力和产物,从而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同一;马克思正是根据黑格尔的同一的主体和客体理论才在历史内部找到了同一的主体和客体——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新马克思主义”据此认识,黑格尔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出生地和秘密,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要消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的渊源

性。“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主张，使马克思主义被黑格尔主义化了，使被马克思加以唯物主义改造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又被倒转了回去，唯心主义又恢复了自己的权威。清除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只能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但他们却企图从黑格尔那里寻求答案，这不能不使他们走上歧路。又如，他们提出“一切是为了人的幸福”，如果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把这里所说的“人”，看成是现实的人，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这当然是正确的，但由于他们从抽象的人出发，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与现实不符的理论。“新马克思主义”以“回到青年马克思那里去”为口号，宣称人的本质的确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基础，认为只有从人的自我实现出发才能去积极地扬弃人的异化并最终达到人性的复归。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现实马克思主义”由于变成了执政党的“官方理论”、“政治意识形态”而显得缺少人性和批判性，它的阶级性、“科学性”和“实证性”使自己变得狭隘、保守，变成了实践中的官僚主义。因此，“新马克思主义”主张恢复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发扬青年马克思的解放精神，进而创造一种揭露“社会主义新官僚”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创造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企图将马克思主义简化和归结为人道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来考察，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从马克思的“现实的人”倒退到抽象的人，从特殊的人道主义倒退到一般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可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有其合理与积极的部分，如强调对人的尊重、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和人的全面发展，但和马克思的学说还是有着严格的理论分野。

再次，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可以使我们在比较中正本清源，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比较中去伪存真、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并进而在坚持中研究新问题、新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另外，也应看到，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使我们获得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先进思想的结晶，它作为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提出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大部分人是由于对社会现实不满而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求社会出路并探索真理的。因此这就使他们在现象形态上部分地反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譬如他们认识到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看到了工人阶级因福利待遇的改善而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新问题等。它研究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虽然是错误的，是从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人本学和心理分析学出发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繁荣的背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所遭受的压抑，以它特有的方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并且触及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现实问题。“新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理论同现代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尝试虽然是失败的，但它在探索中的这些收获却可以启发人们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这也许正是它在西方拥有一定数量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追随者的原因所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来看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厦并不是平地而起的，也不是建立在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开放的、发展的和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有魄力面对“新马克思主义”，有能力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在比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附录

参考文献 Die Sekundärliteratur

1. Werke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

1843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in M. E. W., Bd. 1, s. 201—336。

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201—336页。

1843 An Ruge (im Mai 1843), Brief aus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n", in: M. E. W. Bd, 1. S. 338—343。

1843年,致卢格的信(1843年5月),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38—343页。

1843 Brief an Ruge im September 1843, in M. E. W., Bd. 1, S. 343—346。

1843年,致卢格的信(1843年9月),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43—346页。

1844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

leitung, in: M. E. W., Bd. 1, S. 378—391.

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78--391页。

1844 Zur Judenfrage, in M. E. W., Bd. 1, S. 347—377.

1844年,《论犹太人问题》,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347页--377页。

1844 Zu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k — ökonomisch — 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1844), in: Marx/Engels, 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 Berlin 1955, S. 42—166; “Kritik der Hegelscher Dialektik und Philosophie überhaupt” von “Drittes Manuskript”, in: Karl Marx frühe Schriften, Stuttgart 1962, Bd. 1, S. 637—666.

1844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载于:马克思恩格斯:《简明经济著作》;1955年柏林版,第42—166页;《手稿》第三篇“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的批判”,载于《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96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637—666页。

1844 Brief an Ludwig Feuerbach, 11. August 1844, in: M. E. W., Bd 27, S. 425—428.

1844年,《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信》(1844年8月11日),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7卷,第425—428页。

1845 Thesen über Feuerbach, in: M. E. W., Bd. 3, S. 5—8.

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5—8页。

1845 Die heilige Familie, in: M. E. W., Bd. 2, S. 3—224.

1845年,《神圣的家族》,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卷,第3—224页。

1846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hilosophen, in: M. E. W., Bd. 3, S. 9—530.

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3卷,第9—530页。

1847 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 in: M. E. W., Bd. 4, S. 63—182.

1847年,《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4卷,第63—182页。

1848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M. E. W., Bd., S. 459—493.

1848年,《共产党宣言》,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4卷,第459—493页。

1848 Artikel aus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Der magyarische Kampf, in: M. E. W., Bd. 6, S. 165—176.

1848年,摘自“新莱茵报”的文章《匈牙利的斗争》,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6卷,第165—176页。

1849 Lohnarbeit und Kapital, in: M. E. W., Bd. 6,

1849年,《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6卷。

1850 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vom

Mörz 1850, in: M. E. W., Bd. 7, S. 244—254.

1850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1850年3月),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7卷,第244—254页。

1850 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1850, in: M. E. W., Bd. 7, S. 9—107.

1850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7卷,第9—107页。

1851 Auszüge aus dem Buch “Elemens d’econorme politigue”, in: MEGA, I, Bd. 3.

1851年,《〈政治经济要素〉一书的摘录》,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 A本,第3卷。

1852 Der achzehnte Brumaire des couis Bonaparte, in: M. E. W., Bd. 8, S. 111—207.

1852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8卷,第111—207页。

1857—58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ietz, Berlin 1974.

1857—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1974年柏林迪茨出版社版。

1865 Arbeitslohn, Preis und Profit, in: M. E. W., Bd. 16.

1865年,《工资、价格和利润》,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6卷。

1867 “Vorwort” zur 1. Auflage des “Kapitals”, in: M. E. W., Bd. 23, S. 18—30.

1867年,《〈资本论〉第1版〈序言〉》,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18—30页。

1867 Kapital, geschrieben 1867 — 1883; Bd. 1 1867 veröffentlicht, Bd. 2 und 3 von Engels herausgegeben 1885 und 1894, in: M. E. W., Bd. 23—25.

1867年,《资本论》,写于1867—1883年;1867年出版了第1卷,第2卷和第3卷由恩格斯编辑出版于1885年和1894年,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3—25卷。

1872—1875 Le Capital, Maurice Lachatre et Cie, Paris 1875

1872—1875年,《资本论》法文版,1875年巴黎版。

1873 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 des Kapitals, in: M. E. W., Bd. 23, S. 18—30.

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跋》,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3卷,第18—30页。1875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in: M. E. W., Bd. 19, S. 11—32.

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9卷,第11—32页。

1882 Vorrede zur zweiten russischen Ausgabe de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M. E. W., Bd. 19, S. 295—296.

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9卷,第295—296页。

1843 Fortschritte der Sozialform auf dem Kontinent, in: M. E. W., Bd. 1, S. 480—496.

1843年,《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1卷,第480—496页。

1873—1886 Dialektik der Natur, in: M. E. W., Bd. 20, S. 307—570

1873—1886年,《自然辩证法》,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0卷,第307—570页。

1878 Antidühring. Herm Eugen Dührings Umu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in: M. E. W., Bd. 20, S. 5—306.

1878年,《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0卷,第5—306页。

1883 “Vorwort zum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e Ausgabe von 1883)”, in: M. E. W., Bd. 21, S. 3—4.

1883年,《〈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3—4页。

1884 Marx und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1848—1849, in: M. E. W., Bd. 21, S. 16—24.

1884年,《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16—24页。

1884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1884), in: M. E. W., Bd. 21, S. 27—173.

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27—173页。

1888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M. E. W., Bd. 21, S. 259—307

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于《马恩著作》德文版,第21卷,第259—30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50

卷。

《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

2. Werke von Herbert Marcuse 海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

1928 Beiträge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Philosophische Hefte 1 (1928), S. 45—68. Wiederabdruck in: Herbert Marcuse/Alfred Schmidt: Existentialistischen Marxinterpretation, Frankfurt/m 1973, S. 41—84.

1928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贡献》，载于《哲学杂志》，第1期（1928年），第45—68页。再版于：赫伯特·马尔库塞，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阐释》，1973年法兰克福版，第41—84页。

1929 Besprechung von Karl Vorländer: 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in: Die Gesellschaft, 6Jg. 1929, S. 186—189.

1929年，卡尔·福兰德的评论：《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著作》，载于：《社会》，第6年卷，1929年，第186—189页。

1929 über konkrete Philosophie,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62 (1929), S. 111—128.

1929年，《论具体哲学》，载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第62期（1929年），第111—128页。

1929, Zur Wahrheitsproblematik der soziologischen Methode; Karl Mannheim: Ideologie und Utopie, in: Die Gesellschaft, 6. Jg. 1929, S. 356—369.

1929年，《论社会学方法的真理问题：卡尔·曼海姆：意识

形态与乌托邦》，载于：《社会》第6年卷，1929年，第356—369页。

1930 Zum Problem der Dialektik I, in: Die gesellschaft VIII (1930). S. 15 — 30. Wiederabdruck in: Herbert Marcuse Schriften, Bd. 1, Frankfurt/m 1978, S. 407—422.

1930年，《关于辩证法问题》，第1集，载于《社会》，第8期（1930年），第15—30页。

再版于：《赫伯特·马尔库塞文集》，第1卷，1978年法兰克福版，第407—422页。

1930 Transzendentaler Marxismus? in: Die Gesellschaft VIII (1930), S. 304—326.

Wiederabdruck in: Adorno/Horkheimer/Marcuse, a. a. O., S. 283—309.

1930年，《先验的马克思主义?》，载于《社会》，第7期（1930年），第304—326页。

再版于《阿道尔诺、豪克海默、马尔库塞》，引文出处同上，第283—309页。

1931 Zum Problem der geschichtlichen Wirklichkeit, in: Die gesellschaft VIII (1931), S. 350—367

Wiederabdruck in: Adorno/Horkheimer/Marcuse, a. a. O., S. 340—360

1931年，《历史现实性的问题》，载于《社会》，第8期（1931年），第350—367页。

再版于：《阿道尔诺、豪克海默、马尔库塞》，引文出处同上，第340—360页。

1931 Zum Problem der Dialektik II, in: Die Gesellschaft VIII

(1931), S. 541—557

Wiederabdruck in: Herbert Marcuse Schriften, Bd. 1, Frankfurt/m 1978, S. 423—444

1931年,《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第2集,载于《社会》,第8期(1931年),第541—557页。

再版于:《赫伯特·马尔库塞文集》,第1卷,1978年法兰克福版,第423—444页。

1932 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geschichtlichkeit, Frankfurt/m 1932.

1932年,《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1932年法兰克福版。

1932 Besprechung von Heinz Heimsoeth: Die Errungenschaften des Deukchen Idealismus, in: Deukche Literaturzeitung, 3. Folge, 5Jg. 1932, sp. 2024—2029

1932年海因茨·海姆梭斯的评论:《德国唯心主义的成就》,载于《德意志文学报》第3系列,第5年卷,1932年,Sp. 2024—2029。

1932 Neue Quellen Zur gi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Die gesellschaft IX (1932), S. 136—174.

Wiederabdruck in: Herbert Marcuse, Ideen Zu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Frank furt/m 1969, S. 7—54.

1932年,《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载于《社会》,第9期(1932年),第136—174页。

再版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思想》,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7—54页。

1933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wirtschaftlicher

Arbeitsbegriffs,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69 (1933), S. 257—292.

Wiederabdruck in: Herbert Marcuse: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Bd. 2, Frankfurt/m 1965, S. 7—48.

1933年,《论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第69期(1933年),第257—292页。

再版于:赫伯特·马尔库塞:《文化与社会》,第2卷,1965年法兰克福版,第7—48页。

1934 Besprechung von Herbert Wacker: Das verhältnis des jungen Hegel zu Kant, in: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3, Folge, 7. Jg. 1934, Sp. 629—630.

1934年,赫伯特·维克的评论:《青年黑格尔与康德的关系》,载于:《德意志文学报》第3系列,第7年卷,1934年,Sp. 629—630。

1934 Der Kampf gegen den C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ären Staatsauffassung,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 (1934), S. 161—195.

1934年,《国家总体观反对自由主义》,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3期(1934年),第161—195页。

1936 Zum Begriff des wesens,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 (1936), S. 1—39.

1936年,《论本质概念》,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5期(1936年),第1—39页。

1937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I (1937) S. 54—94.

1937年,《论文化的肯定特征》,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

6 期 (1937 年), 第 54—94 页。

1937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I (1937), S. 631—647.

1937 年,《批判理论的哲学》,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 6 期 (1937 年),第 631—647 页。

再版于:《赫伯特·马尔库塞文集》,第 3 卷,1979 年法兰克福版,第 227—249 页。

1938 Zur Kritik des Hedonismus,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ahrgang 7. 1938, S. 55—89.

Wiederabdruck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g. 7 (1938), Bd. 7, München 1980, S. 55—89.

1938 年,《对享乐主义的批判》,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 7 年卷,1938 年,第 55—89 页。

再版于:《社会研究杂志》第 7 年卷 (1938 年),第 7 卷,1980 年慕尼黑版,第 55—89 页。

1941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1941; 2. Auflage mit einem Nachwort 1954; broschierte Ausgabe mit einem Vorwort, "A Note on Dialectic", Boston 1960.

Die deutsche Ausgabe: Vernunft und Revolution. Hegel und die Entstehung der Gesellschaftstheorie, 3, Darmstadt und Neuwied 1962.

1941 年,《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产生》,1941 年纽约版;第 2 版增补一个“跋”(1954 年),平装本带序言《辩证法注释》,1960 年波士顿版。

德文版:《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产生》,1962

年达姆施塔特—新维德版。

1948 Existentialismus; Remarks on Jean—Paul Satre's "L'Être et le néant", in: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II (1948), S. 309—336. Deutsch in: Sinn und Form I (1950), S. 50—82.

Wiederabdruck in: Herbert Marcuse;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Bd. 2, Frankfurt 1965, S. 49—84.

1948年,《论让·保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载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期刊》,第8期(1948年),第309—336页。德文本载于:《意义与形式》,第2期(1950年),第50—82页。

再版于:赫伯特·马尔库塞:《文化与社会》,第2卷,1965年法兰克福版,第49—84页。

1950/51 Besprechung von Geirg Lukacs; goethe und seine Zeit,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11, 1950/51, S. 142—144.

1950年至51年,捷尔吉·卢卡奇的评论:《歌德与他的时代》,载于《哲学和现象学研究》,第11卷,1950年至1951年,第142—144页。

1950 Eros and Civilisation, Boston 1955, Die deutsche Ausgabe, 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 Ein Philosophisches Beitrag in SigmundFreud, Frankfrut 1965.

1950年,《爱欲与文明》,1955年波士顿版,德文版,《欲望结构与社会,对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哲学研究》,1965年法兰克福版。

1958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58, broschierte Ausgabe mit einem neuen Vorwort, New York

1961.

Die deutsche Ausgabe: Die gesellschaftslehre des nowjetischen Marxismus, Neuwied—Berlin 1964.

1958年,《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个批判性的分析》,1958年纽约版。带前言的平装本,1961年纽约版。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1964.

Die deutsche Ausgab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Studien zur Ideologie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Darmstadt und Neuwied 1967.

1964年,《单向度的人,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之研究》,1964年波士顿版。

德文版:《单向度的人,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1967年达姆施塔特和新维德版。

1964 Perspektiven des sozialismus in der entwickelt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in Praxis 2/3 (1964), S. 260—270.

1964年,《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前景》,载于《实践》2/3 (1964年),第206—270页。

1965 Vorwort zu: Herbert Marcuse: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Bd. 1, a. a. O., S. 7—16.

1965年,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文化与社会》,第1卷前言,引文出处同上,第7—16页。

1966 Zum Begriff der Negation in der Dialektik, Vortrag gehalten vor dem Prager Hegel — Kongress 1966, Zuerst veröffentlicht in Filosoficky Casopis 3, Prag 1967.

Der deutsche Wiederabdruck in: Ideen zu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69, S. 185--190

1966年,《关于辩证法的否定概念》,在布拉格黑格尔大会上的发言(1966年),最先刊登在Filosoficky Cacopis,1967年布拉格版。

德文版再版:《社会批判理论思想》,1969年法兰克福版,第185—190页。

1966 Zur geschicht der Dialektik, in: Sowjetsystem und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Freiburg 1966, S. 1192--1211.

1966年,《关于辩证法的历史》,载于《苏维埃制度和民主社会》,1966年弗赖堡版,第1192—1211页。

1968 Befreiung von der überflußgesellschaft, in: David Cooper (ed.): The Dialectics of Liberation, Penguin Book.

Die deutsche Ausgabe: Dialektik der Befreiung, Reinbek bei Hamburg 1969, S. 90—102.

1968年,《富裕社会的解放》,载于《解放的辩证法》(大卫·库普尔编)。

德文版:《解放的辩证法》,1969年汉堡雷伯克版,第90—102页。

1969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Die deutsche Ausgabe: Versuch über die Befreiung, Frankfurt/m 1969.

1969年,《论解放》,波士顿版。

德文版:《试论解放》,1969年法兰克福版。

1972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Die deutsche Ausgabe: Konterrevolution und Revolte, Frankfurt 1973.

1972年,《反革命与造反》,波士顿版。

德文版:《反革命与造反》,1973年法兰克福版。

1974 Bemerkungen über die Kunst und Revolution. Manuskript eines Vortrage im Sender Freies Berlin am 9. 7. 1974.

1974年,《论艺术和革命》,1974年7月9日在自由柏林电台的讲演稿。

1977 Die Permanenz der Kunst. Wider eine bestimmte marxistische Asthetik/Ein Essay, Münchenwien 1977.

1977年,《艺术的持续性,对某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论文),1977年慕尼黑—维也纳版。

3. Werke Von Juergen Habermas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著作

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 Neuwied 1962.

《公共性的结构转变》,诺伊维特1961年版。

Theorie und Praxis, Neuwied 1963.

《理论和实践》,诺伊维特1963年版。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Beiheft 5, Tübingen.

《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年。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M, 1968.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法兰克福1968年版。

Erkenntnis und Interssese, Frankfurt/M, 1968.

《认识 and 兴趣》,法兰克福1968年版。

Theorie der Gerellschaft oder Sozialtexhnilogie, Frankfurt/M 1971.

- 《社会理论或者社会技术》，法兰克福 1971 年版。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M 1973.
- 《哲学政治学论丛》，法兰克福 1973 年版。
Kultur und Kritik, Frankfurt/M 1973.
- 《文化和批判》，法兰克福 1973 年版。
Legitimationsprobleme in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M 1973.
- 《后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化问题》，法兰克福 1973 年版。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6.
-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法兰克福 1976 年版。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d., Frankfurt/M 1981.
- 《交往行为理论》，两卷本，法兰克福 1981 年版。
Kommunikatives Handeln und Moralbewußtsein, Frankfurt/M 1983.
- 《交往行为和道德意识》，法兰克福 1983 年版。
Die Moderne—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Leipzig 1990.
- 《现时代——一个未完成的课题》，莱比锡 1990 年版。
Vergangenheit als Zukunft, Zuerich 1990.
- 《作为未来的过去》，苏黎世 1990 年版。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eacon Press, Boston 1979.
- 《交往与社会进化》，波士顿 1979 年版。

4. Die zu dem Thema herangezoene Literatur 与本著相关的文献

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Der Begriff des Unbewußten in der transzendentalen Seelenlehre, unveröff. Dissertation, Universität Frankfurt 1927

Th·W·阿道尔诺:《先验的灵魂说中的非意识概念》(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1927年法兰克福大学版。

Adorni, Th·W-.: Rezension des Marcuseschen Buchs "Hegels D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ahrgang 1, 1932, Bd. 1, München 1970, S. 409—410.

Th·W·阿道尔诺:《评马尔库塞的〈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一书》, 载自《社会研究杂志》, 第1年卷, 1932年, 第1卷, 1970年慕尼黑版, 第409—410页。

Adorno, Th. W-.: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 1966.

Th. W. 阿道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1966年法兰克福版。

Adorno—Konferenz 1983, eine Referatesammlung, hrg. v. L. Friedeberg u. J. Habermas, Frankfurt 1983.

《阿道尔诺讨论会》(1983), 论文集, L·弗里德堡和J·哈贝马斯编。1983年法兰克福版。

Anderson, Perry: über den westlichen Marxismus, Frankfurt 1978.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 1978年法兰克福版。

Arnason, J. P.: Von Marcuse zu Marx, Neuwied und Berlin 1971年。

J·P·安耐森：《从马尔库塞到马克思》，1971年新维德—柏林版。

Bauer, Bruno; Feldzüge der reinen Kritik, eine Sammlung von Aufsätzen, eingeleitet von H. —M. Saß, Frankfurt 1968.

布鲁诺·鲍威尔：《纯粹批判的战场》，论文集，H·M·萨斯作《序言》，1968年法兰克福版。

Bergner, Dieter; Der Mensch. Neue Wortmeldungen zu einem alten Thema, Beiträge von Bergner usw., hrg. von Bergner, Berlin 1982

迪特·拜格纳：《人》，对旧课题的新发言，拜格纳的论文，拜格纳编，1982年柏林版。

Bloch, Ernst; Subject — Objekt. Erklärungen zu Hegel, Frankfurt 1972.

恩施特·布洛海：《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1972年法兰克福版。

Cerroni, Umberto; Gramsci—Lexikon, Hamburg 1979.

乌姆拜特·蔡罗尼：《葛兰西词典》，1979年汉堡版。

Deng, Xiaoping; Ausgewählte Werke (1975—1982), Beijing 1983.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1983年北京版。

Dilthey, W.;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VI, 3. Auflage, Stuttgart/Göttingen 1958, S. 252—291.

W·狄尔泰：《历史世界在精神科学中的建构》，载于：《W·狄尔泰全集》，第7卷，第3版，1958年斯图加特—格丁根版，第252—291页。

Drees, Martin: *Alltag und Vergegenständlichung. Eine kritische Rekonstruktion zentraler Aspekte des Gesamtwerkes von Georg Lukacs*, unveröffent. Dissertation, Universität Bonn 1981.

马丁·德雷斯：《日常生活与对象化，对捷尔吉·卢卡奇全集中中心观点的批判性重建》，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81年波恩大学版。

Feick, Heidegard: *Index zu Heideggers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1968.

海德戈特·冯克：《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索引》，1968年杜宾根版。

Fetscher, Iring: *Grundbegriffe des Marxismus. Eine Lexikalische Einführung*, Hamburg 1978.

伊林·费彻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一部词典导论》，1978年汉堡版。

Fetscher, Iring: *Der Marxismus. Seine geschichte in Dokumenten*, Bd. I: Philosophie. Ideologie, München 1976.

伊林·费彻尔：《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历史》，第1卷，《哲学意识形态》，1976年慕尼黑版。

Fichte, Johann Gottlieb: *Zweite Einleitung in die wissenschaftslehre*, werke Dritter Band, Felix Meiner in Leipzig, S. 35—102.

约翰·哥特利伯·费希特：《科学学说的第二个导论》，第3卷，莱比锡费利克斯·美娜版，第35—102页。

H·Frank/R. Trauzettel: *Das chinesisches Kaiserreich*, Frankfurt 1968.

H·弗兰克和R·特劳蔡特尔：《中华帝国》，1968年法兰克福版。

Freud, Sigmund; Vorlesung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Leipzig, Wien, Zürich 1926.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讲座》，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1926年莱比锡—维也纳—苏黎士版。

Fromm, Erich; Die Furcht Vor der Freiheit, Steinberg, Zürich 1945.

埃里希·弗洛姆：《畏惧自由》，1945年施泰因贝格—苏黎士版。

Fromm, Erich; The Human Implications of Instinctive "Radicalism," in: Dissent I, 4 (1955) und A Counter Rebuttal, in: Dissent I, 1 (1956).

埃里希·弗洛姆：《人类本能激进主义的内涵》，载于《争鸣》第二期（1955年4月），和《一个反辩驳》，载于《争鸣》第三期（1956年1月）。

Fromm, Erich; Marx' Beitrag zur Wissenschaft des Menschen, in Analytische Sozialpsychologie und Gesellschaftstheorie, Frankfurt 1970.

埃里希·弗洛姆：《马克思对人学的贡献》，载于《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理论》，1970年法兰克福版。

Fromm, Erich; Das Menschenbild bei Marx. Mit den Wichtigsten Teilender Frühschriften von Karl Marx, Frankfurt 1963.

埃里希·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附：卡尔·马克思最重要的早期著作，1963年法兰克福版。

Geschichte der Dialektik (Rollektive Arbeit):

1. 14. bis 18. Jahrhundert, (Moskau 1974) Berlin 1979;
2. Die klassische deutsche Philosophie, (Moskau 1978) Berlin 1980.

《辩证法的历史》(集体撰写)

1. 14 世纪至 18 世纪, (1974 年莫斯科版) 1979 年柏林版;
2. 《德国古典哲学》(1978 年莫斯科版) 1980 年柏林版。

Geschichte der Marxistischen Dialektik (Rollektive Arbeit):

1. Von der Entstehung des Marxismus bis zur Leninschen Etappe, (Moskau 1971) Berlin 1974;
2. Die Leninsche Etappe (Moskau 1973) Berlin 1976.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集体撰写);

1. 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到列宁阶段 (1971 年莫斯科版) 1974 年柏林版。
2. 列宁阶段 (1973 年莫斯科版) 1976 年柏林版。

Geyer, Carl-Friedrich: Kritische Theorie, Freiberg/München 1980 卡尔·弗里德里希·盖耶:《批判理论》, 1980 年弗莱堡—慕尼黑版。

Geyer, Carl — Fredrich: Aporie der Metaphysik und Geschichtsbegriff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eiburg/München 1980.

卡尔·弗里德里希·盖耶:《批判理论的形而上学概念和历史概念的疑难》, 1980 年弗赖堡—慕尼黑版。

Görlich, B.; Alfred Lorenzer, Alfred Schmidt;

Der Stachel Freud, Beiträge und Dokumente zur Kulturismus — Kritik. Mit Texten von Otto Fenichel, Th. W. Adorno,

Max Horkheimer und Herbert Marcuse. hg. V. B. Görlich, Frankfurt 1980.

B·戈里希·阿尔弗雷德·劳伦茨,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弗洛伊德之刺》, 对文化主义批判的论文和文件, 附有奥托·费尼彻尔, Th·W·阿道尔诺, 马克斯·豪克海默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选著, 由 B·戈里希编, 1980 年法兰克福版。

H·Guminor/R, Ringguth: Max Horkheimer, Reinbek bei Hamburg 1973.

H·古米诺, R·林古特:《马克斯·豪克海默》, 1973 年汉堡雷伯克版。

Habermas, Jürgen: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Neuwied—Berlin 1963.

约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 社会哲学研究》, 1963 年新维德—柏林版。

Habermas, Jürgen: Zum Geleit, in: Antworten auf H. Marcuse, Frankfurt 1968, S. 9—16.

约尔根·哈贝马斯:《前言》, 载于《对 H·马尔库塞的答复》, 1968 年法兰克福版, 第 9—16 页。

Hegel, G. Wilh. F.: („Kleine Logik“ der Enzyklopädie) system der Philosophie. Erster Teil. Die Logik, in: Hegel Sämtliche werke, Bd. 8. stuttgart 1929.

G·Wilh. F·黑格尔:《百科全书中的《小逻辑》》哲学体系, 第一部分, 逻辑, 载于《黑格尔全集》, 第 8 卷, 1929 年斯图加特版。

Hegel, G. Wilh.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Theorie Werkausgabe, Frankfurt 1970,

Bd.^r 3.

G · Wilh · F ·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载于《二十卷著作 理论版》，1970年法兰克福版，第3卷。

Hegel, G. Wilh, E. ;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Leipzig 1940.

G · Wilh · F ·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940年莱比锡版。

Hegel, G. Wilh, F. ;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I und II, in: Werke, Bd. 16 und 17, Frankfurt 1969.

G · Wilh · F ·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载于《黑格尔全集》，第16卷和17卷，1969年法兰克福版。

Hegel, G. Wilh. F. ; 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rg. Von J. Hoffmeister, Hamburg 1940.

G · Wilh · F · 黑格尔：《哲学史导言》，霍夫曼斯特编，1940年汉堡版。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Halle a. d. S. 1941.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41年哈勒版。

Heiseler, J. H. V. ; Die "Frankfurter Schule" im Lichte des Marxismus (Zur Kritik der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von Horkheimer, Adorno, Marcuse, Habermas), hg. V. J. H. V.

Heiseler, A. steigerwald und J. Schleifstein, Frankfurt/m 1970.

J · H · V · 海泽勒：《马克思主义眼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豪克海默、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哲学之批判》，1970年法兰克福版。

Hermann, Friedrich Wilhelm von: Der Begriff der Phänomenologie bei Heidegger und Husserl, Frankfurt 1981.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海尔曼：《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概念》，1981年法兰克福版。

Horkheimer, Max; Rede anlässlich eines Festaktes üb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forschung”, in: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XXVII, Frankfurt/m 1931.

马克斯·豪克海默：《在庆祝活动时关于“社会研究现状”的讲话》，载于《法兰克福大学演讲录》，第28卷，1931年法兰克福版。

Horkheimer, Max; “Vorwort” für di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ahrgang 1 (1932), S. I—N.

Wiederabdruck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g. 1 (1932), Bd. 1, München 1980, S. I—N.

马克斯·豪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杂志〉所提〈序言〉》，第1年卷（1932年），第1至4页。

再版于《社会研究杂志》第1年卷（1932年），第1卷，1980年慕尼黑版，第1至4页。

Horkheimer, Max;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g. 6 (1937), S. 245—294.

Wiederabdruck in: Kritische Theorie 1, Frankfurt/m 1968.

马克斯·豪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6年卷（1937年），第245—294页。

再版于《批判理论》，第2卷，1968年法兰克福版。

Horkheimer/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 1969.

豪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的辩证法》，1969年法兰克福版。

Horkheimer, Max; Notizen 1950 bis 1969 und Dämmerung.

Notizen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1974.

马克斯·豪克海默：《1950年至1969年摘录》，《朦胧》，《德国笔记》，1974年法兰克福版。

Horkheimer, Max: Kritische Theorie, I und II, Frankfurt 1968.

马克斯·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第1卷和第2卷，1968年法兰克福版。

Horkheimer, Max: Kritische Theorie gestern und Heute, Nachschrift eines freien Vortrags, gehalten in Venedig 1970, in: Gesellschaft im Übergang, Frankfurt/M 1981, S. 162—175

马克斯·豪克海默：《批判理论的昨天与今日》一个自由演讲的书面记录，1970年作于威尼斯，载于《过渡中的社会》，1981年法兰克福版，第162—175页。

Hu, Qiaomu: über Humanismus und Entfremdung, in: Zeitung "Ri—Min—Ri—Bao" vom 27. 1. 1984. Peking, S. 1—5.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载于《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北京第1—5页。

Jansohn, Heinz: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ische Grundlage seiner Gesellschaftskritik, Bonn 1971,

海因茨·杰逊：《赫伯特·马尔库塞，他的社会批判的哲学基础》，1971年波恩版。

Jay, Martin: Dialektische Phantasie, Die 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1923—1950, zuerst erschienen in Amerika und England 1973, deutsche Ausgabe, Frankfurt 1976.

马丁·杰伊：《辩证法的幻像·法兰克福学派及社会研究所 1923—1950 年的历史》，1973 年在美国和英国出版，1976 年法兰克福出版德文版。

Kant, Immanuel;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2. Auflage.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 2 版。

Kant, Immanuel;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Akademie-Ausgabe VI.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学术版第 6 版。

Kant, Immanuel; Einleitung zu der Vorlesung über Logik, in: Werke, AA., Bd. 9, S. 25.

伊曼努尔·康德：《逻辑讲演录导论》，载于《康德著作》AA，第 9 卷，第 25 页。

Knecht, Ingbert: Sartres Theorie der Entfremdung, unveröffent. Dissertation, Universität Bonn 1972.

英伯特·克耐西特：《萨特的异化理论》，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2 年波恩大学版。

Kolakowski, Leszek: Die Hauptströmungen der Marxismus, München (Piper) 1979, Bd., 1—3.

莱斯泽克·科拉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1979 年慕尼黑版，第 1—3 卷。

Korsch, K.;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Hrsg. u. eingeleitet v. E. Gerlach, Europ. Verlagsanstalt Frankfurt 1966.

卡·科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由 E·盖拉海编并撰导论，1966 年欧洲出版社，法兰克福版。

Krahl, Hans Jürgen;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Zur historischen Dialektik von bürgerlicher Emanzipation und prole-

tarischer Revolution. Frankfurt 1971.

汉斯·约尔根·科拉尔：《组织与阶级斗争，论资产阶级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辩证法》，1971年法兰克福版。

Kupsch, Wolfgang: Marx, Mao und Marcuse, Hamburg — Bergstadt 1970.

沃尔夫冈·库伯需：《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1970年汉堡—贝格斯泰特版。

Lefebvre, Henri: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Frankfurt 1966.

亨利·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1966年法兰克福版。

Lenin, W · I. : Die historischen Schicksale der Lehre von Karl Marx, in: Lenin Ausgewählte Werke in zwei Bänden, Moskau 1946, Bd. I, S. 67—70.

弗·伊·列宁：《卡尔·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于《列宁选集》，两卷本，1946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67—70页。

Lenin, W · I. : Karl Marx, zuerst veröffentlicht 1915 in Granats Lexikon, 7. Auflage, Be. 28.

Deutsch in: Lenin Sämtliche Werke. Wien—Berlin 1929, Bd. XVII, S. 7—57.

弗·伊·列宁：《卡尔·马克思》，首先在1915年发表于《格拉那茨百科全书》，第7版，第28卷。

德文版载于：《列宁全集》，1929年维也纳—柏林版，第18卷，第7—57页。

Lenin, W · I. : Staat und Revolution. Die Lehre des Marxismus vom Staat und die Aufgaben des Proletariats in der Revolution, in: Lenin Werke, Bd. 25, Berlin 1977, S. 393—

507.

弗·伊·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载于《列宁著作》第25卷，1973年柏林版，第393—507页。

Lenin, W · I. ;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der Verräter Kautsky, in: Lenin Werke, Bd. 28, Berlin 1974.

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于：《列宁著作》，第28卷，1974年柏林版。

Lenin, W · I. ; Kommunismus. Zeitschrift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für die Länder Südosteuropas (in der deutschen sprache), Wien, Heft 1/2 vom 1. Februar 1920 bis Heft 18 vom 8. Mai 1920, Lenin Werke, Bd. 31, Berlin 1974. S. 153—155.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为东南欧各国发行的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维也纳，自1920年2月1日第1—2期创刊至1920年5月8日第18期，《列宁著作》第31卷，1974年柏林版，第153—155页。

Lenin, W · I. ; NOch einmal über die Gewerkschaft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und die Fehler der Genossen Trotzki und Buchorin (1921), in: Sammelband, Wien—Berlin 1925.

弗·伊·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1921年），载于《列宁全集》，1925年维也纳—柏林版。

Lenin, W · I. ; Was tun? Brennende Fragen unserer Bewegung, in Sämtliche Werke, Bd. IV, zweiter Halbband, S. 125—335.

弗·伊·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载于《列宁全集》，第4卷第2分册，第125—335页。

Lenin, W · I. : Das Verhältnis der Sozialdemokratie zur Bauernbewegung, in: Sämtliche Werke, Bd. VII, S. 241—251.

弗·伊·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载于：《列宁全集》，第8卷，第241—251页。

Lenin, W · I. : Materialismus und Empirokritizismus, in: Sämtliche Werke, Bd. XVIII.

弗·伊·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载于：《列宁全集》，第13卷。

Li, Zhongshang: Zur Kritik der “Studien zur Ideologie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Von Herbert Marcuse. Eine Inhaltsangabe von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Übersetzung, Peking 1983, Nr. 1. S. 64—67.

李忠尚：《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之批判，对〈单向度的人〉内容简介》，载于《哲学译丛》，1983年北京，第1期，第64—67页。

Li, Zhongshang: Entfremdungsbegriff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n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Aachen 1985.

李忠尚：《异化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1985年德国亚琛版。

Li, Zhongshang, Übersetzungen:

a) Marx Engels Werke, Bd. 42. (aus dem Deutschen ins Chinesische,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ussischen und englischen Ausgaben), Peking 1979.

b) *Geschichte der marxistischen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übersetzt und eingeleitet veröffentlicht Peking 1983, (in Zusammenarbeit mit anderen Kollegen).

李忠尚参译的译著

a)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第42卷（德译中；参考俄文版本和英文版本）1979年北京版。

b) 《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83年北京出版（合译）。
Lukacs, Georg: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Neuwied — Berlin 1968.

捷尔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968年诺伊维特—柏林版。

Lukacs, Georg: *Lenin, Studie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1924)*, in: *Organisation und Illusion. Politische Aufsätze III*, Darmstadt 1977, S. 209 — 301.

捷尔吉·卢卡奇：《列宁，他的思想的前后联系研究》（1924），载于《组织与幻想》政治文章第三集，1977年达姆施塔特版。第209—301页。

Lukace, Georg: *Marxismus und Stalinismus (1933)*, Reinbek bei Hamburg 1970.

捷尔吉·卢卡奇：《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1933），1970年汉堡雷伯克版。

Lukacs, Georg: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Die ontologischen Grundprinzipien von Marx (Ontologie — Marx)*, Darmstadt u, Neuwied 1972.

捷尔吉·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马克思的本体论基本原则（本体论—马克思）》，1972年达姆施塔特和新维德版。

Lukacs, Georg: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Die Arbeit (Ontologie — Arbeit), Neuwied und Darmstadt 1973.

捷尔吉·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劳动(劳动本体论)》1973年新维德与达姆施塔特版。

Lukacs, Georg: Brief an Iring Fetscher (6. 9. 1962 aus Budapest), in: I. Fetscher, "Der Marxismus", Bd. 1, München/Zürich 1975, S. 137—138.

捷尔吉·卢卡奇:《致伊林·费彻尔的信》(1962年9月6日自布达佩斯),载于:伊林·费彻尔的《马克思主义》,第1卷,1975年慕尼黑—苏黎士版,第137—138页。

MacIntyre, Alasdair: Herbert Marcuse, München 1971.

阿拉斯泰尔·马克图列:《赫伯特·马尔库塞》,1970年伦敦版。

Mannheim, Karl: Wissenssoziologie, eine Sammlung von Aufsätzen, Rezensionen und Kritiken, herausgegeben von Heinz Maus und Friedrich Fürstenberg, eingeleitet von Kurt H. Wolf, Erstveröffentlichung als Sammlung 1964, Neuwied am Rhein und Berlin (2. Auflage 1970).

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一部文章、评论和批判集子,由海茵茨·毛斯和弗里德里希·菲尔斯滕贝格编,海·沃尔夫·库特作序,1964年作为集册出版,莱茵新维德与柏林版(1970年第2版)。

Mao, Zedong: über die Praxis, in: Ausgewählte Werke, Bd. 1, Peking 1968, S. 347—364.

毛泽东:《实践论》,载于:《毛泽东选集》,第1卷,1968年北京版,第347—364页。

Mao, Zedong: über den Widerspruch, in: Ausgewählte Werke, Peking 1968, Bd. 1, S. 365—406.

毛泽东:《矛盾论》,载于《毛泽东选集》,第1卷,1968年北京,第365—406页。

Mao, Zedong: Ausgewählte Werke, Bd. 1—4, Peking 196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4卷,1968年北京版。

Markert, W.: Der Mensch im Kommunistischen System. Tübinger Vorträge über Marxismus und Sowjetstaat, hrg. V. W. Markert, Tübingen 1957.

W·马克特:《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在杜宾根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国家的讲演,由W·马克特编,1957年杜宾根版。

Maurer, Reinhard: Der angewandte Heidegger Herbert Marcuse und das akademische Proletariat, in: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herausgegeben von Hermann Krings usw., 77. Jahrgang 1970, . Halbband, alber Freiburg/München, S. 238—259.

雷哈特·毛勒:《依靠海德格尔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学术无产阶级》载于:《哲学年鉴》由海尔曼·克林斯等编,1979年(总)第77年卷,第2分册,弗赖堡—慕尼黑出版,第238—259页。

Merleau—Ponty, Maurice: Die Abenteuer der Dialektik, Erstver-öffentlichung Libraire Gallimard 1955. Deutsche Ausgabe Frankfurt 1974.

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利伯雷尔·加利马特第一次出版发行,1974年法兰克福德文版。

Merleau—Ponty. Maurice: Humanism and Terror, Boston

1969.

梅劳·庞蒂：《人道主义的恐怖》，1969年波士顿版。

Meszapos, Istvan: Der Entfremdungsbegriff bei Marx, München 1973.

伊斯特冯·曼斯扎伯司：《马克思的异化概念》，1973年慕尼黑版。

Ng, Hong Chilk: Staatsphilosophie von Marx und ihre Aktualität in unterentwickelten Ländern, München 1983.

Ng, 宏修克：《马克思的国家哲学和它在不发达国家的现实性》，1983年慕尼黑版。

Pöggeler, Otto: 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 Neske Pfullingen 1977.

奥托·玻格勒：《回忆海德格尔》，1977年耐斯克·普甫灵根版。

Pöggeler, Otto: Der Denkweg Martin Heideggers, Neske Pfullingen 1963.

奥托·玻格勒：《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进程》，1963年耐斯克·普甫灵根版。

Popitz, Heinrich: Der entfremdete Mensch, Frankfurt 1967.

海因里希·波皮茨：《异化之人》，1967年法兰克福版。

Post, W.: Kritik der Religion bei Karl Marx, München 1969.

W·波斯特：《卡尔·马克思的宗教批判》，1969年慕尼黑版。

Post, W.: Kritische Theorie und metaphysischer Pessimismus. Zum Spätwerk Horkheimers, München 1971.

W·波斯特：《批判理论与形而上学悲观主义，论豪克海默的晚期著作》1971年慕尼黑版。

Post, W.: Max Horkheimer: Die Widersprüch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Grundprobleme der großen Philosophen. Philosophieder gegenwart IV, göttingen 1981, S. 106—146.

W·波斯特:《马克思·豪克海默: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性》,载于:《大哲学家的基本问题》,《当代哲学》第4期,1982年格丁根版,第106--146页。

Ranciere, Jacques: Der Begriff der Kritik und 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ternationale Marxistische Diskussion 28, MerveVerlag, Berlin 1972.

雅各奎·伦西亚:《批判概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8届国际马克思主义讨论会,梅伏出版社1972年柏林版。

Rohrmoser, G.: Das Elend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eiburg 1970.

G·罗莫泽:《批判理论的贫困》,1970年弗赖堡版。

Rudasl, Ladislaus: Orthodoxer Marxismus, in: Arbeiter — Literatur 1924 Nr. 1—12 und Sonderheft, vollständiger Nachdruck in zwei Bänder, Berlin1977, Bd. 1.

拉迪斯劳司·罗达斯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载于:《劳工文学》,1924年第1—12期及单行本,两卷本的再版本,1977年柏林版,第1卷。

Sartre, Jean — Paul: Marxismus und Existentialismus, Versuch einer Methodik, Erstveröffentlichung Libraire Gallimard, Paris 1960, deutsche Ausgabe. Reinberk bei Hamburg 1964.

让·保尔·萨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对一种方法的探求》,利伯莱尔·加利曼特首版,1960年巴黎版,德文版,1964年汉堡雷伯克版。

Sartre, Jean—Paul: L'être et le neant, Gallimard Paris 1943; deutsche Ausgabe, Das "sein" und das "Nichts", bearbeitet, hrsg, und übersetzt von J, streller, Rowohlt, Hamburg 1952. 让·保尔·萨特:《存在与虚无》,1943年巴黎加利曼特版;德文版《存在与虚无》,由J·斯特莱勒,罗伏尔特编辑出版和翻译,1952年汉堡版。

Saß, Hans—Martin: Nachwort zu Feldzüge der reinen Kritik, Frankfurt 1968, S. 224—267.

汉斯·马丁·萨斯:《〈纯粹批判战场〉之跋》,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224—267页。

Saß, Hans—Martin: Kudwig Feuerbach, Reinbek bei Hamburg 1978.

汉斯·马丁·萨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978年汉堡雷伯克版。

Schack, Herbert: Marx—Mao—Neomarxismus, Wandlungen einer Ideologie, Frankfurt 1969.

赫伯特·夏克:《马克思、毛泽东、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1969年法兰克福版。

Scharf, Henny: Marx, Lenin, Marcuse und der Sozialismus, in: 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Ges. —Sprachw. R. XVII (1968) 4, S. 485—493. 亨尼·夏夫:《马克思、列宁、马尔库塞和社会主义》,载于柏林洪堡大学科学杂志《社会语言学》,第17期(1968年4月),第485—493页。

Schmidt, Alfred: Existential—Ontologie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bei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1968, S. 17—49.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生存本体论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1968年法兰克福版，第17—49页。

Schmidt, Alfred: Die Kritische Theorie als Geschichtsphilosophie, München—Wien 1976.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作为历史哲学的批判理论》，1976年慕尼黑—维也纳版。

Schmidt, Alfred: Zur Ide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in: Zur Ide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m 1979, S. 7—35.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关于批判理论的思想》，载于《批判理论的思想》，1979年法兰克福版，第7—35页。

Schmidt, Gerhart: Vom Wesen der Aussage, Meisenheim 1956.

盖哈特·施密特：《陈述的本质》，1956年曼森海姆版。

Schmidt, Gerhart: Hegel in Nürnberg, Untersuchungen zum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Propädeutik, Tübingen 1960.

盖哈特—施密特：《纽伦堡时期的黑格尔，对哲学基础知识的问题研究》，1960年杜宾根版。

Schmidt, Gerhart: Aufklärung und Metaphysik. Die Neubegründung des Wissens durch Descartes, Tübingen 1965.

盖哈特—施密特：《启蒙与形而上学，笛卡尔对知识的重新建立》，1965年杜宾根版。

Schmidt, Gerhart: Subjektivität und Sein, Zur Ontologie des Ich, Bonn 1979.

盖哈特·施密特：《主体性和存在，论自我的本体》，1979年波恩版。

Schmidt, Gerhart: Einleitung für kritische Ausgabe "Grund-

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von Ludwig Feuerbach, Klostermann, Frankfurt 1967.

盖哈特·施密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批判本〈未来哲学原理〉的导论》，1967年克罗斯特曼，法兰克福版。

Schmidt, Gerhart: Die Religion in Hegels Staat,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Jg. 74. 1967.

盖哈特·施密特：《黑格尔国家观中的宗教》，载于：《哲学年鉴》，第74年卷，1967年。

Schmidt, Gerhart: Zur Wiederaufnahme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Georg Lukacs' Geschichtsphilosophie, in: Stuttgarter Hegel Tage 1970, hg. V. Hans-Georg Gadamer, Hegel-Studien Beiheft 11, Bonn 1974, S. 635-641.

盖哈特·施密特：《精神现象学在捷尔吉·卢卡奇的历史哲学中的再现》，载于《1970年斯图加特黑格尔大会》，汉斯·捷尔吉·伽达默编，《黑格尔研究附册》，第11期，1974年波恩版，第635-641页。

Schmidt, Gerhart: "Was ist der Mensch?", in: Die Welt des Menschen - 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hrg. v. W. Bremel, Marinus Nijhoff/den Haag 1972. S. 21-37

盖哈特·施密特：《人是什么？》，载于《人的世界——哲学的世界》，W·布莱梅尔编，1972年玛里奴斯·尼吉豪夫—海牙版，第21-37页。

Schmidt, Gerhart: Das Spiel der Modalitäten und die Macht der Notwendigkeit. Zu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n: Hegel in der Sicht der neueren Forschung, Darmstadt 1973, S. 188-206.

盖哈特·施密特：《方式的游戏和必然必然性的力量，论黑格尔的逻辑学》，载于《新研究视野中的黑格尔》，1973年达姆施塔特版，第188—206页。

Schmidt, Gerhart: Karl Marx — Philosoph wider Willen, in: Marx und Marxismus heute, Hg. G. Breitenbürger, G. Schnitzler, (Reihe:) Standpunkt, Hg. Hans — Helmut Röhring, Hamburg 1974, S. 11—26.

盖哈特·施密特：《卡尔·马克思——反对意愿的哲学家》，载于《马克思和当今马克思主义》，G·布莱登布格，G·施尼茨勒及汉斯·海尔默特·罗林编，1974年汉堡版，第11—26页。

Schmidt, Gerhart: Unfreiwillige Dialektik, in: Hegel — Jahrbuch 1974, Hg. Wilhelm R. Beyer, Köln 1975, S. 166—172.

盖哈特·施密特：《强制性的辩证法》，载于《黑格尔年鉴》(1974年)，威廉·R·拜依尔编，1975年科隆版，第166—172页。

Schmidt, Gerhart: Der Begriff der Toleranz im Hinblick auf Lessing, in: Wolfenbütteler Studien zur Aufklärung, im Auftrag der Lessing — Akademie, hrg. V. G. Schulz, Bd. I, Wolfenbüttel 1975, S. 121—136.

盖哈特·施密特：《莱辛的宽容概念》，载于《沃尔芬比特尔的启蒙研究》，由莱辛科学院委托组办，G·舒尔茨编，第2卷，1975年沃尔芬比特尔版，第121—136页。

Schmidt, Gerhart: Leibniz contra Locke — eine Systemkonfrontation, in: Sinnlichkeit und Verstand in der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Philosophie von Descartes bis Hegel, hrg. v. H. Wagner, Bonn 1977, S. 21—32.

盖哈特·施密特：《莱布尼茨反对洛克——一次体系的对话》，载于《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中的感性和知性》，H·瓦格那编，1976年波恩版，第59—73页。

Schmidt, Gerhart: Die Transzendentalität des Seinsgedankens, in: Die Aktualität d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hrg. V. G. Schmidt usw., Bonn 1977, S. 21—32.

盖哈特·施密特：《存在思想的超验性》，载于《超验哲学的现实性》，G·施密特编，1977年波恩版，第21—32页。

Schmidt, Gerhart: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und die Geschichtlichkeit der Philosophie, in: Kulturwissenschaften, Bouvier, Bonn 1980, S. 371—387.

盖哈特·施密特：《历史性的哲学和哲学的历史性》，载于：《文化科学》，1980年波恩，第371—387页。

Schmidt, Gerhart: Essay de Synthèse d'une methode phenomenologique, in: phenomenologie Hegelienne et Husserlienne, ed, G, Planty—Bonjour, 1981, S. 37ff.

盖哈特·施密特：《一种现象学方法综合的尝试》，载于《黑格尔的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G·普朗特编，1981年版，第37页及以下几页。

Schmidt, Gerhart: Das Recht Der spekulativen Erkenntnis, in: 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 Neues Jahrbuch, Bd. 7, 1981, hrg. V. R. Berlinger usw., Gerstenberg, S. 263—276.

盖哈特·施密特：《思辨认识的权利》，载于《哲学的前景，新年鉴》，第7卷，1981年版，R·柏林根等编，盖施藤堡出版，第263—276页。

Skura, Anselm: Max Horkheimer, Stuttgart 1974.

安瑟尔姆·斯库拉：《马克思·豪克海默》，1974年斯图加特版。
Stachr, Gerda von: 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sche Dialektik, Bonn 1973.

盖达·冯·斯泰艾尔：《批判理论和政治辩证法》，1973年波恩版。

Steigerwald, R. ; Herbert Marcuses dritter Weg, Köln 1969.
R·斯泰格瓦尔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1969年科隆版。

Steigerwald, R. ; Wie Rritisch ist Herbert Marcuses "kritische Theorie"? in: Die "Frankfurter Schule " im ; Licht des Marxismus, Zur KritikDer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von Horkheimer, Adorno, Marcuse undHabermas, hg . V. J. H. V. Heiseler, R. Steigerwald und J. Schleifstein. Frankfurt 1970, S. 101—114.

R·斯泰格瓦尔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有多大批判性？》，载于《马克思主义眼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豪克海默、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哲学之批判》，J·H·冯·海斯勒，R·斯泰格瓦尔德和J·斯莱芬施坦编，1970年法兰克福版，第101—114页。

Störig, Hans Joachim; Kleine 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2, Frankfurt 1973.

汉斯·约阿希姆·斯托里希：《简明世界哲学史》，第1—卷，1973年法兰克福版。

Theunissen, Michael; Gesellschaft und Geschichte, Zur Kritik der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1969.

米歇尔·图尼森：《社会与历史，批判理论的批判》，1969年柏

林版。

Thier, Erich; Das Menschenbild des jungen Marx, Göttingen 1957.

埃里希·梯尔：《青年马克思的人的观念》，1957年格丁根版。

Vranicki, Predrag; Geschichte des Marxismus, Bd. I, Frankfurt 1972, Bd. II, Frankfurt 1974.

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1972年法兰克福版，第2卷，1974年法兰克福版。

Wellmer, A.; 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Positivismus, Frankfurt 1969.

A·韦尔梅尔：《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实证主义》，1969年法兰克福版。

Wyss, Dieter; Marx und Freud. Ihr Verhältnis zur modernen Anthropologie, Göttingen 1969.

迪特·维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他们与现代人类学的关系》，1969年格丁根版。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hrg. v. M. Horkheimer, Jahrgang 1—9 (1932—1941). Bd. 1—9, Wiederabdruck, München 1970.

《社会研究杂志》，由马克斯·豪克海默编辑第1—9期（1932—1941），第1—9卷，再版本，1970年慕尼黑版。

Zur Kritik der bürgerlichen Ideologie:

4. N. V. Motrosilova, Marcuses Utopie der Antigesellschaft, Frankfurt 1971;

8. A. Gedō, Der entfremdete Marx, Frankfurt 1971;

10. W. R. Beyer, Die Sünder der Frankfurter Schule,

Frankfurt 1971;

15. R · Steigerwald, *Marxistische Klassenanalyse oder spä-tbürgerliche Mythen*, Frankfurt 1972;

17. R · Bauermann und H - J. Rötcher, *Dialektik der Anpassung. Die Aussöhnung der "Kritischen Theorie" mit den imperialistischen Herrschaftsverhältnissen*, Berlin 1974;

36. G · Belkina, *Marxismus oder Marxologie*, Frankfurt 1975;

57. E. Julier, *Marx - Engels - Verfälschung und Krise der bürgerlichen Ideologie*, Frankfurt 1975;

70. T. I. Oisermann, *Der "junge" Marx im ideologischen kampf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1976.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

4. N. V · 莫托洛施洛伐:《马尔库塞的反社会乌托邦》, 1971年法兰克福版;

8. A · 盖德:《异化了的马克思》, 1971年法兰克福版;

10. W · R · 拜耶尔:《法兰克福学派之罪人》, 1971年法兰克福版;

15. R · 斯泰格瓦尔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或者资产阶级的神话》, 1972年法兰克福版;

17. R · 鲍尔曼和 H · J · 罗彻:《适应的辩证法, "批判理论" 与帝国主义统治关系的调解》, 1974年柏林版;

36. G · 贝尔基那:《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 1975年法兰克福版;

57. E · 犹利亚:《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伪造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 1975年法兰克福版。

70. T·I·奥依瑟曼：《在当代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青年”马克思》，1976年法兰克福版。

Gorman, Robert A. :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Neo-Marxism, Greenwood Press 1985.

罗伯特·A·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人物传记辞典》，格林伍德出版公司1985年版。

Li Yengming: Habermas, Taipei 1986.

李英明《哈伯马斯》，台北1986年版。

Li Zhongshang: Ueber den Neomarxismus, Beijing 1987.

李忠尚《“新马克思主义”析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McCarthy, Thoma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uergen Habermas, Massachusett 1978.

托马斯·麦卡锡《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马萨诸塞1978年版。

后 记

“第三条道路”？——这是人们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始终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其意在探讨并存于当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社会政治制度之外的第三种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一方面，人们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就而欢呼，对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深恶痛绝，为资本主义的衰败而发出日落西山的叹息。另一方面，人们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因其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和其教条的意识形态以及高度中央集权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等现象感到不满，也为资本主义吸取经验教训而在现代工业社会实行“三高”政策，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并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而赞叹和沉思。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人们产生种种疑问：既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有优劣，既然社会主义未能实现世界革命，资本主义也未腐朽和垂死，第三种选择有可能吗？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正是旨在探讨这些问题。本书从概要阐发“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理论体系入手，重点研究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观、社会发展观和意识形态批判观，着重分析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继承发展、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技术意识形态观，进而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第三

条道理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和批判之批判，最终指日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及其理想——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和浪费的社会”，确立“一种人能够真正确定自己存在的生存方式”，实现“解放”等等，不过是寄希望于意识革命，具有浪漫的乌托邦特点。正如他们坦率所言：人们“应该为了解放而斗争。但是我们并不敢肯定，在现实的彼岸等待我们的就一定是自由或者总体性。”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也是作者长期在德国及欧洲留学和客座教研的学术成果之一，是作者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五部学术专著。这使我想起来在莱茵河畔的波恩大学图书馆的五年苦读和在学生公寓的日夜写作，想起在大学课堂上和哲学、社会学会议上的学术讨论，想起与我的导师施密特教授的学术争论；想起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的近两年的客座教研，想起与世界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学术讨论和愉快合作；想起在德意志哲学总会内的学术活动和在学术大会上宣读论文的辉煌；想起德国总统魏茨采克博士等政治家接见的荣耀！……在此，我谨向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施密特（Gerhart Schmidt）、波斯特（Werner Post）、萨斯（Hans Martin Sass）等师长、同事、同学和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有给我很大支持的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 Stiftung）和德国学术交流协会（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本书的前一部分及基础工作得益于后者，本书的后一部分及总纂成书得益于前者，在此谨向他们亦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第二、三、四、五章曾部分或全部于1984年在德国公开出版过，此次由（现在德国某大学工作的、我曾指导的87

级研究生)陈晓锋讲师从德文译为中文,蔺月峰、洪佩玉二位译审作了校订。本书的第六章第二节的内容曾在指导我的研究生胡邦胜(现在中宣部工作)写作硕士学位论文时一起讨论并共同署名发表过。赵占平同志为本书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王世义、刘小灿等同志对本书的立意、谋篇和文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高难度的理论研究项目,需要艰苦不懈的钻研和辛勤的耕耘。算起来从1978年我在中央编译局翻译《马克思学的贫困》起步,继而1979年到中国人民大学研习深造,再到1980年赴德国波恩大学留学,后于1984年回国教研,于1986、1987、1988、1989、1991、1994年多次赴欧美客座教研,已逾17年了!虽有十七年坐冷凳之功夫,但仍觉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尚有很多地方需深入再深入,努力再努力。本人所出的五部专著《早期马尔库塞的马克思论研究》(1984年,德国亚琛版)、《异化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1985年,德国亚琛版)、《“新马克思主义”析要》(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待出)和《第三条道路?》(1994年,学苑出版社版),旨在抛砖引玉,开辟此方面研究之道路。

由于本人学识精力时间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李忠尚

1994年8月于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Zhongshang Li

Der dritte Weg ?

— — — Studi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von Herbert Marcuse und Juergen Habermas

Inhaltsverzeichnis

Interview mit Juergen Habermas als Vorwort

Erstes Kapitel: Der dritte Weg beim Neomarxismus

Einleitung

I . Marcuse und der Neomarxismus

1. Der Begriff des Neomarxismus

2. Der Neomarxismus, die Marxologie und der westliche Marxismus sowie ihre Einheit und Vielfaltigkeit

3. Di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s Neomarxismus

I . Marcuse' Grundgedanken und ihre Entwicklung

1. Die erste Etappe: 1928—1933

2. Die zweite Etappe: 1933—1941

3. Die dritte Etappe: 1942—1964

II . Die Marx—Rezeption von Herbert Marcuse

1. Die Grundtendenz der Marx—Rezeption von Herbert Marcuse

2. Was Marcuse bei Marx entdeckte

(1) Der kritische Charakter des Marxismus

(2) Eine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 (3) Die "Wesensbestimmung des Menschen" als "das eigentliche Fundament der Marxschen Theorie",
 - (4) Der Kommunismus als "eine neue Form des Individualismus"
3. Das Verhaeltnis zu Heidegger, Horkheimer, Marx, Hegel und Lukacs
- (1) Marcuse als Schueler Heideggers
 - (2) Die Hinwendung zur kritischen Theorie
 - (3) Der junger Marx als Bezugspunkt
 - (4) Die Philosophie Hegels als Grundmuster
 - (5) Lukacs als Vorgaenger
4. Die individualistische Utopie Marcuses
- (1) Der "kritische Marxismus" stuetzt sich auf das Bewusstsein
 - (2) Der utopische "humanistische Marxismus"
 - (3) Der romantische Individualismus Marcuses

Zweites Kapitel: Der Marxismus als kritische Theorie

Einleitung

- 1. Darstellung der kritischen Theorie durch Max Horkheimer
 - 1. Die Vorstuf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 2. Die Grundcharakter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 (1) Die zeitliche Differenz
 - (2) Di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Differenz
 - (3) Die Differenz der erkenntnis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 (4) Eher eine philosophische Position als eine bestimmte

Theorie

3. Die Selbststaendigkeit der kritischen Theorie
4. Horkheimers Pessimismus
- II. Marcuses philosophisch—konkrete Auslegung der kritischen Theorie als Marxismus--Kritik
 1. Der Marxismus als oekonomischer, letztlich mechanischer Materialismus
 2. Der Marxismus als ueberholte Theorie des 19. Jahrhunderts
 3. Die Kritische Theorie als "Philosophie" im Sinne einer Modifikation des Marxismus
- III. Marx' Kritik und die "kritische Kritik"
 1. Marx' Kritik
 - (1) "Kritik der Waffen"
 - (2) "Kritik der alten Welt"
 - (3)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 (4) "Dialektik" ist "kritisch und revolutionaer"
 2. Die "kritische Kritik"
 - (1) Die reine "theoretische Kritik" und "die Philosophie des Selbewubtseins"
 - (2) Der "Geist" und die "unkritische Masse"

Drittes Kapitel; Marcuses von Heidegger inspirierte Marx--Interpretation und seine Geschichtskonzeption

Einleitung

1. Marcuses erstes Gesamt--Bild von Marx

- I. Der Marxismus als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1. Der Begriff der "Geschichtlichkeit"
 2. Marcuses Bestimmung der "marxistischen Grundsituation"
 3. Marcuses Theorie der "radikalen Tat"
 - (1) Die mystifizierte "revolutionaere Situation als Bedingung fuer die Verwirklichung der "radikalen Tat"
 - (2) Die Bestimmung der "radikalen Tat"
 - (3) Der Grundcharakter der "radikalen Tat"
 - (4) Der Traeger der "radikalen Tat"
 4. "Intelligible Tat", "Tathandlung" und "permanente Revolution"
 - (1) "Intelligible Tat" und "Tathandlung"
 - (2) "Radikale Tat" und "permanente Revolution"
 - (3) Die Praxis der "permanenten Revolution" durch Lenin
- II. Die missglueckte Vereinigung von Dialektik und Phaenomenologie
 1. Dialektik als "Widerruf" des Vergangenen in der Geschichtlichkeit
 2. Der Phaenomenologie-Begriff von Marcuse
 3. Marcuses Entwurf einer "dialektischen Phaenomenologie"
- IV. Der Begriff der Geschichte bei Marcuse und Marx
 1. Marcuses fruehe Theorie der Geschichte
 - (1) Die "Beziehung zwischen Mensch und Aussenwelt"
 - (2) Die "Geschichtlichkeit des Daseins" als Gesellschaft

2. Marx' Begriff der Geschichte

- (1) Die "Produktion des materiellen Lebens" als "Grundbedingung aller Geschichte"
- (2) Die entscheidende Bedeutung der Produktionsweise fuer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 (3) Die Bedingtheit des "gesellschaftlichen Bewusstseins" durch das "gesellschaftliche Sein"
- (4) Die These von der Ergreifung der "politischen Macht" durch das Proletariat

Viertes Kapitel: Die humanistische Marx--Interpretation

Einleitung

- I. Marcuses "neue Entdeckung" des "eigentlichen Bodens" der Marxschen Theorie
 1. Die "entscheidende" Bedeutung der Sinnlichkeit bei der Marxschen "Wendung von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zur Theorie der Revolution"
 2. Der Marxsche Arbeitsbegriff als "ontologische" Kategorie
 - (1) Die "vorlaeufigste und allgemeine Charakteristik des Marxschen Begriffs der Arbeit"
 - (2) "Arbeit" als philosophischer Begriff
 - (3) Marcuses Ontologie der Arbeit
 3. Das menschliche Wesen als Fundierung der Marxschen Theorie
- II. Die Hegelsche Philosophie als die "wahre Geburtsstaette, und das Geheimnis" der Marxschen Theorie (Marcuse)

1. Hegel und die "grundlegenden Kategorien" von Marx
2. Die Stellungnahme zu Dialektik und Wahrheit in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 III. Die Funktion der "Erkenntnis" bei der Aufhebung der Verdinglichung
 1. Die im Wesen des Menschen begründete Möglichkeit der entaussernten Arbeit
 2. Die die Verdinglichung durchbrechende Erkenntnis als Hebel zur Aufhebung aller Entfremdung
- IV Marx' "wirklicher Mensch" und "die menschliche Emanzipation"
 1. Die Wendung vom abstrakten zum wirklichen Menschen
 2. Der Begriff des "vollendeten Humanismus" und die Emanzipation des Menschen

Fünftes Kapitel: Der individualistische Kommunismus als Aufhebung der Entfremdung

Einleitung

- I. Marcuses Konzeption der "Entfremdung"
 1. Der Kommunismus als "eine neue Form des Individualismus"
 2. Der Gipfelpunkt der Abschaffung der Entfremdung: Die Abschaffung der Arbeit
 - (1) Die These von der Abschaffung der Arbeit
 - (2) Die Konkretion des Gedankens der Abschaffung der Arbeit

(3). Die Arbeit in der 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
(Marx)

II. Erich Fromms Interpretation der Marxschen
"Entfremdung"

1. Der junge Marx als Ausgangspunkt des Marxismus
2. Die Gleichsetzung von Hegels Entfremdungsbegriff mit demjenigen von Marx
3. Die Befreiung des menschlichen Wesens als das Ziel der Marxschen Theorie
4. Die Verwandlung der entfremdeten Arbeit in freie Arbeit als das zentrale Thema von Marx

III. Marcuses Versuch der Verknuepfung von Freud mit Marx

1. Der Konflikt zwischen psychischer 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sstruktur
2. Die Kontroverse zwischen Marcuse und Fromm

IV. Marx' Begriff der "Entfremdung"

Sechstes Kapitel; Marcuses utopische Entwicklungsanschauung
der Gesellschaft

Einleitung

- I. Marcuses Kritik der "eindimensionalen Gesellschaft"
- II. Marcuses Begriffe der "Eindimensionalitaet" und "Integration"
- III. Marcuses Kritik des "eindimensionalen Gedanken"
- IV. Marcuses "Moeglichkeiten der Alternativen" ueber die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und die Kritik der Kritik

Siebtes Kapitel: Marcuses Ideologiekritik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Einleitung

- I. Von der Kritik der traditionellen Ideologie zur Kritik der Ideologie der Technik
- II. Die Verwandlungen einiger traditionellen Begriffe der Ideologie
- III. Marcuses Begriff der Ideologie
- IV. Marcuses Kulturanschauung
 1. Ueber die Verwirklichung der "grundlichen Humanisierung" der "modernen zivilisierten Welt"
 2. Ueber die "Kulturrevolution"
 3. Beurteilung und Kritik

Achtes Kapitel: Der dritte Weg?

Einleitung

- I. Marcuses Gedanken des dritten Wegs
- II. Die Gesamtkritik der Marcuseschen Theorie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1. Die Ueberflusgesellschaft und der Klassengegensatz zwischen Proletariat und Bourgeoisie
 2. Die Funktionen der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in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3. Ueber das Eingreifen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 ins Wirtschaftsleben

Neuntes Kapitel; Habermas' Ideologiekritik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Einleitung

- I. Habermas' Grundgedanken sowie ihre Entwicklung
 1.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2. "Studenten und Politik" und "Protestbewegung und Hochschulreform"
 3.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und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4. Von de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 I. Habermas' Ideologiekritik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1. Grundlage der Habermasschen Ideologiekritik; Marcuses Ideologiekritik
 2. Habermas' Kritik und Entwicklung der Marcuseschen Ideologiekritik; Rationalität und politischer Inhalt der technischen Vernunft
 3. Uebergang der traditionellen Gesellschaft zu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und die betreffenden Kategorien
 4. Die zwei Grundtendenzen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und die ideologische Funktion der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5. Die zwei sogenannten ueberholten Marxschen Kategorien; Klassenkampf und Ideologie

6. Abschaffung der Ideologie und das einzige Protestpotenzial
III . Zur Kritik der Habermasschen Ideologiekritik

Zehntes Kapitel; Habermas der 90er Jahre und die aktuelle Bedeutung unserer Forschung nach d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 I . Neu Beurteilung der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und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sowie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I . Die Moderne- 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III . Die aktuellen Bedeutungen unserer Erforschung der kritischen Theorie sowie des Neomarxismus

Literaturverzeichnis

Nachwort

Danksagung : Juergen Habermas (Frankfurt/M), Gerhart Schmidt (Bonn), Hans Martin Sass (Washintong/Bochum) und Werner Post (Dortmund) danke ich herzlich fuer viele fruchtbare Diskussionen und die gute Zusammenarbeit. Bei der 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 bedanke ich mich vielmals fuer die erfolgreiche Unterstuetzung meines Forschungsprojektes (unter der wissenschaftlichen Betreuung von Juergen Habermas), ohne die die Veroeffentlichung dieses Buches fast unmoeglich waere.

Herr Zhongshang Li, geboren am 23. 9. 1953 in Shaanxi Chinas,

studierte Germanistik, Philosophie, Volkswirtschaft und Politologie an der Universitaet Nanking (1973–1977), an der Chinesischen Volksuniversitaet Peking (1979–1980) und an der Universitaet Bonn (1980–1984). Nach der Promotion der Universitaet Bonn (1984) arbeitete er in der Chinesischen Volksuniversitaet Peking als ausserordentlicher Professor (1986–1991), ordentlicher Professor (1991–1993), Direktor des philosophischen Seminars (1985–1986) und Direktor des Forschungsinstituts fuer Soft Science (Dekan, 1986–1993). Ab den Januar 1994 ist er in der chinesischen Zentralbank, also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ls ordentlicher Professor und stellvertretender Direktor des Forschungsinstituts fuer Finanz- und Bankwesen, taetig. Wissenschaftliche Publikationen: Die Marx-Rezeption des fruhen Marcuse, Aachen 1984; Entfremdungsbegriff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n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Aachen 1985; Ueber den Neomarxismus, Peking 1987; Soft Science und wissenschaftliche Politentscheidung, Peking 1988; Die Reformpolitik und die Aus- und Fortbildung der Beamten in der VR. China, Speyer 1989; Das grosse Lexikon fuer Soft Science, Liaoning 1989; Das neue Denkfabrik, Peking 1990; Die moderne Soft Science, Peking 1991;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 Peking 1995; mehrere Aufsaezte und Uebersetzungen aus dem Deutschen, z. T. aus dem Englischen oder Russischen, ins Chinesische.